

红军长征全史

杨成武

第三卷

雄关漫道

——红四方面军战史

● 武国友 主编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281.405

21
213

红军长征全史

第三卷

雄关漫道

——红四方面军战史

本卷主编 武国友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C

412838

书名题写 杨成武

顾 问 叶 飞

总 主 编 柏福临 刘喜发

本卷主编 武国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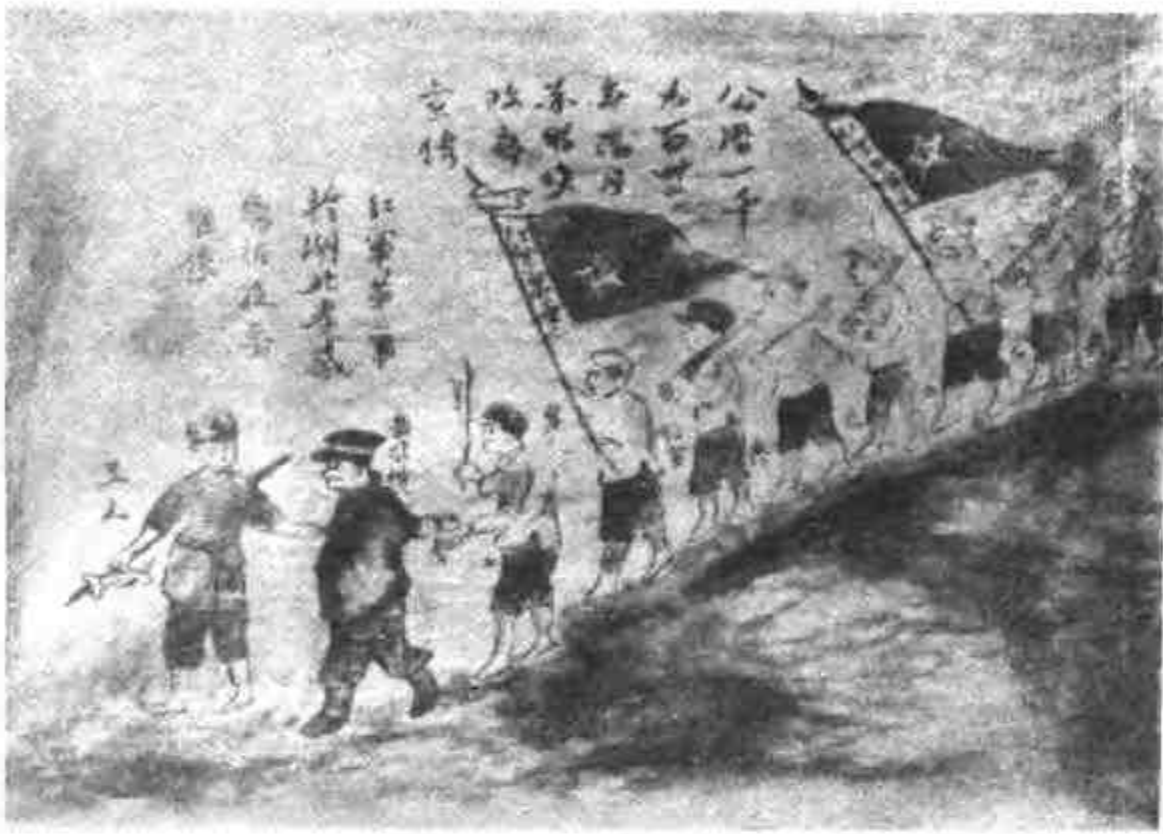
本卷编著 苏 杭 姚金果

紅軍長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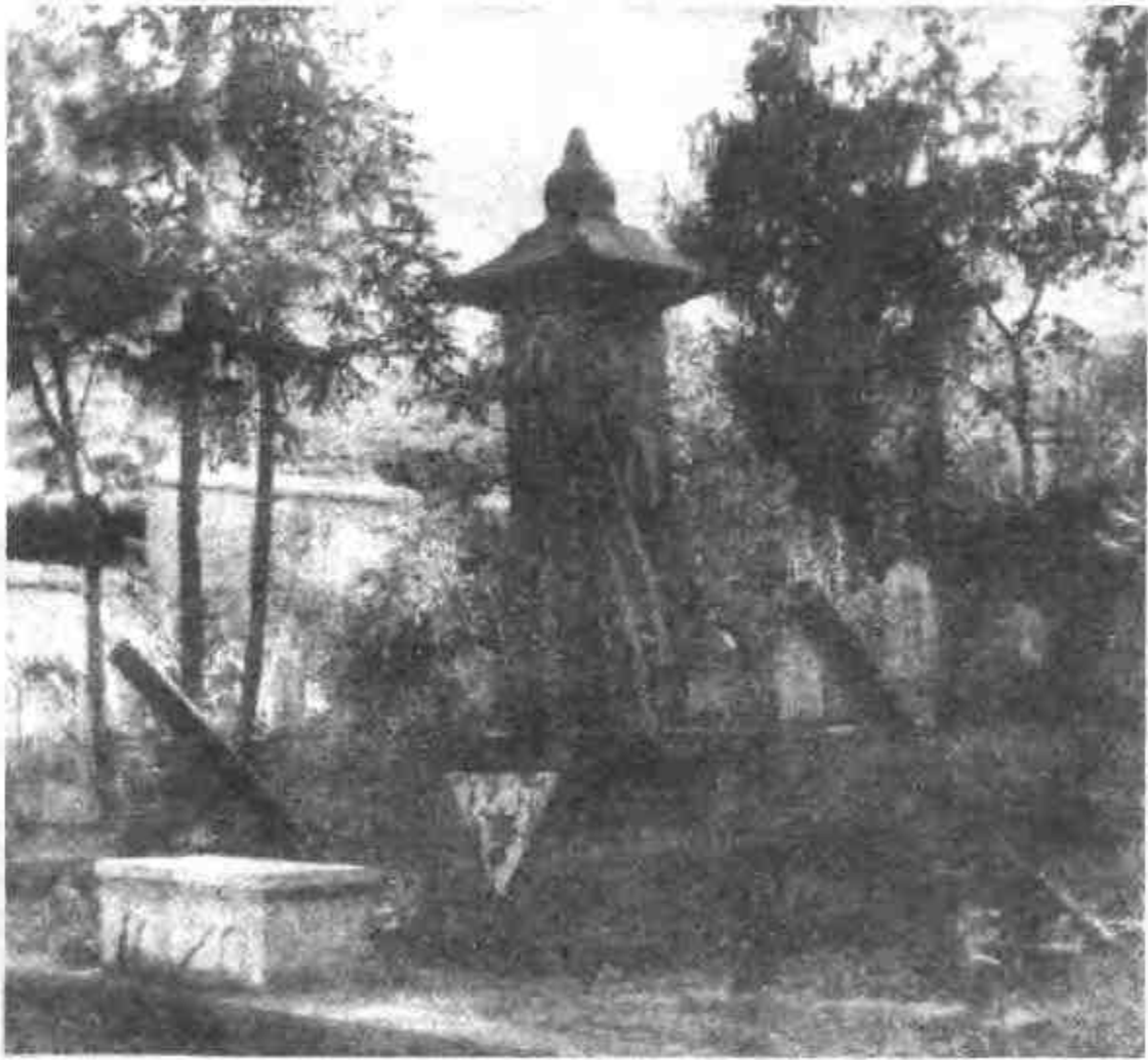
千古流芳

李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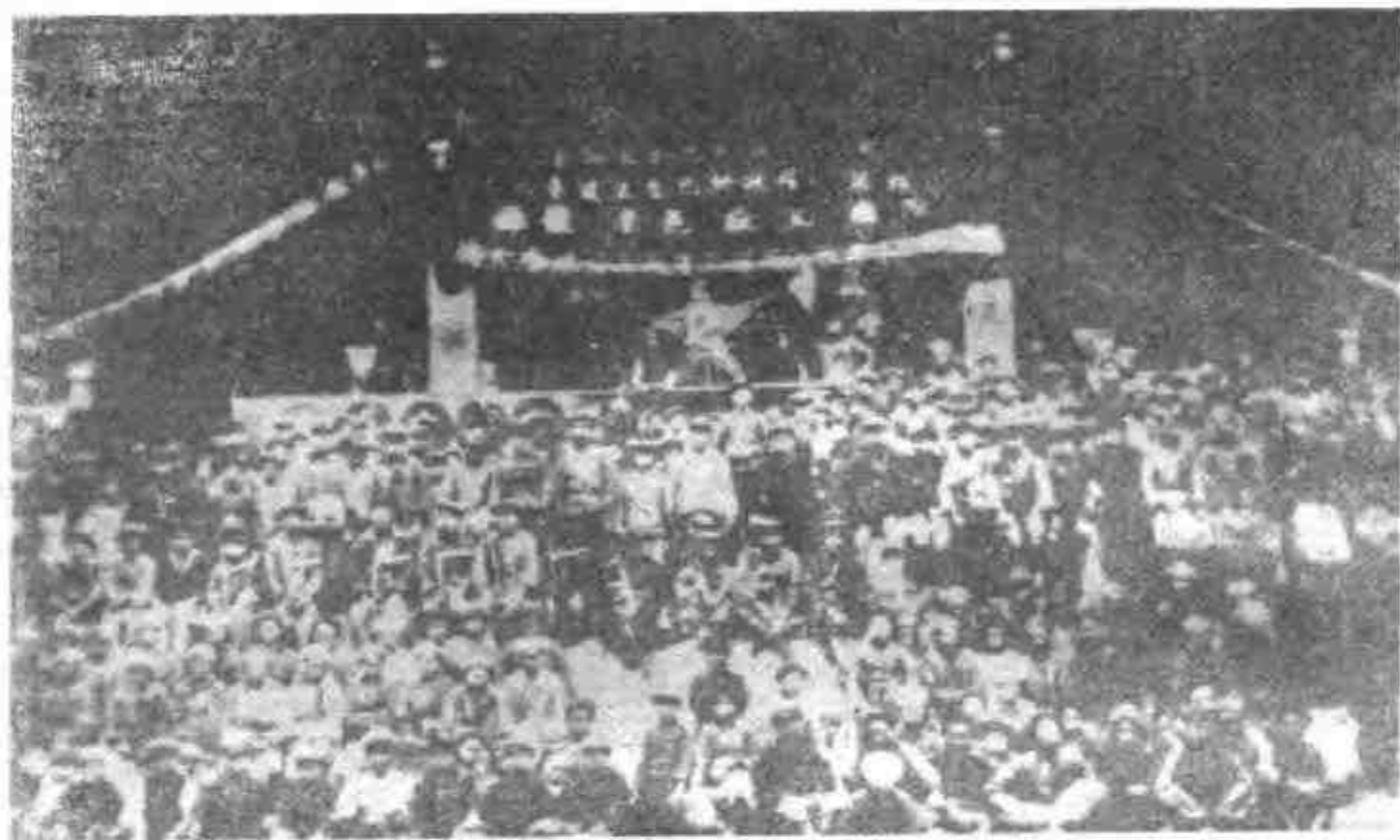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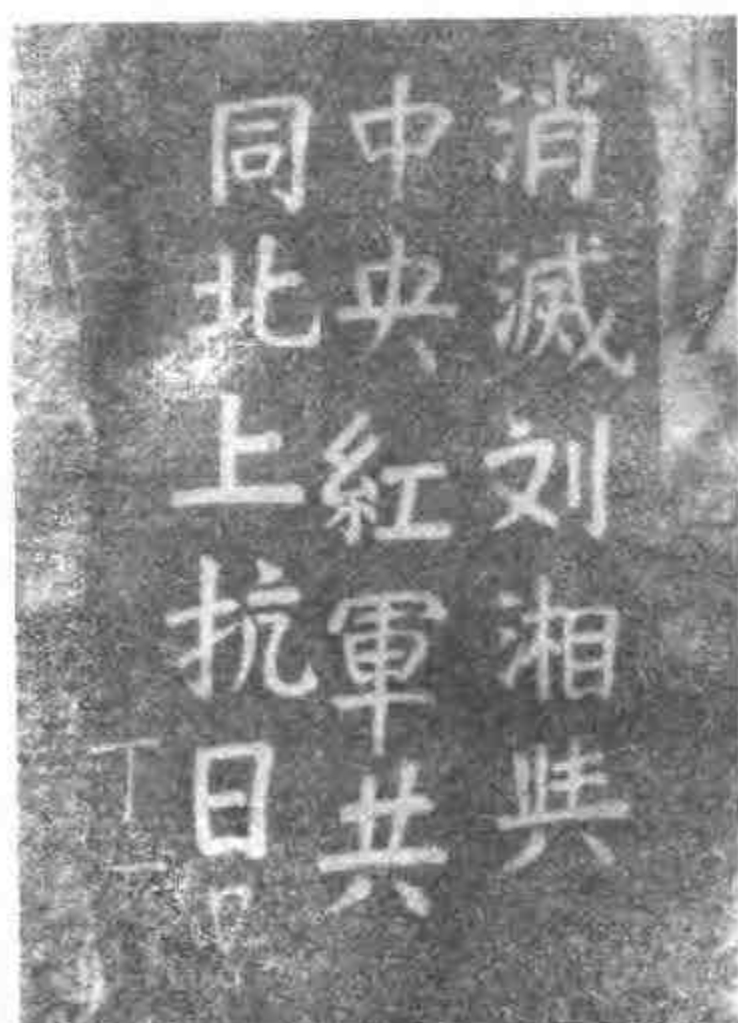
红四军在双桥镇大捷中，全歼敌三十四师，活捉敌师长岳维峻。这是一九三一年工农民主政府在通山燕厦区画的壁画（临摹）



四川省通江县王坪红军烈士墓。一九三五年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后，人民群众将墓碑埋藏地下，保存至解放后重修。碑文由张琴秋题写。



1933年川陕省扩大
红军运动周纪念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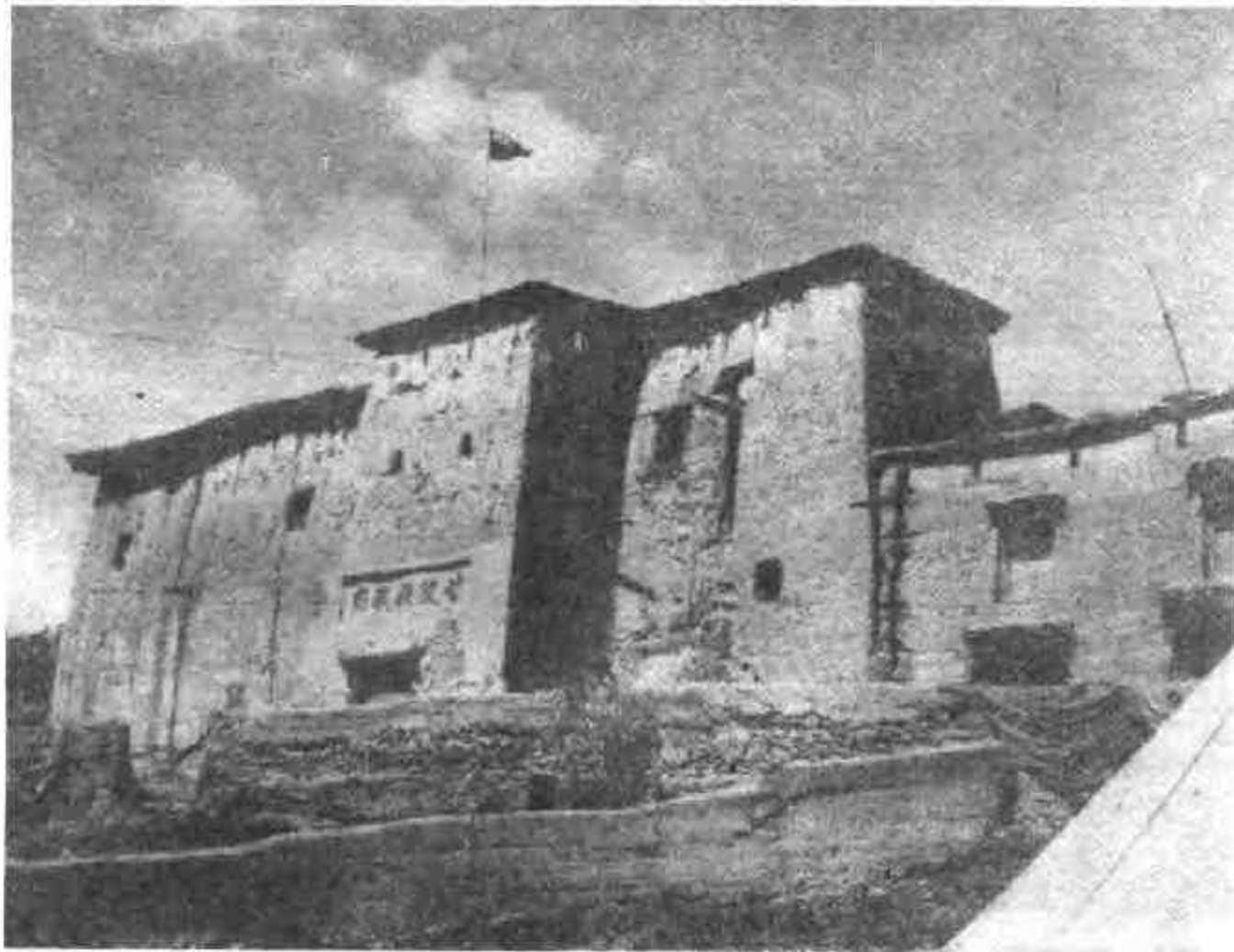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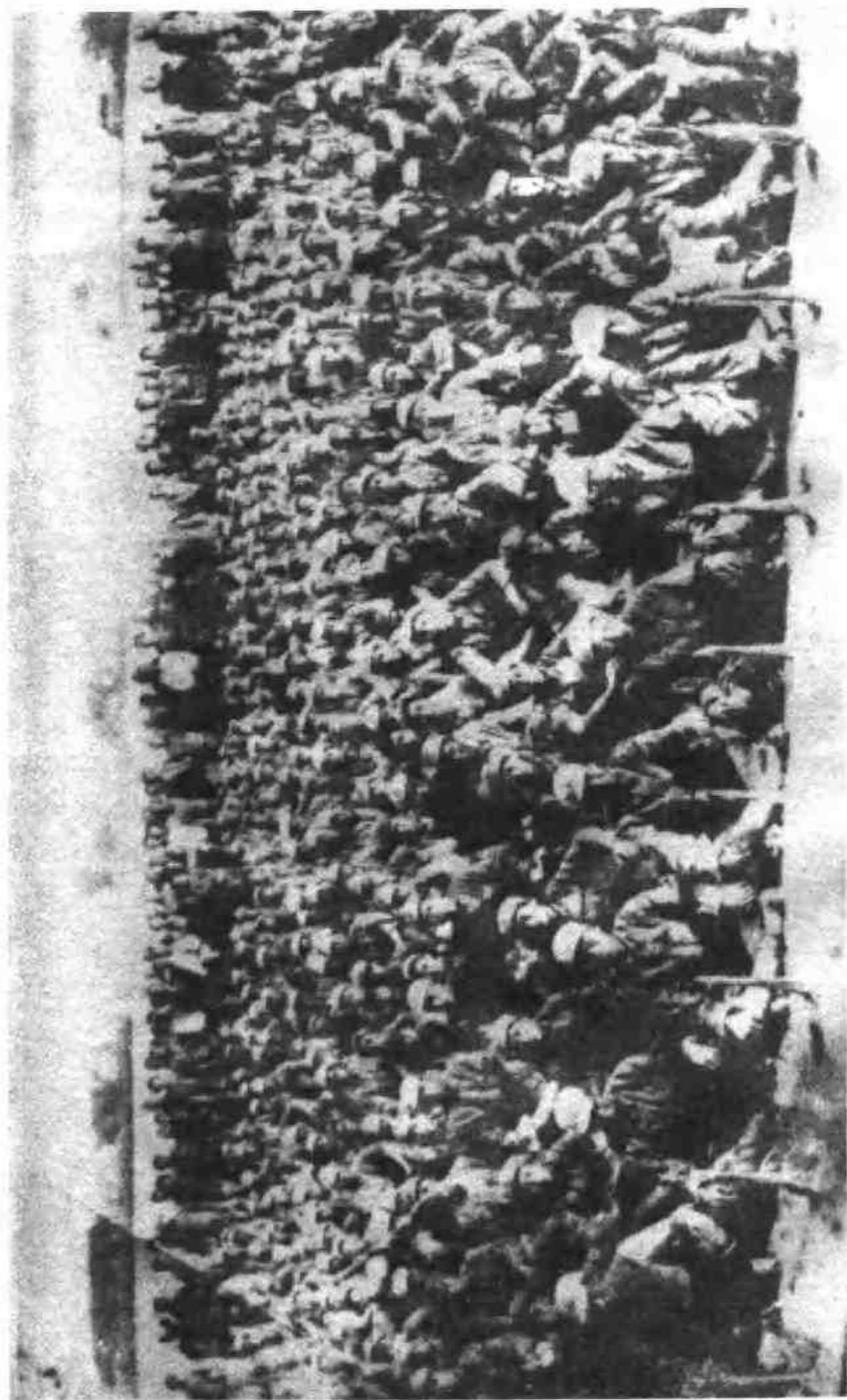
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
刻在石碑上的标语

1935年6月14日，红四方面军与党中央、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桥会台



1936年6月底，红四方面军与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合





1936年10月，长征胜利到达甘肃会宁的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到达陕北的红军方面军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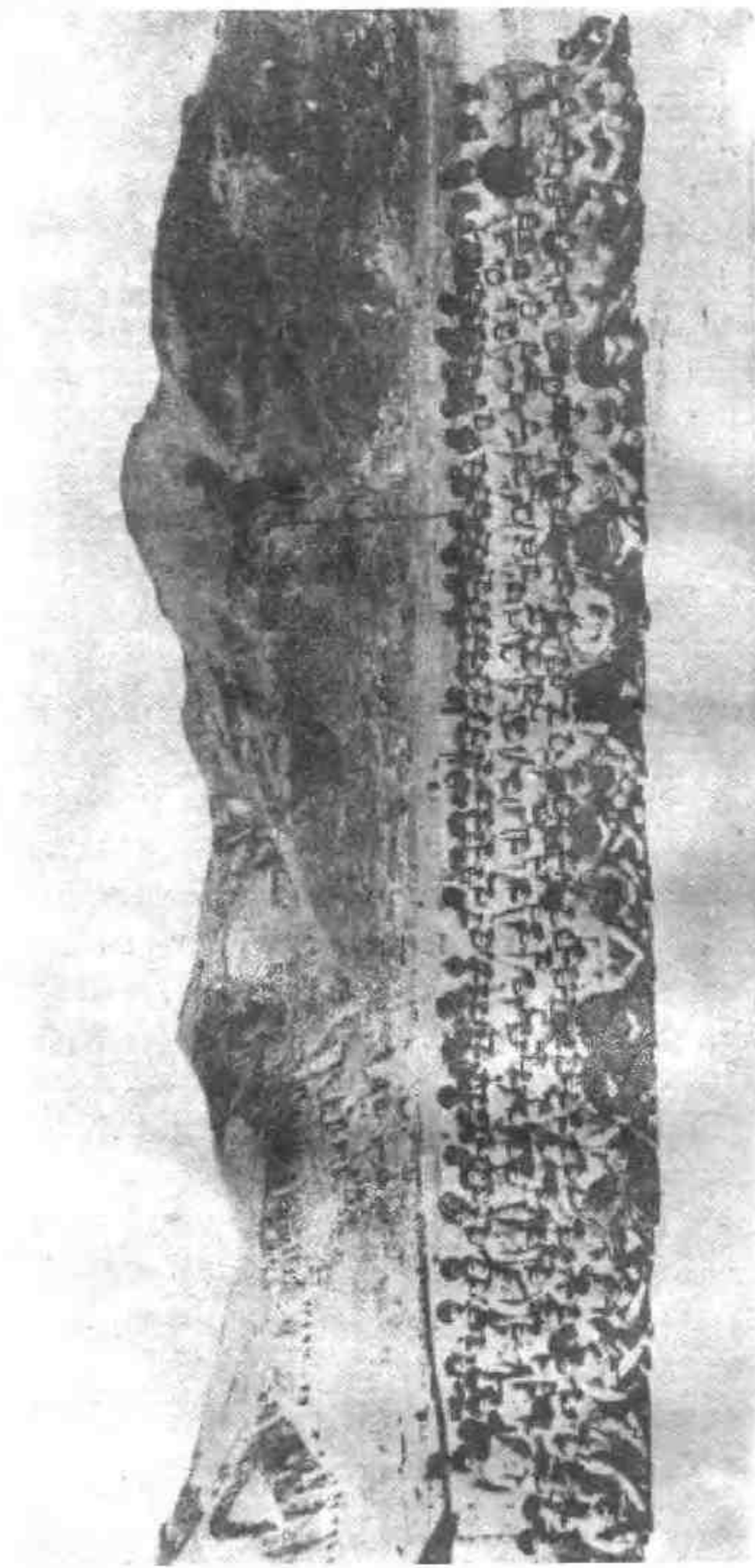


1937年5月1日，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党代表在延安合影

前排(由左至右)：甘泗和(一一)、张吉厚(三)、陈再道(五)、王政柱(七)、赵炳梓(八)、程启光(十)、胡少山(十一)、鲍先智(十二)、王宏坤(十三)

中排：李定灼(左一)

后排(由左至右)：周纯全(一一)、张昌厚(二)、胡奇才(三)、陈生葵(四)、张德发(五)、江波(十二)、王近山(十三)、陈锡联(十四)、陈美藻(十五)



李先念率领西路军部分指战员，在党中央关怀下，由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回到延安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艰苦西征三千里

- 一 徐向前打痛了蒋介石..... (1)
- 二 蒋介石坐镇武汉“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16)
- 三 生死决斗漫川关 (34)
- 四 红旗漫卷通南巴 (56)

第二章 大战川陕

- 一 志大才疏的田颂尧 (78)
- 二 川北红旗扬 (97)
- 三 万源大决战..... (126)
- 四 强渡嘉陵江..... (165)

第三章 抚边相会

- 一 “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中央红军..... (193)
- 二 拥抱..... (206)
- 四 拉拉扯扯..... (216)

第四章 争 论

- 一 两河口会议..... (222)
 - 二 喜怒芦花镇..... (229)
 - 三 波澜再起沙窝..... (240)
-

四 毛儿盖重定大计····· (249)

第五章 分 裂

一 张国焘排除异己····· (255)
二 分路北上····· (263)
三 事出噶曲河····· (274)
四 分道扬镳····· (286)

第六章 南下之旅

一 张国焘另立“中央”····· (291)
二 崎岖的南征路····· (310)
三 争取张国焘····· (322)
四 西进甘孜····· (331)

第七章 从甘孜到会宁

一 甘孜相会····· (345)
二 二次北上····· (361)
三 曲折的征程····· (373)
四 会宁会师····· (392)

第八章 悲壮！西路军

一 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400)
二 转战河西走廊····· (414)
三 血战倪家营子····· (433)
四 兵败祁连山····· (444)

主要参考文献····· (454)

第一章 艰苦西征三千里

一 徐向前打痛了蒋介石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处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控制了该地区就可以“北窥豫中，南瞰武汉，东控江淮平原，西扼京汉铁路”^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就像一把钢刀插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脏地区，令蒋介石反动集团日夜坐卧不宁。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自1927年11月13日掀起黄（安）麻（城）起义，后经商（城）南起义、六（安）霍（山）起义数年的浴血奋斗，到1930年春便发展壮大起来。鄂豫皖红军由最初的几十个人，发展成为拥有1个军12500余人的主力红军，并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二次“围剿”，进一步得到发展壮大。

1931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直接领导鄂豫皖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1931年11月7日，湖北省黄安县城正北的七里坪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欢声雷动。西门外的倒水河清澈明亮，河水中倒映着的巍巍大别山显得庄重宁静。宽阔的河床铺满雪白的碎沙石，与河滩上如林的红旗、耀眼的刀枪交相辉映。

这天，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军民在这里举行盛大的庆祝大会，热烈欢庆十月革命节14周年，欢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周围的田坎山坡上，聚集着数万名前来庆贺的群众，他们是从根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2 雄关漫道

据地各县、区特意赶来的。红军战士大都换上了崭新的棉衣，排着整齐的队伍，精神抖擞地排列在河滩上。从各地赶来的赤卫队穿着各色衣服，扛着长矛、大刀、鸟枪、土炮、“汉阳造”（步枪）也列队在会场中。黄安县张湾乡的乐队，在队长张泽高的带领下进入会场，据说这是中国农民的第一支西洋乐队。这时，全场金鼓齐鸣，军号嘹亮，会场上响起了雄壮有力的《国际歌》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

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领导人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站在设在河岸坡地上的主席台上，面对着一片红色的海洋，心情十分激动。会场上入山入海，鼓声、军号声、欢呼声、口号声连成一片，一阵又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宛如大海的波涛，回荡在河谷中。此时，他们还不知道，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江西瑞金叶坪也在召开着一个大会——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在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成立，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军民的一件大喜事。七里坪，当时被命名为“列宁市”，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居民的屋墙上、店铺的门板上、路口的树干上，到处都贴上了五颜六色的标语，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兴高采烈，有的一家老小都来参加庆祝大会。鄂豫皖中央分局在这个盛会上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下辖第四和第二十五两个军，总计兵力3万人。徐向前任总指挥，蔡升熙任副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

年仅30岁的总指挥徐向前和25岁的政委陈昌浩，身穿洗得平平整整的灰布军装，骑着两匹高大的战马，在雄壮的军号声中检阅了部队。徐向前和陈昌浩分别在会上讲了话。徐向前说：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是鄂豫皖苏区红军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标志，是党领导鄂豫皖苏区人民和广大红军指战员四年英勇斗争的胜利成果。他号召全体指战员，要团结一心，戒骄戒躁，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而努力奋斗。

担任阅兵总指挥的王树声精神焕发，庄重地发出号令：红四方面军成立庆祝大会阅兵式开始。在雄壮明快的军乐声中，以红旗为先导，部队分列式整齐地通过主席台。走在最前面的是彭（湃）杨（殷）军政学校的学员，接着是红军的主力部队，后面是赤卫队员，他们神情严肃，迈着整齐的步伐，目光一致地向主席台上行注目礼。四乡云集到七里坪的民众，自发地摹仿着部队队伍的步子，尾随着受阅部队通过主席台，他们振臂欢呼着，歌唱着，源源不断地向前、向前……

红四方面军刚刚成立，便立即投入到第三次反“围剿”的斗争中去，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此而达到极盛时期。

黄安（今红安），位于大别山南麓，是鄂东北重镇。此时为鄂东敌人靠近根据地中心的最大前哨基地，守敌是第六十九师的两个旅共4个团。师长赵冠英，由于瞎了一只眼，人称“赵瞎子”。他的部队是国民党“围剿”军中的杂牌军，战斗力不强。而且窜入黄安时间不长，人地生疏，城内存粮不多，主要靠后方接济。从地形和交通情况来看，敌六十九师显然处于孤立突出的地位。鉴于敌人各种不利因素，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进行黄安战役，先打黄安之敌。11月10日夜，红四方面军成立后的第四天，黄安战役打响，拉开了鄂豫皖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帷幕。

黄安战役开始后，红军首先插向黄安城的外围地带，夺取要

点，控制重镇。经过十多天的战斗，全部肃清了县城外围敌 8 个据点，完成了战役的第一步，包围县城。随即转入第二步作战，围城打援。

敌师长赵冠英举着望远镜站在城防的制高点——城东北的课子山据点工事里，向城外观看。他看到和听到了一派极为令他心惊胆颤的情景：在他的部队丢弃的外围据点上，无数的红旗迎风招展，人声鼎沸。这情景使他感到绝非只有五六个团的红军！赵冠英怀疑他的情报人员的报告是否属实，红军主力到底有多少？他真有点迷惑了。赵冠英接连向武汉发出告急电，要求救援黄安，这正好中了徐向前总指挥“围城打援”之计。

敌人被困月余，粮弹将尽，油盐已绝，衣破被薄，饥寒交迫；加之外援无望，突围不易，军心颓唐，内部倾轧，士气极为低落。驻宋埠的敌三十师看到赵冠英部陷入如此之困境，不免有兔死狐悲的感觉，师长彭振山率三十师两个旅向黄安救援。红三十三团经桃花镇诱敌进至红军主阵地嶂山地区后，埋伏在两翼的红三十团、三十一团突然向敌发起猛烈反击，一举歼其先头团，其余敌人在红军的凌厉攻势之下慌忙溃逃。12月18日，敌葛云龙三十三师和三十师一个旅共 8 个团从歧亭、宋埠再次北援，猛攻嶂山阵地。担任打援主力任务的红十一师在师长王树声的指挥下，于嶂山地区与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嶂山战斗是黄安战役关键的一仗，能否夺取战役胜利在此一举。似乎敌人也意识到此役的重要性，摆出一副“玩命”的架势，凶狠地向红军阵地猛扑过来。红军阵地一度被突破，敌人一直进至红十一师指挥所附近，红十一师师长王树声、政委甘济时当即组织手枪队、通信队、机关人员及三十一团一部与敌激战、肉搏……情况万分危急！徐向前总指挥闻讯后立即带总部手枪营飞速赶往阵地，同时下令总预备队投入战斗。

“徐总来了！”

“总指挥到前线来啦！”

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大大鼓舞了正在奋战的红军官兵。王树声师长号召大家：“同志们，狠狠打呀！我们人在阵地在，寸步不退让！”红军官兵们顿时精神振奋，力量倍增。

徐向前总指挥带领的手枪营，如“天兵天将”突然出现在阵地上，“顿时，军号声、冲杀声、枪声、炮声，震撼山谷，威慑敌胆。冲到离敌人二三十米远的地方，我们连100多支驳壳枪，像一把扇形的铁扫帚，‘哗’一扫，敌人立即倒下一片。红军战士冲进敌群中，跳进工事里，开枪打，举刀砍，与敌人混战在一起”。“敌人伤的伤，死的死，一个个嚎叫着溃逃了。我们乘胜追击，无数面红旗迎风招展，驳壳枪上的红穗子，军号、马刀上的红绸子，在空中飞舞着。敌人被打得丧魂落魄，抱头鼠窜”^①。

经过三个昼夜的激烈战斗，红军彻底打垮了援敌。敌之4个旅，被红军消灭近半，弃尸千余具，余敌逃往宋埠、黄陂，再也不敢复出。久困黄安，原已奄奄一息的“赵瞎子”，得知援兵将到，又给其喽啰门打气，梦呓般地叫嚣“胜利在望”，并蠢蠢欲动，准备夹攻红军。哪晓得，援兵在红军的猛烈打击下彻底崩溃，赵冠英就像泄了气的气球，彻底绝望了。

12月22日，黄安雪后初晴。在黄安东北面100多里的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的机场上，红军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正“整装待发”。“列宁号”飞机，原本是德国制造的国民党空军高级教练机。1930年3月16日，该机由龙文光驾驶从南京回四川，因大雾迷失方向，汽油耗尽，迫降到宣化店西南20里的陈家河附近的河滩上。龙文光成了俘虏。后来，飞机被运到新集。龙文光在红军的的教育下决定留下来为红军服务，飞机亦改名为“列宁号”。但是，谁都知道，那时候，飞机一旦上了天，谁也无法控制，只有驾驶员才能操纵。龙文光虽说同意为红军服务，但谁又能保证他不会

^① 秦基伟：《黄安大捷》，《艰苦的历程》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1页。

再飞到南京或是其他什么地方？这是红军的第一架飞机，如果它再返回南京，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年轻气盛，有胆有识的红军政委陈昌浩真有办法，他带着枪，拿着手榴弹坐在后座上跟着飞机上了天。……此时，“列宁号”正挂着炸弹向黄安飞来。陈昌浩裹着一件棉大衣戴着皮帽和眼镜，坐在飞机后座上紧张地注视着地面的目标。山川、田野、村镇，急速在机翼下掠过，龙文光沉着地驾驶着这架德国造容克飞机。黄安县城很快进入视野，龙文光示意陈昌浩做好准备。

黄安的敌守兵们，看见天上来了飞机，顿时从极度的沮丧中兴奋起来，他们在地面上纷纷举起双手向飞机挥舞，随着飞机喊叫、奔跑。飞机按照计划低空绕城一周，陈昌浩把大把的传单撒了下去，花花绿绿的传单在空中随风飘落。敌守兵们没有失望，他们还在奔跑，盼望飞机能投下食物，他们饿疯了。“列宁号”在空中盘旋。敌官兵们瞪着眼睛盯着飞机转悠，他们感到有些迷惑：今天这飞机怎么回事？其实，这是“列宁号”在寻找目标。当龙文光把飞机驶向敌人城防的制高点课子山时，陈昌浩把迫击炮弹投了下去，又把集束手榴弹投了下去。

“天啊！共军的飞机！”敌人这才明白过来，一个个惊慌失措，拼命躲藏，四处逃散。

“列宁号”炸毁了课子山核心工事，红军黄安独立团乘机猛攻课子山，守敌一个营大部被歼。“列宁号”安全返航。陈昌浩迈快要冻僵的双腿，摇摇晃晃地走下飞机，同前来迎接的同志们握手致意，并向他们介绍：“这是我们的龙文光同志。”^①

“列宁号”参战，是中国红军历史上第一次由自己的“空军”配合作战。

当天夜里，红军即开始发起总攻。徐向前带领红军主力部队

^① 范青：《陈昌浩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页。

攻城，陈昌浩率部分红军部队和赤卫队在郊外围歼逃敌。总攻于22时打响，红军像下山的猛虎直扑城垣，担任主攻的红三十五团首先登上西北角城墙，随即向城内发展。赵冠英在城池已破，挣扎无望的情况下，又耍了个花招，一面令部队向南门突围，一面准备化装潜逃。在逃命之前，为避人耳目、蒙混过关，他让秘书扮成他的模样，骑上他的大白马，率队从南门突围；“赵瞎子”则混在乱兵丛中，带着手枪队从西门溜出城。无奈，假赵瞎子一出城就当了俘虏，揭穿了赵冠英的老底。从南门突围的敌军大部被红三十四团冲散，部分敌人被红三十四团、三十五团逼进城去，并尾追溃敌突入城内，与敌展开巷战。战至午夜，城内之敌被红三十四、三十五团歼灭。

突围出城的5 000余名敌军，则被陈昌浩政委率领的红军部队团团围住。红军战士的喊话声四起：

“白军士兵，你们已被包围了！”

“缴枪不杀！”

“你们不要为赵冠英卖命！”

红军的政治宣传工作对这些惊魂未定的敌兵产生了极大的作用，成班成排地缴枪投降。陈昌浩下令缩小包围圈，彻底搜剿残敌。天亮时战斗已经结束，赵冠英下落不明。

中午时分，几名赤卫队员押来一个胖老头，此人一身短打扮，一条肮脏的绷带蒙了半边脸，他一口咬定自己是伙夫。陈昌浩政委一把扯掉了那条绷带，赵冠英原形毕露。至此，黄安战役胜利结束。

黄安战役历时43天，我军先后共歼敌1.5万余人，其中俘敌师长赵冠英以下近万人，缴枪7 000余支、迫击炮十余门、电台一部。这次胜利，使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等县革命区域连成了一片，迫使南线敌人处于守势，不敢轻易向我根据地进犯。

为了纪念黄安战役的胜利，苏区军民在黄安县城召开了隆重

的庆祝大会，并宣布将黄安县改名红安县。

黄安大捷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乘胜扩大根据地，把鄂豫边和皖西两块根据地连接起来。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准备新的战斗做了巨大的努力。1931年12月25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为迅速完成扩军任务及动员方法的补充通知》的紧急通知第一号，号召各县委和全体同志努力扩大红军。通知说：“红军打下黄安县城缴得枪械数千支，需要迅速扩大红军。现在前方红军所需要的新兵人数在5 000以上，为保障目前大举进攻的策略能够顺利地执行，我们必须非常迅速的完成这一数目。”^①在鄂豫皖根据地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共青团组织的广泛动员下，鄂豫皖根据地广大群众纷纷起来送儿送女参加红军，节省粮食供给红军，抬着礼物慰问红军，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支援红军热潮，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鄂豫皖中央分局下达的扩红任务，黄安独立团和陂安南独立团扩编为独立第一师，不久又成立了少共国际团。

在人民群众空前高涨的革命精神鼓舞下，红军指战员们的战斗士气越来越旺盛，战士们刻苦训练，磨刀擦枪，随时准备投入新的战斗。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认真分析了敌我态势之后决定发起商（城）潢（川）战役。

商城、潢川两城都是豫东南的军事重镇，敌人重兵集结在这个地区。曾万钟第十二师主力位于潢川城区，一部布于城南商潢公路上的北亚港；蒋介石嫡系汤恩伯第二师及唐云山独立三十三旅，布于北亚港东南商潢公路上的傅流店、豆腐店、江家集一线；陈耀汉第五十八师主力驻商城，一部布于商潢公路上的河风桥；戴民权第四十五师驻商城以北、潢川以东的固始地区，与商潢之敌

^①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30页。

互为犄角。

徐向前在部署战役时决定，战役的第一步，先打蒋介石的嫡系汤恩伯第二师，控制商潢公路，切断商、潢两城敌军的联系，对汤恩伯第二师取“腰斩”之势；第二步，相机夺取县城。为此，方面军总部率红四军第十师、十一师、十二师北上，调皖西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西进。

这年冬天，自过了新年就连降几场大雪，蜿蜒起伏的大别山披上了银装，深山沟壑变成茫茫雪海，呼啸的寒风卷着松软的雪粉弥漫山野，把本来就阴沉的天空搅得混混沌沌。红军战士不畏风雪严寒，踏着泥泞不堪的道路向敌人逼近。1932年1月19日拂晓，红十一师向北亚港守敌发起猛烈攻击，激战3日，击溃守敌1个团和援敌4个团，占领了北亚港，切断了敌第二师与潢川第十二师的联系。接着红七十三师从东面，红十二师和十师一部从西面压向盘踞在江家集、杜傅店、河风桥一带的汤恩伯第二师，汤恩伯见势不妙，乘红军尚未合围之前，慌忙北出何集，经潢（川）固（始）大道仓皇逃进潢川。河风桥、龙头桥一带的敌军也急忙逃回商城。至1月26日，长达60公里的商潢公路为红军完全控制。战役第一步的任务胜利完成，商潢战役进入第二步。红四方面军总部鉴于敌第五十八师占据的商城处于红军包围之中，面商城城坚难破，逃至潢川之敌第二师、十二师尚未遭到重创，遂决定围点打援，对商城围而不取。“红军一部兵力，做了个进围商城的样子，攻都没攻，就把援敌吸引面来”。1月31日，“猬集豫东南之敌第二十、十二、七十六师及独立三十三旅共十九个团出动，沿商潢公路向我进攻”^①。“我军获悉大量援敌出动的情报后，当机立断，连夜冒雪急行军，抵杜傅店（即豆腐店）地区筑好工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78页。

事，严阵以待”^①。“我以红十二师担任正面突击任务；十、十一两师置于左侧，七十三师置于右侧，担任两翼迂回包抄的任务。”^②2月1日清晨，敌人向杜傅店蠕动，红十二师三十四团一营于上午9时首先打响。红军的作战对手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二师汤恩伯部，其装备好，战斗力也不弱。红十二师的3个团抗击敌人10个团的轮番进攻，战斗任务异常艰巨，阵地多次被敌人突破，红军战士硬是用手榴弹和大刀把敌人一次又一次地赶了下去。红十二师死死顶住敌人的疯狂进攻，激战至下午，红十、十一师左侧迂回成功，包围了汤恩伯第二师和曾万钟第十二师两个指挥部，并抢占傅流店渡口，切断了右路敌人的后路。敌军心动摇，全线慌乱，我正面和左翼部队乘势向敌猛攻。兵败如山倒，数万敌军纷纷向北夺路逃命。一贯飞扬跋扈的蒋介石嫡系汤恩伯第二师，在我军打击下溃不成军。“数万敌兵犹如雪山崩溃，一败涂地。丢在雪地上的枪弹和物资，一堆一堆的到处皆是。”^③

红军战士则像虎荡羊群，所向披靡，摧枯拉朽一般扫荡敌人。夜幕降临，大地笼罩在一片昏暗之中，漫天大雪纷纷扬扬飘落下来，红军冒雪跟踪追击，直追抵潢川近郊，并在城东的十里头给敌第七十六师以沉重打击。红军铁一般“榔头”砸在汤恩伯头上，痛在蒋介石心上，打出了红军的威风，吓得商城守敌心惊胆战，乘红军主力尚未回师之际，弃城而逃。商潢战役，红军“以十多个团的兵力击败优势装备的敌人19个团，打断了蒋介石嫡系第二师的脊梁骨，很有意义。”^④蒋介石因为汤恩伯在商潢战役中的失败，一怒之下撤了他的第二师师长职务。

①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艰苦的历程》上，第13页。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78页。

③ 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页。

④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79页。

商潢战役历时 15 天，歼敌 5 000 余人，缴枪 2 000 余支，拔掉了敌人横插在鄂豫边和皖西之间的据点，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三月的大别山，迎来了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此时，漫山遍野的山花竞相开放，姹紫嫣红，随风摇曳，峰峦起伏的山间，流淌着清澈的溪水，岸边的青松、翠竹、绿柳、白杨透出一片盎然生机。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并不甘心失败，蒋介石调兵遣将，准备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

徐向前认真总结了黄安大捷和商潢战役的战斗经验，针对皖西地区敌陈调元部已进占六安以南之苏家埠和青山店一线，准备继续向根据地进攻的情况，认为应先打皖西之敌。陈昌浩政委也认为这样做正确，支持向皖西进兵。3 月 20 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在六安独山镇召开了军事会议。徐向前在会上指出：苏家埠是敌人在皖西的前哨据点，岳盛暄四十六师一三八旅全部和一三六旅旅部带一个团驻苏家埠。敌以苏家埠为枢纽，沿淠河东岸的韩摆渡、青山店、马家庵，北迄六安城，南至霍山，总共部署了 6 个旅 12 个团。我方面军总部的决心是：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支援掩护下，主力全部东渡淠河，从侧后包围苏家埠、韩摆渡和青山店，运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原则，消灭敌人。徐向前强调，有大气魄才能打大胜仗；下大决心才能有大胜利。围点和打援，围点是手段，打援是目的，围点要打持久战，打援要打速决战，歼灭战。一定要将苏家埠的守敌死死围困，防其突围，逼其投降。以“围点”为钓饵，把来自六安、霍山，以及合肥、蚌埠方向的援敌，引出来放在陡拔河以东的广大地区一举歼灭。^①

1932 年 3 月 21 日夜，红军在青山店以西的两河口，临时架了一座浮桥，趁着沉沉夜幕，迅速而隐蔽地渡过了淠河。红七十三

^① 徐深吉：《苏家埠战役》，《艰苦的历程》上，第 239 页。

师和霍山独立团，首先包围了青山店的敌人；红十师和十一师，绕过青山店向北疾进，当先行的红十师进至芮草洼，即与苏家埠出援青山店的敌人遭遇，红十师在歼敌1个营后，乘胜追击前进，突然包围了苏家埠；红十一师继续向北疾进，驻守马家庵、韩摆渡之敌仓皇窜逃进六安城内，红十一师跟踪而进，一直逼进六安城郊。3月23日敌岳盛暄部一三七旅、警备二旅各1个团，出六安城南下，企图增援苏家埠，红十一师、十师立即对敌施行南北夹击，敌人慌不择路，一三七旅1个团逃进了韩摆渡据点，警备二旅1个团则窜入了苏家埠据点。随后，红十一师一部和六安独立团奉命包围了韩摆渡的敌人。至此，红军完成了分割包围敌人的任务。

红军将敌围困在3个据点里，并不急于攻打，而是将部队部署在六安到韩摆渡、苏家埠之间地区，占据有利地形，修筑工事，准备打击来自六安方向的援敌。3月底，敌岳盛暄四十六师从六安倾巢出动，敌警备二旅从霍山出动企图南北夹击红军，在红军的打击下，岳盛暄率残部仓皇逃回六安，警备二旅亦被迫退回原地。战斗过程中，青山店守敌冒死突围，被歼过半，残部逃入苏家埠，青山店被红军占领。敌人增援不成反而损兵折将，红军则将苏家埠和韩摆渡围得像铁桶一般。

到4月中旬，苏家埠、韩摆渡两处守敌已到了焦头烂额的地步，弹缺粮尽。詹才芳将军回忆：“我们围困苏家埠不到20天，敌人已是外无接济、内吃一空了。站在高处，或通过瞭望哨，可以看到敌人据点里，树叶撸净，树皮剥光，原来是绿油油的麻苗地也露出一片黄土，像被火燎过似的。敌人开始吃树叶、麻苗、草根了，吃得寸草不留。敌机偶尔从上空投放一些食物，由于技术不高，再加上我对空射击的威胁，大部投落在我军阵地上。”“在敌人那里已是日无炊烟，夜无灯亮，官兵饥疲，士气低落之时；在我军阵地上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麻苗绿油油，菜花黄灿灿，草深

林密，一派明媚春色。战士们利用战斗间隙，学文化、学政治、练军事、做游戏，还经常助民劳动。人民群众支援红军的物资也源源不断地送到阵地上。鱼、肉、蛋、菜，应有尽有。”^① 被围困在苏家埠、韩摆渡的敌人士气低落到了极点，而占据六安县城的敌四十六师及其师长岳盛暄乃至安徽省主席陈调元，而对被围的苏家埠、韩摆渡，同样一筹莫展，无计可施，只得频频向蒋介石告急、求援。

4月下旬，蒋介石委任第七师师长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令他率第七师、十二师、五十七师、五十五师及警备一旅共15个团2万余人，自合肥出动，分两路前来救援解围。

对于蒋介石来说，这时还没有把鄂豫皖红军完全放在眼里，他把“围剿”红军的重点放在江西的“朱毛红军”那里。只是不时从鄂豫皖传来的坏消息经常使他感到心烦。赵冠英全军覆没、汤恩伯大败而逃，如今又接安徽省陈调元电报说徐向前围住了他上万人。这使得蒋介石不得不考虑怎样对付徐向前了。不过蒋介石还是认为徐向前没有什么了不起，有厉式鼎所带的2万人马足够应付徐向前。厉式鼎也没有把徐向前放在眼里，他仗着人多装备好，气焰嚣张，毫无顾忌地向苏家埠、韩摆渡方向扑过来。

苏家埠、韩摆渡两个据点都在淠河东岸河边上，敌人由东向西压过来，红军如果顶不住，后果不堪设想。当时红军只有两万人枪，背后是河水猛涨的淠河，红军没有退路，用徐向前的话说“弄不好要被压下淠河‘放鸭子’”^②。情况反映到了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上。张国焘感到情况比较严重，他有些犹豫了，敌众我寡，背水作战，这是兵家大忌，搞不好的话要吃大亏的！他不想打了。

^① 詹才芳：《苏家埠战役散记》，《艰苦的历程》上，第254页。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83页。

徐向前则主张打，他主张打的理由有四：“一是援敌虽多，但除第七师未经我打击，战斗力较强外，其余的十二、五十五、五十六师等部队，均曾遭受过我军的打击，里面有不少人是我们放回去的俘虏，士气不振。二是敌远道而来，为疲惫之师；我军以近待远，以逸待劳，兵力虽少，胜敌一筹。三是在丘陵地带作战，具有便利发挥我军野战、近战长处的地形条件。四是有地方武装和群众的配合。”^① 陈昌浩明确表示支持徐向前的意见，坚决主张打。张国焘在听取了徐向前的分析和陈昌浩的意见之后，也改变了看法。意见一致后，徐向前立即集中精力，迅速部署兵力准备迎敌。

徐向前决定用红七十三师布于樊通桥以东地区构筑工事担任正面狙击；用红十、十一两师主力布于红七十三师两翼伺机迂回包抄；以七十三师一个营和六安独立团至陡拔河以东，佯做抵抗，诱敌深入。对于两据点之敌则以少部兵力予以围困。

5月2日，敌先头部队厉式鼎第七师十九旅，与红军诱伏部队接触后，不顾一切冒险冲过陡拔河，向红七十三师阵地猛攻。红七十三师利用工事予敌重大杀伤后，立即向敌发起猛烈反击。敌人前进受挫，后续部队又未跟上，处于孤军背水作战的不利境地。而天公又不作美，大雨如注，河水猛涨，敌人仓皇后撤时，向西疾进的后面部队不知前面情况，霎时，前退后拥，造成互相拥挤，人踩马踏，阵势乱到无法收拾的地步。红军则乘势冲杀，敌人溃不成军，只顾逃命，混乱中落水者无数。第十九旅旋即大部被歼。敌河东岸部队见先头部队失利，慌忙抢占附近老牛口、婆山岭等高地企图顽抗。红七十三师乘胜渡过陡拔河向敌展开猛烈进攻。徐向前亲自指挥红十一师主力、六安独立团向敌右侧后包抄过来；红十师主力向敌左侧包围过去。敌人陷入红军包围之中。被围在苏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84页。

家埠、韩摆渡的敌人，在战斗展开过程中，数次想突围出来，都被红军顶了回去。

徐向前见红军将敌完全包围后，发出总攻击令，红军7个团与游击队、赤卫军多路突击，向敌猛烈穿插、分割、围歼，并突入敌纵深，一举打乱了敌指挥系统。战斗持续至下午5时结束。敌人来援之两万多人，全部被红军歼灭。敌总指挥厉式鼎也成了俘虏。

5月8日，苏家埠、韩摆渡两据点守敌眼看援敌覆灭，外失援兵，内无粮弹，在红军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之下，缴械投降。

历时48天的苏家埠战役到此结束。红四方面军取得了建军以来最大的胜利。此役，共歼敌皖西国民党“围剿”军及其援军共19个团和两个警备旅共3万余人。俘敌总指挥厉式鼎以下官兵2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炮43门、电台4部，击落敌机1架。解放了淠河以东的广大地区。红四方面军乘胜前进，向东逼近合肥，向北占领霍丘县城，直抵淮河岸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

至此，国民党反动派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基本上被打破。

红四方面军乘苏家埠战役大捷之后敌人尚未得到喘息之机，又发起了潢（川）光（山）战役，消灭潢川、光山地区的敌人，向西扩大根据地。战役于6月12日开始，仅5天时间即告结束，共歼敌正规部队8个团和反动民团一部，毙伤俘敌近万，缴枪7000余支。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红四方面军历时7个月，进行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次战役，总计歼敌6万余人，歼灭敌正规部队40个团，取得了规模空前的重大胜利。

红四方面军反第三次“围剿”取得重大胜利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引起了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的极大忧虑。徐向前这一次确

实把蒋介石打痛了。如果说蒋介石在江西的“剿共”虽然连续失败，但由于江西毕竟远离南京而尚能使其挽回一点面子，那么鄂豫皖红军的胜利就在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眼皮底下。尤其令蒋介石感到不快的是：厉式鼎所统率的两万装备精良的士兵，居然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化为乌有。蒋介石大大震怒了。他决定，对江西方面的红军“朱毛”部先取守势，将重点移向徐向前身上。他要亲自教训一下这个使校长难堪的“学生”^①。

1932年5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特派蒋介石为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

二 蒋介石坐镇武汉“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1932年6月7日，身为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亲赴汉口“督剿”红军。他所以亲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因为他感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日益发展壮大，对国民党反动政权威胁太大。这块根据地东迄津浦路，西达平汉路，北临淮河，南濒长江，地处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既威慑南京，又威逼武汉。蒋介石确实有芒刺在背的感觉。

1932年6月23日，蒋介石决定将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设在汉口。6月29日，蒋介石到达汉口，开始坐镇武汉“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国民党的“剿匪”军，分为左路、中路、右路三路军，左路军司令官为何成浚；中路军司令官由蒋介石兼任，刘峙任副司令官；右路军司令官为李济深，王钧任副司令官。这三路军除以左路军专门对付湘鄂西苏区外，“中路、右路两路军共26个师又5个旅30余万人，另有4个航空队，全力压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蒋

^① 徐向前是黄埔军校一期生，当时校长是蒋介石。

介石亲自兼任中路军司令官。其嫡系精锐主力师，除陈诚等部尚在江西对付我中央红军外，大部（胡宗南第一师、黄杰第二师、李玉堂第三师、徐庭瑶第四师、蒋鼎文第九师、李默庵第十师、李思塑第八十师、蒋伏生第八十三师、俞济时第八十八师、汤恩伯第八十九师）均调来围攻我们，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以上。”^①

蒋介石“围剿”计划的第一步，是从东西北三面发起攻击，从东南方向将红四方面军驱出鄂豫境；第二步，是实行东西夹击，将红军主力压至长江北岸，聚而歼之。蒋介石为表示自己“剿共”的决心，对他的部下宣称：“匪如一日不肃清，本人即一日不回京。”此后，一直到1933年3月，蒋介石以武汉、庐山为中心，亲自指挥“剿共”战争。

蒋介石如此频繁地调动部队，引起了红四方面军总部的注意，认为：“我军连续作战，疲惫已极，当务之急是养精蓄锐，休整训练。应当停止外线进攻作战，把主力摆到鄂豫边界，一脚踏在根据地，一脚踏在白区，边休整部队，边掩护地方开辟工作，为粉碎敌人的‘剿匪’做准备。”^②但是，这时张国焘等中央分局领导人却被红四方面军连续几次大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命令红军西出平汉路，进逼罗山，向信阳、广水段出击，而后伺机南下，进逼武汉。7月初，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在黄陂县夏店召开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徐向前发言说：“我军从去年秋天洗马畈战斗以来，连续作战大半年，指战员疲惫已极，战士烂脚病蔓延，部队减员人数逐日上升，情况十分严重，好比弓弦拉得太紧，有绷断的危险，部队必须休整。如果继续南下麻城威胁武汉，部队将更加疲惫。一旦敌军压境，以疲惫之师仓猝迎敌，定将贻误大局。我建议首先立即停止外线进攻作战，将主力调集鄂豫边界，休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97～198页。

^② 同上书，第194页。

整部队，发动群众，这样既可以扩大苏区，又可使部队就粮于新区。”^①陈昌浩也说：“对总的形势的估价，是我们的出发点。蒋介石、刘峙，往来武汉、信阳之间，非同寻常。据鸡公山的群众反映，平汉路兵运紧急，种种迹象表明大规模的‘围剿’在即，我们必须先在苏区进行反‘围剿’的动员和准备。”^②

沈泽民则不同意徐、陈两人的意见。沈泽民，是陈昌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此时是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常委，兼任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因此，他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他说：“蒋介石经过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已被打得溃不成军。前段又有迁都西安的计划。有人说：蒋介石迁都西安为避日寇的凶焰，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鄂豫皖雄踞长江中游，临近九省通衢武汉，高屋建瓴，有顺流直下之势。蒋介石不谓不知，迁都之议原因在我们不在日寇。何况他的嫡系主力仅7个师，其他均为杂牌。目前是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大好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按原定计划夺取麻城，实现威逼武汉。”^③陈昌浩不同意沈泽民的意见，他进一步阐述自己的理由：“四大战役，共歼敌正规军40个团6万多人，这在鄂豫皖来说是空前的胜利，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然而，他们是全国的统治阶级，他们有帝国主义和买办豪绅的支持。敌人是不会甘心于失败的，一次更大的围剿即将到来。我同意徐向前同志的意见，当务之急是养精蓄锐，休整训练，为粉碎敌人的新的‘剿匪’做准备。……”^④会议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要不要南下麻城，威逼武汉的问题上。这是一个涉及全局的行动方针问题，双方各持己见，争论得相当激烈。

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张国焘的意见是决定性的。张国焘拿出了《中共中央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训令说：“鄂豫皖红四

^{①②③④} 范青：《陈昌浩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86、87页。

方面军，除以二十五军巩固皖西北新发展苏区外，主力应向西行动，扩大与巩固鄂东苏区，以一师以上的兵力过京汉路，配合红三军行动，消灭徐源泉、萧之楚等主力，造成京汉路两旁孝感、武胜关间比较巩固的新苏区，必要时可重新进攻黄陂，威吓武汉，调动敌人进攻湘鄂西的力量，求得战争的解决，以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①实际上，这无异于为这次中央分局会议讨论的主题作了结论。沈泽民当然是同意这个意见的。他不仅同意，而且认为：国民党军队已被红军打得溃不成军，要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自出马担当主力军，国民党已处于“偏师”地位，新的“围剿”不会来临。张国焘支持沈泽民的看法，他也认为国民党军队已经成为“偏师”了。

徐向前针对沈泽民、张国焘等人的意见，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说：“蒋介石的黄埔系精锐部队还没拿出来，我们打的多是杂牌军，怎么能说国民党是‘偏师’呢？”尽管陈昌浩支持徐向前的意见，认为红四方面军应该转入反“剿匪”的准备，但是，最后还是由张国焘拍板按照《中共中央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执行，作出了部队南下进攻麻城的决定。

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夏店会议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根据中央分局决定，率红军主力红四军第十、十一、十二师，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及独立第一师南下进攻麻城。

湖北麻城，是国民党军队长期占据的一个坚固城池，也是安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内的一个顽固堡垒。蒋介石认为麻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地住麻城既可以牵制红军兵力，又可从东西相援，配合中路、右路军作战，为此，蒋介石下达了死守麻城的命令。麻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231页。

城守军为国民党“围剿”部队第四纵队，指挥官为第三十一军军长张印相。张印相将其所辖的第三十、三十一师和一个特务旅分驻于麻城、宋埠和黄陂，作战时可以互相支援，但其防守重点是加强麻城防务，并筹集了充足的粮食和弹药，做好了坚守的准备。

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作出的“围攻麻城”的决定，实际是个硬碰硬的决定。中央分局提出的口号是“攻下麻城，攻下宋埠、黄陂，打到武汉去！”

红军冒着酷暑抵达麻城地区后，“当即向麻城外围据点发起猛攻，以实现孤立和围攻麻城，吸打黄陂、武汉方向的援敌的作战企图。”^①7月7日、8日，红军首先占领了骑龙铺、长岭岗、阎家河、梅花脑、邓家竹园等地，并于红石堰、七里桥一带全歼敌三十一师九十三旅，俘敌旅长章祖卿以下官兵2 000余人，缴枪2 300余支，机枪40余挺，迫击炮40余门。进而，红四方面军以主力控制了麻城以西的霸王山、麻姑洞、红石嘴一带高地，在城西南中馆驿包围了敌三十师九十二旅，切断了麻城与宋埠、歧亭、黄陂等地的交通线，待机打援。为了稳固后方，红军还派出一部分兵力，与地方武装配合，将麻城周围纵横百余里的反动地主民团，一扫而光，毙俘千余人，活捉了一批土顽首领，解放了黄土岗、福田河一带。这样，使麻城之敌陷入红军重重包围之中。麻城守敌凭借着坚固的城防工事，固守不出，红军屡攻不克。

敌三十一军军长张印相见麻城被围，立即调黄陂的三十一师，避开红军设伏打援的战场，绕道经宋埠北进来援麻城。徐向前当即决定改变作战计划，乘黄陂空虚之机，率红军主力立即南下，于18日攻占黄陂以东距汉口仅五六十里的要点仓子埠，歼敌一部，缴获食盐万余斤。红军前锋部队逼近武汉，使武汉的敌人大为震惊，蒋介石急调郝梦龄五十四师由水路直趋仓子埠，彭振山三十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96页。

师由宋埠、歧亭向南进逼，汤恩伯八十九师集中于祁家湾车站一带阻止红军西进，妄图对红军实行夹击。红四方面军总部得知敌人的动向后，当机立断令部队反击。26日，红军回师李家集、靠山店、甘棠铺一线，重创敌三十师、三十一师，歼敌一个旅，溃敌逃回宋埠、歧亭。红军再次回兵围攻麻城。

红四方面军自南下围攻麻城以来，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并没有实现南下计划，麻城未克，而红军主力又被敌人吸住，失去主动。敌人则乘机从容部署“围剿”，展开行动。

当红军在麻城地区作战之时，敌人已开始紧缩包围圈。首先是在东线皖西地区开始向根据地进攻。

1932年7月7日，敌右路军徐庭瑶纵队进犯霍丘县城。

霍丘县城是红二十五军在军长旷继勋率领下解放的。霍丘县城解放后，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认为应该守住它，使霍丘成为红军“从大别山伸向淮河边上的一个据点，要和商城、六安互为犄角之势，左可以驰援六安，右可以驰援商城，而商六两城也可以驰援霍丘”^①。这个战略意图并不错，问题在于当敌军集结兵力准备大举“围剿”，企图对红军各个击破的时候，固守县城，则是极端错误的。徐向前回顾这段历史时说：“皖西的红二十五军一部也遇到敌徐庭瑶部的进攻。旷继勋军长打来电报说，他们正在霍丘城内坚守，‘以城攻城’，与敌决战。张国焘拿到电报气坏了，说：‘什么叫以城攻城！’我们也认为，这种和敌人硬拼的办法不对头。所以，马上派蔡申熙同志去皖西。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红二十五军的守城部队1000多人与敌人血战5昼夜后，全部损失，仅军长旷继勋及少数人脱险。”^②霍丘县城保卫战失败了，但

① 李华丰等：《霍丘城血战记》，《皖西革命回忆录》上，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6页。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96页。

红军在同敌人的战斗中所表现的英勇牺牲精神永远值得人们敬佩。鄂豫皖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最为壮烈的场面大概就是霍丘保卫战了。当敌人从东城门、北关城隍庙、南门三面突进城来，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时，城里的人不自觉地朝西门涌去，2 000多人挤在一条长街上，西城门打开的一个小门，已经被人挤住，一个人也出不去了。敌人的机枪在身后“哒哒哒”作响，外围的人不断倒下去。

“共产党万岁！”

“苏维埃万岁！”

……伴随着敌人的枪声响起了口号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许多人把脸转过来，唱出了这雄壮的歌。他们昂首挺胸，宁死不屈。“哒哒哒！哒哒哒！”一批批的人不断地倒下去……

就这样，一两千人在街头上，迎着横扫过来的弹雨，没有人躲避，没有人叫喊，没有人悲伤。他们只用仇恨的目光，望着那喷火的枪口！这是一幅多么惊天动地的场面！这就是1932年7月13日中午，霍丘城血战到最后的情景。^①

霍丘县城失守，敌人向鄂豫皖根据地紧缩包围圈的第一步得逞了。由于红四方面军主力正在麻城地区与南线敌人呈相持胶着状态，敌人从东、北、西三面大举进攻鄂豫皖根据地。蒋介石“进剿”军的主力是卫立煌第六纵队和陈继承第二纵队，他们分别由花园向河口、从罗山向七里坪压向根据地中心；还有平汉路东侧的马鸿逵纵队，豫南的张钫纵队，皖西的徐庭瑶纵队，蕲黄广的上官云相纵队，麻城、黄陂的张印相纵队，也摆成一个分进合击的架势，向鄂豫皖根据地纵深涌来。

在武汉坐镇指挥“围剿”的蒋介石，见各路“进剿”部队进

^① 李华丰等：《霍丘城血战记》，《皖西革命回忆录》上，第275～276页。

入根据地后未遇到有力的抵抗，遂改变其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决定“进剿”部队开始总攻，命令主攻纵队陈继承部、卫立煌部迅速插入根据地中心区域，寻机与红军主力决战。

8月10日，陈继承纵队向七里坪急进，卫立煌纵队亦进抵河口一带，扑向黄安。

形势相当严峻，张国焘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仓促改变了围攻麻城的作战计划，命令部队主力立即撤离阵地，向黄安以西转移迎击敌主力，彻底粉碎敌人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围剿”。红军主力星夜匆忙赶向黄安，仓促间开始了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的大规模战斗。红四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和三十六团，作为全军的先行，顶着烈日赶到黄安城西的冯寿二地区。红军因天气炎热，中暑掉队的人不少。指战员疲惫不堪，马上要进入战斗，困难是非常大的。^①“部队还没顾上拧一拧被汗水浸透的衣服，敌人就恶狠狠地向我们发起了攻击。”^②与红十二师遭遇的敌先头部队是卫立煌纵队的李默庵第十师。这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因为这个师尚未与鄂豫皖红军主力交过锋，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顽强地进行了阻击。徐向前总指挥带领后续部队跑步前去支援，战斗空前激烈，部队上来一批投入战场一批，顶住敌人的疯狂进攻。激战至下午，红十一师向敌左翼迂回，河口独立团主动抄袭敌人后路，配合红十二师正面反击成功，歼敌三十旅旅长王劲修以下2 000余名，才迫使敌人后退，红军伤亡也较重。敌十师、八十二师联合据地固守，红军攻不下去，双方形成对峙。同时，曾中生指挥黄安独立师与汤恩伯八十九师激战于高桥河，红军援军到达，敌依托工事固守，又形成相持状态。

但是，战局的发展对红四方面军主力不利。当红军在冯寿二、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01页。

② 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第174页。

高桥河与敌对峙时，敌陈继承纵队正从宣化店向七里坪开进，红军有被敌人抄后路的危险。红四方面军总部研究了敌情后，决定放弃黄安，转向七里坪攻击敌人。

七里坪是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地形条件，群众条件都很好，利于红军作战。徐向前总指挥将红十一、十二两师放在北面控制酒醉山；红十、七十二两师居中，控制大小雾嘴山；独立第一师（黄安独立师）和少共国际团在南面控制古风岭，准备迎敌。方面军总部的意图是：七里坪一仗，要一鼓作气，把两来之敌彻底摧垮。

8月15日，天刚蒙蒙亮，天空中响起了沉闷的马达声，国民党空军的飞机也来参战了。敌机在红军的阵地上空盘旋，一排排炸弹落在各个山头上，霎时腾起了冲天烟雾。紧接着敌人地面部队全线出动，向红军阵地猛扑过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有最好的武器装备，又有飞机大炮掩护，攻势相当凌厉。“陈继承纵队毕竟是蒋介石豢养的恶犬，打起仗来比那些杂牌部队高明得多。他们在炮火的掩护下，灵活地利用地形地物，步步向我阵地逼近，使我军火力不能给其以大量杀伤。更可恶的是一些枪法颇准的匪兵，专打我们的干部和机枪手，对我威胁较大。战斗开始不久，就有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①红军以劣势装备对敌之优势装备，与敌人拼搏，战士们拔出大刀跃入敌群，与敌进行白刃格斗。满耳都是刀枪的撞击声和变了音的厮杀声。鲜血在空中飞溅，在地上流淌，染红了红军战士的衣衫，也染红了山石和茅草。仗打得十分艰难。时至中午，敌人攻势略减，徐向前看到反击时机已到，下令红军5个主力师集中出击，务求全歼敌人。红军从两侧扑向敌阵地，当即歼敌第五旅两个团大部。陈继承急调第四旅八团、第六旅十一团加强阵地，第三师一部策应第二师固守阵地。敌人的顽强程度出乎意料。徐向前等红军指挥员站在山头上，一直

^① 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第175页。

用望远镜观察战况，指挥战斗。黄昏时分，红军终于突破敌正面阵地，向纵深发展。敌人第二师全线溃逃。敌第四旅八团和六旅十一团大部被歼。红军乘胜向前推进了八九里，直插白马嘶河，占领敌第二师指挥所，逼近陈继承纵队司令部。陈继承此时已惊慌失措，准备撤退，但敌卫立煌部这时赶到了，要陈继承坚守，陈继承才顶了下来。而红军“四个主力师和黄安独立师均已投入战斗，手头缺乏后续力量。敌依托山地坚守，我军反复冲杀，攻不上去，心里着急也没办法”^①。徐向前总指挥看到天色微明，相持下去对红军不利，于是下令部队停止进攻，撤回河东。

此役，敌第十四军军长卫立煌差点成了红军的俘虏。当卫立煌尚未到达黄安时，红军“在黄安以西的草堂地方，出其不意，对卫立煌来了一个薄暮奇袭，先击溃了第十师的三十旅，接着直捣十四军军部，双方硬碰硬，进行了一场十分激烈的战斗。随在卫立煌身边的十四军特务连伤亡惨重，眼看支持不住了，如果红军再前进200米，卫立煌就要变成俘虏。当时卫立煌拼命抵抗，组织其卫上集中火力，堵住路口”。“十四军的武器在当时算是最精良的了，特务连中携有二十响的快慢机，卫立煌个人还有几条当时国内少见的英国自动步枪，一齐用上，交叉射击，火力凶猛。红军原先认为胜利在握，战斗快要结束了，最后从枪声中听出武器有异，为了避免过大的牺牲，迟疑了几分钟没有穷追。就在这几分钟的时间，形势发生了变化，十四军的二四九旅先头团赶到，挽救了他们的军部。卫立煌侥幸免于被活捉。”^②

七里坪之战，其激烈程度，实属少见。国民党军第二师被打垮，敌6名团长悉数毙命，战场上到处是敌军的死尸和伤号。红军也伤亡约2000人，独立一师师长曾中生负伤。红军在七里坪倒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03页。

②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10页。

水河以东与敌对峙两三天后，敌卫立煌纵队由南向北进逼七里坪，敌陈继承部又派一部兵力与北路张钫纵队配合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首府新集。红军前进不能，久留又有被敌合击的危险，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向新集以北的胡山寨转移，准备打击北路之敌。

红军进至新集地区后，以红七十三师监视北面张钫纵队；以红十师在檀树岗阻止卫立煌纵队北上；以红十一、十二师布防于胡山寨、四面山、金兰山、旗盘山一线，与从宣化店方向西来之陈继承纵队第三、八十师激战。红军在胡山寨一带又与敌拼杀数日，毙伤敌2 000余人。与此同时，卫立煌与张钫纵队已从南、北两面向红军侧后推进，形成对红军三面包围之势。红四方面军总部看到敌众我寡，相持不利，处境危急，便决定撤离豫东南向皖西根据地转移。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立即行动，冒着滂沱大雨向东疾行。

冯寿二、七里坪、胡山寨三战，红军万众一心，奋勇杀敌，共歼敌8 000余人。冯寿二和七里坪两战，都是趁敌立足未稳，猛烈反击，打垮了敌人的先头师，使敌遭受重创，打乱了敌人企图聚歼红军的部署，但并没有击破敌之一路，始终没有摆脱被动地位，没有在局部形成优势兵力。红军在鄂豫边已经失去运动歼敌的时机和条件。因此，不得不向皖西方向寻求办法。

然而，皖西的形势也不乐观。早在鄂东北、豫东南之敌发起总攻之时，皖西之敌在右路军副司令王钧的统一指挥下，也分路向鄂豫皖根据地的皖西地区猛攻。敌徐庭瑶纵队已西越淠河、独山一线，占领了叶家集、独山镇、流波碓等地。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在北起叶家集、南迄英山的广大地区与地方武装一起同各路进犯之敌展开激战。

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领红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到达皖西金家寨与红二十五军会合。方面军总部决定首先挥师六安方向，打击深入根据地叶家集、独山镇的徐庭瑶部。但由于部队隐蔽行动

不够，行至东西香火岭，即与敌遭遇，且打得很艰苦。而后面的卫立煌、陈继承两纵队又经沙窝、新店追来，与徐庭瑶纵队形成对红军的東西夹击之势。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部队南下英山，会合地方武装，寻机歼敌，遂率领部队南下。走到霍山县燕子河时，红四方面军总部、鄂豫皖中央分局得到消息：英山也被敌人占领，部队只好停止前进，就地休息待命。

红四方面军从南下围攻麻城到此时，时间只有两个多月，但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没有想到情况会发展成这个样子。面对这样严酷的形势，他有点愁眉不展，灰心丧气，再也不说国民党军队只是“偏师”了，他“以为今天打出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又说我们红军只可打一仗，就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了”^①。

1932年9月13日，鄂豫皖中央分局、红四方面军总部致电党中央，报告了鄂豫皖红军的转战情况：

敌分路合进，每路均三师人，互相策应，我军已与敌转战一月。在黄安、七里坪两次激战，敌第二、第十、第八十九师受重挫，退回黄安补充。敌第三、八十、八十三师又取道新集西北，协同五十八师及张飏部进攻，激战三日，敌八、八十两师又受重挫。因敌人分路合进，我军尚未能消灭敌之一路，现在正移师皖西，首先消灭进攻金家寨之敌，七里坪、新集已自动放弃。我军最大困难即补充人员不易；医院中现有近万战斗员，四分之三系烂脚病，生烂脚病者仍在增加，缺医生缺药……我军处在激烈战斗中，当按中央来电坚决斗争下去，请中区

^① 《中共鄂豫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月5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8页。

及中央紧急动员各区红军及工农群众急起策应我军。望经常告我们以敌军消息。^①

这封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三人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除报告鄂豫皖红军转战情况外，主要是请求中央“紧急动员各区红军及工农群众急起策应”红四方面军。临时中央向在中央苏区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转去了这封电报。

周、毛、朱、王对红四方面军十分关心。当中央转去张国焘等人的电报后，他们立即急电中央局转鄂豫皖分局：

（一）此次敌集结兵力，分进合击我鄂豫皖苏区，整个形势已不同于去年，但其战略战术颇似去年三次“围剿”对付中区之并进长追并益以坚守据点稳扎稳打。

（二）因此我们建议，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相当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于我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的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而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个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

（三）这三次战斗中的战略与战术的经验，你们可以根据目前形势与红四方面军的优点灵活运用。

（四）红十六军在通山、咸宁的两次胜利，这次一方面军北向发展的胜利的开始，均是对鄂豫皖的配合策应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05页。

行动；湘鄂西应在打击敌人一方的便利条件下，以一部兵力向京汉路西行动。^①

徐向前回忆：“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志这一电文，提出鄂豫皖红军应通过诱敌深入、击敌一路、群众配合、运动歼敌来粉碎敌人的‘围剿’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在反‘围剿’的准备和开始阶段，分局领导人有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局面一定会好得多。”^②

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在燕子河地区休息待命的时候，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抓紧时间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徐向前、蔡申熙、方英、王平章等。陈昌浩在会上首先发言，他说：“这次，敌人采取了并列推进、稳扎稳打的战术，克服了以往此进彼退，易被我军各个击破的弱点。敌人变了，我们没有变，在麻城继续用‘围城打援’之策，结果使我们空等了两天。敌人接着又用‘围魏救赵’之计，径自进军黄安，使我们撤麻城之围速奔黄安，这样使我军被动往返，丧失机动作战能力。现在，30万敌军步步进逼。我军回旋区域愈来愈小，如果继续这样打下去，我军将发生更大的危机。我认为不如南下英山，出兵潜山、太湖地区，跳出敌之重围，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以图良策。”^③徐向前也认为：“南下先取英山，以英山为立脚点，喘息待机，与敌周旋，恢复根据地；如继续受敌重兵压迫，则将红军主力暂时拉到外线，向潜山、太湖方向转移，伺机打回根据地。”^④张国焘同意陈、徐的意见。面沈泽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483~484页。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07页。

③ 范育：《陈昌浩传》，第93页。

④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07~208页。

民和王平章则不同意红军跳出外线，积极主张部队拉回黄麻城区。蔡申熙冷静地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权衡利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红军主力必须跳出根据地实行外线作战，以保存实力。但东出潜、太不如出平汉路以西的应山、随县、枣阳一带有利。因那儿有党的基础，有红三军在那里活动；南靠桐柏山，西可入大洪山，而平汉路的敌防线属兵站性质，过往甚繁，防守反而薄弱，从这儿突围，将出敌不意。待条件成熟，回过头来，很快就能回到我们的中心地区。”讨论的结果，决定放弃出潜山、太湖的计划，以郭述申和独立师师长徐海东等同志带少部分兵力和地方武装，在皖西和潜山、太湖县一带地区扰敌后路，红四方面军主力则先取英山，再向黄安、麻城地区转移。

9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由燕子河经西界岭、五罡庙直趋英山。红军原准备在英山地区打击敌上官云相纵队，但因这路敌军和其他敌军一样，依托工事坚守防御，红军未获战机，遂移师西进，到达英山以西石桥铺后兵分两路行动，张国焘、蔡申熙率领一路，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一路，约定两路部队在新洲会合。当两路部队在新洲会合后，于10月上旬末抵达黄安的高桥河、河口地区。

蒋介石发动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可谓是煞费苦心，作了一系列的努力，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侵华行动则一再退让、妥协。7月14日，蒋介石颁发所谓《告匪区民众书》和《悬赏招抚胁从民众命令》等；8月2日，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颁发《自新悔过条例》；8月10日，蒋介石在汉口手谕“剿共”总部广招反共“贤才”；8月22日，蒋介石颁发《剿匪区内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并首先在鄂豫皖地区实行。“保甲”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曾使用过的统治人民的反动工具。保甲的编组，是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

为保，保设保长。保甲制度把根据地内以及苏区以外的全体人民不分职业、地位、性别、年龄，一律编组起来，使老百姓“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声明结内各户互相劝勉监视，绝无通匪或纵匪情事，如有违犯者，他户应即密报惩办。倘瞻私隐匿，各户应负连坐之责。”这个保甲条例，是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剥夺人民最基本权利的集中体现。该条例没有给人民半点权利，而对人民要负担的种种义务却规定到细微末节。国民党军队进入根据地之后，按照国民党汉口剿共总部的命令：“（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区粮食分给铲共义勇队搬出匪区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须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①。开始烧杀、抢掠，残忍至极。

红四方面军连战失利，向皖西撤退后，国民党军队大多不愿意与红军激烈交战，因而畏葸不前，蒋介石严厉催促各军向鄂豫皖根据地大别山腹地进军。卫立煌这时“带了一个师从后山小路直扑鄂豫皖边区的军政中心金家寨，未遇抵抗，穿城而过。镇内搭有戏台，像要演戏的样子，数量较小的守军没想到国民党军队来得这么快，不作无谓的牺牲，主动撤出，追随主力往西去了。此时，蒋介石还在继续催促各军进兵，没想到忽然接到卫立煌的电报，说他已经占领金家寨，这个电报就是由金家寨发来的。蒋介石大喜过望，亲自前去慰劳，为了嘉奖卫立煌的功劳，鼓励其他‘剿共’部队的士气，除奖给卫以巨额金钱外，还由国民政府颁布明令，在大别山中地跨豫皖两省之间‘三不管’的险要城镇金家寨，建立一个新的县治，用卫立煌的名字命名为‘立煌县’。”^②为此，蒋介石认为对鄂豫皖的“剿共”计划已经大功告成，于9月

① 见谭克绳等：《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98页。

②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第10~11页。

12日宣称：“剿共”计划第一期已完成。

红四方面军到达黄麻地区，先头部队红十师、十二师即在河口镇以东与敌第一师、八十师遭遇；红二十五军一部也在冯寿二地区与敌第十三师遭遇，敌军在死伤2 000人后退至河口固守。敌卫立煌纵队、陈继承纵队发现红四方面军主力向黄麻地区转移，便由东向西穷追而来。红军在激烈的遭遇战中，用刺刀和手榴弹同敌人战斗，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身先士卒，再次身负重伤，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直到打退敌人最后一次冲锋。蔡申熙被敌人击中小腹，疼痛得没有办法，豆大的汗珠在蜡黄的脸上直往下淌，他用牙齿咬着自己的嘴唇，要求卫生员，不要管他，去救别的同志。那天正下着雨，徐向前总指挥在战斗间隙去看蔡申熙。蔡申熙睁开紧闭的双眼，要求说：“总指挥，我疼得不行，补我一枪吧！”眼看着熟悉的战友伤痛成这样，徐向前总指挥流下了热泪。他安慰着蔡申熙，嘱咐卫生员好好照顾蔡军长，就急急忙忙地指挥部队去了。陈昌浩政委经过包扎所，俯身看望昏迷中的蔡申熙，他取下自己肩上的毛巾，帮蔡申熙擦拭了汗水和血污，又帮着把他握紧的双手放回床上。红四方面军的一些领导人，听到蔡申熙负重伤的消息，有不少人来看他，曾中生、王树声等都来了，但他已疼得不能说话，只能用深情的目光望着这些并肩作战的战友。

红四方面军在河口镇和冯寿二地区与敌激战两天，歼敌一部后，急忙向黄柴畈转移。当红军主力抵达黄柴畈时，天色已近黄昏，敌陈继承部的先头部队已尾追而来，又向红军发起猛攻。担任阻击任务的部队红七十三师在陈昌浩率领下顽强地阻击敌人。陈昌浩亲自操起机关枪，向敌人猛烈地扫射，战士们看到陈昌浩政委亲自上阵，战斗士气益发高涨，子弹、迫击炮弹像冰雹一样砸向敌阵。此战共毙伤敌第二师副师长柏天民以下近千。但敌人已经形成了对红军的包围态势，红军处于方圆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四面临敌，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红军的当务之急，是解决行动方针问题：是继续留在根据地打，还是跳到根据地外面打？10月10日夜，在黄安县东北的黄柴畈，鄂豫皖中央分局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徐向前、徐宝珊、王平章、吴焕先等20余人。会议在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红军跳出根据地打，待机歼敌后再返回；另一种是主张红军留在根据地坚持，分散游击。

张国焘首先发言说：“情况紧急，敌人催我们再开一次会。红军必须立即跳到外线作战。”^①他认为：“反第四次‘围剿’中敌人的力量大大超过我们，我军经过各次战斗未能完成击溃敌人的任务，已完全处在被动、失败的地位。根据地内的主要城镇被敌占领，红军主力没有周旋余地，无法粉碎敌人的‘围剿’。只有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外，才能保存力量。如果将红军主力继续留在根据地进行战斗，是毫无希望的。”^②因此，他具体地提出：“去平汉路以西，与红三军会合。”^③这个建议实际就是蔡申熙在燕子河会议上的建议。沈泽民、王平章则认为：“反四次‘围剿’，我军未能击退敌人，处于被动和失败的地位，是客观事实。但是，红军不应脱离根据地。在敌人重兵深入根据地的情势下，可采取分散游击的办法，坚持游击战争，待机破敌。”^④

徐向前也认为：“根据地中心区域已经被敌人占领，我大部队不易活动，又已丧失了歼敌一路的机会；要分散游击，地方游击队还行，大部队就有许多困难，敌人兵力总比我大，有几十万人，而我根据地仅剩那么一小块地方，只要枪一响，不用两三个钟头敌人就会从四面八方合击而来，更何况你分散敌人也会分散呢！”^⑤

① 范青：《陈昌浩传》，第96页。

②③④⑤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10、211页。

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同意将红军主力暂时拉出外线，待调动和歼灭敌人后重返根据地。张国焘最后根据与会多数同志的意见作出了决定：“留下七十四、七十五两师与各独立师团，由沈泽民同志负责，在根据地坚持斗争；方面军总部率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及少共国际团，跳出根据地，暂到平汉路以西活动，伺机打回根据地。”^①

根据黄柴畈会议的部署，陈昌浩率领先头部队开路先行。

红四方面军总部和红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少共国际团，总部直属各单位约2万余人，集结于黄安县西四姑墩地区。然后全军分左右两个纵队，于10月12日夜行动，跨过平汉路，踏上了漫漫征途。

三 生死决斗漫川关

1932年10月12日夜，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平汉路广水、卫家店车站之间越过铁路。10月13日，左右两纵队在平汉路西约50里的陈家巷会合。10月14日，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率部队进入大洪山区，经洛阳店、新店向原红三军活动过的豫家湾一带转移。

此时，蒋介石发现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越平汉路，跳出其对红军的包围圈，立即部署对红军“追剿”。按照蒋介石的电令：卫立煌率李默庵第十师、蒋伏生第八十三师、罗启疆独立第三十四旅等跟踪追击；胡宗南第一师在北面沿花园至襄阳的公路、萧之楚第四十四师在南面沿京山至宜城的公路，实行平行追击；原在襄阳、枣阳、宜城地区的刘茂恩第六十五师、冯鹏翥第六十七师，则依托沙河堵击。敌人妄图一举将红四方面军主力聚歼于襄阳、枣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11页。

阳、宣城地区。

红军昼夜兼程疾进，奔向璩家湾一带。当红军战士们踏上另一块红色土地的时候，急欲见到那里的红军兄弟。可是，迎接他们的却是一片荒芜的田野，破败的村庄，衣衫褴褛的孱弱百姓。有不少人躲藏到深山野林中。“红三军已经走了，根据地早垮台了。没有政权，没有红军，没有游击队，没有党组织，剩下的只是一片断垣残壁的荒凉景象。”^①经过白军放火烧剩的残壁上留下了字迹清晰可辨的革命标语：“苏维埃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蒋介石！”“打倒帝国主义！”贺龙来过，红三军来过，遗憾的是他们已经转移了！这让红军战士们非常失望。10月19日，红军到达新集地区，部队赶紧架锅做饭。可是，战士们饭还没得吃上，敌人就追了过来。饥饿疲惫的红军，仓促临敌，急起应战。红四方面军总部原拟在这一地区“略事休整，反击敌人，待机打回根据地”^②。但由于敌人尾追过紧，红军不得不立即展开阻击。敌人何以来得如此之快？罗应怀将军回忆：“原来，我军为了避开敌人的拦阻，走的多是荒野小道，而敌人则是沿着公路、大道追赶，因此撵得很紧。一路之上，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前脚刚到，敌人后脚就跟来了，有时连饭都没做熟，敌人便围了上来。我们只好先打垮了敌人再弄饭吃，真有点像‘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③。

这次紧追红军的是敌第八十三师，红军第十一师奉命阻击这师敌人。

红十一师师长倪志亮接到命令，扔下饭碗，站在一个高岗上，大声向各团发出命令：“各团指挥员，立即准备战斗！”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15页。

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页。

③ 罗应怀：《突破敌重围 转战三千里》，《艰苦的历程》上，第317页。

红十一师全体指战员，听到师长的命令，立即行动，占领有利地形，准备迎击尾追之敌。陈再道将军回忆：“尾随而来的敌人八十三师，像成群结队的恶狼一样，刚追到枣阳新集地区就向我展开攻击。敌人依仗着武器装备精良，处在我走他追的得势地位，战斗一开始，倒有那么一股子猛劲。我们同这些敌人较量，记不清有过多少次了，早就摸透了他们脾性。你别看他一开头张牙舞爪，实际上他们比我们怕死，只要你把前面敌人撂倒一排，剩下的敌人就会调头往回跑，只是后面有督阵的长官，他们才硬着头皮顶在那里。

“因此，我们十一师同敌人一接火，首先让过敌人的头三枪，等到敌人冲上来了，一个排子枪打出去，让前面的敌人横在地上，敌人就不敢轻易向前冒进了。我们全师、全团采取这种打法，首先煞住了敌人那股子猛劲。后来，尽管敌人又发起一次次冲击，却丧失了先头的力量，只是在长官的命令之下，不得不那样做罢了。最后，我们一个奋力反冲击，把进攻的敌人打退了。”^①

红十一师将这股敌人击退之后，立即在大梨树、三里塆一线构筑阵地，准备反击敌人。同时，红四方面军总部为了给次日反击造成有利态势，命令红十二师占领新集西南10余里的制高点乌头观。因为，“控制了乌头观，才能保障我右翼阵地关门山、刀锋岭的安全”^②。但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由于乌头观上有地主修筑的寨子，有反动地主武装防守，红十二师攻击不得力，行动迟缓，没有拿下来。当天晚上，敌第十师和独立第三十四旅先后到达，乌头观反被追过来的敌人抢先占领。“这一制高点的丧失，使红军右翼关门山、刀锋岭、吴家集等阵地受到严重威胁，并影响了尔后

^① 《陈再道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22～228页。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15页。

战斗的发展”^①。敌人占领乌头观后，居高临下，火力又强，红军硬攻难克，伤亡不小，面临很大的困难。

乌头观吃紧。作为红军主帅的徐向前、陈昌浩深知乌头观的重要性，急忙策马飞奔乌头观、大坡岭阵地。许世友将军回忆这次战斗时说：“20日清晨，我团东侧的乌头观山头上突然出现了敌人，并以迅猛动作突然扑向大坡岭一营阵地。一营猝不及防，伤亡很大，不得不撤下来。乌头观、大坡岭相继失守，使我军右翼关门山、吴家集等阵地受到了严重威胁。我急得满头是汗，一连串的问号在脑海中翻腾着。怎么回事？乌头观是哪个部队防守的？敌人怎么不费一枪一弹就拿下了这个最高的山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还没等我找出答案，徐向前、陈昌浩同志骑马来到了团部。

“陈昌浩一下马，就舞动着马鞭，对我大声训斥起来。从他的话语中，我渐渐听出了眉目。昨晚，方面军总部曾令我们十二师占领乌头观至大坡岭一线阵地，但我们接到的师部命令只是占领大坡岭，可能哪个部队没有按时赶到，贻误了战机，给敌以可乘之隙。……

“徐向前同志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总是比较冷静的。他用手比划着向我们介绍了敌情：敌人正以三十四旅、八十三师在右，全力进攻我宋家集至吴家集阵地；以十师在左，依托乌头观有利地形向关门山猛攻，企图以左右钳击我军于新集以西地区。现在，乌头观、大坡岭阵地关系到全局安危，必须坚决夺回。”^②

许世友不愧是一员猛将，听了徐总的话，他点了点头，立即接着说道：“明白了，夺不回阵地，我提头来见！”许世友立即命令二营营长吴世安向大坡岭阵地进攻。二营营长吴世安拔出驳壳枪，带领全营冲了上去。经过一场苦战，二营终于夺回了大坡岭，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190～191页。

^② 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第180～181页。

并站稳了脚跟，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保证了红军主力的安全。红十二师紧紧钉在关门山、刀锋岭阵地上顽强地阻击敌人。

这一天，从早到晚，红军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阵地前沿，敌人尸横遍野。下午3时，红军在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后，红四方面军总部集中红十师、十一师主力，向敌人薄弱部分独立第三十四旅实施反击；同时，红十二师进攻敌第十师乌头观阵地，准备在突破该敌阵地之后向敌第三十四旅侧后迂回，配合红十师、十一师全歼敌第三十四旅。经过激烈战斗，敌第三十四旅遭到重创，旅长罗启疆被击伤，敌损失惨重，向后溃逃。但是，乌头观之守敌凭借地势险要，拼命顽抗，虽经红十二师奋力强攻，仍未能夺取该敌阵地，没有包抄住已被击溃之敌予以全歼，使红军的反击“未奏全功”。此役，最危险的是红四方面军总部被突进之敌逼近。原来，红四方面军主力与敌激战一天后，敌后续部队第四十四师、第一师、第五十一师相继压了上来，形成了对红军的包围态势。敌之一部攻到了离徐向前的指挥所仅50米的地方，子弹从徐总的身边“嗖嗖”地飞过，真是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当时，徐向前身边只有300来人的机关人员和警卫、通讯部队，他在紧要关头，表现出惊人的沉着镇定，有条不紊地指挥部队紧急集合，投入战斗。当敌军进一步逼进时，由指挥所的参谋、政工人员、警卫、通讯部队组织起来的突击队猛然冲杀出去，将敌击退。幸亏敌人弄不清虚实，只是一般性的进攻，未形成强大突击力量。红十一师师长倪志亮、政委李先念获悉总部被围的消息，立即率部驰援。经过一番激战，终于将敌击退，使总部转危为安。

10月21日，敌人集中第四十四师、第十师向关门山、刀锋岭阵地猛攻。红军坚守阵地，居高临下，向进攻的敌人猛烈反击，从早晨到日落，与敌人多次肉搏苦斗。尽管红军战士奋勇杀敌，不怕流血牺牲，但由于敌众我寡，加之西南方向之敌范石生第五十一师已向红军后侧攻来，与红七十三师激战，北面沿襄（阳）花

(园)公路疾进之敌第一师也压过来,与当面之敌对红军形成合围之势。

情况异常严重。红四方面军总部紧急开会确定行动方针。张国焘认为应向西南方向渡过丰乐河,进入襄河以东地区活动^①。但西南方向已为敌人所堵截。为了摆脱危机局面,方面军总部当夜又决定急速向西北转移。这样,红四方面军企图在外线寻机歼敌打回根据地的计划,就不得不放弃了。

当天夜里,徐向前总指挥命令部队连夜向西北转移。

红四方面军趁夜行动,脱离战场,向西北方向急进。部队走了一夜,第二天到达枣阳西南20余里的土桥铺地区。敌第六十五、六十七师据守沙河堵击红军,敌第一、五十一师从两侧攻来,尾追红军之敌亦紧逼于后,红军再次陷入敌人的包围态势之中。在这紧急情况下,陈昌浩亲自率领红军前卫团——三十二团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奋勇冲杀,杀出了一条通道,控制了土桥铺一带沙河地段。与此同时,红七十二师和红十一师三十一团也分别击退两侧进攻之敌。入夜后,全军胜利突围,继续向西北转移。

红四方面军主力从10月12日越过平汉路后,新集、枣阳战斗是红军转移以来打得最凶恶的一仗。新集反击战和土桥铺突围战,虽然歼敌3000余人,缴枪千余支,子弹百余箱,但红军损失也很严重,伤亡千余人,红三十二团团团长林维权、红三十三团团团长吴云山在战斗中牺牲,红十师师长王宏坤负伤。这次战斗,红四方面军给了数倍于己的尾追和堵击之敌以重创,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襄、枣、宜地区的狂妄计划,打击了敌人猖狂猛追的气焰。

红四方面军是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打完了新集、枣阳战斗的。红军从过平汉路开始,连续作战、行军,十天十夜没有睡过一觉,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191页。

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全体指战员疲惫至极。作为全军首脑机关的红四方面军总部首长，更比一般指战员劳累。徐向前说他从来没有那样累过，两条腿走得拖也拖不动了，话都不想说。张国焘亦对此这样描述：“在后卫团的掩护下，我们下马步战，向北行进，走了20里后，在一个山冈上与徐向前、陈昌浩等会合，因连日过度疲劳，我一看见他们之后，不由自主的便倒卧在地上了。陈昌浩等大多数人也已累得不能再动。只有徐向前等少数身体特别强健的军人，还能支持得住。”^①红军指战员正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凭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顽强的斗志与敌人进行战斗的。上桥铺突围后，部队进行了整编，将少共国际团撤销，人员分别补充到各师。但是，红四方面军仍未完全摆脱敌人前堵后追的困境，因此，只能且战且走，继续转移。

10月22日夜，红四方面军主力经枣阳七房岗向西转进。时值深秋，天气一天比一天冷起来，红军战士们离开鄂豫皖时一直穿着夏装，他们迎着萧瑟的秋风向西北方向行军。部队为了尽量避免与敌人遭遇，沿着一条荆棘丛生的小路，踩着一片片枯草落叶，行进在人烟稀少的荒野中。走新野，过邓县，夺路向淅川前进。一路上，战士们看到，由于连年军阀混战和旱涝虫灾，到处是一片荒芜。在瑟瑟秋风里，黄色起伏的丘陵上、田野里，庄稼绝迹，渺无人烟，村庄变成了废墟，农田里长满了野草，听不到鸡鸣狗叫，看不见炊烟袅袅。部队走上几十里见不着一户人家，找不到一点粮食。有些日子，红军战士只能靠山果、野菜充饥。解决部队的饥寒问题已成了燃眉之急。一天傍晚，红军总算走到一个有人的小集镇，本想在这里得到一些物资上的补充，但由于当地群众在反动宣传的欺骗下，谁也不敢与红军接近，战士们冒雨站在门外说上多少道理，他们总是默默地听着，就是不答腔。门依然闭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41～142页。

得紧紧的，还加上了门杠！后勤工作人员把银元敲得叮哨作响，也没能买回一颗粮食！光洋，旧中国最有信誉的货币，在这儿暂时失去了作用。这使得红军战士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丧失根据地的痛苦。

红军只好忍饥熬寒，昼夜兼程，硬挺着身子继续向前赶路。一天，部队来到了浙川西南的丹江边上。在河畔休息的时候，大家一看自己的腿和脚，有许多裂开的口子，还在不停地向外渗血，这时才感到隐隐作痛。有位红军战士回首望一眼连绵的群山，又望一眼隐没在山水间的路途，感慨地问大家：

“你们猜一猜，我们趟过了多少河流？”

“谁知道，反正这两条腿，湿了干，干了湿，没有惬意的时候。”另一人回答道。确实是这样，这一带山川河谷很多，红军为了抢时间，少绕路，爬山涉水，指战员们腿上的绑带湿了干，干了又湿，像紧箍咒一样越勒越紧，有的战士忍不住，干脆解下绑带行军。不是细心人，是很难记清趟过多少河流的。幸亏还有这个有心人。

“你不知道，我可清楚：我们一共趟过 72 条河流。”话音刚落，大家惊奇地互相看着，立即就热闹起来。

“哎呀，那么多！怨不得腿和脚上裂开口子呢！”大家风趣地编出了顺口溜：“趟不完的水，翻不完的山”，“七十二道川，绑腿总不干”。

“不奇怪。你看，这条丹江又等着咱们呐！”

红军越过丹江后，又继续向前赶路了。

11月初，红军进到鄂豫陕交界的南化塘地区。部队在南化塘休息 3 天。方面军总部研究了南化塘地区的各种情况，认为“南化塘地区北靠伏牛山，南傍鲍鱼岭，介于丹江和汉水之间，地形

较好，粮米较丰”，“准备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①。并向党中央电告了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的原因和今后的打算：

此次（鄂豫皖）战区未能冲破包围，客观原因系革命发展不平衡，战区处交通便利、四面受敌、反动势力较雄厚之区域。在此次激烈斗争中，并未得四面工农，特别是交通界城市工人的最低赞助，最主要的是战区政治工作和政治领导之错误，对敌力估计不足，发动赤区群众反包围不够，发动白区士兵斗争的工作不够，省委之白区机关工作方式在紧急斗争时完全表明不能胜任。即中央（与）各区的红军亦未有更有力的配合行动，中央未能供给战局最低必须之政治、军事、技术的无产阶级的干部，亦是原因之一。我四方面军精锐英勇慷慨，我以孤军大战数倍之敌，转战千里未曾一挫锐气，但终被迫脱离赤区。鄂豫皖赤区尚有近三万枪之游击队，必能在困难条件下斗争而有发展。红四方面军现已到鄂豫陕边，当以联合湘鄂西、鄂豫边、陕甘边赤区和红军，形成襄江上游之巩固赤区和红军为目的。^②

但是，红四方面军的计划没能实现。红军在南化塘刚驻3天，敌人又跟踪追来。敌第五十一师、第一师、第六十五师、第四十四师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再次对红军造成了合围之势。在敌三面进逼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经鄂陕边界之漫川关，西进汉中。

漫川关，是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小镇。周围都是千米以上悬崖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18页。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18～219页。

峭壁，仅有几条羊肠小道，地势十分险要。11月11日，红四方面军进至漫川关东康家坪、任岭地区。当时，陕军杨虎城的重兵3个团已卡住关口，挡住红军西去的道路。胡宗南第一师也由郿西进到漫川关东南任岭、雷音寺、古庙沟一线，当即与红十二师先头部队激战。13日，敌第四十四师也由鲍鱼岭地区进占漫川关东北张家庄、马家湾一线，与红七十三师二一九团激战竟日；敌第六十五师、五十一师也尾追红军至漫川关东大沟口、当山地区；冯钦哉第四十二师，则经漫川关北之石窖子向南压下来。蒋介石严令其各追堵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务必将红军歼于康家坪到任岭10余里的悬崖峭壁之间。事实上敌人已经将红军合围在康家坪至任岭的深山峡谷中了。

红四方面军17000余名指战员与围敌相比，数量上处于劣势，但与驻守在漫川关的陕军相比则处于绝对优势。然而，漫川关的隘口是属于那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隘。如果红军先头红十二师乘胡宗南部立脚未稳，情况不明，一个冲锋打上去，有可能把敌人击溃。但红十二师师长旷继勋指挥不力，贻误了战机。红军的确到了危险至极的境地。

陈昌浩得知消息后，抑止不住怒火，向红十二师的通讯参谋大发雷霆：“犯罪！简直是犯罪！”撤职、处分，此时都无济于事了。陈昌浩的脸色煞白，一会儿又变得铁青。通讯参谋看着总政委的狂怒，惊呆了。刚从红七十三师调来总政治部工作的张琴秋，推了受委屈的参谋一把：“你快去吧！总政委几天没有合眼，太疲劳了。”陈昌浩也意识到自己失态，于是缓过语气发出命令：“传令师长，三十五团掘壕坚守，决不能让敌人再前进一步。敌人可能趁夜突然攻击我军阵地，必须下定决心，与阵地共存亡。”他还命令：“三十四团全体指战员暂时休息以待后令。”此时，陈昌浩接到张国焘的通知，要他立即到指挥部参加紧急会议。陈昌浩火速赶到指挥所，总部的领导人都蹲在一个掩体的周围，警卫战士

分散在四周的高台上。陈昌浩刚刚坐在一块大卵石上，张国焘即对他说：“刚才我们已经议了一下，情况十分紧急，漫川关已被杨虎城部队占领，敌军正在向我们合围，四面通道已被堵截。”^①张国焘顿了一下，继续解释说，红军在山林中寻找到三个老百姓，略加讯问，就发现这三个人原来是敌探，我们予以优待，保证决不加害，其中一人很快就说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情况。他告诉我们，“漫川关的右侧离这里30里地方，有一条险要的小路，通山谷外的陕境，如果萧之楚部尚未赶到那里布防，是比较容易通过的地方。”^②

陈昌浩认真地听着张国焘的解释，脑子里翻江倒般海飞快地思索着。这时张国焘又说话了：“我认为现在只有化整为零，分散游击，让敌人摸不着我们主力的真实动向，才易于突围。突围出去后，按指定地点集合，再归建制。”^③陈昌浩闻听此说，一时无言以对。张国焘盯视着陈昌浩，想听听他的意见。陈昌浩思索片刻将眼光转向徐向前。

张国焘见状，代替徐向前说：“总指挥不同意分散。”

徐向前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这支部队不能够分散，在一块儿才有办法。我们好比一块整肉，敌人一口吞不下去；如果分散，切成小块，正好被人家一口一口地吃掉。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分散打游击，要想尽一切办法突围。”^④

陈昌浩听了徐向前的意见，又研究了一阵军用地图，看了参谋指点的敌军来犯的路线，便果断地说：“不能分散，千万不能分散，我同意总指挥的意见，集中兵力突围。”^⑤张国焘最后亦同意

① 范青：《陈昌浩传》，第106页。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146页。

③ 范青：《陈昌浩传》，第106~107页。

④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20页。

⑤ 范青：《陈昌浩传》，第107页。

集中兵力突围。于是，方面军总部决定：从北面敌之薄弱环节实行突围。^①

事不宜迟，立即行动。徐向前、陈昌浩等总部首长策马奔向红十二师驻地。许世友将军回忆：“几匹战马向我团疾驰而来，急骤的马蹄声未落，徐向前、陈昌浩等总部首长就翻身下马，来到了我们的面前。从他们的神色揣度，一定是又碰上了严重的敌情。”“果然不出所料。徐向前同志扼要地介绍了敌我双方的态势，我们的心情立即变得沉重起来。”“红四方面军的命运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徐总命令红三十四团在北山垭口敌四十四师两个旅的接合部打开一条通道，保障全军通过。“徐总指挥交代了任务以后，又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世友同志，全军安危唯此一举，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夺取垭口，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我看着他那信赖和期待的目光，斩钉截铁地说：‘请放心，三十四团只要拼不光，就一定为全军杀出一条血路！’”^②

徐总指挥当即命令红三十四团正面突击，红七十三师二一九团配合，夺占北山垭口。陈昌浩总政委带着红三十四团、二一九团立即行动。

许世友为团长的红三十四团和韩亮臣为团长的二一九团都是善于打硬仗、恶仗的部队。特别是红三十四团能攻善守，攻如猛虎、守如泰山。“团长许世友，是一员能征惯战、勇猛顽强的虎将。他执行上级的命令非常坚决，从来不讲半点价钱，他特别喜欢打硬仗。每次战斗总是冲在前头。”罗应怀回忆：“在我们团，指战员们始终士气高昂，斗志旺盛，困难再大，伤亡再重，从不皱一皱眉头。如今重任在肩，许团长的眼睛又瞪圆了。他腰里扎着一条足有四五寸的灰色腰带，别着两支驳壳枪，背后斜插着一把磨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196页。

^② 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第184~185页。

得锃亮的长柄朴刀，袖子卷得老高，大家一看团长的模样，更是精神抖擞，士气倍增，誓与阵地共存亡。”^①红三十四团轻装跟随陈昌浩政委出发，红二一九团在团长韩亮臣率领下随后跟上。

部队出发不久，就接到情报：敌第四十四师正沿着一条小路向北山垭口方向疾进。陈昌浩马上叫来许世友，对他说：“敌四十四师已派出两个团来抢北山垭口，想堵死我们的出路，你立即带领全团跑步前进，一定要抢在敌人的前面占领山垭制高点。”又传令韩亮臣团长，令二一九团接应三十四团。

许世友团长走在队伍的前面，红三十四团的战士们在团长的带领下快步行军。寂静的山谷中，除了战士们的脚步声引起的回音外，只有被惊动的雀儿振翅向远方飞去。许世友团长命令：“抢占北山垭口，必须两小时赶到，时间就是胜利，我们要争分夺秒，为全军杀开出路。”

敌萧之楚部已经向北山垭口爬过来了。

陈昌浩看着战士们张着大口喘息着，拼命向前行进的情景，十分感动。他心想，这是些多么好的战士啊！只要有任务，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拼命完成。但是，人的体能已将近极限。怎么办？在最困难的时候要拿出办法来，在看似绝望时候找到希望，这才是工农红军。眼下，是根本用不着政治动员的！陈昌浩经过几秒钟的思考后，紧急集合了担负警卫任务的战士和红三十四团的马匹和骑手共17骑。经过几句动员说明任务后，由他亲自率领着，飞马向北山垭口奔去，红三十四团二营跑步紧跟在后。马蹄声、跑步声，在山谷里似春雷，阵阵回响着。

许世友传令：“总政委率二营已冲上前了！快！我们一定要抢在敌人前面，占领北山垭口！”部队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去。

红军是向东北方向前进，敌人是朝西南方向行动；红军顺山

^① 罗应怀：《突破敌重围 转战三千里》，《艰苦的历程》上，第323页。

势由上而下，敌人则仰面爬坡由下向上；红军轻装疾行，敌人则辎重较多，大部队在后，只有少数先头部队顺着山坡向北山垭口爬了上来！

一个多小时后，陈昌浩率领的十余骑提前赶到了北山垭口，立即占领了山谷右侧高地，抢挖工事，扼守着北面的小道。二营的全体指战员随后也进入阵地。

敌萧之楚部两个团因此时犹如一片乌云，漫山遍野地向北山垭口爬来。敌人官长和督战队强逼着士兵向上攀行。当敌人尖兵刚进至北山垭口前沿时，突然遭到猛烈的打击，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搞得蒙头转向，丢下一片死尸，很快败退下去。

与此同时，直接配合红三十四团作战的红二一九团，在北山垭口西北方向的龙山制高点上，也同合围过来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如果说红三十四团打开了红军突围的右大门，而红二一九团则是打开了红军突围的左大门。当红二一九团在红七十三师师长王树声和团长韩亮臣的率领下冲上龙山制高点时，发现敌四十四师一三〇旅也从山头的另一侧爬到了半山腰，离山顶只有几十米了。真是危险至极！红二一九团团长韩亮臣未及喘息一下，就将手枪拔了出来，指挥部队立即反击，一阵密集的枪弹像下雨似地倾泻到敌人头上。敌人留下一片死尸慌忙逃了下去。顷刻间，敌人又疯狂地发起了进攻。狂风暴雨般的炮弹、枪弹落在红军阵地上，敌军士兵在官长的强逼之下，又反扑过来。韩亮臣在激烈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王树声的战马也倒在了阵地上。但红二一九团还是牢牢地守住了阵地。

经过红三十四团和二一九团的奋力拼杀，红军终于在敌人的结合部撕开了一条三四里宽的口子。

徐向前总指挥当即命令全军立即行动，从这里突围。

为了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垭口小路，部队再次轻装，凡是可

精减的东西全部扔光了，行军锅被砸成了碎片；一些瘦弱的牲畜行动迟缓，被推下了山涧；连那些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山炮和迫击炮，也不得不忍痛炸成了废铁。徐向前和陈昌浩站在最危险的小路边，亲自指挥部队迅速通过，他俩瞪着熬红了的眼睛，穿着单薄而褴褛的衣衫，满面尘土和沾满血污地立在刺骨寒风中，冒着敌人的炮火枪响，命令部队：“快，快！再快一点！”

总指挥、总政委的命令很快传遍了全军，指战员们，深知速度就是胜利，时间就是生命，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迅速向前疾进，通过垭口。

敌人也知道丢失了垭口意味着蒋介石在漫川关聚歼红四方面军的如意计划将变成泡影。所以，凭借装备和兵力上的优势，发疯般对红三十四团防守的右侧阵地和红二一九团的左侧阵地冲了过来，想把缺口重新堵上。战斗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敌人和红军双方都尽全力在拼搏，在厮杀。敌人像扑上来的狼群，嚎叫着冲来，但被红军的排子枪、手榴弹打下去；再冲来，再打下去，反反复复不知多少次。枪声已分不出节奏，炮弹亦听不出响声。许世友回忆，当时“四面大山都仿佛在微微发颤”。

11月13日黄昏，红四方面军主力全部通过这个垭口。

当敌人的两个旅再合拢时，包围起来的只是红军甩掉的一堆破烂。红军已经翻越野狐岭，抢占竹林关，再一次摆脱了险境。

漫川关战斗，是关系到红四方面军生死存亡的一仗。当时，红军处境之险恶，战斗之激烈、残酷，是前所未见的。参加这次战斗的红三十四团一营二连的打旗兵、兼连部通信班班长罗应怀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枪子和弹片把无名高地上的松树枝叶削得光秃秃的，只剩下一根根半截子树桩。我们一营上去时五六百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80多人。我打的旗，被弹片撕成了一条条碎片，连旗杆也被子弹打穿了好多孔。二营撤离阵地时，发现有两个班的十几名同志由于长时间趴卧在冰天雪地里，竟被严寒夺去了生

命。这些同志已经冻僵了的躯体，还依然保持着卧射的姿势，手指抠着枪的扳机，眼盯着前方，就像一尊尊钢打铁铸的塑像。然而，红旗没倒，阵地没丢。”^①

红军漫川关突围后，在如漆似墨的夜色中，攀峭壁，越深涧，朝正北方向翻越野狐岭。夜走野狐岭，行动十分艰难。徐向前回忆：“野狐岭山势陡险，只有条两尺来宽的羊肠小道，一边靠峭壁，一边靠深壑，又处在敌火力封锁之内。我军抢在夜间通过，人走马踏，路都快垮了，人和牲口有的翻下山去。我下了马，指挥部队砍树铺路，边铺路边走人马：笨重的东西通通扔掉。我有个皮包，里面还有块怀表，也在忙乱之中丢失了。”^②红军连夜翻过了海拔1600多米的野狐岭，横跨大大小小的山峦，穿过层层叠叠的密林和荆棘，直插竹林关。

竹林关位于丹江上游，是进入陕西关中平原的一道关口，这里的守敌是陕军两个团。红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二十六两团，在徐向前指挥下，一举打垮了守关的敌人，抢占了竹林关。红军攻下竹林关后，名声大震，附近的老百姓都说红军不怕死。

红军没有在竹林关停留，跨关而过，挥戈向西。此时，已是11月中旬，天寒地冻，冷风刺骨，红军指战员们依旧薄衣单衫，食不果腹。红四方面军总部首长很为解决部队的冬装问题伤脑筋。然而，红军这支人民军队，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罗应怀将军这样记述：“我军过了竹林关，摆脱了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大踏步向西挺进。

“天刚亮，我们路过商县境内的一个小镇子。这天正逢集日。一听说有大军开过来了，老百姓也不知道什么军队，赶集的、摆

① 罗应怀：《突破敌重围——转战三千里》，《艰苦的历程》上，第326~327页。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23页。

摊的人们呼啦一下全跑光了，东西都没顾得上收。当我们到时，面前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情景：衣物、首饰，京广杂货，还在敞开的铺子里摆着；钞票，还在做买卖的摊子上放着，有的被风吹得东一张西一张的；烧饼在火炉上烤焦了，油条在锅里炸糊了……由此可以想像出人们跑开时的惊慌与混乱场面。

“说实在的，我们的指战员连日来奔波转战，穿的是单衣，吃的是萝卜、土豆和红薯，冷坏了，也饿极了。一下看到香喷喷的油条、烧饼和货架上的衣服、鞋袜，哪有不眼馋的？！但是，我们是人民的队伍、是革命的军队。同志们勒了勒裤带，挺了挺胸脯，穿镇而过，秋毫无犯。宿营的时候，指战员们以采购来的苞谷、山芋充饥，心里却是甜滋滋的。”^①

然而，敌人却过分地估计了红军的困难境况。他们认为，红军“不死于炮火，即死于冻饿”。在其《鄂豫皖三省‘剿匪’军事经过报告书》中，这样描述红军：“匪因迭受重创，死伤过半，枪炮骡马损亡遗失殆尽。”^②在敌人贬低红军“实力此时仅四五千人耳”的话时，红军已经过了竹林关，途经龙驹寨、商县，到了商县以西50多里的杨家斜。红军主力部队在杨家斜作短暂休息之后，总部决定南下镇安、柞水，尔后再进入汉中。当红军走到凤凰嘴以东的牛王寨时，侦察到敌胡宗南部已经赶来堵截。红军当即调头向北，两天急行军230余里，到达曹家坪。红四方面军总部开会，决定兵分两路越秦岭，一路走汤峪，一路走库峪，向关中平原转进。

秦岭山脉，高耸入云，气吞万里。山连山，水连水，翻不完的山头，越不尽的急流。古有秦岭“七十二岫护潼关，七十二峪

① 罗应怀：《突破敌重围 转战三千里》，《艰苦的历程》上，第328页。

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卷），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内部版，第210页。

保长安”的说法。站到秦岭高峰环顾四周，只见群山起伏宛如海上涌起的波涛，似被仙人用点水成石之术，把这奔腾的浪涛固定下来，成为群峰争雄的绵延山势。秦岭的险峻在红军战士脚下根本不成其为问题，他们跃马扬鞭，大步行进在崇山峻岭悬崖峭壁之间。

11月23日，红四方面军进入关中平原。

红军进逼西安古城，大大出乎敌人的意料。敌人屡次吹嘘说：红军“自鄂经豫窜陕以至现在，其实力盖已无形减少三分之一矣”^①；“匪之实力，以迭次消耗，不过五六千人，……歼灭之期当不远也。”^②敌人指挥部认为红军还被困在秦岭山中，蒋介石电令国民党军队：“向匪夹击，早收聚歼之效”，^③“尽最后之努力，必可获得至大之成功。”^④当红军突然出现在关中平原，兵逼西安古城时，敌人顿时手忙脚乱，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主席杨虎城，忙调孙蔚如第十七师在王曲、子午镇一带阻击红军，尾追红军的敌第一、六十五、四十四、五十一、三十五师，也蜂拥扑向关中地区，敌第二、四十二师则沿陇海铁路匆忙西进，星夜向西安奔去。

红四方面军出秦岭后，便与追击堵截之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11月24日，红七十三师在师长王树声指挥之下，在西安南郊40里的王曲镇同敌阻击部队陕军混成旅和特务团接火。敌人以逸待劳，凭借着武器优良，使得红七十三师的前锋二一八团一时难以得手。双方正在僵持着，方面军总部几位首长来到前线。徐向前、陈昌浩等领导人向王树声询问：“你们能不能击破敌人？如果不行，我们就调其他师！”这一“激将法”，把王树声激怒了，他斩钉截铁地保证：“打不垮敌人，愿受军法论处！”说罢，王树声飞身上

①②③④ 《第四十四师记载各部对西征途中的红军追围堵情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卷），第233、243、244、245页。

马，带领部队旋风般向敌人冲去。经过几个回合的厮杀，敌人被歼4个营，溃败了。11月25日，红军后卫部队第十一师在子午镇被敌第十七师截断，红十师先头部队三十三团和红十师一部，立即折回，配合红十一师主力与敌激战，并将其击溃。溃敌向西安方向逃去。红军冒着漫天大雪，撒开两腿，乘胜猛追残敌。许世友将军回忆：“当时我们的衣服都很单薄，在雪地穷追猛打一阵以后，周身寒意全消，一口气追了很远。后来，隐隐约约看见前方有座大围子，并听说那是西安，城里的守敌已有戒备，这才撤了下来。”^①

11月27日，红四方面军主力抵达郿县（今户县）以南的彷徨镇。红军分两个梯队前进，张国焘带第一梯队的十一师、七十三师先行，徐向前、陈昌浩带第二梯队的十师、十二师殿后。当第二梯队行至炉丹村一带时，又被敌第一师两个旅截断。同时敌第六十五师和第四十四师由东面，第十七师和第四十二师由北面分别逼近，对红军形成三面包围形势，而南面又是秦岭，攀登亦难，情况甚为危急。敌人想张开大口吞掉红军。徐向前临危不乱，紧急集合队伍，组织反突击。同时以第一梯队之第十一、七十三师各一个团配合红十师、十二师对敌夹击。红军把截击之敌逼在一个河湾里，天上还下着雪，红军冒雪与敌激战，整整打了一个半天和一个通宵。敌人腹背受击，大败而逃。这是个不小的胜仗，红军毙伤敌第一师团长以下官兵数百人，全歼陕军一个警备旅，俘其旅长以下官兵数千人，后经过教育后全部释放。这次战斗中，红十师代理师长曹光南不幸牺牲。这次战后，红军继续西进。

11月28日，红四方面军进抵盩厔县（今周至县）南40余里马召镇附近之新口子。此时，红四方面军总部收到党中央11月27日电，来电说：

^① 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第187～188页。

(一) 虽然在临城战役中，红军获得伟大的胜利，击溃敌人九师主力，坚强了自己。但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崩溃过分估计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四次‘围剿’严重性的估计不足，使我们不得不离开原有的根据地，这是很大的损失。(二) 现在的任务是要红四方面军在鄂、豫、陕边建立新的根据地，发动当地的群众的革命斗争，给红军主力以整理补充，并尽量扩大红军，以准备向敌人反攻。继续向西入陕与长期行动是不适当的。(三) 迅速与红第二军团取得联系与行动的呼应。特别是在向敌人反攻准备时期，这有极重要的意义。(四) 帮助领导鄂豫边区，恢复鄂豫边苏区，发动在这些区域中的游击战争，最高限度的发展土地革命的斗争，这是创造与巩固鄂豫边苏区的不可分离的步骤。(五) 红军主力整理休息补充之后，应取向回发展的方向，造成时时威胁襄樊及武汉形势，所以与鄂豫皖苏区取得密切的联系，是十分必要的。”^①

对此，徐向前元帅后来评论说：“教条主义的中央领导人，远在江西根据地，他们提出的上述任务和要求，远远脱离我军转战的实际，是行不通的。”^②红四方面军此时在敌军紧追下，“已远离鄂豫边深入陕境，鉴此情况，张国焘决定部队南进汉中。”^③

11月29日，红四方面军由新口子出发，再次翻越秦岭。

为了甩掉追兵，红军选择的道路几乎都是人迹罕至的高山区，加之天不作美，落了几场大雪，红军的行军更为艰苦。红军指战员们身着单衣，脚踏草鞋，有的连鞋子也没有，只在脚上缠几层

^{①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25～226、226页。

^③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198页。

破布。隆冬严寒，大雪封山，指战员们无心欣赏这群山披玉、大地铺银的山河美景，只顾迈着快步疾行在崇山悬崖之间。由于长期行军打仗，红军指战员们大多数都患了严重的脚病。红军在深山老林里行军，沿途杳无人烟，粮食极其缺乏，吃饭成了大问题。红十二师担任后卫，虽然前面部队留下一些粮食，但数量少不够用，所到之处，能充饥的野菜、野果早被先行部队采光，连飞禽走兽的踪迹也被大雪掩盖得无影无踪。在最后两天，竟不得不宰杀战马充饥。红军指战员充分发扬了高度的吃苦耐劳精神，战胜了横在前进路上的一切困难。经过9天的艰苦行军，一连翻过9座海拔2000—4000米的大山，通过老君岭、厚畛子、下佛坪、都督河、黄柏源等地，于12月7日进抵秦岭南麓的小河口。

小河口镇，位于秦岭南麓，为秦岭入汉中的咽喉。红四方面军总部到达小河口的第二天，召开了著名的小河口会议。《红四方面军战史》这样记载这次会议：“方面军抵达小河口的当晚，部分高级干部商议同张国焘进行斗争。这次行动，是在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指战员对张国焘错误领导日益不满的基础上发生的。鄂豫皖根据地，是党自1927年起，经过千辛万苦创立起来的，红四方面军在这里成长壮大，与当地人民有着血肉的联系。可是，在敌人第四次‘围剿’面前，由于张国焘的错误，红军主力竟然被迫离开这个长期以来为之流血战斗的地方，实行了大转移，越走越远。转移前既未向部队说明原因，途中又借口军事秘密对行动方向缄口不言。这就不能不引起广大指战员的怀疑和不满。许多干部纷纷议论：‘为什么放弃了根据地？’‘究竟到哪里去？’部队到达小河口时，曾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的余笃三和总部干部王振华、朱光，便计议到中央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要求中央迅速采取措施加以纠正。王、朱将此事告诉第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张认为不妥。是夜，王振华、朱光、李春霖、张琴秋到曾中生、刘

杞处谈论对张国焘的意见，并推举曾中生书面向张国焘陈述大家对领导和当前行动方针的意见。基本意见是停止退却，争取迅速在陕鄂一带创造新的根据地；希望张能采纳大家的意见，改正错误，并将这一意见转报中央。十二月八日，张国焘在小河口召开部分师级以上干部会议，讨论行动方针。会上，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随后又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任命张琴秋为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事后，张国焘得悉上述同志反对他的行动，便怀恨在心，伺机打击报复。

“在小河口，没有形成和张国焘公开对抗。因为：第一，张国焘当时仍然是中央代表。第二，广大干部对张国焘的错误还缺乏更多的认识。但是尽管如此，这次行动仍是有意义的。迫使张国焘不得不将其家长制的领导，暂时稍加收敛。这对以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创建，有着一定的积极影响。”^①徐向前总指挥没有参加小河口会议，他带着先头部队到前面去了。

小河口会议后，红四方面军继续南进。行抵秦岭出口处许家庙、升仙村时，又遇到陕军赵寿山第五十一旅两个团的堵截。红军先头部队第十师向敌发起猛攻，迅速将其击溃，并歼灭一部。12月10日夜，全军进入汉中平原的城固地区。因为这一带回旋余地小，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去大巴山北麓的西乡、镇巴一带立脚。在茫茫夜色中，汉水奔流呼号，横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汉水是长江的一大支流，发源于陕西境内米仓山西端，下游在汉口注入长江，即便在冬春枯水季节，水量也相当可观，200米宽的江面，湍流湍急。江上只两条小船，一万多名战士无法迅速渡过。

徐向前、陈昌浩接到报告，立即策马亲赴江边探测。他们上下奔跑查看，还骑马试渡。陈昌浩首先找到了一段浅水处渡到了对岸，他骑在马背上，湿透了的双脚已冻得麻木了，然而他不顾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198~200页。

寒冷，迎着朔风兴奋地向着对岸的徐向前高声呼喊：“总指挥！只齐胸深的水，行啊！”

徐向前大声向同志们说：“同志们！这条汉水挡不住我们，这儿水不深，完全可以趟过去！”大家十分高兴。可是数九寒天，浅滩处已结着亮晶晶的冰凌，使人望而却步。正当大家有些迟疑之时，徐向前已带头下了水，踏着岸边的薄冰，向着江对岸趟了过去。指战员们看总指挥先趟进了河中，纷纷涌向岸边，跟在徐总身后浩浩荡荡地徒涉汉水。当夜，全军渡过汉水。尾追红军的敌人，做梦也想着汉水会助他们一臂之力，没想到汉水亦会成为他们追赶红军的一大障碍。红军夜涉汉水，又把他们甩掉了。渡过汉水，红军进抵上元观地区。徐向前在此清点了全军人数，共14400人，其中仅有10多个女同志，包括张琴秋、曾广澜、林月琴、汪荣华、何福祥、刘伯新、王泽南等。

徐向前元帅后来总结说：“部队南渡汉水，向镇巴、西乡转移，是极为重要的一着。从此，摆脱了遭敌追堵的被动局面，取得了主动权。汉中地区，仅汉水两岸有西北军十七师一部驻守，兵力不多，我军渡过汉水后，杨虎城鞭长莫及，无力再追堵我们，只能令部队远远地打打炮，做做样子。敌胡宗南第一师被甩在关中，尚未赶来；四十四、六十五师则奉令调去安康地区，对付转到鄂陕川边境的红三军。这样，经过两个多月艰苦转战的我军，终于使敌人的‘此股残匪’‘不死于炮火，即死于冻饿’的梦想彻底破灭，迎来了胜利的曙光。”^①

四 红旗漫卷通南巴

红四方面军夜涉汉水，进抵汉水以南地区，摆脱了敌人的追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28～229页。

击堵截。这样，红四方面军自10月下旬至12月中旬所经历的战略转移，行程近3000里，其间，迭破重重围堵，两次翻越秦岭，歼灭敌人近万，保存了1.5万人的革命骨干，为开创新的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红军还在小河口时，中共陕南特委派王燮、胡哲等带领20多名党团员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联系，受到徐向前、陈昌浩等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徐、陈等领导人分别作了指示，并发给长短枪120支及一部分经费，还从红军中选派了十多名骨干，协助地方党开展工作。地方党组织也为红军派来了向导引路，提供敌军情况。当地人民对红军十分亲切，凡是有党的工作基础的村镇，红军一到，人民群众就积极送粮送草，张贴标语，热情欢迎红军。许世友回忆：“当我军到达以后，立刻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虽然群山还覆盖着皑皑白雪，而我们却感到四面都是和煦的春风。人们团团围住了部队，把战士们搀扶到家里，换下了破烂不堪的衣服，端出了热气腾腾的饭菜，又眼中含着泪水给我们洗脚上药。到了这时，我们这些挺过了那样艰难困苦硬汉子，也都不禁流下了热泪。嘴里喃喃地说着：‘到家了，到家了！……’”^①

饱尝撤离根据地后长期转战之苦的红军指战员，对陕南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感到分外温暖，要求建立根据地的心情也更加迫切。当时，红四方面军前敌委员会考虑到陕南地区北濒汉水、南倚巴山，地方党又有一定的工作基础，于是准备在城固、西乡、镇巴、石泉、紫阳、安康等县就地展开，建立革命根据地。

12月12日，红四方面军在城固县上元观召开了党团活动分子会议，检查和总结了西征途中的政治工作，并指示部队一面休整，一面就地发动群众。“红军在上元观派出干部、战士开展群众工作，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任务及政策，

^① 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第195页。

镇压了数名土豪劣绅。”^①“此后在南乐、胥家营等村，发动贫苦农民起来进行反封建斗争，打开地主粮仓给穷人分粮 100 多石、布 120 余匹，进行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当时分地主土地 180 余亩，分得土地者五六十户人家。”^②红军部队还在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展地方武装的同时，开展建立政权和土地革命等工作。在钟家沟地区建立了 10 多个村的工农民主政权，将地主 800 多亩土地分给了贫苦农民，镇压了一批土豪劣绅，并帮助贫苦农民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12 月 20 日，中共陕南特委发出《为欢迎红四方面军发动群众斗争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汉南新苏区的紧急通知》，号召“为欢迎四方面军为创造陕南新苏区而斗争”。

正当工作将要全面展开之际，红四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又得知四川军阀正在混战，川北敌人兵力极为空虚，并且那里地势险要，物产丰富，回旋地区更为广阔。而陕南由于连年干旱歉收，粮食极缺，又屡遭兵匪蹂躏，群众又少，大部队无法久驻。因此，前敌委员会认为，以川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要比陕南更为有利。遂决定集中力量向四川发展，创建以川北为中心的川陕边革命根据地。

1932 年 12 月 15 日，红四方面军在西乡县钟家沟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传达进军川北、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方针。许世友记述这次会议说：“方面军领导同志首先总结了西征以来的情况，表扬了我们三十四团和其他作战有功部队，接着就宣布了进军川北的决定。”“这消息不啻一颗重磅炸弹，在会场上引起了很大震动。离开鄂豫皖以来，战斗频繁，行踪飘忽，广大指战员迫

① 林超 温贤美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 页。

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上），解放军出版社 1993 年内部版，第 108 页。

切要求结束这种无根据地作战的被动局面。到了陕南以后，我军受到当地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大家都有一种‘游子还乡’的喜悦心情。现在板凳还没焐热，又要去爬雪山，太出人意料了。

“但是听了方面军领导同志的解释后，我们又产生了一种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感觉。汉中地区南与巴山毗连，北与秦岭相接，既是陕南地区政治经济的中心，又是通往四川与西北的枢纽，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现在，听方面军领导同志说：川北比陕南的地势更险要，物产更丰富，回旋地区更广阔；而且四川军阀林立，目前正在川西一带混战，川北的防守十分空虚，正是我军入川的大好机会。既然有这么好的有利条件，我们何乐而不为呢！经过热烈讨论，大家一致同意：立即翻越大巴山，占领通江、南江、巴中地区。”^①

进军川北，横在红军而前的第一道难关就是“巴山天险”。早在1000多年前唐朝诗人李白就发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更何况这雄峙于川陕交界处、横断两省通道的大巴山脉此时又披上了银装。当地人说：“雄鹰双展翅，难过巴山顶。”乡亲们听说红军要过巴山，都感到十分惊奇。纷纷到红军驻地好心相劝：

“要翻山也要等到春暖花开，现今可万万不能。冻，也冻死呀！”

“你们现在不能走！巴山上七十，顶七十，下七十，三七二百一十里，都是羊肠小路，悬崖峭壁。眼下大雪封山，连个插脚的地方都没有，你们怎么走法？怎么能过得去呀？”

红军指战员们说得更好：

“我们能过去，一定能过去！”

^① 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第198～199页。

“我们红军连死都不怕，还怕一座大巴山吗？”

“巴山天险一定会被我军征服！”

红四方面军总部也充分考虑了翻越大巴山的种种困难，要求每个指战员要打两至三双草鞋，带足三天的炒米和铺路、取暖用的稻草，并将马匹集中起来供伤病员使用，还向周围群众尽可能多买了些衣被，为翻越巴山做了种种准备。

行动前，徐向前亲自到红七十三师二一七团做了检查和动员。这个团是先遣队，担负着为全军开路的光荣任务，同时还肩负侦察敌情，勘察标示道路的任务并要在每隔10里、20里的地方，搭起一些简陋的小草棚，作为后面大部队中伤病员和体弱同志的休息地方。

1932年12月17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命令红七十三师以二一七团为先遣队，先行出发，主力于19日相继出动。据杨立夫在《翻越巴山先遣团》一文中记载：“17日拂晓，我们先遣队开始翻越大巴山天险。黎明前的夜空，寒星闪烁，我们踏着白雪，沿着蜿蜒的山径向上爬去，边走边用砍刀和刺刀砍掉路上丛生的荆棘，为后面的大部队开路，并在显眼的地方插上事先准备好的三角小红旗，作为部队行进的标记。走着走着，太阳已高高升起，皑皑的积雪反射着白光，刺得眼睛直流泪，睁不开，渐渐地一些同志看不清东西了，雪盲症严重地威胁着每个同志。……”

“当我们上到三四十里的时候，巴山的狂风向我们袭来，狂风卷着雪片直往鼻子和嘴里灌，呛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树梢上的小冰球被风吹落下来，像下冰雹似的不断打在我们的脸上，疼痛难忍；单薄的衣服由于浸透了汗水和雪水，冻成了硬邦邦的‘白铁’夹克，它磨破了我们的皮肤，渗出血来，使人疼得揪心。

“越向上走，风雪越大，山势越险峭，崎岖狭窄的山道几乎要直立起来，冰坡一个接着一个，一不小心就有滑下去的危险。部队的前进速度慢了下来。我们的草鞋早被雪水浸透了，结成了冰，

有的同志的脚也被冰渣划破了，鲜血直流，十个脚趾冻得又木又麻；手像一双紫红的皮手套，又肿又发硬，全身上下几乎都是冰凉的。

“同志们越走越感到腰酸腿疼。由于空气渐渐稀薄了，高山缺氧，一些年大体弱的同志，越走越喘，越走越吃力了。”^①但是，红军指战员们互相鼓励，彼此搀扶，你拉我，我拽你，一步一步前进着。看不到沮丧的面孔，听不到埋怨的声音，红军战士再次表现出不畏艰难困苦的英雄气概和毫不动摇的革命信念。

12月19日，红四方面军大队人马开始行动，黎明前3小时，他们就出发，沿着先头部队的足迹、路标一鼓作气走了下去。“记不清爬过多少悬崖峭壁，总算离山顶不远了。这是最艰难的地段。上面是又高又陡的峭壁，下面是幽深莫测的山涧，稍有不慎，就会被摔得粉身碎骨。狂暴的山风吹得人摇摇晃晃，棉桃大的雪花打得人睁不开眼睛。我们手足并用地爬着，脸快要贴到雪地上了。”“我们爬到山顶，天已经黑了，又走了二三十里才宿营。谁知宿营比行军还苦。荒凉的山顶上，没有一间房屋。部队只好在雪地上露营：挖一个雪坑，就是我们的‘房屋’；垫一把稻草，就是我们的‘床铺’。我们一把炒米一把雪，一口一口吞下去。”^②“为了抵御山顶的寒冷，大家捡来了一些树枝、枯草，点起了一堆堆篝火。俗话说，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我们围着点燃的篝火，还觉得身后冷冰冰的，只得背靠背挤在一起，用聊天分散注意力，抵挡着偷偷袭来的夜寒。”^③

在这异常艰难的进军中，共产党员和红军各级指挥员更是以身作则，带头替有病或体弱的同志背东西，或奋不顾身地站在危

① 《艰苦的历程》上，第356页。

② 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第205页。

③ 《陈再道回忆录》（上），第243～244页。

险地段上抢救和拉扶战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这样记载着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共产党员、优秀的红军战士陈松庭，就是一个例子。一路上，他经常替年幼的战士背东西，并把自己的干粮让给别人，休息时又协助班长在风雪中为全班战士拾柴生火。深夜，自己睡在草棚门口，用身体为大家遮风御寒。第二天早晨发现，这个平凡而伟大的共产党员，竟因冻累而光荣地献出了生命。”^①陈松庭卷曲的身子死死地压在草编的窝棚门帘上，身下压着一把铁镐，身上覆盖着厚厚的冰雪。他用自己的身体压着窝棚，让战友们度过了寒夜，而他自己却再也醒不来了。战友们忍不住失声痛哭，用军用手镐掘开冻土，他们朝着战友的遗体默默地脱下军帽。总政委陈昌浩赶来了，他站在坑前，摘下八角军帽，向伟大的战士默哀。然后，他夺过一把手镐，拼力地铲着那坚硬的冻土，虎口都震裂了，他也不觉，鲜血洒在冻土上，洒在烈士的身旁。

红军指战员就是凭着忘我牺牲和顽强拼搏的革命精神，征服了风雪严寒、艰难险阻的天险大巴山，突然出现在川北。

四川，历史上号称“天府之国”，地广人众，物产富饶，人民素以勤劳勇敢著称。不仅男子长年劳作不息，妇女也同样从事各种主要劳动。但是，在军阀和地主阶级的暴虐统治之下，人民受到苛捐杂税、重租高利的各种剥削，生活极端痛苦。四川自1920年实行“防区制”后，全省分别为刘文辉、刘湘、田頌尧、邓锡侯、杨森、刘存厚等军阀所控制。他们对省外是一个大的封建割据，不仅与邻省壁垒森严，就是对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也呈半独立状态，对内则勾心斗角，各霸一方。实力最大的为第二十四军军长兼四川省主席及川康边防总司令刘文辉，据有成都及川中、川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211页。

南和西康省东部地区；重庆、万县及川东地区为刘湘第二十一军防区；阆中、通江、南江、巴中等川北 20 余县为田頌尧第二十九军防区；川西为邓锡侯第二十八军防区；营山、渠县、蓬安、岳池、广安为杨森第二十军防区；宣汉、达县、城口、万源为刘存厚川陕边防军（后改为第二十三军）防区。此外，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和第二十三师师长罗泽洲也在川中占据着一些地盘。各个军阀在其防区内，掌握着政治、经济、军事等大权，形成各自的独立王国。他们为了争夺地盘，扩大势力，连年混战。在红四方面军决定入川之前，1932 年 10 月间，爆发了刘湘同刘文辉争夺四川霸权的大混战，全省大小军阀多被卷入这场混战，其中田頌尧曾抽兵 30 个团与刘文辉在成都展开巷战。12 月间，刘湘、刘文辉之战再起，刘文辉全力反攻，与刘湘大战于成都以南之荣县、威远地区。四川军阀兵力大部集中于成都、内江一带，而川北田頌尧第二十九军防区尤为空虚。

红军入川伊始，进入田頌尧第二十九军的防区。所到之处看到的是田园荒芜、烟毒遍地、兵匪为患、民不聊生的人间地狱景象。徐向前记述：“四川军阀连年混战，割地自肥，向来不顾人民死活。所以，尽管川北的自然条件利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但群众生活却苦不堪言，简直贫困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不论县城或乡村，我们见到的多是些‘打精巴子’的男女老少，衣不蔽体，面黄肌瘦，佝偻着身子，缩成一团。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围着块棕片遮身。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压得人们简直透不过气来。”^① 据当时反动报刊记载，仅田赋一项，每年最少也要征收两次，连同附加等，实际相当于征收正赋 8 次。而田頌尧的防区，田赋竟预征到 1987 年，一年之中，常常征收 10 至 12 次。除田赋外，人民群众还苦于军阀政府的特别捐（军阀强迫人民大量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 253 页。

种植鸦片以收重税)，仅以通江、南江、巴中3县为例：通江每年要缴特别捐70万两，南江30万两，而巴中则为100万两。这种特别捐成为人民最沉重的负担。农民交不起捐税而被吊打时，还有吊费，打费。再加上官吏的贪污，层层加码，月月摊派，摊到人民头上时就更为繁重，农民有的倾家荡产也无法承担。在巴中曾流行这样一副对联：

“好了他田家，苦了我田家，说声派杂税，团总派、甲长派、估派滥派，指名官派，胡派鬼派，硬起心肠由你派。

为了要‘巴士’，所以要‘巴士’，讲到收洋钱，场上收、乡下收、明收暗收，不怕手收，只怕天收，谨防尸骨无人收。”^①

这副对联反映了农民愤怒的心情。然而，反动军阀官府却根本不理睬人民的疾苦，对缴不起捐税的农民动辄拴、打、吊、押或关监牢，被折磨成残疾或被折磨死的人数不胜数。如南江县，在1932年筹集军款，数目达到历年来最高峰，人民无法缴出。县长姚奎却出告示说：“杀人可恕，欠款难容。”公然叫团总、保长屠杀缴不出款项和反抗的人，在南江长池的街上“经常吊起排排的人。”^②

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在军阀、地主阶级统治之下成为劳动人民的地狱。人民群众除了反抗之外，别无生路。自从大革命失败以来，四川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军阀、地主阶级进行着英勇的斗争。1929年4月，共产党员王维舟、李家俊等在万县、宣汉等地组织川东游击军第一路，并于5月12日举行了武装起义；1929年6月29日，邓锡侯第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在共产党员、时任该旅旅长的旷继勋等领导下于遂宁、蓬溪边界起义，打出了“中国共产党四川红军第一路”的旗帜；1930年7月，虎城、太平、龙沙三支农民武装合并成立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

^{①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上），第138页。

1931年5月，川东军委书记王维舟重组川东游击军；1932年11月，阆中、南部县党组织领导了升钟寺、保城寺地区2万多农民起义……。

红军刚一入川，把红军的主张一宣传，就立即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21日，我们终于翻过了天险巴山。快接近两河口时，忽然听到‘噼哩啪啦’的响声，山谷回应，犹如枪炮齐鸣。我以为是前面打响了，命令全团跑步前进。赶到街口一看，原来是镇上的老百姓放鞭炮欢迎我军，家家户户的门口铺满了鞭炮的纸屑，满街满巷弥漫着爆竹的烟气。”^①从许世友将军的这段记叙，看出川北人民欢迎红军、渴望翻身解放的迫切心情。

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背靠巴山南麓，俯视川东盆地，物产丰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军阀田頌尧在此盘踞多年，也是他赖以同各路军阀争雄角逐的要地。当红四方面军翻越巴山天险时，田頌尧及其主力第二十九军大部正在嘉陵江以西参加军阀混战。田頌尧第二十九军，共有5个师、3个路（每路两个旅）、一个军属独立旅，共约50个团。此时，通江、南江、巴中等县仅由其罗乃琼第三师第七旅之一个团和当地团防驻守。敌人也认为“巴山天险”难以通过，因此对北面的防御并不严密。

红四方面军先遣队红七十三师二一七团在师长王树声率领下，经过两天的急行军，于12月18日进占通江县北部边界之两河口，守敌一个连闻风逃之夭夭。紧接着红七十三师进占了泥溪场，全军主力相继到来。泥溪场一带正在闹土匪，深受其害的老百姓大多被迫离家，躲在半山的岩洞里。今见红军爱护百姓，秋毫无犯，大为感动，纷纷走出山洞，摇着红旗，献出自己仅存的一点大米、细粮来慰劳红军。红军战士看到这里层峦叠嶂，林木

^① 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第206页。

遮天，河川纵横，土地肥沃，地势险峻，人民朴实，进可攻，退可守，真是高兴极了。他们说：“这地方真不错！我们该不会再走了吧？”

“对！我们就要在这儿创建新苏区。”红七十三师师长王树声也欢欣地回答说。

12月21日，红四方面军主力通过两河口、泥溪场，进至苦草坝。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苦草坝决定兵分三路，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夺取通江、南江、巴中。以红七十三师为右翼，西出夺取南江；以红十师为左翼，东出进击洪口；红四方面军总部则率红十一、十二师直趋通江城，准备在攻占通江后再向巴中发展。苦草坝则作为战略后方，西北军委机关、后勤部门和医院、伤病员等，暂留苦草坝。徐向前总指挥要求各师神速运动，机断专行，加强联络，一定要打好入川的第一仗，在大巴山下取得立脚点，创造新局面。

12月25日，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领红十一师、红十二师，直扑通江城。在红军扑向通江城的路上，所经过的大小村寨，都有群众热烈欢迎，他们热情地为红军烧水送茶，主动为红军带路，积极要求参加红军。为了打好入川的第一仗，红军沿着大通江疾进，指战员们看着眼前阳光灿烂，满山葱绿，悬崖壁立，怪石峥嵘的大通江两岸一派生机的景色，不由地感叹着：“这里真是个好地方，在这里立足没问题！”

驻通江城的敌人两个营赶到瓦石铺前来阻止红军前进，被红十二师先头部队悉数歼灭。接着，红十一师和红十二师出敌不意，乘势向前。守在通江县城的反动民团亦被歼灭，红军一举解放了通江县城。12月26日，红四方面军总部抵达通江县城，并举行了隆重的人城式，庆祝红军入川解放通江县城的胜利。红旗插上了通江城头。

通江县城，一面傍水，三面临山，住有千余户人家，四周环有相当坚固的城墙。街道两旁有些店铺，经营日用百货、山货土

产、饭菜小吃之类。民房一般为木质结构，看上去大多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只有一座孔庙、一座天主教堂还算宽敞和坚固。这个小县城内居然还修筑有几条水泥的小马路和一个小小的中山公园。张国焘记述：“这是四川军人爱装门面的表现。在中山公园的高地上，还有一幢两层的小洋房，原系县政府的招待所，它即成为我的办公处。我在川北停留的期间内，多在里面办公。”^①与四川军阀的豪华奢侈相比，通江县城的普通百姓则穷途潦倒，街上走过的男女老少，大多面容憔悴，衣衫褴褛。更有甚者，在田颂尧统治之下，大片良田被勒令种植鸦片，供大小军阀、官吏吸食贩卖。“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这座只有千余户人口的通江县城，竟有上百户人家以开大烟馆为业，瘾君子之多，就可想而知了。有些青少年也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一个个弄得面黄肌瘦、骨瘦如柴。

红军进驻通江县城，立即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反响。尽管红军历经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衣服破烂，容装不整，身体虚弱，但他们态度和蔼，买卖公平，秋毫无犯，先头入城的指战员为了不惊扰城里百姓，冒雨露宿在群众房檐之下。当地群众从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加之红四方面军有个非常好的传统，即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一时间，通江城里满街满巷是红军贴的标语、口号；到处是红军官兵在街头宣传、讲演，发动群众。红四方面军的文艺宣传队大张旗鼓，唱歌、跳舞，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革命道理，宣传红军的性质，一曲在鄂豫皖根据地唱红了半边天的“八月桂花遍地开”，又响彻了川北的村村寨寨。一传十、十传百，人民群众纷纷打着小旗子，送茶倒水，杀猪宰羊，送粮送菜慰问红军。一时间“红军”成为通江城里城外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欢迎红军，支援红军，成了人民群众的普遍的心声和行动。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161页。

红四方面军总部进驻通江县城后，总部领导人决定：迅速向四周发展，控制通江附近大部地区，“抓紧时机，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建立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并充分做好迎击敌人进攻的准备工作。”^①

当田颂尧得知自己的防区被红军攻入的消息后，连忙从嘉陵江沿岸调兵堵击红军。其李炜如第一路和罗乃琼第三师第七旅进抵巴中，刘汉雄第二路进抵南江，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反攻通江。另有国民党刘茂恩第六十五师也从陕西西乡尾追红军向万源前进。同时红四方面军各部也按照总部的意图向南江、巴中等方向发展。

红七十三师在陈昌浩总政委和师长王树声率领下向通江西北之涪阳坝、平溪坝前进，向南江进攻。敌第二路司令刘汉雄将部队布防于南江县城西南之孙家山、太平山及东北的鹿角埡、甑子埡等险要阵地，企图阻止红军解放南江。陈昌浩、王树声率红七十三师，一路扫荡反动民团，一路前进。红七十三师进至涪阳坝后，兵分两路：红二一八团沿小通江河北上，经新场坝、青浴口，抵平溪坝，折向南江；红二一七、二一九团随师部由陈家坝进入南江东南的大河口。敌刘汉雄以十九旅杨选部在太平山、小尖山子、元山坪一线，据险扼守。红二一七团四连在向导带领下，绕过敌哨卡，夜袭尖山子。天明后，敌向尖山子发起波浪式冲击，整个山头笼罩在一片硝烟火海中。尖山子系太平山脉主峰，占据此处即可控制周围之观光山、元山坪、孙家山。红四连虽经鏖战，终因伤亡太大，弹尽援绝被迫撤回。与此同时红二一九团派出部分兵力向太平山守敌发起的攻击，也未成功。红四方面军指挥部鉴于攻击一时不能奏效，乃决定避开敌正面防御阵地，改变攻击方向。此后，红七十三师除留少部兵力原地牵制敌人外，师部率二

^① 《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页。

一七、二一九两团北上到官路口与二一八团会合，拟集中主力从南江县城东北之甑子垭、鹿角垭方向进攻。甑子垭为主攻方向。徐深吉将军回忆：“甑子垭战斗开始，我带领二一八团三营占领了一个较高的山头，敌人约一两个团向我反扑。二一九团政委曾传六带领该团两个连和师特务连在另一个位置，遭到敌另一个团的进攻。战斗打得相当激烈。陈昌浩、王树声亲自指挥。这一天，敌我双方你争我夺，互有伤亡。到黄昏时，我方撤出了战斗。第二天，部队经过重新调整，集中兵力，终于夺取了甑子垭一带山地，随后，我军占领了南江。”^①大河口方向之敌，闻听北线战败消息，也全线动摇，仓皇溃退。红军乘胜尾追。

2月1日，红军进入南江县城。当晚，南江人民在城里举行了盛大的灯火游艺晚会，热烈欢迎红军的到来，庆祝南江的解放。会场两侧的对联富有强烈的革命性：“军阀跑，团防跑，豪绅跑，跑跑跑，国民狗党跑垮台”“工人来，农民来，士兵来，来来来，共同建立苏维埃”。并把这天定为灯火节，把红军入城的东门更名为“红四门”，作为永久纪念^②。

在红七十三师与敌激战于南江地区时，红四方面军总部令红十一、十二两师由通江西进，在城西之恩歌嘴，抢占有利阵地，构筑工事，迎击巴中方向来犯之敌。徐向前总指挥随红十二师行动。恩歌嘴是个镇子，坐落在山顶上，是通江西面的屏障。山下的杨柏河，是通往巴中的要地。红军赶到恩歌嘴时，天色已是黄昏，部队选好地形后连夜构筑工事，做好战斗准备。第二天拂晓，敌李炜如率第一路赶到恩歌嘴地区后，迫不急待地向红军阵地发起多路进攻。许世友将军记述这次战斗说：“入川之初，四川军阀视我

^① 见元江：《关于红四方面军入川初期解放南江若干情况的订正》，《川陕革命根据地论丛》，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5～336页。

^② 《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军为不堪一击的‘流寇’。所以，李炜如的部队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们到了山下，立即向我阵地发起集团冲锋，一群一群地往上涌。

“这种不讲战术的军队，哪里是红军的对手！待敌接近阵地前沿几十米时，全团火器像刮风似的响了起来，打得敌人一片一片地倒下去。前面的敌人招架不住，掉头就逃。后面的敌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退下来的敌人冲了个人仰马翻，乱成一团。我们所有的火器一齐向敌群里猛打。敌人的死尸、伤兵、枪枝连同石头，像倒垃圾一样，乱七八糟地往下滚。有些敌人见退路拥挤，干脆从两侧跳崖逃命。

“大约八九点钟的时候，敌人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这一次，敌人学乖了，像乌龟似的爬爬停停，只要我们的枪一响，就往后缩。我见出击的时机已经成熟，就下达了‘冲锋’的命令。司号长立即吹起了冲锋号。霎时，营的号目、连的司号员一起站了出来，十几把军号齐鸣；营的旗帜、连的旗帜、排的旗帜一起竖了起来，几十杆红旗迎风招展。战士们犹如猛虎下山，迅速向敌人扑去。我也提着大刀，带着交通排向山下冲去。敌人被我军的英雄气概吓呆了，稍事抵抗后，便纷纷溃逃。”^①在红军的英勇打击之下，敌人像潮水般地退了下去。战场上一片狼藉。红军乘势猛追，一直追到杨柏河、马家坪、杀牛坪地区。红军此战歼敌一个多团。仅许世友红三十四团就抓获了几百个俘虏。这些俘虏充分体现了田颂尧双枪兵的最大特点：一个个尖嘴猴腮，骨瘦如柴，一看就知道是大烟鬼。他们每人都有一个竹子编的背篮，上面是一床军毯，下面放着烟枪和其他烟具。在押送俘虏的路上，有些俘虏的烟瘾发作了，哈欠连天，眼泪鼻涕直淌，连话也说不清楚，走起路来像喝醉酒一样摇摇晃晃。他们一面苦苦哀求，一面拿出烟具倒在

^① 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第211页。

地上吞云吐雾。红军战士们又好气又好笑地说，四川军阀的“双枪兵”果然名不虚传。

红军追击到马家坪、杀牛坪一带时，敌李炜如部已占据了山垭口，红军数次仰攻，未能攻克。杀牛坪群山连结，从北到南绵亘40多里，东西两面是陡峭的山崖，敌人想借此有利地形遏阻红军。徐向前总指挥从当地老乡那里了解到，川军怕打屁股，要绕到山后去打。徐向前当即派少部兵力迂回到山后一打，敌人当即乱了阵脚，在红军前后夹击下，敌人纷纷夺路逃命，红军又是一气猛追，一直追到清江渡。这一仗，又歼敌一个多团。此时，田頌尧部第三师罗乃琼率部前来支援李炜如，已进抵巴中。敌人为了确保巴中县城，罗、李两部集中了7个团的兵力从清江渡大举反扑。红十二师和红十一师三十二团一面阻击敌之攻势，一面派奇兵出郑家山，绕至清江渡后方的右垭口，截断清江渡与巴中之间的联系。敌人大为惊恐，军心混乱，红军全线反击，毙伤敌1000余人，俘敌600余人。在红军的追歼之下，敌人狼狈回窜，跌崖落水者甚众。当李炜如率其残部溃退至曾口场以东时，龙成寨的红军迂回部队居高临下予以截击，敌当即溃散。李炜如本人在渡巴河时，由于极度慌乱，竟坠入河中，几被擒获。罗乃琼部退到巴中后，看到红军攻势凌厉，势难抵挡，便弃城逃窜至恩阳河一线驻守。

1933年1月23日晨，红三十四团作为红十二师的前卫部队正在向巴中挺进，侦察员带着两个老乡来见许世友团长，说巴中的敌人逃到平梁城去了，他们是代表巴中人民来欢迎红军的。许世友一面派人向师部报告，一面带领部队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大约走了个把钟头，就听到锣鼓喧天，人声嘈杂。再往前走一会儿，看见巴河两岸彩旗飞舞，人头攒动。群众一看见红军，就欢呼起来：“红军来了！”“欢迎红军！”无数鞭炮顿时响成一片。码头上，排着许多扎着花的船只。红军整顿队伍，依次上船。刚上岸，群

众就一拥而上，端茶送水，问疲道乏，还给红军披红挂花，连许世友的枣红马也被披上了红布。从码头到城里，到处是欢乐的人群。巴中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巴中的人民群众对红军的到来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居民都出城欢迎，从城内一直到巴河边，排成了长长的队伍。每家每户像过新年一样，写了对联，插了欢迎旗，群众赠送红军的猪、油、米和其他各种食物很多。总之，红军所到之处，真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敌人望风逃命。群众看到红军英勇善战，无不称赞，还编了民歌歌颂红军的战斗事迹。巴中，这个川北重镇，由于盛产高质量的大烟土而颇有点名气。此时却在红军的控制之下，到处插上了胜利的红旗。

当红四方面军总部指挥红十一师、十二师、七十三师在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实施战略展开之际，由王宏坤率领的红十师两个团也完成了东向竹峪关阻击刘茂恩部的任务，迫使刘茂恩第六十五师退守万源。后来，刘部又退出了川北。原来，红四方面军入川，田颂尧继续在成都参加混战。田颂尧在川北一角割地称雄，从未和红军较量过，认为乘虚面入的红军，不过是东流西窜的“残匪”，并未把红军放在眼里。面对追击红军的胡宗南、刘茂恩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要从陕南入川“进剿”，田颂尧与其他四川军阀怀有同样的心理，怕请神容易送神难，担心蒋介石把触角伸进四川，吞并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因此，硬是不要蒋系部队入川帮忙。所以，追击红军的刘茂恩部已经从陕南进至万源，不久便又退了回去。胡宗南部也已从汉中进到川陕交界处，并爬上了巴山，但也吃了“闭门羹”，不得不悄然回兵。徐向前元帅后来回忆总结说：“假定那时没有四川军阀混战的局面，我军入川，川军联合起来一致对付我们，我们的处境将会困难的多。假定那时四川军阀和蒋介石之间没有矛盾，同意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入川‘剿共’，那么，蒋军由北面南，川军由南而北，两边一压，我军腹背受敌，首尾

难顾，要想在大巴山下立脚，更是不可能的。”^①红四方面军入川，选在田頌尧倾其主力参加军阀混战的当口，可以说是恰到好处的一着棋。田頌尧恐怕没有料想到，他在成都参加混战却帮了红军一个“大忙”。

红四方面军入川仅月余，就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县的绝大部分地区，歼敌3个团，溃敌8个团，初步实现了进军川北的战略预想。从此，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形成。

川北，地势偏僻，交通不便，文化落后，没有经受过大革命的洗礼，共产党的活动一直处于极为薄弱的状态。例如：巴中县有50万人口，却找不出几名共产党员来。许多农民住在交通闭塞的山旮旯里，对于“三民主义”、“国民革命”闻所未闻，更谈不上“共产主义”和“苏维埃运动”了。在川北，红军能不能站住脚，搞块根据地，红四方面军总部的一些领导人包括张国焘、徐向前等开始时还拿不准。但是，经过入川一个多月的战斗和多方面调查研究，红四方面军总部初步掌握了川北的敌情、民情、出产以及山形地貌，认为只要政策对头，把群众发动起来，红军就一定能够立脚生根，让红旗飘扬在通南巴地区，创造一个革命的新天地。徐向前回忆：“好在群众受压迫剥削很重，极端痛恨军阀地主的统治。提起敌二十九军军长田頌尧，人们从不称呼他的官衔，而直呼其名字或绰号（‘田冬瓜’）冠以‘棒老二’、‘狗日的’、‘龟孙子’、‘那舅子’等头衔，说：‘我们穷人被他整苦了！’积恨之深，可见一斑。这是我们发动群众的有利条件。”^②

红四方面军总部深刻地认识到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与迫切性。红军攻占通江后，总部即在此召开会议，决定利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57页。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60页。

用田颂尧的反攻部署尚未就绪的时机，休整部队，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实行土地革命，拔除军阀地主的反动社会根基，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奠定坚实的基础，为迎击敌人的进攻做好充分准备。会后，徐向前、陈昌浩分别去前线随军行动，留在通江的张国焘和曾中生领导发动群众，巩固后方的工作。红四方面军的各个领导人分头积极着手创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1932年12月29日，即通江解放后的第5天，成立了以旷继勋为主席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作为省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前当地的最高政权机关。红四方面军总部自通江解放时起，就从部队陆续抽调了数以千计的指战员，由师、团政治部主任带领，组成工作队，深入城乡，走家串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总政治委员陈昌浩，热情很高，对各项工作亲自部署，亲自检查。很快，全军上下在执行战斗任务的同时，掀起了发动群众，建党建政的高潮。“打土豪、分田地、开仓分粮”成为通南巴地区最为热门的话题。红四方面军政治机关对这些工作队提出了具体要求，规定每个队员必须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守革命纪律，尊重群众的风俗习惯，学习当地语言，注意工作方法等，有的工作队还经过短期集训。南江、巴中解放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又进行了统一部署，将部队逐步就地展开，划分区域，分片包干发动群众。由总部直属部队负责通江城区和郊区；总医院负责通江以北的泥溪场、苦草坝地区；红十师负责通江东北洪口、龙凤场和万源西部竹峪关地区；红十一师负责巴中城区及郊区；红十二师负责巴中以南地区；红七十三师负责南江地区。各部队在指定的区域内，除以工作队发动群众外，还组织了许多宣传队，做到了人人动手动口，普遍参加群众工作。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革命十大纲领》，编印了《怎样分配土地》的小册子，说明分配土地的重要意义、分配方法、阶级的划分以及各种具体政策界限，强调指出分配土地是发动新区群众斗

争、发展新的根据地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武器，要求每个红色战士积极参加发动群众分配土地的斗争。

粮食和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红军发动群众的基本武器。“打倒土豪劣绅！”“平分土地！”“废除一切高利贷债务和地主契约！”“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破仓分粮！”“土地归农民所有！”等口号，对农民有极大的吸引力、号召力。徐向前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每当开仓分粮时，就像赶场一样的热闹。那些身衫褴褛的贫苦农民，背着背篓、挑着箩筐，从几十里外赶来，喜盈盈地领回全家的‘救命粮’，含着热泪，对红军千恩万谢。他们说：‘红军来了，穷人才能吃上白米干饭！’‘红军救了我们穷人的命，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的’。”^①红军还给贫苦农民分配了土地，这是他们祖祖辈辈做梦也没想到的事，红军来了却成了现实。当时正值春荒时节，农民不仅有了救命口粮，还免除了苛捐杂税，还有了春播种了，广大农民欢天喜地的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春耕播种。红四方面军总部的土地分配政策“基本上是以乡村为单位，按土地和人口的总量，抽多补少，平均分配。除留部分红军公田外，一般成人人均各五背田（‘背’是川北计算土地的单位，每背相当于二斗粮的产量），小孩人均各二背田，大体能维持温饱生活。地主豪绅的土地、山林、房产、牲畜、财物全部没收，富农的部分没收，分给贫苦农民。中农的土地和财产不动。”^②

打倒了地主豪绅，通南巴地区的广大农民有了自己的田地、耕牛、房屋、山林，结束了“打精巴子”的苦难岁月，开始了新生活。通南巴各地一个时期天天响着喜庆的锣鼓，到处飘扬着革命的红旗。农民群众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掀起了支援红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62页。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63页。

军，加紧春耕生产，“不让一寸土地放荒”，努力建设根据地的热潮。

红四方面军在通南巴地区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速度之快，成效之大是惊人的。余洪远回忆：“在部队和地方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不到一个月时间，就相继建立了赤江、红江、南江、赤北、巴中5个县的临时县委，在此基础上，于1933年2月7日至13日在通江城召开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共500多人，除方面军总部和所属4个师的党员代表外，各县参加会议的代表人数不等，最多的是通江县，120人，其次是南江90人，巴中、赤江、赤北30至40人。”^①这次党员代表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创建川陕边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川陕省党的任务》、《发展党的组织与扩大红军》和立即召开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等重要决议。中央代表张国焘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大会决定：广泛深入地开展分配土地的斗争，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打垮封建势力。同时，考虑到敌人新的围攻很快就会到来，大会号召川陕省人民立即掀起一个参军热潮，扩大红军，壮大力量，准备粉碎敌人的围攻。大会选举袁克服、曾中生、吴永康、郑义斋、傅钟等37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委员会，袁克服任省委书记。中共川陕省委成立后，统一领导通南巴地区党的工作，红四方面军前敌委员会领导的地方党的任务，也移交给了川陕省委。

根据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1933年2月17日至24日，在通江城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红四方面军人川之初，即从省、县、区至各乡、村，普遍建立了临时革命委员会，履行政权机构职责。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大都是在拥军、带路、打土豪中表现积极而坚定的工农分子，部队政治

^① 余洪远：《力量的源泉——胜利的保证》，《川陕革命根据地论丛》，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机关和工作队也派人参加。临时革命委员会一面担负分配土地、组织生产、支援红军、肃清反动分子、动员群众的任务，一面筹备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为正式产生苏维埃政府创造了条件。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就是在此基础上召开的。大会明确宣布以《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为指导川陕省各项工作的根本大法。对当前开展土地革命斗争、扩大红军、建立地方武装和准备粉碎敌人围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布置，并通过了《川陕省苏维埃临时组织法大纲》，正式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选举熊国炳为主席，杨孝全、罗海清为副主席。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发表文告，号召广大人民行动起来，进行土地革命，准备粉碎敌人的围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下设省军区指挥部、省政治保卫局、省革命法庭以及监察、内务、文教、粮食、劳工、土地、交通、外交、经济、财政等委员会，设有红江、赤江、赤北、南江、巴中5县和巴中特别市及陕南特别区（包括陕南镇巴、西乡各一部地区）等苏维埃政权，人口约100余万。

红色政权的普遍建立，标志着川陕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第二章 大战川陕

一 志大才疏的田颂尧

对于红四方面军入川，四川军阀认为红军不过是些东流西窜的“残匪”，区区之灾，不足为虑。这是从未与红军交过战的川军将领们的普遍心理。一心想当“四川王”的刘湘，则坚持“先安川而后剿赤”的方针，他纠集各路军阀在成都一带与刘文辉火并。对这种状况，蒋介石极为不安，连电四川各路“诸侯”停止混战，共同对付红军。早在红四方面军行动于川陕边，意向川北进军之时，蒋介石即电令各追堵红军的部队：

兹以消灭徐匪残部于川陕边境西乡县西南地区之目的，所有追击各部队应取如下之行动：（一）十七路军王志远、赵寿山、杨渠统、严沛霖各旅为追剿部队，继续向峡口镇——贯子山急进紧追。如匪窜入川境，即派两旅以上兵力入川追剿，勿失时机，必使歼灭而后止；（二）第一师联络十七路军速向车家坝——大盘坝一带前进，堵匪西窜，并准备向川省南江方面堵剿；（三）第十一路军刘茂恩部各旅，即取捷径速向洋县——西乡急进，联络十七路军，猛力跟追；（四）第四十四师速向石泉前进，候令追剿；（五）刘存厚军速派有力部队集结璩渣附近堵截，并与我追击部队联络，探明匪踪夹击之；（六）田颂尧军速派有力部队集结南江——广元附近堵截，并与宁羌驻军联络，探明匪踪夹击之。以上规定部署，除

分电及另知川军外，希即遵照分别督饬遵行，并复为要。^①

这个军事部署，其意图十分险恶，即要在川陕边境地区围歼红四方面军。如果包括四川军阀在内的国民党部队真能按照蒋介石的意愿行事，那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创建根据地的战略设想的实施就会困难得多。然而，向来对蒋介石抱有很大戒心的四川军阀，并不完全听命于蒋介石。据循实所写《川东北“剿赤”印像记》所载：“那时中央军的萧之楚、刘茂恩两师从鄂西追匪追到陕边，在那里扼守着，如田颂尧肯把他们请进川境来夹击，是不难把赤匪一鼓歼灭了。但田颂尧深怕‘请客容易送客难’，自然不肯这样办。”^②就田颂尧而言，他一方面对红军入川表示不屑一顾，同时，又对他自己的防区被红军突破表示担忧；另一方面，他拒绝蒋介石中央军入川“追剿”红军，也就意味着他要担负在川北“围剿”红军的更大责任。田颂尧毫不怀疑他完全有力量将红军赶出他的地盘。他根据自己的情报认为，入川红军不过几千人，而他的二十九军兵员械弹均比红军优越，趁红军立足未稳之际予以压迫，似不难将其一举赶出川境，使通、南、巴重归二十九军统治。因此，当盘踞宣汉、达县的四川老牌军阀刘存厚忧心忡忡，致信田颂尧示意他罢战成都，回兵“剿赤”时，田颂尧满不在乎地回信说：“区区之灾，何以老师费心！”田的打算是，等在成都打垮刘文辉之后，再班师“回剿”，通南巴仍是他的天下，而且一旦刘文辉败北，田颂尧还有希望从刘文辉那里再分得一块“肥肉”。所以，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的头几天，田颂尧并没有将红军放在眼里，只是命令其驻守通南巴及周边地区为田颂尧“看家护院”的部队李炜如第一路、罗乃琼第三师第七旅、刘汉雄第二路

^{①②}《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卷），第253~254、273页。

向通江、南江、巴中进攻，把红军挤出通南巴。谁知，田颂尧的“双枪兵”与红军一接触，居然如此不禁打，短短几天就丢掉了通南巴的广大地区。

当通江、南江、巴中等地被红军占领的消息传到正在成都参加混战的田颂尧那里时，他有些吃不住劲了，便硬着头皮说：“既然红军到通、南、巴，威胁到我军的生存，那就不管怎样，只好非干不可了。”^①田颂尧立即向与刘文辉交战的联军总司令刘湘要求星夜回防，而刘湘则借故不见，田颂尧接连去了几次，均未见到刘湘，惹得田颂尧破口大骂。

1933年1月下旬——农历腊月底，快要过大年了，田颂尧接到刘湘的请帖，便迫不急待地快马加鞭向刘湘的公馆驰去。当田颂尧怒气冲冲地跨进刘湘的临时公馆——静侯馆时，刘湘已笑容可掬地降阶相迎。田颂尧在刘湘的陪同下，进入有雕花窗棂，有棉帘低垂的暖阁，只见里面已到了四川的几位头面人物，有吴佩孚时授予“勋一位”崇武上将军的刘存厚，有尖下巴、高颧骨、号称“猴子”的邓锡侯，还有杨森、罗泽洲、李家钰等。刘湘请来这些四川的各路“诸侯”是为了商量“军机大事”。原来四川的“二刘”大战双方，在蒋介石连电要求他们停战言和，共同对付红军的催促和邓锡侯的调解之下，取得“谅解”，暂时停止了在川西的混战。几个军阀聚首一起，自然各入心中别有一番滋味。怒气冲天的田颂尧，得知蒋介石委任他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并拨给军费20万元、子弹100万发，飞机数架，便由怒转喜，十分高兴。1月28日，田颂尧在成都宣誓就职，由四川军务督办刘湘监誓。随即，田颂尧将其在川西参加混战的部队大部东调向川北，部署对通南巴苏区的围攻。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卷），第285页。

田颂尧就任川陕边区“剿匪”督办，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他上台后，即通电全川各军阀“协谋剿共”，强调此系“全川局势之安危，实关整个之休戚”，要各方通力合作。

“田颂尧的第二十九军，辖五师（每师三旅六团）三路（每路二旅四团）及军、师独立旅，共60个团的兵力。”^①他投入到三路围攻红军的总兵力达30多个团，约3万余人，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根据蒋介石“着重左翼”、防止红军西进的指令，田颂尧以左纵队为主攻、中央纵队和右纵为助攻。左纵队以第一师、第四师、第五师（欠一个旅）、第二路、第三路、独立旅等组成，由第四师师长王铭章任纵队司令官，集结于旺苍坝地区，企图经木门、长池夺取南江，进而控制大巴山南麓，切断红军退往陕南的道路；中央纵队以第二师和第五师各一个旅组成，由第二师师长曾宪栋任纵队司令官，集结于恩阳河以西地区，企图经恩阳河夺取巴中，尔后会同右纵队占领通江；右纵队以第三师和第一路组成，由第三师师长罗乃琼任纵队司令官，集结于仪陇及其以北地区，待进至巴河沿岸后，联络中央纵队夺取巴中，尔后经曾口场、得胜山，直扑通江。1933年2月上旬，田颂尧参加“围剿”红军的三路纵队分别集结完毕。除此之外，田颂尧还网罗地主武装，成立了左、中、右3个游击司令部，每股几百人到千余人不等，配合其主力部队作战。盘踞于营山、渠县的杨森第二十军和盘踞于万源、达县地区的刘存厚川陕边防军（后改为第二十三军）亦准备相机出动配合。2月1日，田颂尧返回潼南（今三台）军部，任命其亲信、副军长孙震任前敌总指挥；任命其军政治部主任刘大元为川西北十余县的“清剿”保安司令。前敌总指挥部驻阆中。2月12日，田颂尧、孙震亲赴阆中视察。当天，田颂尧即下令开始总攻。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76页。

1933年的农历腊月，通南巴地区已是春意盎然。翠绿的山水，发出沁人心脾的清新气息。随着人们燃放的爆竹声，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来临了。通南巴的人民在欢庆解放的同时，又迎来了第一个热热闹闹的新春佳节，山山水水之间到处飘荡着对红军的赞歌。在通南巴地区人民敲着锣鼓，唱着山歌，燃放鞭炮，划彩船、踩高跷欢度春节的时候，红四方面军总部的各位领导人却没有这份闲情，节日对他们来说几乎是陌生的了。此时，徐向前正在巴中县城的一所房子里全神贯注地思考着对付敌人反扑的作战计划。入川以来，他不断考察通南巴的地形、民情，地图上的一些山岳、河流、平川、隘路、村镇等都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中。徐向前深知，红军在通南巴地区的战略展开，很快就会引起敌人大规模的进攻。如果敌人发起进攻，采取什么作战方针？主力向哪里集中？决战的战场选在什么地方？如何组织反攻？这些问题都是他日夜思索的，有关红军根据地生死存亡的大事。总指挥部的几位参谋都知道徐总指挥的习惯：在他集中精力思考时，最需要的是沉静。所以，他们谁也不去干扰总指挥，只有总部电台人员送来电报，才暂时打断他的沉思。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电台室，也沉浸在紧张严肃的工作气氛中。电台小组已探知田頌尧即将回师进击通南巴的信息，正不分昼夜地侦听敌人电讯联络，分析敌人种种动向，随时向总部报告。根据情报获悉，田頌尧第二十九军开始东调，军情越来越紧急。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在通江召开军事会议，商讨粉碎敌人进攻的对策。徐向前接到通知后，带上参谋和警卫人员，翻山越岭，从巴中赶到了通江。

军事会议在通江城的小公园内张国焘的办公地点召开。红军占领通江后，将小公园命名为“列宁公园”，以纪念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参加这次军事会议的红四方面军总部成员有张国焘、徐

向前、陈昌浩、王树声、曾中生、周纯全、傅钟等人。会议由中央代表、西北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副主席张国焘主持。徐向前总指挥在发言中首先分析了敌情，他认为：各领“防地”，自保实力，是四川军阀的一个重要特点。川陕根据地南面的杨森部和东面的刘存厚部，“防地”没有被红军占领。估计他们以主力部队参战的可能性不大，红军置少数兵力进行警戒即可。田颂尧部是红军的主要作战对象。根据川北的地形，红军应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要求各部队和地方武装、人民群众密切配合，利用险要地势，构筑工事，在积极防御中节节抗击、消耗、迟滞敌人，逐步诱敌深入，待机反攻歼敌，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攻。这是与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战斗不同的作战方针，立即引起大家热烈的讨论。有些同志一时思想还转不过弯来，留恋以往的战法，这种思想情绪在会上有所流露。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红军反“围剿”作战，一般说来，高度的集中兵力，是弱小的红军对付强大的敌人的最有效的手段。往往敌人的进攻一开始，指挥员首先就要集中主力在手，避其锋芒，择其弱点，待机破敌。鄂豫皖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都是如此。通南巴地区反田颂尧的作战要以“收紧阵地”、“节节御敌”为作战方针，却要首先分散兵力，分兵把口，敌人的兵力又是红军的3倍，红军仅4个师，又要应付东南西北四面的各路情况，这样能否战胜敌人，自然使人放心不下。徐向前针对这一情况进一步分析说：“这里与鄂豫皖不同，那里的情形适合打运动战，搞‘围点打援’，搞远距离奔袭，这里就得靠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要搞新的打法。”^①又说：“我们的根据地不大，没有广阔的回旋余地。我们的根据地是新区，尚不具备军民一体从四面八方袭敌扰敌的条件。我们的兵力有限，必须最大限度地保存和集中。我们的敌人兵力众多，来

^① 《徐向前传》，第164页。

势凶猛，占绝对优势地位。我们的作战地势是南低北高，利守难攻，愈往大巴山靠近，地形愈险要。我们的作战方针是逐步收紧阵地，节节消耗敌人，待机举行反攻。”^①他还针对有的同志担心兵力分散的问题指出：“我们只有4个师的兵力，要从三面抗击优势敌人的进攻，达到逐步消耗和疲劳敌人的目的，不分散行吗？是不行的。这种必要的分散，适应了川北的地形条件，正是收紧阵地这一作战方针不可缺少的一环，是集中兵力实施反攻决战的前提条件。”“从全局上、整个防御战线上看，兵力则相对分散”，“从局部上、一个防御方向上看，兵力相对集中。”^②他最后说：“我们的退却是为了反攻，退却的终点要视情况而定，必要时准备放弃通江，但是绝不能离开根据地，退到巴山以北去。”^③徐向前总指挥的发言打消了一些同志的思想顾虑，大家一致同意他的建议。

张国焘最后作会议总结，他说：“由于我军决定留住下去，暂时不愿再流浪到其他地方，必须在这里击败田颂尧部，并以通南巴一带川北地区，作为我们稳固的根据地。田颂尧部的人数，大约等于我们的3倍，刘存厚、杨森、孙蔚如部，合计也等于我们的三倍，我军将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以便集中最大的攻击力量，在适当地区，歼灭田颂尧部。只有沉重的打击了田颂尧部，我们才可以立下脚来。”^④

这次军事会议确定：红军作战事宜由徐向前总指挥负责；政治动员、群众工作、后方工作、肃反工作、支前工作等由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等人负责。

会后，徐向前即返巴中前线，进行军事部署。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等总部领导人，也立即开始了战前的各种准备工作。

①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92、293页。

③ 《徐向前传》，第164~165页。

④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177页。

徐向前一到巴中，立即进行了军事部署：

“以七十三师(欠二一八团)布于南江及其以西的三江坝地区，十一师(欠三十三团)布于南江西南之木门、长池地区，抗击敌左纵队。

“以十二师布于巴中及其东南的曾口场、粉壁场、兰草渡一带，抗击敌中央纵队和右纵队。

“以十一师第三十三团布于通江西南的江口至得胜山地区，十师布于通江以东及东北的麻石场、洪口场、竹峪关一线，警戒可能来犯之杨森、刘存厚部，掩护方面军侧后安全，并担负战略预备队的任务。

“以七十三师二一八团位于南江东北的碑坝地区，向汉中方向警戒。”^①

2月12日，敌军开始出动，很快控制了巴河右岸地区。18日，敌左、中、右三个纵队向巴河左岸全线发动攻击。田军各部有蒋介石和各路军阀打气、撑腰，加之熟悉川北地形和民情，人数、装备又占绝对优势，因而没把红军放在眼里，骄横不可一世，其攻势十分凌厉。

田頌尧部担任主攻的左纵队主力向红七十三师、十一师扼守的三江坝、木门、长池地猛扑过来。鉴于敌军来势凶猛，兵力雄厚，徐向前要求各部队充分利用有利地形，依托工事，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硬着头皮顶住，在战役的第一阶段争取以少量的兵力，大量消耗敌人。敌左纵队首先发起进攻：以第二路十八、十九两旅攻三江坝、分水岭等地；以第四师、第五师及第三路各一部从木门攻周家坝、马尚庙、高壁寨，企图一举拿下中魁山、长池。红七十三师和十一师依托险要阵地，进行顽强抗击，给敌人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78～279页。

以重大打击。红七十三师二一九团在三江坝、分水岭击退敌之进攻，给敌以重大杀伤；红十一师三十二团在侯家梁与龙洞岩之间奋力抗击，并出敌不意，夜伏主力于土地垭，于拂晓前突然发起猛击将敌逐退，俘敌 500 人，缴枪 700 余支。田颂尧见其主攻方向受挫，于 21 日重新调整部署，集中左翼全力向长池猛攻。红军凭险固守，先在高壁寨击退第五师 3 个团和第三路 1 个团的进攻，接着又在中魁山地区击溃敌第四师、第五师、第三路共 6 个团的进攻，杀伤敌约 2 000 人。敌第一师两个团进攻青冈梁也被击退。从 2 月 18 日至 28 日，红七十三师和十一师共毙、伤、俘敌左纵队官兵近 5 000 人。红四方面军总部见第一步大量消耗敌人的目的已经达到，乃令红军于 28 日主动撤出木门、长池阵地，转移到八庙垭地区构筑工事。3 月 8 日，敌左纵队 1 个旅，扑向八庙垭阵地。八庙垭位于南江城南 40 里，山高路险，绝壁临河，是南江至巴中间的重要阵地。方面军总部原计划在八庙垭顶一阵子，但红十一师没打好，阵地被敌突破，部队后退 10 余里。徐向前回忆说：“半夜里张国焘打来电话，说八庙垭失守，我急得觉都没法睡。天不亮就赶去，集中十一师、七十三师一部向敌反击。这一仗，我攻敌防，打得很激烈。我们采取正面攻击和两翼迂回相结合的战术，‘包饺子’成功”^①。歼敌第一旅一部和独立团大部，毙敌团长何济民及代理团长何柱，夺回了八庙垭。3 月 18 日，红七十三师主动撤出南江城，并在甑子垭、梁炮台等地给敌以大量杀伤后，和红十一师逐渐收紧阵地至贵民关、官路口、观光山、大明垭一线。

田颂尧中央纵队亦于 2 月中旬由苍溪、阆中向巴中进犯。红十二师在恩阳河一线阻击敌人后，撤至巴中附近。敌第二师、第三师主力渡过恩阳河后，分两路向巴河左岸前进，企图夺取巴中城。红十二师相继在杏儿垭、西华山、玉皇庙、东兴场、炮台垭、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 280 页。

平梁寨等地，利用险要地形和工事节节抗击敌人，使其不断受挫。2月27日，敌迫近巴中城西南之大梁山、南坎坡一线，在炮火掩护下，向山上冲锋。红十二师乘敌急进之际，在南坎坡突然向敌两翼实施反击，歼敌1000余人。3月初，敌中央纵队与右纵队一部再次进攻巴中，方面军总部见阻击和消耗敌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令红十二师撤出巴中，收紧阵地至清江渡一线。此时，敌右纵队李炜如亦经曾口场向得胜山进犯，被红三十三团击退。

与田頌尧发动进攻的同时，敌杨森部第五混成旅由营山北犯兰草渡，遭到红十二师三十六团顽强阻击。刘存厚部一个旅和第三路廖雨辰部两个团，分别向得胜山以南之元山场和洪口场以南之余家坪进犯，先后被红三十三团和红十师击溃。

“从二月十八日到三月十八日的第一阶段作战中，敌虽先后占领巴中、南江二城，但却付出了近8000人伤亡重大代价，士气大挫，攻势顿减。红军主力则在北起贵民关，南沿官路口、观光山、大明垭、杀牛坪到得胜山一线阻击，又由得胜山向东北沿麻石场、龙凤场、竹峪关一线占领了新的阵地。”^①

3月下旬到4月25日，战局呈现对峙状态。

这时，收复了南江、巴中县城的敌人，正兴高采烈，陶醉在一片“胜利”的吹嘘之中。国民党电台天天给川军的“胜利”添油加醋，吹得天花乱坠。田頌尧和孙震更是趾高气扬，得意忘形，继续做着把红军消灭在大巴山下的美梦。他们令所部停止进攻，就地休补，准备发起更大的攻势，完成其第二步战役企图。在此期间，田頌尧一方面抓紧其部队的整顿、补充，另一方面在其统治区大肆搜刮民财，以充实军费。田頌尧、刘存厚在其防区内各县对人民敲诈勒索，其他军阀也以接济田頌尧为名，横征暴敛。4月初，敌邓锡侯严厉电催各县收解“剿匪慰劳费”，收齐后转交田頌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220~221页。

尧军。邓锡侯的电文中说：“军长谢电已转行各县，岂容再事延缓。仰即克日扫解，以凭转交。事关剿赤需要，毋再拖延干咎。”^① 还有所谓“难民救济费”，每县分担10万或数十万元。四川省“赈务会”则在救济难民的名义下，大肆向各界筹集赈款。刘湘虽在3月下旬送给田颂尧军费10万元、子弹10万发，但在4月15日起发行印花烟酒券500万元；4月16日又发行盐库券500万元，交各地税局在商人完纳货物税时搭销。这些都加重了四川人民本已很沉重的负担。

红军则利用战局呈对峙状态之际，抓了三件大事：一是休整训练部队，加强政治工作。方面军总部要求各部队就地休整补充，吃足睡好，养精蓄锐，以利再战。军民结合，抢修和加固防御工事。开展战场练兵和冷枪冷炮杀敌运动，加强小分队、游击队的袭敌扰敌活动。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一切行动听指挥，克服急于反攻求胜的心理。抓紧对俘虏的训练教育，放回一部，瓦解敌军。二是动员群众，稳定人心。方面军总部针对通南巴是新区，人民群众没有经受过赤白“拉锯”的锻炼，特别是看到红军一撤再撤，放弃了南江、巴中而产生的重重疑虑和敌特分子乘机煽风点火，搞得人心惶惶，极不稳定的状况，发动地方党组织、苏维埃政府、红军工作队及群众组织深入群众，广泛进行红军必胜、白军必败的教育工作，号召翻身群众紧紧和红军站在一起，为保卫自己的政权、土地、家园而斗争。对愿意转移的老弱妇孺，派人护送到后方山区，妥善安置。对造谣破坏的反动分子，坚决进行镇压，毫不留情。三是扩大运输队伍，增强运输能力。方面军总部鉴于第一阶段作战中暴露出来的物资运输问题，下决心加以解决。“蜀道难”在川北地区体现得非常鲜明。这一带前前后后、左

^① 林超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6页。

左右尽是大山，交通运输极为不便。运送粮食、弹药、物资和伤病员，全靠人力背和抬。由于运输力量不足，第一阶段作战中，前线曾出现粮食接济不上去，伤员运送不下来的困难，特别是撤离南江、巴中县城时，许多红军急需的物资转移不走，只好烧掉。因此，红军总部和省苏维埃统一组织、编制县、区、乡的运输队伍，管饭给钱，分段“接力”，构成数条连绵不断的运输线，保证伤员、弹药、粮食、盐巴及其他物资的顺利运送和转移。这支运输大军多达数万人。此外，为了加强后方警卫和有利于主力集中，川陕省委还在通江城将机关中的部分妇女百余人和妇女群众中的积极分子 200 余人，组成妇女独立营，直属总部领导。妇女独立营下辖 3 个连，营长陶万荣，政治委员曾广澜。这支队伍组建之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军事、政治训练，并担负着警卫后方机关和通信、运输、剿匪等繁重任务。

敌人在进行了一个月的休整、补充和准备之后，4 月 26 日，又向红军发起了强大攻势。前沿阵地，一片硝烟火海。这次进攻，田頌尧令其中央纵队由巴中经清江渡、右纵队由曾口场经得胜山、左纵队一部由两河口经大明埡，一齐扑向通江城；又以左纵队主力由南江向东猛插，企图将红军主力压缩包围于通江城以北地区而歼灭之。红军则运用第一阶段作战经验，继续以少数兵力依托险要阵地和工事，以猛烈的火力和灵活的战术顽强进行阻击，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红十二师三十六团两个连，在杀牛坪一带抗击敌第二师第五旅和第三师、第一路的轮番进攻，激战 3 昼夜，毙伤其 1 500 余人，阵地屹然未动；红三十五团一个连在赵公寨，以正面坚守与侧后反击相结合的战法，击溃敌一个团；红十一师两个团在大明埡击溃敌第一师两个旅；红十一师一部在屈家山、红七十三师一部在黑岩场等地也大量杀伤敌人。敌军数倍于红军，攻势很猛，红军前线部队承受的压力极大。方面军总部乃决定再次收紧阵地，放弃通江县城。4 月 29 日，红军转移到通江城以北、小

通江河以东，布阵于平溪坝、新场坝、鹰龙山、鸡子顶、九子坡、竹峪关一线。红四方面军总部撤至战略后方最北端的空山坝地区。这时，红军的收紧阵地战略退却，紧到了极限，退到了终点。红军虽已退到方圆不及百里的狭窄地区，但战线也因此而大大缩短，主力已全部集中。选择反攻的时机和地点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红军反攻的作战计划，由徐向前提交方面军总部讨论决定。

红军一次次地撤退，给田頌尧一再造成错觉，特别是红军主动撤离通江城，更使得他误以为红军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田頌尧及其前线各部指挥官都为其占领通江、南江、巴中而陶醉。加之东面之刘存厚部以8个团的兵力抢占了竹峪关，威胁着红军的左侧，企图在配合田军作战中趁机捞一把；陕南的孙蔚如又于5月5日致电田頌尧，说已派出部队准备阻击红军：“即令赵司令寿山所部为左纵队，由白杨庙经河口之路，杨司令子垣所部为右纵队，由青石关、天池冈之路，向竹峪关、洪口方面进击。贵军进展情形，随时电告，俾资联络。”^①这也给田頌尧造成了四面包围红军的印象。田頌尧据此认为，取得完全胜利，“不过是指顾间事”了。但他此时绝没有想到，红军的屡次退却是“诱敌深入”，也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在这场战斗中损失最大的是他自己。他于5月2日发出通电：

我围剿中右两纵队，东日自鹦哥嘴，得胜山继续攻击前进，匪已不支，纷纷退却，遗弃伤匪官兵，到处皆是。东晚全纵队之先头部队直逼通江城下，本日拂晓，我罗乃琼师谢副师长庶常指挥六十三团朱麟，十七团宋培根，率部首先占领通江城，李炜如部继至，并向母沈镇方面追击。又元山场附近之匪，由李派队肃清，正在围

^①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第128页。

剿中。匪自二月中旬至今伤亡过半，此乃总崩溃，特连，
颁尧冬印。^①

这时，他和他的部将“都错误地认为红军不堪重兵压迫，撤离川境已属必然之势，因而对红军可能采取的其他措施则毫无准备，满以为不待旬日之间，即可‘奏凯回师’，一般都踌躇满志，得意忘形。而此种骄矜之气，尤以左翼纵队为甚。”^②在一片红军已“溃不成军”，将“兵退汉中”的鼓噪中，田颂尧令所部再次发起全线进攻，以“竟其全功”。田颂尧集中第四师5个团、第五师1个旅、独立师3个团及第三路两个团共13个团的兵力，由西向东向空山坝、余家湾、柳林坝猛扑。其中纵队、右纵队则向通江北推进，妄图南北夹击，围歼红军。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此时正设在空山坝的半山腰上。空山坝是大巴山南麓一座海拔2500多米的高山。半山坡上有几间破旧的茅草房，隐蔽在山坡上茂密的树林翠竹中间，方面军的一些高级领导人都在这里。5月17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在空山坝召开军事会议。此前，徐向前下令红十师、十一师主力星夜东出，奔袭竹峪关刘存厚部，解除红军翼侧威胁。据当时任红十师师长的王宏坤将军回忆：“我当时就在竹峪关，敌人从万源出动，分三路向我猛犯，先以优势兵力夺下了我竹峪关东北和东南山头后又向竹峪关镇子猛扑，竹峪关地形很复杂，镇子夹在四面山中，镇边上又是3条河的汇合处。河虽不宽，但水很深，部队运动不便，很不好防守，我们边打边撤，我们只有三十二团千余人和独立团，兵力不够，在给敌以一定杀伤后撤到西面的山头固守。”“为了反击刘存厚，解除对我东面的威胁，为大反攻创造条件，第二天我军主力奉总部命令迅速赶到竹峪关。十一师政委李先念带来了第二

^{①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卷），第280、290页。

十九团、二十团和三十三团3个主力团，十二师也来了两个团……16日凌晨，我军反击开始，西北面的二十九团、三十三团突破了敌前沿，又向敌占山头攻击，二十八团在三十二团两个营的配合下，猛攻观音梁。观音梁山势险峻，树林茂密，阵地前敌人砍倒大片大树，做起木城寨，拼命固守，我军不惧伤亡，反复攻击，终于攻下了山头，歼敌1个团大部。失掉观音梁，敌人惧怕后路被堵，全线慌乱。战斗最激烈时，丝罗坝的敌人1个团向竹峪关增援，从我独立团警戒埋伏的峡谷丛林中穿过，遭我突然打击，敌2个营被歼，同时北面红十二师主力也进展顺利。敌人惧怕被歼，朝后溃退，我攻击部队和预备队全线出击，恰逢连日大雨，山洪暴发，河流阻隔，敌官兵不少落水而亡，我军乘胜猛追。”^①竹峪关反击战，红军共歼敌近两个团，缴长短枪1000余支，解除了红军东面的威胁。随后，红军星夜转回。红军这次行动，不仅解除了东线的威胁，亦使田颂尧认为红军主力将东移，因而更加强了对西线、南线的攻势。同时徐向前命令王树声率红七十三师，死死顶住敌左纵队的进攻，为反攻争取时间。红七十三师的奋力阻击，使田颂尧进一步确信红军是正在准备东移。

空山坝军事会议由徐向前主持，张国焘、陈昌浩、曾中生及各师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徐向前分析了当前的敌我态势和总反攻的有利条件，传达了总部研究的反攻作战方案，给各师分派了任务。会后，各部队按规定的任务，积极进行反攻的准备工作。红七十三师阵地是敌左纵队攻击最猛烈的地方，也是关系到决战成败的最紧要之点。徐向前深知此处的极端重要性；如果被敌人突破，红军的反攻部署将付诸东流，全局会陷于极为不利的境地！因此，徐向前特意叮嘱红七十三师师长王树声：“你那里可是要命的地方噢！伤亡再大，也得顶住。你们顶得住，胜利就有希望。”

^① 王宏坤：《我的红军生涯》，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191页。

红七十三师真像钉子一样砸在阵地上，经五昼夜激战，阵地屹然未动。

5月20日晚，红军各部队开始行动。红十一师担任从空山坝以北向敌左侧迂回，断敌退路的任务，徐向前亲自带着这支部队向敌后穿插。适逢天降大雨，红军指战员们冒着隆隆雷声、顶着闪电，忍受着被扎伤的手脚、被划破的面颊的疼痛，披荆斩棘，从人迹罕见的深山老林开路前进。红军在这种恶劣的气候条件下迂回包抄，是敌人料想不到的。红十一师以三十三团为先锋部队，冒着马蜂叮、毒蛇咬的危险为全师伐木、砍树开路。他们浑身被雨水浇得透湿，身上被划破的伤口与泥污混在一起，但没有一个人喊一声累，叫一声苦。与此同时，红十师一部与红十二师主力也冒雨由空山坝以东及长坪地区出发，向敌右侧迂回，秘密插入柳林坝东侧等地，占领了进攻出发阵地。各部队按预定计划到达指定地点后，占领了要点，构筑工事切断敌左纵队的退路。红十一师三十三团进至离敌人只有200米的地方，对面敌人说话的声音都可以听得见，直到最后完成了开路任务，做好战前的一切准备之后，才轮流休息一会儿。

21日拂晓前，徐向前下达了总攻击令。红十一师突然向敌左侧发起猛攻，打得敌人茫然不知所措，阵脚大乱。接着，红七十三师从正面开始反击，红十师、十二师向敌右翼发起猛攻，将敌左纵队9个团，分割包围于空山坝以南的余家湾、柳林坝地区。当敌前敌总指挥孙震发现四面八方都出现红军时，这才慌了手脚，赶快突围逃命。这里的地形本不适于大部队运动，翻过一岭又一岭，走出一谷又一谷，山隘路险，一旦被截断，插翅也难逃，又加之倾盆大雨，山洪横流，敌人争相逃命，乱成一团，互相践踏，被挤下悬崖摔死者无数。在红军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之下，敌第四师余大经团整团被红军包围缴械，余本人乘混乱逃脱。红十一师三十三团冲到敌旅指挥所——梓潼庙周围，师政委李先念带着几

个干部来到三十三团前沿亲自指挥，要求消灭掉这个旅部，红军战士搭人梯爬上高墙，投进集束手榴弹，占领敌旅部，毙伤敌多人。进攻小驷马之敌李璽陶旅，得悉梓潼庙为红军占领，后路被截断，部队溃乱，纷纷丢弃军械、物资，夺路逃生，尽管李璽陶悬赏5 000元，令官兵停止退却，就地占领阵地，但无人听命，只顾奔逃。位于大驷马前线的敌第二、三路杨选、杨特生旅及第四师一部，见左、右两翼惨败，亦人心惶惶，各自分道突围，溃不成军，第四师团副曾慎修在逃跑时竟被踩死。红军则像虎入羊群，奋力冲杀，经过3昼夜激战，至24日，基本将敌全歼，毙、伤、俘敌旅参谋长李汉城、团长张克纯、白正刚、谢安华、张缉光、邱芳如、熊九秀以下官兵5 000余人，缴获长短枪3 000余支，机枪20余挺，迫击炮50余门。^①继之，红军在赵光岭、麻石寨、乌龙垭分别击溃敌第三路第二十旅和第一师第一旅共4个团。至此，敌左纵队13个团在空山坝西南地区遭到红军围歼。

红军乘势扩张战果，猛烈追击。“川军素有‘川老鼠’之称，溃败时不仅逃得快，而且耍花招。官兵往往把枪支、弹药、辎重、衣物、银元等，沿路丢弃，让对方去拣，以便自己争取时间逃命。这次，敌人如法炮制，又玩起了边跑边丢东西的把戏。我们命令部队一律不许打扫战场，只管猛打穷追敌人。川军从未见过如此凶猛的追击战术，愈加溃不成军。”^②徐向前率红七十三师、十一师向南江方向追击。部队只顾跑路，饭也顾不上吃，沿途俘虏大量敌人。5月26日，红七十三师收复南江城，守敌第四师独立旅弃城西逃，王树声师长督师继续穷追猛打，扩大战果，经罗家坝进抵三江坝附近。红十一师由师长倪志亮、政委李先念率领经平溪坝、官路口抵长池附近。5月29日，红十二师在旷继勋、甘元

^① 《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第57页。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88页。

景率领下收复通江后，一路经清江渡夺回巴中，继而攻克恩阳河，进迫仪陇城，另一路经得胜山、元山场收复江口。这次追击战，红军采用穷追猛打战术，残敌不是闻风而逃，就是一触即溃，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红军跟踪追击，沿途俘敌官兵6 000余人，红军有一个炊事员，一个人就俘敌50余人。红十师二十八团也在东线向前推进，刘存厚部被迫向后撤退，红军乘胜进抵土地堡。

至此，田颂尧4个月来所占之地，仅10余日即被红军全部收复，其所大肆吹嘘的三路围攻彻底破产。

敌人“三路围攻”惨败后，田颂尧为了阻遏红军，急忙抽调后方留守部队5个团进至三江坝、长池一线。6月10日夜，红七十三师第二一七团两个连，从马家梁涉水，摸到敌前哨据点，一枪未发，将其包围缴械，随即摸进敌指挥所，里外夹攻，一举袭占三江坝后面的险要阵地华盖山，仅以轻伤2人的代价，歼敌500余人。敌余部仓皇西逃，红军乘胜追击。6月15日，在旺苍坝将敌大部歼灭，连克快活岭、元坝、王家、大石板，直抵广元城下。同时，红十一师收复长池，向木门急进，红三十三团在青龙寨歼敌一个多团，占领木门镇，继经龙山场向苍溪、阆中方向挺进。

红军反三路围攻作战，总计毙、伤敌官兵1.4万余人，俘敌旅参谋长李汉城等以下官兵万余人，缴长短枪8 000余支，机枪200余挺，迫击炮50余门。田颂尧损失近半，残部退守嘉陵江沿岸。

红军空山坝大捷，粉碎三路围攻的胜利，使四川军阀和国民党统治集团极为震惊，蒋介石、何应钦立即致电刘湘、杨森等，要他们“泯除私见，协力兜剿”，以挽救田颂尧的惨败。田颂尧则更是痛心疾首，忧悲已极。多年惨淡经营起来的“实力”一下子损失近半，对他来说无异于从身上挖肉，因此，他一面下令“各县官绅民众戒除宴乐，以示哀悼”，否则“决予惩处”；一面大骂其他军阀隔岸观火，坐视不救，声言：“共匪如果再追来，我连保宁

（阆中）都放弃，让大家都过不成清静日子！”^①田颂尧如此，其部将也惊魂难定，一个个闻红军之威名而胆寒。志大才疏的田颂尧，此时才深知红军绝非“窜匪”、“流寇”，而是一群有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大仗恶仗的硬汉，自己绝非红军的对手。于是在6月15日发出通电，请求辞去“剿匪”督办之职，通电宣称：“尧前奉中央命令，督剿川陕边区赤匪。材轻任重，自知难胜。祇以该徐匪等为党国根本大患，尧承命中央，不敢不前，欲以奋斗精神，使各袍泽闻风兴起，故倾全军之力，与该匪周旋。……今者匪焰益炽，我力渐衰，而内战方殷，莫肯应援，饷拙弹缺，难事补充。……惟匪为全国公敌，而专力猛攻者，谨尧之一军。剿匪军费浩繁，而负担者，谨尧部戍区之民。今兹之失，固在意中，从前之胜，转为意外。岂特尧一人之罪，川中各军与有责焉。现匪扩充红军，数达三万以上，实现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恐非尧部所能遏制。除电呈蒋委员长，请予解除川陕边区剿匪职务，另简贤能接替，以期督率川陕各军认真兜剿外，尧仍率所部任一方进剿之责。即使余一兵一弹，仍愿为剿匪牺牲。”^②

田颂尧的惨败，使得四川军阀不得不重新估计红军的力量。这时，于5月间爆发的刘湘、刘文辉川西混战，胜负未分，欲罢不能，其他军阀慑于红军威力，提心吊胆，自保“防地”，谁都不想贸然进犯川陕根据地，落个田颂尧第二的下场。杨森派出代表到江口与红军联络，提出与红军相互支援和互不侵犯，又派人送给红军军用地图和部分药品，其目的是尽可能避免单独与红军作战，以保存实力和地盘。陕南的西北军孙蔚如部，也同红军谈判，暂时达成了互不侵犯默约。这样，在川陕边，暂时出现了有利于根据地建设的相对稳定局面。

粉碎敌人三路围攻后，川陕根据地面积扩大一倍以上。到6月

^{①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卷），第274、280~281页。

间，根据地的范围北起陕西的镇巴、西乡南部，南至仪陇、江口，东达万源，西抵广元和苍溪城附近，纵 200 余里，横 300 余里。新建立了江口、仪陇（县北部地区）、广元（旺苍坝地区）、长池、恩阳（巴中恩阳河地区）、苍溪、万源等 7 个县的苏维埃政府。全区人口达 200 余万人，面积近 3 万平方公里。在根据地中心通、南、巴地区，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分配土地的任务，新区的土地革命斗争也正在迅速展开和深入。

二 川北红旗扬

红四方面军反三路围攻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大大地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和胜利信心。在反围攻的战争中，许多翻身群众热烈响应党和红军的号召，纷纷参军、参战，运物资，捉敌探，抓俘虏，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增强了抗敌本领。

1933 年 6 月 23 日，中共川陕省委在通江新场坝，召开了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代表共 248 人，代表党员千余名。大会听取了曾中生代表省委所作的政治报告，并根据反围攻胜利后的新情况和党中央的指示，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决议案规定当前的具体任务是：扩大红军、游击队、赤卫军，要求在最近期间“必须完成第一期动员一万新的红军战士”；彻底分配土地；健全各级苏维埃政权；开展白区工作和白军内部的士兵运动；扩大和健全党的组织和工会、青年团的组织；继续深入镇压反革命等。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还通过了《组织问题决议案》、《红军与地方武装决议案》等决议。

依据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红四方面军于 6 月底在木门召开了军事会议。徐向前和陈昌浩主持了这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 100 余名红军领

导干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反三路围攻的作战经验；检查红军中过去肃反的问题；部队扩编和整训问题等。

徐向前就作战和建军问题发了言。他在发言中通观全局，立足实践，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对反三路围攻作战的意义，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川军的作战特点和红军的战术等问题，作了全面深刻、实事求是的总结。他说：“这次战役，是在广泛发动群众，初步奠定根据地工作基础上进行的。有红军的英勇作战，有地方武装的积极配合，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保证了战役的胜利发展。除此之外，导致胜利的一个根本原因，则是战略方针适应了新情况。”“反三路围攻，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收紧阵地呀，节节抗击呀，待机反攻呀，重点突破呀，就是以有利的地形，少数的兵力，劣势的装备，与优势的进攻敌人‘磨蹭’，经过一个逐步消耗敌人的阶段，使他们把战线拉长，孤军深入，疲惫不堪，难乎为继，而后我实施总反攻，把敌人一下子打垮。”^①徐向前的发言，对红四方面军深入进行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问题的学习和研究，起了很好的动员和推动作用。

木门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停止部队内部的“肃反”问题。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时期，张国焘就曾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肃反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恶果。红四方面军入川以后，在川北一站稳脚跟，张国焘就再一次进行“肃反”。1933年2月，张国焘在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首先发动了一个所谓反“右派”的斗争，把那些对他有过意见的人诬为“右派”，是所谓“反党活动”，并说“右派是托陈取消派的新生力量”，而“托陈取消派”又是“目前反革命派别的领导中心”。徐向前回忆：“反三路围攻开始不久，张国焘即借口部队‘不纯’，令陈昌浩和保卫局‘肃反’。老一套的办法，单线领导，搞逼供信、‘自首’运动，任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90~291页。

意捕人杀人，军委主席和政治委员说了算。罪名无非是什么‘托陈取消派’、‘右派’、‘通敌’、‘AB团’、‘改组派’等，天晓得！当时，战争异常紧张，部队整天和敌人拼杀，一个人顶好几个人用，有生力量宝贵得很。我在前线听说一些干部、战士被捕的消息，真是恼火极了。九军七十三团政委陈海松，年仅20岁，很能打仗，被列为‘审查’对象，要抓起来。军长何畏跑来找我，我说：他是个小孩子，有什么问题呀，不能抓！我打电话问陈昌浩：‘同志，你们想干什么？我们的部队从鄂豫皖打到四川，是拼命拼过来的，哪来那么多‘反革命’嘛！现在弄的人心惶惶，仗还打不打呀？命还要不要呀？陈昌浩有张国焘撑腰，‘奉命行事’，我的话他当然听不进去。电话里应付了我几句，实际上仍在坚持‘肃反’。部队意见很大，层层进行抵制。李先念同志在十一师，就没有照保卫局列的黑名单抓人，说：‘打完了仗再说！’保护了一些干部。这个期间，先后被逮捕杀害的团以上干部，有：旷继勋、余笃三、吴展、闻盛世、陈少卿、赵箴吾、杨白、王振华、袁诚汉、李绍德、任玮璋、张逸民等。七十三师二一八团第三营一仗没打好，政委陈少卿被当作‘改组派’抓起来，株连全团排以上干部，几乎全部抓光。有的被关，有的被杀，有的被送到运输队里扛大米袋子。木门会议上，大家议论纷纷，慷慨激昂，强烈要求停止部队内部的‘肃反’。有个师政治部主任，搞刑讯逼供，杀人不少，在会上挨了批斗。陈昌浩的头脑清醒了些。他在讲话中虽肯定前一段部队中‘肃反’的必要性，但承认错抓了人，同意停止‘肃反’，将错抓的放回。木门会议，在抵制张国焘的罪恶‘肃反’上，取得了胜利，意义非同小可。”^① 木门会议作出停止部队内部“肃反”的决定，其意义不在于决定内容本身，而在于说明红四方面军内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同志能在“左”倾路线统治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97～298页。

全党的情况下，在党的会议上正式作出反对错误的肃反政策的决定是需要担负很大风险的，也说明以徐向前为代表的红四方面军的绝大多数干部对于错误的肃反政策是进行坚决斗争的。木门会议关于停止部队内部“肃反”的决定，虽然未能从政治路线上、阶级根源上、国际背景上去分析肃反错误的原因，而且会后关于停止内部“肃反”的决定也未能完全彻底贯彻落实，但它毕竟是以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意志集体讨论决定的方式，抵制了张国焘的错误。这在川陕革命根据地乃至红军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这个决定还使一些干部免遭不测，稳定了部队情绪，巩固了部队的团结，保存了一些革命力量的精华，对部队和根据地建设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勿庸讳言，木门会议停止部队内部“肃反”决定的作出，与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陈昌浩有很大的关系。正是由于陈昌浩态度的转变，木门会议才顺利地作出了这个决定。

木门会议的另一个重大决定是调整和健全部队的编制体制，为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和根据地的巩固创造了重要条件。会议决定将红四方面军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并通过整训，加强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恢复彭杨军政学校，进一步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

木门会议后，部队于7月上旬进行了整顿扩编，组成情况和编制序列为：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参谋长曾中生。下设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兼西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总指挥徐向前、总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兼，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曾传六。方面军直辖机关和部队有参谋处（主任舒玉章）、总经理部（即后勤部，主任郑义斋）、总医院（院长苏井观）和警卫第一、二团、妇女独立营等单位。彭杨军政学校直属军委领导，校长倪志亮。

以红十师为基础，连同赤江、赤北两县独立团和万源、江口两县独立营扩编为第四军。军长王宏坤，政治委员周纯全，政治部主任徐立清，下辖第十、十一、十二师。

以第十二师为基础，连同巴中市、巴中、恩阳、仪陇、阆中等县独立团、独立营扩编为第九军。军长何畏，政治委员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参谋主任王学礼，政治部主任王新亭，下辖第二十五、二十七师。

以第十一师为基础，连同苍溪、长池等县独立团和其他地方武装扩编为第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主任文建武，政治部主任张成台，下辖第八十八、八十九、九十师。

以第七十三师为基础，连同南江、红江、广元等县独立团、独立营扩编为第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政治委员张广才，政治部主任黄超，下辖第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师。

整个红四方面军共4万余人。

红四方面军的扩编和整训，得到了通南巴地区人民的热烈拥护，特别是妇女的态度更为积极。“川北的妇女真是好样的！”红四方面军人川之初，即对四川的妇女有这种印象。当时，在川北的田野里、山坡上能见到的劳作者，大多为妇女，砍柴、背粮、挑粪、耕田等无所不能。后来，大家才知道，川北的妇女从小就参加劳动是主要劳动力，男人抽大烟的多，体力不行，家里家外的繁重劳动，便靠妇女来承担。但妇女的地位也最低贱，命运也最惨。她们不仅终年像奴隶般的劳动，而且经常遭受公婆、男人的欺凌和虐待。红军到来后，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男女同工同酬，妇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打碎了套在妇女身上的枷锁，使她们挺起了腰杆，见到了天日。妇女们觉得自己的地位改变了，被当人看待了，生活有了希望，革命的积极性空前提高。红军扩编，需要吸收大批的青壮年参加红军。然而，川北的

大多数男人都抽大烟，不仅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而且倾家荡产、卖儿卖女也在所不惜。鸦片烟确实坑苦了川北的妇女，也害苦了川北的所有群众。田颂尧却在勒令群众种植鸦片的高压之下，榨取20万银洋的税收，使通南巴地区，不仅种鸦片的多，吸鸦片的多，而且迷信鸦片的也多。当地男女老少，不论生大病小病，都靠吸鸦片治疗，敬神敬祖，也把鸦片当供品，庙里的菩萨、土地老爷，嘴上抹的尽是烟膏子。红军进入川北后，立即广泛宣传抽鸦片的害处，破除群众对鸦片的迷信，发出戒烟号召，禁止继续种植鸦片。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戒除鸦片烟毒，专门设立了戒烟局。刚开始戒烟，响应者不多。许多烟客持消极对抗态度，有的甚至造谣，挑拨红军和群众的关系。但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群众分到了土地、房屋、耕牛，有了过好日子的希望，那些体弱多病的鸦片烟客、瘾君子也无法继续抽下去，戒烟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妇女们在戒烟运动中最相信红军和苏维埃的宣传，最拥护戒烟的号召，成为戒烟运动的积极分子。红军扩红之初，唯抽大烟者不准参加红军。红四方面军总部下达“扩红”命令后，川北大大小小的坝子、村落，都掀起了“扩红”的宣传热潮，出乎意料的是“扩红”工作进展极为缓慢。为此，陈昌浩专门召集各团、营“扩红”负责干部了解情况。一个干部告诉陈昌浩：川北的妇女们都踊跃报名要求参军，可部队要不了那么多女的！

“男的呢？”陈昌浩问。

“没有几个男的够资格当红军。”负责“扩红”的干部们报告说：“这儿的男人个个脸色铁青，活像东岳庙里的鬼。穷得叮当响，饿着肚子还要抽大烟，弄得一个个尖嘴猴腮，鼻涕眼泪满面流，哪里还能当红军！”

“他们是要求参军，我们没要！”

“没有要？！”陈昌浩似乎有些生气。

“叫他们戒了烟再来。”陈昌浩听了汇报，有些焦虑。他知道

红军中有些高级干部对是否招收当地有抽大烟习惯的贫苦农民当红军有不同意见。红九军军长何畏公开命令下属：烟猴子一律不吸收，抽大烟的懒汉一律不分田。为了这件事，陈昌浩严厉地批评过何畏，但是，红军战士、干部的看法没有完全改变，大家担心把有烟癖的农民吸收来当红军会影响战斗力。为此，红四方面军总部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决定：吸烟的男子也可以参加红军，入伍后再戒烟。该决定一出，立即引起了川北地区青年的参军热，特别是青年妇女，她们组织宣传队，挨家挨户地宣传苏维埃、红军的政治主张，动员妇女劝丈夫戒烟，劝青年男子参加红军。很短时间内，红四方面军都完成了扩编任务。那些参加了红军的“瘾君子”也在部队的教育、帮助之下很快地戒绝了鸦片烟瘾。当时任红十一师三十一团机枪连指导员的李定灼回忆说：“我们连在通江和巴中两县交界的右垭口，接受了训练一批新兵的任务。由于这批新兵情况特殊，开训的第一课不是学政治、学军事，而是戒烟课。”“记得在全团各连队把新兵送来的当天下午，连里决定把全体新兵集合在山前坡地上，点一次名，讲讲训练计划和进行开训动员。谁知司号吹了两遍集合号，用了半个钟头的时间，才稀稀拉拉地把队伍集合起来。我急切地想看看全体新兵到底啥样，便大步地跨到两排弯弯曲曲的队伍前。只见这些新兵由于地主、军阀的层层盘剥和吸食鸦片，个个骨瘦如柴，面无血色，好像纸扎的小老头。全都穿着褴褛不堪的长衫短褂，为了御寒，不少人腰间还系着一根用稻草搓成的‘黄金带’。他们在凛冽的寒风中，紧缩着脖子，冷得直抖，看样子真有被风吹走的可能。”“连长点完名，为使大家能听清我的声音，我跳上紧贴队伍的一块大石头上，放开嗓门大声地讲道：‘同志们！从现在起，新兵训练开始了。这第一课就是戒烟课……’我还没讲上几句，队伍里突然咚！咚！咚！接连倒下了几个人。我和连长忙奔了过去，只见有几个新兵躺在地上，一个个脸色灰白，呵欠连天。我弯下腰用手

摸着一个瘦高个子的额角问道：“怎么啦？”高个子艰难地睁开双眼，伸出左手翘起大拇指和小指，做了个吸烟的手式，边比划边有气无力地说：“红军哥，一天多没吸这个啦，我要求来几口”。我怕影响其他新兵，惹起连锁反应来，忙叫人把他们抬回宿舍。”^①在此后的十多天里，李定灼和全连的老同志们竭尽全力帮助这些新兵戒除烟毒：给新兵做最好的饭菜；利用戒烟的土方，嚼花椒；请新兵讲苦难家史及如何上当受骗吸上鸦片烟的历史；老同志与新兵住在一起，不分昼夜守护在新兵身边，精心照看；利用各种形式丰富新兵文化生活……“由于组织的关怀，老同志的精心照顾和新同志自己的积极配合，经过十天左右的时间”，这些新兵先后都戒了烟。新兵连的变化，很快传遍了附近的村寨，乡亲们纷纷到部队来看新奇。父母看到儿子，妻子见着自己的丈夫，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看到自己的亲人，在不长的时间里在红军的关怀帮助下变化如此之大，真是感慨万分。他们说：“地主军阀把人变成‘鬼’（烟鬼），你们红军哥把‘鬼’变成人。”^②

红四方面军扩编和整训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大力开展了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部队在扩编中发展很快，为适应部队整编中的组织变动，红四方面军建立和健全了各级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机关，并以军为单位开办了政治干部训练班，以师、团为单位普遍进行了党、团支部骨干分子的训练。各级政治机关陆续翻印和编印了《党员须知》、《支部组织及其工作》、《连指导员须知》、《红军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等许多教材和大量宣传品。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还办有《战场日报》（后改为《红军》）和《干部必读》等报刊，各军分别出版有《红星》、《红旗》、《赤化全川》、《红光》等小报。部队中还以中共“六大”的《十大政纲》和编印的《红色战士读本》、《红色战士必读》、《红色战士丛书》等

^{①②} 李定灼：《特殊的一课》，《艰苦的历程》上，第374～379页。

教材进行政治教育。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为：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红军的性质、任务、斗争历史和纪律，革命的光明前途及其艰苦性，以及如何进行群众工作和瓦解敌军，遵守俘虏政策等，并强调养成持久作战、吃苦耐劳、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随着部队的扩编，新成分大量增加，许多老战士被提升为干部，因而急需提高干部的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为适应部队训练的需要和有计划地提高干部的军事素质，红四方面军领导机关号召各级干部要有一面斗争一面学习的精神，总结和研究过去作战的经验教训，学习军事理论，创造新的战术，克服以往作战中存在的缺点，提高指挥能力，在继续发扬英勇战斗作风的基础上注意研究战术。除颁发《连、排、班长须知》、设立各种训练机构进行轮训外，主要采取“战后检讨会”、“军事研究会”等办法，进行实际教育。方面军总政治部还在《干部必读》上刊登大量介绍军事知识和实战经验的文章，并专门印发了一些有关的小册子，如陈昌浩写的《与川军作战的要点》，曾中生写的《游击战争的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与川军作战要点》，舒玉璋写的《追击要点》、《军事知识研究》以及张国焘、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负责人所写的文章等，这些对于提高红军干部的指挥能力、管理能力和军事理论水平产生了极大的作用。红四方面军针对当时部队的情况和敌情、地形特点，在部队中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训练。在技术上，强调射击、投弹、劈刺和土工作业的训练；在战术上，根据川北地形险要、道路崎岖和敌人多据险固守、害怕夜战等特点，着重加强山地战斗、河川战斗和夜间战斗的训练。

在红四方面军进行扩编和整训的高潮中，川陕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反动土顽、匪患基本肃清，巩固了根据地后方，安定了社会秩序。通南巴位于川北交通闭塞、山高林密的地区，既是封建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又是“棒老二”（土匪）聚啸出没之所在。各

县都有一批“东霸天”、“南霸天”、团总、惯匪、地头蛇，长期鱼肉乡民、坑害百姓。红军入川后，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初创，土地革命的开展，封建军阀勾结土豪劣绅，千方百计进行反抗、破坏，反对革命，其活动相当猖獗。这些家伙造谣惑众，威胁农民，土地明分暗不分，继续收租逼债；有的隐瞒成分，伪装积极，“趁红军和工作队初到，对地方情况不够了解，便以各种方式混入苏维埃政权，待机蠢动。如赤北县一区五乡初建村乡苏维埃时，反革命分子冉明扬、刘海丰等就互相推举，混入苏维埃，进行罪恶活动。赤北县一区七乡，28个苏维埃下部中，有6个是混入的阶级异己分子。又如地主分子杨国材窃取了巴中县化成乡苏维埃主席的职务后，以卑劣手段杀害红军一名连长；”^①还有的勾结土匪或边缘区的敌军，袭击红军，杀人放火，反攻倒算，如“巴中大地主何尧阶曾带领匪徒于晚上窜至渔溪区街上，抢劫区委机关及商店，并放火烧毁民房”。“在南江县杨家坝，以地主姜应千为首的反革命武装，曾猖獗一时，致使乡苏维埃不能建立。在通江，一些川军溃兵和地主相勾结，打着‘川军二十八军特遣司令部’的旗号，发动叛乱，几次进攻德汉城，有一次竟冲进城门，杀死红军战士多人。”^②另一些反革命分子则利用“盖天党”、“孝义会”、“红灯教”等反动会道门组织反革命武装，进行叛乱^③。那些“棒老二”土匪武装，历来与官府狼狈为奸，对新生的红色政权同样不满，四处打家劫舍，扰乱社会治安。当时川陕边一带最大的土匪是王三春股匪，匪众2000余人，主要活动于陕南、通江、万源的崇山密林中；另一股土匪李茂春部，则主要流窜在川东北、陕南边境，其余的小股土匪数不胜数，多隐藏在深山洞穴之中。国民党四川军阀利用土匪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本性，对其大肆封官许愿，并施以金钱诱饵，驱其进攻红军，破坏苏维埃政权，杀

①②③ 《川陕革命根据地史》，第200页。

害革命群众。红四方面军总部充分认识到：不坚决镇压这些反动分子、“棒老二”土匪，群众就难以发动，根据地就无法巩固。因此，红四方面军在通南巴刚刚站稳脚跟，便立即展开了镇压反革命分子和肃清土匪的工作。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专门进行肃反（包括镇压社会上的反革命）工作机构——川陕省总保卫局，设立了革命法庭，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严厉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杀了一批地主豪绅和反动头目。红军部队和各级苏维埃政府在镇反中，还采取了现场开会，公审反革命的罪恶，当场处决的办法，使反革命分子昔日欺压百姓的威风扫地，真正显示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强大震慑力。如1933年5月，红七十三师某团在旺苍县吴家垭和当地乡苏一起召开了400余群众参加的斗争大会，会上当场处决了反动地主任老武，当地人民拍手称快。再如，五权乡豪绅地主何仕义仗其父团总之势，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红军将其逮捕后，立即召开了约有千人参加的大会，宣布其罪恶，然后红军卢科长问广大群众：“何仕义该杀不该杀？”群众异口同声地说：“该杀！”于是，当场镇压了何仕义。在根据地军民的严厉镇压的威慑之下，各类反动分子纷纷作鸟兽散，逃亡在外或藏匿深山。根据地军民又采取搜山清剿的办法，给子一网打尽。江口县得胜山东部的狮子寨一带以逃亡地主刘成雄为首纠集一股近千人的反动武装，经常夜间袭击红军部队和苏维埃政权。1933年4月，红三十三团奉命搜山清剿，经过激烈战斗，毙敌400余人，俘敌200多人，摧毁了这股反动武装。针对川北土匪的各种特点，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依靠群众，消灭土匪。一是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派出小股部队进剿；一是利用土匪的家属去做工作，劝他们放下武器，改邪归正。王宏坤将军回忆：“在通江的两河口附近，有一个曲江洞，这里是个远近闻名的土匪窝，土匪在里面呆了几十年。曲江洞地势险要，洞口悬在六七百米的悬崖半截上，他们以一副铁链梯子上下进出洞口。曲江

洞很深、很长、很宽敞，洞下200余米处一条暗河有30多里长，北穿大巴山通陕南，河道里还有能聚集万人的大沙滩。曲江洞内有土匪二三百，物资储备丰富，军阀刘文辉打了几次也没有打开，对他们毫无办法。”“师政治部主任傅钟在这一带做群众工作，给土匪头子写信，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土匪也听说过红军打富济贫，颇有好感，下来与我们联系，傅钟同志做了很多工作，几经反复，达成了协议，结果，我们将曲江洞的土匪大部分调出，开到洪口整编为一个独立营，我们还派了教导员、指导员等。”^①后来，曲江洞成了红军安置伤员的地方。同时，红军对那些坚持与人民为敌的顽固土匪，如王三春匪部则给以坚决的打击，迫使这些土匪或逃离根据地或缴械投降，从此不敢在根据地露面。经过红军与地方武装、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一时间根据地内的反革命分子、土豪劣绅、反动派、土匪销声匿迹，有力地保障了根据地的后方安全，大大提高了红军在群众中的声望。

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反三路围攻的胜利和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以及扩军、镇反、剿匪等各方面的胜利，也进一步促进了敌人阵营内部的分化。驻陕南的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军长兼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因不满蒋介石的排除异己政策，同时鉴于红军力量日益强大，继续同红军敌对于他自己不利，在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的影响下，便派时任三十八军少校参谋的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代表他到川北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进行联系，商谈互不侵犯的问题。武志平在赴川北的时候还携带了机要军用地图和几组作战联络信号、口令、密码等。他到川北后先后见到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负责人傅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后勤负责人郑义斋、总政治部副主任张琴秋、总后方医院院长苏井观以及张国焘。张国焘和武志平交谈过几次，对他带去的军用地图和

^① 王宏坤：《我的红军生涯》，第185页。

一些情报非常感兴趣，并表扬了他。在武志平详细汇报了工作情况之后，张国焘认为白区党组织对武志平的工作指示（主要为：利用公开身分向党搜集情报；利用十七路军与红四方面军的直接敌对形势，建议孙蔚如不要和红军正面冲突，设法建立通往川陕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并用之将物资、情报输送给红四方面军；利用矛盾，争取杂牌军中立或对红军作战时取消极态度以及策动白军哗变等）是正确的，并认为武志平在白区有许多便利之处，可以利用其公开身分作掩护，进行党的秘密工作，对红四方面军的工作会起相当大的作用^①。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军委认真进行了研究，“认为既然十七路军主动来和我们建立联系，这不论从战略上还是从整个川陕根据地发展考虑，都是有利的也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一方面，在川北根据地的后方，翻过大巴山便是汉中，是孙蔚如十七路军控制的地区，如果能和他们打通关系，就可解除我们的后顾之忧，集中全力向四川发展。另一方面，敌人对我们封锁得很厉害，我们急需打开通路与外面发生联系。当时临时中央已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我们希望能与留在上海的机关取得联系，请他们给我们派一些干部并在工作上给予协助。同时，希望能解决部队物资上的困难。因此军委确定和十七路军建立联系。”^②红四方面军总部随即派徐以新（红四方面军参谋部主任）和武志平一同返回汉中，与孙蔚如进行谈判。在空山坝大捷的胜利影响下，孙蔚如终于和红军达成了互不侵犯、共同反蒋的秘密协定。^③这次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减轻了红军对陕南方面的顾虑，得以集中全力对付四川之敌，对川陕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以及对敌斗争，都

① 武志平：《回忆在川陕地区的统战工作》，《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上），第235～238页。

② 徐以新：《我代表红四方面军同孙蔚如谈判的经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上），第248～249页。

③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227～228页。

起了积极的作用。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的各项工作都向前迈出了极为可喜的一大步。8月1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在巴中城召开了第二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160人，选出了由32人组成的新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熊国炳仍任主席。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和川陕省苏维埃的任务》的决议，制定了《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条例》、《公粮条例》和婚姻、禁戒鸦片等条例。大会还奖励了反三路围攻中作战有突出功绩的部队，分别授予原红三十二团、三十三团、二一七团等单位“以一胜百”、“百战百胜”、“夜摸常胜军”等奖旗。改选后的省苏维埃政府设有财政、经济建设、外交、交通、土地、劳工、粮食、文化教育、内务、工农监察等委员会和政治保卫局、革命法庭、戒烟局。这一时期，各级苏维埃政权机构经过改选，进一步纯洁了组织，提高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责任感。

经过苏区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根据地的生产事业、文化教育事业等有了长足的发展。农业方面，由于广大农民分得了田地，并在老区普遍开展了查田运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特别高涨，当年即获得了历史上少有的大丰收，产量有显著的提高。工业方面，先后恢复和新建了一些农具、纺织、造纸、被服、军工等小型工厂，还在通江城内外和沙溪嘴地区开挖盐井，解决根据地缺盐的问题，制斗笠、制药、染坊等手工业也恢复了生产。交通建设方面，省工农民主政府先后发动50万民工，劈山炸石，干了件大工程——疏浚巴中至江口、江口至善草坝总长300余里的河道，不仅保证了舟船的顺利通行，而且减少了巴河下游的水患。还修整了道路桥梁，改善了根据地内的交通运输条件，方便了群众。财政方面，颁发了公粮和各种税务条例，设立工农税务局，征收统一累进税，建立了工农银行和造币厂，发行根据地的银币和布币。文化教育方面，省工农民主政府除建立干部学校外，在通、南、巴

三县各建列宁中学一所，各县、区均建立了列宁小学，进行义务教育，每个集镇还设立群众俱乐部，开展群众性的文化学习娱乐活动和普遍进行军事化的动员教育工作。

红四方面军取得反三路围攻的胜利，带来了川陕根据地的大好形势：根据地更加扩大和巩固，各县苏维埃政权迅速恢复和健全；土地革命深入开展，广大工农群众积极生产，热烈地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红军扩编整训，加强了地方武装；文化、教育、卫生等工作迅速恢复和发展。根据地内到处是飘扬的红旗，欢乐的歌声，拥护红军、积极生产，成为川北人民最热心的活动。支援红军、参加红军，是川陕根据地翻身青年男女的最大志愿，他们争先恐后报名参军，决心为保卫苏区、保卫革命果实，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消灭土豪劣绅而战斗。川北成为红色的世界，成为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新天地。

田頌尧的三路围攻被红四方面军彻底粉碎，南京的蒋介石十分着慌，遂于1933年7月7日，发布国民政府令：“特派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又令：“现在川匪猖獗，通南告陷，亟应剿灭，以靖地方，兹特派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并飭川中各军，悉归节制，着即辑和诸将，同心协力，以尽除暴安良之天职。从前一切睚眦小嫌，悉宜蠲弃，勿得逞私仇而启内争，致使匪势坐大。务须申明纪律，师行所至，注意解除闾阎疾苦。庶匪患早平，民政财政，咸臻正轨，有厚望焉。”^①国民政府的“令”是下了，但刘湘此时尚无法部署对根据地的围攻，他同刘文辉争霸四川的混战，在6月间又开始接触，7月上旬正式展开，此时他的部队正与刘文辉部打得“鸡飞狗跳”，况且他也无意派兵进攻红军。因此，刘湘对蒋介石的命令想方设法拖延执行，直到7月20日，刘湘才回到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卷），第281页。

成都，表示将召集成都会议，会商“剿赤”及安川事宜，并于同一天致电南京，说已会同各部，正式出兵“剿赤”。四川的其他军阀亦无心“剿赤”。田頌尧刚刚在三路围攻中惨败，损失严重，亟需补充、休整；邓锡侯、李家钰、罗泽洲三部远在川西与刘湘部联手与刘文辉作战；杨森和刘存厚两部势力不强，曾派兵支援田頌尧三路围攻红军，失败之后，亦力图自保；至于陕南杨虎城部孙蔚如第三十八军则与红四方面军谈判，密商订立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的协议，更不可能参加围剿红军。

在这种情况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乘军阀之间矛盾重重，互相观望之际，为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根据地，解放更多的劳苦群众，壮大革命力量，采取依托根据地，由北而南，各个击破，全面推进的作战方针，立即发起外线进攻。从8月中旬至10月底，红四方面军集中主力，连续发起了三次进攻战役，即仪（陇）南（部）战役，营（山）渠（县）战役，宣（汉）达（县）战役。

仪南战役。红四方面军的仪南战役计划，是打击退守仪陇、南部地区的田頌尧残部，扫清该地嘉陵江东岸敌人，使根据地向西扩大到嘉陵江沿岸，同时夺取南部县境的盐井，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解决根据地当时缺乏食盐的严重困难。盐，对于200多万川陕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来说是非常金贵的东西。盐巴奇缺，缺到一块光洋买不到一两，甚至有钱也没处买的地步！200多万人民群众要生活，要生产，不解决吃盐的问题不得了。这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红军的战斗力，关系到根据地的生存和巩固，因此盐的问题是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徐向前建议首先发起攻打田頌尧部的仪南战役，就是从解决吃盐问题着眼的。

田頌尧兵败之后，垂头丧气，将其部队大部拉回嘉陵江以西休整。江东只留少数兵力扼守几座孤城。其新收编的王志远第五路和刘汉雄独立师共6个团，布置于广元及其以北地区；罗乃琼

第三师 5 个团，布置于苍溪烟峰楼至南部双山埡一线；李炜如第一路 4 个团，布置于仪陇之兴隆场、日兴场一线，以掩护其主力休整补充。红军的计划是：多路突击，几处制敌，迫使西岸田军主力不敢贸然渡江应援，集中红军主力一部，迅速围歼仪陇、南部之敌。具体部署是：以红九军担负战役的主要任务，由巴中以西之恩阳河向仪陇、南部进攻；以红三十一军一部西出向苍溪进击，以红三十一军一部出西北向广元地区进攻，迷惑和牵制敌人，配合红九军行动；另以红四军在江口和洪口场等地，钳制南面的杨森部和东面的刘存厚部。徐向前率领前线指挥部随红九军行动。

8 月 12 日，徐向前下令部队出击。红九军根据总指挥部关于仪南战役的作战计划，以王学礼率红二十七师的八十一团和红二十五师的七十三团在左翼，分两路向仪陇以东的日兴场等外围据点进攻。许世友率红二十五师（欠七十三团）在右翼，分两路向仪陇以北的兴隆场等外围据点进攻。8 月 12 日上午，红军开始行动。时值盛夏，酷暑蒸腾，太阳像只火盆似的挂在红军战士的头顶上，烤得人大汗淋漓，口干舌燥。但是，经过 3 个月的大练兵运动，红军指战员斗志昂扬，摩拳擦掌，早就憋足了劲，准备奋勇杀敌，谁也没在乎头顶上的太阳，迈大步走向战场。许世友和红七十四团团长江潘幼卿率队行至尹家铺时，同敌 1 个团遭遇，许世友当即下令：“打掉它！”潘幼卿团长跳下战马，向部队喊了声：“跟我来！”带领部队立即向敌人冲去。经过 1 个小时的激战，歼敌 200 余人，缴枪 200 余支，俘敌数十人，余敌溃不成军，向阆中败逃而去。经询问俘虏，原是敌李炜如部的 1 个团，准备在巴中、仪陇之间布防，还没来得及展开就被红军击溃。红军乘胜追击，直抵兴隆场西北的外围据点百胜背。

此时，红七十五团正在师政委陈海松和团长韩东山的指挥下，与敌激战于兴隆场外围的五颗星、文家梁、大包梁、彭家梁一线。红七十五团多次攻击未遂，而且有了一些伤亡。据此，许世友等

决定以红七十五团 1 个营佯攻兴隆场东北外围据点，其他两个营和七十四团向百胜背突击。百胜背地形险要，山上筑有数道环形工事，红军几次进攻都未成功。第二天，红军改变了战术，以少数兵力在正面虚张声势，佯攻诱敌，以大部兵力突然猛击百胜背右后方之三堆石，一举突破敌人防线，并袭占了百胜背后方的观紫场。百胜背守敌因后路被切断，急忙夺路败逃。红军尾追溃敌，先后将兴隆场、中坝、回龙等地分别包围，并以一部兵力向西南迂回，包围仪陇、南部交界的土门铺，切断仪陇之敌逃往南部的去路。红军左翼部队同时亦连战皆捷，相继包围了日兴场、风仪场等据点。至此，仪陇县城周围的据点，全部被红军分割包围。红九军主攻仪陇的部队，经过一周左右的时间，连续战斗，肃清了仪陇外围据点，歼敌 1 个多团。

仪陇，是个山城，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故乡。县城坐落在半山腰上，城墙高筑，碉堡密布，出北门而上，就是海拔 600 多米的金城寨，易守难攻。当红军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向县城进攻时，敌人依托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以山炮、轻重机枪步枪组成好几道火网，封锁了每一条通道，红军与敌激战一天，未能得手。田颂尧部队吃过红军的苦头，很害怕红军，但他们占据有利地形，据险死守，任凭红军怎么喊话要他们缴械投降，敌人都拒不投降。因而只有硬攻。

正当许世友副军长为如何攻克仪陇苦苦思索的时候，地方党组织派朱总司令的弟弟给红军送来了仪陇城要图，并介绍了仪陇城的情况。根据地方党组织提供的情报，红九军决定从仪陇北的金城寨后面攀崖附葛而上，攻占金城寨，然后尾追溃敌从北门突入仪陇城内。8 月 22 日深夜，红七十五团从金城寨后面的悬崖上爬了上去，于 23 日黎明向敌发起进攻，一举占领金城寨后即从北门攻入仪陇，红军正面部队迅速发起进攻，突破敌阵地，向城内猛插了进去。上午 9 时，红军攻占仪陇，歼敌两个营，俘敌 300 余

人，缴枪 400 多支。随后，红九军决定由王学礼率 1 个团留守仪陇，许世友率红七十四、七十五、八十一团向南部挺进。当天上午，许世友和陈海松即率队出发。

田頌尧见仪陇失守，仓皇失措，慌忙调整兵力，企图以嘉陵江天险为依托建立新的防线，防止红军渡江。红九军分两路进击，八十一团占领仪南边界的长平山，击溃守敌第三游击队；七十四团、七十五团在仪阆交界处太阳山歼敌赵索夫民团和部分正规部队，进占阆中县的玉台场。敌第二师师长曾宪栋急令廖刚旅布防于阆中水观音地区，以阻止红军向南部进展。红九军立即分兵三路包抄该敌：八十一团向水观音右翼迂回，七十五团向其左翼迂回，七十四团从正面向水观音猛攻。红军三路部队协同作战，将敌两个团全部击溃，然后尾追逃敌，从阆中的伏庙垭进入南部，在大佛寺歼敌徐子辉民团，然后向西向南猛烈扩展，进占了盛产食盐的洪山场、三合场、碑院地区，占盐井 90 余口，缴盐 10 万余斤。在地方党组织配合下，发动盐井职工继续生产，大力组织食盐的收购工作，动员当地群众将大量食盐运往后方，并开凿了新盐井六七十口，基本解决了根据地的盐荒问题。

红九军在占领大批盐井之后，分兵打击南部县境内的残敌，先后攻克楠木场、火烽山、红观寺、新政坝等地，解放了仪陇全境和南部县沿嘉陵江以东地区，完成了仪南战役的任务。与此同时，经三十一军向广元方向猛攻，连克元坝子、红土关等要点，又攻占千佛岩，迫敌退守尹家沟至九花岩一线，后又攻下广元东南柳林子，歼敌 1 个多营，形成对广元的三面包围，并以一部兵力向陕南宁羌（今宁强）发展。红三十一军一部也进至苍溪城郊，威胁敌不敢外出，有力地配合了红九军作战。仪南战役历时半个月，总计歼敌 3 000 余人，缴枪千余支，解放了仪陇全境，控制了广元、昭化、苍溪、阆中、南部等县之嘉陵江东岸广大地区和陕南宁羌一部分。而大片井盐产区的占领，对保证根据地军民食盐的供应，

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亦有重要意义。

仪南战役后，红四方面军总部接到了党中央致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信。这是红四方面军自西过平汉路转战以来第一次通过秘密交通转来的中央文字指示，大家对此都感到十分高兴。党中央在信中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分析，对红四方面军创造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深表嘉许，并指示说：“目前四川的形势，对于开展四川的苏维埃运动是非常有利的。你们应用一切力量，抓紧这一历史的时机，把革命的火炬烧遍整个的西北。”^①因此，要求红四方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在巩固原有阵地基础之上，来迫切地争取苏维埃首先在四川全省的胜利。”^②红四方面军总部认真讨论了中央的指示，大家都表示同意。

营渠战役。营山、渠县位于川陕根据地南部、渠江和嘉陵江之间，是敌第二十军军长杨森的防地。仪南战役胜利结束后，根据地的南部边界已经扩展至仪陇以南，而杨森第二十军所盘踞的玉山场、鼎山场、立山场等前哨据点，突出于根据地的仪陇和江口之间，仿佛一把尖刀插在人的腹部，成为根据地向东向南发展的重大障碍，同时又可能成为敌人今后围攻根据地的前进出发点，可直插根据地巴中、南江等心腹地带，危及根据地中心安全。

杨森，是四川军阀中的著名人物。他于1909年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后，开始从事军事活动，在军阀混战中曾几起几落，到1933年春掌握有第二十军约32 000人的部队，在四川8名割据军阀中排名第五。杨森为人狡猾，极善投机取巧，见风使舵，惯弄两面派手段。红军人川时曾致信于杨森，希望他持中立态度，不要进犯红军，但他置之不理，派兵参加三路围攻，为田颂尧打气壮胆。当红军粉碎三路围攻后，他坐卧不宁，生怕红军的铁拳砸

^{①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上），第497、500页。

到他头上，于是一面派出代表夏炯与红军谈判，要求“互不侵犯”，并送给红军军用地图和一部分药品，表示“和”意；一面则在其军内和防区内加紧防共、清共，在各地设立“清共委员会”，强化保甲长组织，捕杀共产党嫌疑分子，口号是“宁枉杀一百，不走漏一个”。此时，杨森眼见红军即将进入他的防区，赶忙派人去江口与红军联系，提出与红军互相支援、互不侵犯，力图保住自己的地盘。由于双方所提条件悬殊太大，没有达成协议。红四方面军总部从全局着眼，一致作出了打击杨森的决定。

杨森第二十军辖6个混成旅，每旅3个团，中有宪兵团、手枪团和团务精练司令部的两个团。兵力从巴中县属的玉山场、鼎山场配属起，由北而南梯次配置。以李朝信第二混成旅驻守玉山场、鼎山场及仪陇东北的立山场一线；杨汉忠第一混成旅部署在渠县城及其以北佛楼寺一线，保障李朝信右翼安全；罗润德第六混成旅部署于蓬安东北之徐家场、云雾山等地，保障李朝信左翼安全；精练司令向廷瑞部从广安花桥调至营山，策应李朝信部；另有杨汉域第三混成旅驻守南充；夏炯第一混成旅驻守岳池；高德周第四混成旅驻守广安，充当预备队。徐向前决定采取中央突破、两翼迂回的战法，首先消灭突出于北端的第二混成旅，进而乘胜向纵深发展，相机歼灭营山、渠县之敌。具体部署是：以驻守巴中地区的红三十军主力，担任正面突击任务；红九军主力由仪陇地区向东，红四军十一师由巴中东南向西，实施两侧夹击；红三十一军监视广元、陕南方向之敌；红四军一部监视川东刘存厚部；同时组织地方武装在嘉陵江东岸频繁活动，给田颂尧摆出向西进攻态势，迷惑田部，保证主攻部队右侧后安全。

9月22日夜，徐向前下达了总攻击令。此时正逢天下大雨，敌人意想不到红军会在这样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出击，毫无思想准备。红九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在刘理运团长率领下冒雨出发，穿过荒僻的山径小路，秘密插入玉山场、鼎山场侧后。23日拂晓，攻占

了险要阵地龙背场，歼敌1个营。许世友带领红七十四、七十五两团攻占马鞍场，将当地地主武装千余人大部歼灭。同时，红三十军由正面发起攻击，逼近玉山场，红四军第十一师以两翼迂回的动作，将敌1个团压缩包围于鼎山场。玉山场之敌，在红三十军的强大压力下，向南溃逃，红九军和红三十军随即冒着大雨猛追。24日，红九军和红三十军一部进抵营山北60余里的马深溪，将凭险顽抗的第二混成旅残部全部击溃。红四军十一师也将鼎山场之敌击破，俘敌数百人，缴枪300余支。此时，方面军总部鉴于敌整个阵势混乱，徐向前命令红三十军向东南纵深发展，红四军十一师跟进配合，直接进攻渠县；红九军则攻击营山，以突破敌之第二道防线，相机歼敌。

杨森突然遭此打击，有点手足无措。连电刘湘告急求援，同时急调驻守南充的第三混成旅增援蓬安，第五混成旅两个团增援营山，企图据险堵击红军。29日夜，红三十军主力派出突击队，攀登悬崖绝壁，迂回到敌后，于30日拂晓前突然向佛楼寺守敌发起猛烈攻击，占领了佛楼寺、杨家寨，敌人纷纷溃逃。红三十军一路追歼，打得敌人狼奔豕突，陈尸遍野。敌十四团团团长程栋梁被击毙，第二团团团长雍受康被活捉。红军全歼敌人两团人马。30日，红四军十一师攻占佛楼寺东边的石桥河。红三十军于佛楼寺战斗后，接受总部命令，挥戈西进，迂回营山，协同红九军作战；红四军十一师亦由石桥河南下，逼进渠县近郊。10月3日，红九军、三十军各一部向大庙场、新店子一线敌军发起猛攻。红九军七十三团在大雨滂沱之中，英勇冲入敌阵，与敌展开肉搏，连破7道工事，打乱了敌人的阵线。该线守敌和来援之第三、第五混成旅，在红军猛烈打击下，被歼2000余人，余敌逃向嘉陵江西岸。当晚，红九军攻克营山，6日，继占蓬安对岸嘉陵江边上之周口。当地反动地主组织的会门武装，也在红军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之下，纷纷瓦解。至此，营渠战役胜利结束。

杨森遭此重创，极度恐慌，准备放弃渠县、广安、岳池，退守南充、蓬安。刘湘鉴于杨森如全部退守嘉陵江西岸，他自己的防区将受到直接威胁，于是急调第三师王陵基部两个旅进至渠县东北之三江镇，调第四师范绍增部集中在大竹，另以一部由合川趋武胜，准备配合杨森在营山地区组织反攻。但这时红军已集结主力向东发展，敌之计划遂被打乱。

宣达战役。汉宣、达县是刘存厚的防区。刘存厚是个贪婪而又昏庸、顽固的老军阀。红军入川后，曾几次给他写信，要他严守中立，他都不予理睬。不仅如此，他还趁红军收紧阵地的机会派兵抢占竹峪关，配合田颂尧妄想置红军于死地。刘存厚的昏庸、顽固，甚至敌人方面也对其颇有微词：“大家知道四川抵得一个群雄并峙的欧洲的缩影，刘存厚治下的绥、宣两县的氛围，在这个欧洲的四川国中却又显得格外异样。这位老将军在名义上虽是早接受了国民政府委给他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三军军长的头衔，但是在脑海中依然憧憬着‘吴玉帅’统治时代的他，所用的国徽依然是‘五色’的，不是‘青天白日’的。他在题赠绥属联合中学的匾额上煌煌然题着勋一位，一等文虎章，一等宝光嘉禾章，‘崇威上将军’的荣衔。不但在形式上，就是在精神上他也完全继承北洋军阀时代的典章文物的。”^①这位吴佩孚的“崇威上将军”，升官有道，治军无能，在军阀混战中屡遭败北，最后不得不退居川东北的万源、城口、宣汉、绥定（今达县）一带，苟延残喘。但这位“将军”的第二十三军仍有两个师、一个路和两个独立旅，连同特种兵在内，共约15个团，近2万人。

战前，红四方面军总部在通江得胜山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宣达战役的作战方针和部署。徐向前在会上提出宣达战役的作战方针是集中兵力，中央突破，直捣敌后方，并在两翼实行辅助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卷），第304页。

进攻。为了麻痹敌人，迷惑敌人，保持战役发起的突然性，他还提出以红三十一军一部、红九军和三十军各一部向嘉陵江沿线之广元、苍溪、蓬安等地，积极佯动，虚张声势，造成红军西进的态势，而以主力攻击部队 10 余个团，绝对保持隐蔽，秘密向东线集结。

红军各部队开始行动后，刘存厚真以为红军在西线攻打田颂尧和杨森，悠闲自得，没多少戒意。10 月 16 日夜，红军各路集结完毕，待命出发。17 日拂晓前，方面军总部下达总攻击令。

在中路，红三十军二六八团，通过陡峭的山路，攀越 5 丈多高的绝壁，一举袭占土地堡附近之要隘烟灯寨，歼敌一个营，打开了缺口。其他部队陆续跟进。当天即攻下土地堡、凤凰观，歼敌第六团。接着红九军投入战斗，当天下午占领邱家堡、马渡关，击溃守敌第五团。刘存厚的一字长蛇阵，被红军拦腰切下来一段，其中段防线即刻瓦解。敌第一师残余部分，像大水冲了蚂蚁窝一样，乱糟糟地向宣汉、达县逃去。红三十军 4 个团和红九军二十五师 3 个团，沿着通向宣汉、达县的大道，长驱直入，猛烈追击，一口气追了 100 多里。18 日，红二十五师占领了通往宣汉路上的隘口场、双河场。19 日下午，红二十师一举攻下宣汉城北要点板凳垭和尖子山，俘虏大批敌人，城内守敌弃城东逃，宣汉遂告解放。红三十军在陈昌浩带领下亦先后占领达县以北的双庙场、蒲家场、罗江口，控制了宣汉至达县的大道。刘存厚在达县企图依托城北凤凰山险要地形和坚固工事拒守。红三十军于 19 日攻击凤凰山未克，军政委李先念遂率一部兵力于 20 日夜，绕过凤凰山沿宣（汉）达（县）大路直袭达县县城，一举攻进县城东门，乘敌惊慌失措之际，迅速将守敌一个团大部歼灭。刘存厚仓皇逃跑。达县遂告解放。凤凰山守敌见县城已失，乱作一团，红三十军乘机攻占该地，俘敌团长以下 500 余人，残敌突围西窜。这时，右路红四军两个团已于 18 日渡过巴河进至达县以西地区，当即与红三

十军追击部队协同，将凤凰山逃敌全歼。

徐向前后来回忆：这一仗，本可活捉刘存厚，可惜被他逃脱。原来，刘存厚在宣达战役开始时，以为红军主力仍在嘉陵江沿岸；当土地堡、马渡关等地被占时，并以为是川东游击军“骚扰”；而在红三十军攻击凤凰山工事受阻时，并没有引起刘存厚警觉，反而认为“凤凰山的阵地，共军几条汉阳造是攻不破的”。因而漫不经心地在他的公馆里饮酒扶乩，来占卜军事胜负。据说，这天刘存厚扶乩请下来的仙人是关云长，这不禁使他有点沮丧。平时刘存厚对关羽是敬而远之，认为关公走麦城，终归是个输家，是个不祥的神仙。然而，刘存厚并不死心，看着乩笔在沙盘上盘旋着，心里默默地祈祷。当乩笔不再动时，居然是“吉人天相”4个大字，刘存厚一阵轻松，很舒适地躺在藤躺椅上养神。当他的副官张皇失措地向花厅奔来时，刘存厚大为震怒。在他正要大发雷霆、还没咆哮出口，却听到他的副官迸出一句话：共军已进了府城！刘存厚差点没吓背过气去。在极为惊慌与恐惧中，刘存厚带着他的贴身马弁和卫队以及他的家眷细软，从城南冲出珠市街，渡过渠河由草街子仓皇奔逃。当时，正是红三十军一部在陈昌浩、李先念率领下攻入城东门与敌展开激战之际。没有活捉刘存厚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当中路红军向宣汉、达县开始进攻时，左路的红四军3个团另1个营，向敌防线北段的镇龙观、石窝场、草坝场等发起进攻。17日，红十师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在军政委周纯全率领下向镇龙观发起攻击，歼其守敌一个团之一部，余敌向南溃退，红军遂占镇龙观，后向石窝场逼进。与此同时，红四军军长王宏坤带领红十师三十团和红十二师三十六团出竹峪关，渡河从丝罗坝西进余家坪以东，占据该地一线大山。“余家坪驻刘存厚第二师一个旅，另有保安团四五百人。该旅为刘存厚的‘王牌’，是刘部比较有战斗力的部队。”王宏坤将军后来回忆说：“站在余家坪对面山头，我

仔细看了敌人阵地，心想在这里攻击不利，不能在这里磨。不如以一部向东南行动，经敌侧后长坝场，一来抢占万源，二来控制沿途要点，断敌退路。我当机立断，以三十团就地监视并以三十六团重机枪连附该团，而将三十六团以三营在前，二营跟进，一营在后，向东南行动。”“三营二营相继出发后，我们带一营和司令警卫排从后跟进，进到五龙台下，计划在这里宿营，到晚12点，我和副军长刘士模在一起抽烟闲聊，突然脑子一亮，十师从镇龙关到石窝场隔断了敌人西南面和南面的退路，怎么敌人没有动静？我们这里是不是有路通余家坪？敌人很可能从西向东绕道再向达县逃。脑子这样一转，连忙派出一营向西北伸出警戒巡逻。”“凌晨3点，一营伸到西北面堰口，那里是高山边一条小路，往西面一看，即见敌人已经从堰口冲上来了，并占领了南面一个小山头。一营即向敌占山头攻击，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听到枪声，我们当即留下一个排控制我们所处的西南堰口，命令敌若南窜，坚决阻击。”^①王宏坤和刘士模迅速赶往前线，并派出传令兵向东追回二营，不久，驻余家坪的敌人已全部来到这个地区，为了夺路而逃，敌人发起疯狂反扑，红军一次又一次将敌击退。战斗中红十二师副师长兼三十六团团团长刘善德负重伤牺牲。天亮时，红军向后撤到五龙台寨子上固守。在五龙台红军阻击敌人的时候，红军其他部队也迂回到这里，向敌发起反攻。敌旅长吴占荣没有料到红军会反攻，山洼里、树丛边一堆堆正在吞云吐雾的‘双枪兵’，根本抵挡不住红军的进攻，丢下大片尸体，向西南溃退，乘机占据一个山寨。红军立即将山寨包围。在红军的军事、政治攻势之下，敌旅长吴占荣率3个团的官兵大开寨门向红军投降。第二天召开大会，军政委周纯全讲了话，宣传红军优待俘虏政策，当场将2000余名俘虏释放，在川军中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五龙台

^① 王宏坤：《我的红军生涯》，第199～200页。

一仗，我军全歼敌1个旅及保安团一部，缴枪3 000余支。三十六团立了大功，特别是在军事压力下加强政治攻势，迫敌旅长以下2 000余人放下武器投降，在川陕革命根据地还是绝无仅有的事，具有典型的意义。”^①

在五龙台战斗的同时，红十二师政委徐长勋率红三十五团从竹峪关以东向万源方向运动。万源守敌第三路廖震等部5个团，见红军攻势猛烈，不敢应战，乃弃城南逃。红三十五团乘势进占万源城。接着红十师三十团也抵达万源，于是红军以一部留万源工作，另一部继续东进，直抵城口县境。

宣达战役开始时，活动在宣达地区的川东游击军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积极展开活动，用战斗的胜利作为同主力红军会师的献礼。

在宣达战役过程中，川东游击军积极配合红军夹击刘存厚。当敌第三路廖震部撤离万源南逃时，川东游击军即在黄金口、峰尘场、清溪场一带四处截击敌人。24日，敌廖震部与来自宣汉的逃敌魏邦文部会合，退守南坝场、圣灯寺一带。川东游击军在广大群众的配合下，不断骚扰和袭击敌人，将敌8个团包围于南坝场达一星期之久，因敌人在兵力、装备上占绝对优势，无法予以歼灭，遂派代表到宣汉向红四方面军总部求援。据魏传统回忆：“10月21日，王维舟同志率领川东游击军总指挥部及3个支队进驻下八庙地区。……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迅速解放南坝场，王维舟同志亲自给张国焘、徐向前同志写信，派龚堪念同志代表川东军委去宣汉接头。这封信，介绍了南坝场敌我对峙的情况，请求主力红军给予支援。由于张国焘怀疑心重，没有接见龚堪念同志。”“10月23日，王维舟第二次亲笔写信给张国焘、徐向前同志，派王波等同志前往宣汉求援。在宣汉西门里冉家花园红四方面军

^① 王宏坤：《我的红军生涯》，第202页。

总部，徐向前同志亲切接见了王波同志，看了王维舟同志的信，听取了王波同志的简要汇报。”^①徐总当即令许世友副军长率红七十三、二十八两团，前去应援，配合游击军作战。许世友率领两个团的红军战士们在无数群众的热烈欢迎中，来到了南坝场附近的下八庙镇。当时“中共川东军委书记、川东游击军总指挥王维舟同志率部迎接。王波同志给我们作了介绍。我看着这个又高又瘦，像个乡村教师的中年人，简直不相信他就是在川东地区赫赫有名的王维舟。”^②许世友感慨万分地说：“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了，真是相见恨晚呀！”“惭愧，惭愧！有你们主力撑腰，往后我们的日子就好过喽。”王维舟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腔高兴地回答，充满对总部的感激和战友之情。

在川东游击军总指挥部里，许世友和王维舟一起研究敌情，确定了战斗方案。当晚，红军和游击军在当地群众配合下，分3路向南坝场之敌发起攻击。激战一夜，将敌8个团全部击溃，俘敌500余名。至此，宣达战役胜利结束。“宣达战役，战果辉煌，把刘存厚的‘绥定王国’端了个底朝天。经11天战斗，我解放宣汉、达县、万源3座县城。根据地向东扩展200余里，与川东游击区连成了一片。敌川陕边防军6个团全部或大部就歼，我毙敌千余，生俘敌旅长以下3000余人，缴枪8000余支，子弹500余万发，银元百余万元，棉布20万匹，棉衣两万余套，还有兵工厂、被服厂、造纸厂、印刷厂及库存的大批粮食物资。这是我军入川以来的一次特大丰收，运输都成了问题。”^③刘存厚多年经营的绥定防区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变成川陕苏区的一部分，使四川军阀极为不安，引起敌人内部对刘存厚的不满，说：刘存厚把积存下来的枪支、子

① 魏传统：《从川东游击军到红三十三军》，《艰苦的历程》上，第422页。

② 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第253~254页。

③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35页。

弹、现洋、兵工厂、造币厂的全副机器、材料“轻轻巧巧地送给赤匪了！”^①还说应把这个“瘟牛”“明正典刑，并且没收他的财产，以谢绥宣人民。”^②

宣达战役胜利结束后，11月2日，在宣汉县城西门外大操场举行有4万余人参加的军民庆祝大会。宣汉城内外红旗飘扬，张灯结彩，人们手里拿着写有口号的红绿小旗，喜气洋洋，如同过节一般。王维舟主持大会。陈昌浩代表红四方面军总部在大会上郑重宣布：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红四方面军任命川东游击军总指挥王维舟为军长，梁达中心县委书记杨克明为政治委员。红三十三军下辖3个师：以绥定方面的游击队编为九十七师，蒋群麟任师长；以宣汉城郊及西北区的游击队编为九十八师，冉南轩任师长；以南坝场方面的游击队编为九十九师，罗南辉任师长（不久，罗南辉调任副军长，王波接任九十九师师长）。全军1万余人。

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战役，历时两个半月。红军先后歼敌近两万，缴获长短枪1.2万余支及大量军用物资，沉重打击了敌人，极大鼓舞了群众。新区老区群众，纷纷参加红军，红四方面军发展为5个军，8万余人。川陕根据地扩展到东起城口近郊，西抵嘉陵江沿岸，南起营山、达县，北至陕南镇巴、宁羌的广大区域内，总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余万。控制了通江、南江、巴中、仪陇、营山、宣汉、达县、万源8座县城，先后建立了23个县市的革命政权。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对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赞扬川陕苏区说：“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

^{① 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四卷），第305页。

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这使蒋介石与四川军阀都不得不在红四方面军伟大的胜利面前发抖起来。”^①

三 万源大决战

1933年9月，四川军阀之间的混战以刘文辉的失败暂告停顿。9月10日，蒋介石致电刘湘，要刘湘“大举进剿”红军，“并限命三个月务将赤匪肃清。所需弹药，已令军政部拨发步枪弹二百万粒，交由刘湘运川分配剿匪各军运用。”^②9月12日，刘湘在成都召集四川各军阀将领会议，商筹“剿匪”规划。正当刘湘等各路“诸侯”商讨所谓“剿赤”计划时，红四方面军发起的三次进攻战役接二连三大获全胜。红军的进攻势头如此之猛，使四川各路军阀不得不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考虑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红军。

10月4日，刘湘宣誓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职。《民国川事纪要》记载：“……除何成俊代表蒋总司令莅临监誓外，邓锡侯、杨森、田頌尧、李其相、罗泽洲及各军将领之在省者，均一律参加。各商号悬旗，学校放假，极形热闹。刘对人表示，已抱有匪无我之决心，并望诸将领共存此心，以便彻底肃清。又何成俊乘各将领在蓉之便，召开剿匪会议，今已举行，结果甚圆满，剿匪军队，前定六万，现决增至十万。邓、田、杨等表示，愿与刘共

^①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23日）。

^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卷），第282页。

抱有匪无我之决心。”^①同日，刘湘发表就职通电，通电中说：“今幸内争敉平，各军咸归，一致剿赤，筹备亦已略备端倪，谨拜新命，克日前驱，誓扫赤氛，用奠邦国。所冀海内贤豪，时颁策训，全川袍泽，共赴事功。今众志成城，期一努而永逸，庶免陨越，早奏清夷，障洪水之横流，纾中央之廛系。此湘个人所企望，当亦薄海所同情。”^②

刘湘在成都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职后，10月6日，将其总司令部设在成都。把四川各军阀部队编为六路，分布于川陕根据地东、南、西周边地区，准备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发动对红军的进攻。

据徐向前后来回忆：“1933年秋末，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在蒋介石的大力支持下，纠集各路军阀势力，向我根据地发起了六路围攻。我们遂由外线作战，转入内线防御。敌人先后投入的兵力达140个团，不下25万人。”“反六路围攻，是我们在四川打得最艰苦的一个战役。在红四方面军的历史上，也可以说是战役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战果辉煌的一个战役。”^③

然而，有趣的是如此一场大战役，竟是在红四方面军尚不知晓的情况下拉开序幕的。红四方面军的第三次进攻战役尚未完全结束，刘湘已开始发动对红军的围攻。1933年10月底，徐向前总指挥正带领着红四军十师等部向南追击从万源弃城而逃的刘存厚军廖震部，准备乘胜进占开县、开江两地。但是，红军到了开县以西的杨柳关地区，却同刘湘第二十一军即六路围攻红军的第五路第三师王陵基部遭遇。徐向前回忆：“那天晚上，我们的宿营地和敌人的宿营地挨着不远，互相都不知道。我派一个通讯员给部队送信去，他摸错了路，跑进敌人营地的伙房里去了。要了碗水

^{①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卷），第377、282页。

^③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41页。

喝，抬头一看，人家的帽子不对，就赶紧往外跑。敌人发现后，乱打了一阵枪，没伤着他。他回来报告情况，我们才知道敌人就在跟前。既然与敌遭遇，那就狠打一家伙吧！”^①孰不知，这一遭遇战成了反六路围攻的第一战！

王陵基第三师是刘湘的主力部队之一，武器装备好，实力较强，战斗力也不弱，又有飞机、大炮掩护，未受过红军打击，加之又刚在军阀混战中获胜，气焰甚为嚣张。红军方面虽经连续作战两个多月，部队有些疲劳，但因连战皆胜，士气相当高昂。红军与敌一接触，立即展开了一场激战。从11月1日开始，红军先后在杨柳关、开江西北的天师观、回龙场等地与首先进攻红军的刘湘部第三师、第四师、独立第一旅和刘邦俊第六路第一师、第二师、独立旅展开激战。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只有8个团的红军部队与敌激战5天，虽取得歼敌5000余人的战绩，但未能击退敌人。敌人的后续部队却源源不断地增加。战斗的展开逐渐对红军不利，红军被迫转入防御。

刘湘自从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职务时起，即开始部署对红军的六路围攻。其具体部署为：第一路为第二十八军，由广元、昭化向木门、南江方向进攻，总指挥为该军军长邓锡侯，兵力共18个团；第二路为第二十九军，由阆中向巴中方向进攻，总指挥为该军军长田颂尧，兵力为24个团；第三路为新编第六师和第二十三师，由南充向仪陇、巴中东南的曾口场方向进攻，正副总指挥分别由两师师长李家钰和罗泽洲担任，兵力共15个团；第四路为第二十军，由蓬安向鼎山场、通江方向进攻，总指挥是该军军长杨森，兵力为12个团；第五路为刘湘第二十一军，由开江、开县向宣汉、达县方向进攻，总指挥为该军第三师师长王陵基，兵力为24个团；第六路为第二十三军、另有土匪王三春部6个团，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24页。

从开县、城口地区向万源方向进攻，总指挥为第二十三军军长刘存厚（11月6日，刘存厚被蒋介石撤职查办，由副军长刘邦俊继任总指挥），兵力共18个团。

总计敌人集中了110余团的兵力，约20万人，另有空军两队，18架飞机，在西起广元，东迄城口的千余里弧形线上，形成了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合围态势。刘湘预定的六路围攻红军的计划分为三期：第一期占领宣汉、达县、江口、营山、旺苍、木门、恩阳河、曾口场等地；第二期进占通江、南江、巴中；第三期会攻红军战略后方苦草坝。敌人妄图以分进合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法，将红四方面军围歼于川陕边境。

红四方面军在杨柳关、回龙场、永兴场一线与敌遭遇战之后，才知道刘湘的六路围攻开始了。面临着四川军阀联合进攻的严重形势，红四方面军总部一面命令前线部队抗击敌人，一面在通江开会研究对策。徐向前火速返回通江参加会议。会议认真分析了红军反六路围攻的不利条件和有利条件，并讨论决定了反六路围攻的作战方针。会议认为：敌人这次围攻对红军构成了比三路围攻严重得多的威胁，不仅纠集了庞大的兵力，而且在物资、经济上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并有蒋介石的大力支持。特别是红军的三次进攻战役，势如破竹，锐不可当，不仅打得田頌尧、杨森、刘存厚焦头烂额，溃不成军，而且造成了“赤化全川”的战略态势。红军西抵嘉陵江东岸，如跨江而进，可横扫嘉陵江流域，控制川西平原，直逼成都；东至万源、两开地区，进面可据下江东的万县、夔门，端掉刘湘老巢，扼住全川咽喉；沿长江面上，则涪陵、重庆亦岌岌可危。在这种形势之下，各路军阀如坐针毡，重庆、成都的豪绅巨商、达官贵人，纷纷转移资财，逃往武汉，全川为之震动。各路军阀多有“死无葬身之地”的危机感，因而，便有联合起来共同进攻红军的愿望，加之刘湘刚刚战胜刘文辉，气焰器

张，实力雄厚，各路军阀便公推其为首领，组织联军，摆出一副与红军决一死战的架势，在军事行动中有股蛮劲。红军虽然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新战士、新干部多，缺乏很好的训练，素质不高。这些预示着反六路围攻将是长期的艰苦斗争。这些是不利的条件。但反围攻的有利条件也是很多的，主要有：敌人营垒内部矛盾很多，步调不整齐。尽管各路“诸侯”出于对红军的恐惧，暂时形成了以刘湘为首的统一，实际上仍是貌合神离，各怀鬼胎。邓锡侯表面上赞成刘湘挂帅，说“末将听命，愿效驱策”，但并不满意刘湘将其压下来同李家钰、王陵基平起平坐。田颂尧对乘围攻之机可收复失地感到高兴，但考虑到以往损失太重，不愿再折老本，决定以保存实力为主，为应付刘湘，只派新收编的部队上第一线。李家钰、罗泽洲分别担任一个路的总、副指挥，虽对刘湘感激涕零，但又深惧红军声势，并没有将其主力部队派到前线，而是留在后方“整训”，至于罗、李两人之间因宿怨未消，所以难以做到命令统一，行动则更难一致。从根据地和红军自身来看，有利条件主要是：由于各次战役的胜利，红色政权遍布 20 余县。根据地中心区域已普遍分配土地，农业获得大丰收。新解放区也初步发动了群众，广大军民士气高昂，红军在人力、物力上得到不少补充，地方武装也有很大发展，特别是取得了与川军作战的经验。加之，红军与陕南第三十八军孙蔚如部继续保持互不侵犯协议，减轻了红军的后顾之忧，红军可以集中力量来对付川军。这些条件说明，只要采取正确的作战方针，粉碎敌人的围攻是可能的。针对敌人的六路围攻，徐向前认为，“办法有两条：一条是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和反三路围攻一样，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一条是广泛发动群众。党政军民总动员，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①会议鉴于敌人这次围攻的兵力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 345 页。

强大，为了避免不利条件下的决战，根据反三路围攻的经验，决定仍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求得在收紧阵地、节节抗击的过程中，大量消耗、疲惫敌人，创造反攻破敌的条件。^①在反围攻的具体兵力部署上，以敌主攻兵力、刘湘的精锐部队所在的东线为主要方向，集中红四军全部、红九军和红三十军各两个师、红三十三军全部 20 余团，布于万源至宣汉、达县的东线地区，由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亲自指挥，对付敌第五、第六两路；西线为牵制方向，以红三十一军主力、红三十军九十师、红九军二十七师等十余团，配置于北起广元沿嘉陵江以东至营山、渠县以北地区，由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和红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统一指挥，分别钳制敌第一、二、三、四路；另以红三十一军二七八团和二七六团分置于通江县北境的碑坝和旺苍坝以北的三道河地区，监视陕南的敌军。

通江会议结束后，徐向前和王树声分别去东西两线，陈昌浩居中调度，张国焘则坐镇后方。川陕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万众一心，投入紧张而艰苦的反六路围攻斗争中。

为了发动根据地全体军民投入到反围攻的斗争中去，川陕苏区党组织做了大量的艰苦的工作。1933 年 12 月 11 日，川陕省委在巴中召开了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中心议题是：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党政军民全力投入反围攻斗争。会议指出：目前川陕赤区正处在异常紧张的环境当中，同刘湘的残酷战争已经开始，川陕苏区党目前唯一的紧急斗争任务，便是从组织上转变党的全部工作，深入群众，动员组织群众，扩大红军主力，参加革命战斗；组织大规模的游击战争，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以最大的决心，用一切力量来保卫川陕苏区。

1933 年 11 月 16 日，刘湘下令各路“剿匪”军总攻，并颁布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 268 页。

赏罚令及封锁“匪区”条件，宣称：“（一）凡参加剿赤部队，敢有不奉命令，临阵退缩，或放弃汛地，遗失辐重者，决予以从严处罚，连坐其直属长官。其情节重大者，并呈请中央核办。（二）剿赤部队如有不守军纪，骚扰地方，加害民众者，一经查实，定予严惩不贷。（三）参加剿匪部队，如确因努力杀敌，彻底奋斗而受损失者，本总司令绝对负责，尽量补充。同时昭告全蜀，呈报中央，用表勋勤，而垂不朽。对于伤亡官兵，亦决从优抚恤。以上三端，必信必行，为功为罪，问不容发。其各督飭所部，一体凜遵勿违，切切此令！”^①刘湘虽然下达了总攻击令，也颁布了赏罚令，然而对于各路拥兵自重的“诸侯”们并不起多大作用。第一路总指挥邓锡侯认为：摆开六路是做个挨打的样子，一旦打起来就很难说了，并不积极出兵；第二路的田颂尧则决定把自己当面防线守稳，让其他军去打，行动上采取慎重应付的方针；第三路李家钰、罗泽洲部亦有保存实力的打算，不敢全部前去进攻红军，而是利用当地土匪和“红灯教”组织的“神兵队”在部队先头和侧翼活动；第五、六两路在开江、开线一带与红军激战，遭到红军严重打击后，正与红军对峙于南坝场、宣汉、达县一线。

面对各路军阀的这种态度，刘湘乃至蒋介石只能连电催促各路“诸侯”从速行动，但效果欠佳。各路军阀在刘湘、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之下，依旧左顾右盼，不紧不忙地像乌龟似的爬行。只有第四路杨森部急于收复失地，想在西线夺取头功，于11月下旬命其第三、第五、第六混成旅分别由营山境内花桥、渠县、周口向营山发动攻势，在进攻中，均先后遭到红军部队的有力打击。红九军在给敌以打击之后，主动撤出县城，而杨森的部队在红军的打击之下，成了惊弓之鸟，面对营山一座空城，硬是不敢进。当时发生的一件事被人们广为传笑：“有天晚上野狗从警戒线的草中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卷）》，第378页。

经过，发生音响，哨兵惊问‘是谁’，不答，打了几枪，引起全线慌乱，打了一夜枪，次日才查明究竟。”^①后来敌杨汉域（第三混成旅旅长）派其“弁兵”唐时信等化装入城，探知营山城内红军早已撤走，才于23日进入营山。杨森在进占营山后，一面谎报战况请奖，一面把军部移到营山，作出固守的样子。杨军占据营山后继续北犯，当进至凤凰寨时，防守在这个地区的红九军于26日运用“后进包围”战术，集中兵力反击，将敌第三混成旅全部击溃，一举袭占凤凰寨，将敌迫退于营山城下，歼敌约两个团。当时，杨森部屡遭红军痛击，各旅多已残破，军心极为涣散。该部第一混成旅旅长夏炯、第三混成旅旅长杨汉域等目睹该部状况，深知士无斗志，如再与红军作战，不啻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如向后撤，恐怕蒋介石、刘湘借机加罪，受到严惩，兼并部队。杨森亦清楚自己的处境，既不敢前进，又不敢后退，在无可奈何之中，不得不决定长期与红军对峙。夏炯随即秘密向杨森献策：为保存实力，最好派人与红军秘密联系，要求“双方不打”。这样不仅可保全实力，暂时苟安，而且可让红军集中兵力专打刘湘的嫡系部队，一可借此削弱刘湘，又可发泄对刘湘的私愤。夏炯的建议经杨森同意后，夏炯即派其旅部的副官长王一鄂化装潜往通江，会见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陈昌浩等，达成了“双方都不进攻”的协议。陈昌浩总政委派出徐秘书到夏炯部负责联络。在此后数月内，红军同杨森之间形势趋缓，双方少有接触。杨森的这种做法，充分表现了四川军阀内部矛盾的尖锐性，也使红军腾出了更多的力量反击最主要的敌人。

1933年12月上旬，敌邓锡侯第一路，李家钰、罗泽洲第三路，加上已先期行动的田頌尧第二路，杨森第四路和王陵基第五路，刘邦俊第六路，总算是全部出动。红四方面军在东起南坝场，北到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卷），第176页

广元附近，与敌全线接触。12月中旬，敌第一期进攻开始，其目的是侵占宣汉、达县、仪陇三城和旺苍坝。

12月15日凌晨，敌第五路和第六路，利用浓雾掩护，强渡州河、前河。东线敌人以第五路为主，辅以第六路，兵分左右两兵团，向红军展开多路进攻。红四军一部在宣汉城东三河场，红九军主力在宣汉城西曾家山，分别乘敌半渡之际，给其右路第二十三军廖震第一师和第二十一军王陵基第三师以大量杀伤，共歼其3000余人；红三十军主力也在达县城东南雷音铺等地，给敌左路第二十一军范绍增第四师以大量杀伤。据当时的红九军副军长兼红二十五师师长许世友回忆：“我们二十五师在宣汉及其西南地区，凭借州河之险阻击敌人。……我们以宣汉西南的曾家山为主要阵地，沿河西岸构筑了数道防御工事，有重点地配置兵力兵器，以多层火网严密封锁了河面及其东岸。”“一天早晨，我在师指挥所附近的山坡上散步，忽然听到嗡嗡的飞机声，抬头望去，几架敌机正向我军阵地飞来。敌人的飞机来得这么早，是往日少见的，这预示着有新的战斗行动。我跑步回到指挥所告诉作战参谋：‘通知部队，迅速做好准备，敌人要渡河了。’接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就开始了对我军阵地的猛烈轰炸”。“我在指挥所里，静静地观察着敌人的动向。不一会儿，敌人在曾家山东南的东林河渡口附近开始渡河。有的乘船，有的坐筏，有的徒涉，成群的敌兵在其指挥官的威逼下，下饺子似的跳入齐腰深的河水中，边打枪边向西岸冲来。”“敌人刚到河心，我把拳头猛地一挥：‘打！’嘹亮的军号声骤然而起，各种火器一齐开火，密集的枪炮弹暴风雨般地倾泻在河面上，平静的州河顿时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乱成一团的敌人在河中绝望地挣扎着：死伤的，在河水中沉浮；幸存的，狼狈地逃向对岸。清澈、冰凉的州河水，对王陵基之流似乎也特别

无情，一下子就吞掉了他的一两千士兵。”^①在这次战斗中，红八十八师师长汪烈山不幸壮烈牺牲。与此同时，红四军十师、十二师主力在宣汉城东的三河场，乘敌人半渡之际也给敌廖震师以重大杀伤。

因敌人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攻势相当凶猛，红军未能阻止敌人进攻。经两天激战，歼敌一部后，红军遂于17日主动放弃宣汉，18日放弃达县两城，收紧阵地至东起庙坝，西经井溪场、东升场、双河场、碑牌河迄北山场一线。在转移中，红军于宣汉城西北的万鼓楼和东北的拱桥河等地又杀伤不少敌人，并击落敌机一架。

红军东线部队到达新阵地后，以主要兵力在主要阵地上作纵深梯次配置，依山凭险构成集团工事和多道堑壕，设置大量鹿砦等障碍物，以便有力地阻击和消耗敌人。在次要阵地上，则以少数兵力结合游击队和赤卫军防守，并于密林要隘遍树红旗、广布疑阵，迷惑敌人。当敌以整师、整旅兵力，在猛烈炮火和飞机掩护下实施多路反复攻击时，红军开始仅以少数部队顽强阻止，予以迟滞和消耗，待其攻到主阵地前即突然开火，充分发挥手榴弹的威力，予以大量杀伤，然后以有力部队乘敌气竭力衰举行阵前反击，以白刃格斗消灭突击上来的敌人。每到夜间，红军便在全线展开袭扰，不时派遣小分队越过敌人防线，袭敌哨所，捕捉敌军人员，弄得敌人风声鹤唳，整夜不安。这样，东线红军于12月下旬至1934年1月中旬又多次挫败敌人。红三十军在北山场、红四军在峰尘场、红九军在大城寨等地的战斗，都使敌人损失了大量兵员和装备。^②

在西线，红军在王树声指挥下，同样抗击了敌四路军阀的进

^① 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第262～263页。

^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270页。

攻，给敌以重大杀伤。红三十一军在广元县的元坝子、王家坝、快活岭和苍溪县的三川寺等地多次给敌邓锡侯第一路以有力打击，仅快活岭一战，即歼敌近千人；红三十军九十师在阆中县鸡山梁，击溃敌第二路田頌尧3个旅的进攻；红九军二十七师在仪陇城外围至佛楼寺一线，连挫敌第三、第四两路，不断致敌遭受损失。1934年元旦之夜，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决定乘此“佳节良宵”对进到仪陇城南五里墩等地之敌第三路罗泽洲部进行一次“犒劳”。王树声亲点精兵红三十一军二七一团和红九军二十七师，分别由金子山和仪陇城出发，从左、右两翼摸上五里墩的鹅项颈。深夜12时，红军进入指定地点。这时，王树声命令在金城寨燃起一堆篝火，作为进攻的信号。以夜袭为能事的红军战士，见到命令后，立即从鹅项颈向敌发起猛攻，拦腰斩断了五里墩。敌罗泽洲部3个团和李家钰部1个团等尚在梦中，突然遭到打击，慌乱应战，伤亡惨重，急忙向南突围。当地游击队、赤卫军也团团围过来助战。红军与敌激战一夜，敌人在红军的打击下溃退而逃，红军乘胜猛追20余里，先后毙伤敌团长以下400余人，俘敌100余人，缴枪200余支。在夜袭五里墩的同时，王树声还指挥其他红军部队在大寅坡、老木垭等地伏击、奇袭敌军，也获全胜。敌罗泽洲部遭此教训后，一蹶不振，再不敢轻举妄动了。西线红军在达到迟滞敌人、消耗敌人大量有生力量的目的后，于1月11日主动撤出仪陇城，转移到北起旺苍坝、南沿东河至千佛岩、尹家铺、鼎山场一线，与敌对峙。有趣的是，在红军退出仪陇城时，红军指战员们，又笑看了一场“两狗互咬抢骨头”的闹剧——

原来，敌第三路罗、李部于1934年1月5日开始会同第二路田頌尧军李炜如部向仪陇、巴中进攻，罗部居中、李炜如部居左、李家钰部居右。李炜如吃够了红军的苦头，观望不进，而罗泽洲为了邀功和多占防地，便电请“剿总”刘湘批准由他单独进攻仪陇。罗泽洲以其第二旅王之槐部向仪陇进攻。但李炜如在探知红

军将要撤离仪陇时，及早做好了一切“接收”仪陇的准备，等红军一走，便乘机抢先进了仪陇城，并很快委派了官吏，坐上了县大堂。为进攻仪陇城付出了代价的罗部王旅熊飞团进占仪陇城后的高山金城寨，还与红军掩护部队不断接触。此时，熊团长看到本该是他自己进占仪陇城，坐县大堂，委派官吏的，不想由于战事未停却被他人占了先。熊飞气得跳脚大骂，便在城后高山打枪，伪装红军反攻，向仪陇城大打出手。李炜如却当真认为是红军打来了，立即像惊弓之鸟，慌慌张张地率领众人携带县府大印、文信等弃城而逃。于是熊飞这才进入仪陇城，抢上了这块“干骨头”。

从1933年11月16日敌发动第一期总攻到1934年1月中旬的两个半月间，红军东西两线部队和地方武装，英勇抗击敌第一期进攻，共毙伤敌1.3万余人，有力地抑制了敌人的锐势。敌人以为期1个月完成的第一期总攻计划，未能实现。

红四方面军为进一步创造反攻的有利条件，诱敌深入，骄纵敌人，下令红军东线部队左翼阵地收缩至沿山场、罗大湾、罗文坝、固军坝一线，右翼阵地则继续坚守北山场、马渡关等山险要冲地带。1月20日，红军主动撤至新的防御阵地。这一着，果然造成起敌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的错觉，他竟认为：“赤匪势穷力竭，子弹告罄，势将窜走”，是“全线溃退”，要求刘湘“转饬各路猛进穷追，勿亦划界固守，使该匪无整顿补充余暇，不能再谋抵抗。”^① 随即命令其所属各部猛烈向前推进。红军在转移中也乘敌举师轻进之际，不断予以袭击、杀伤。王陵基急欲抢夺红军右翼阵地马渡关，因为这里地当要冲，地势十分险要，山高林密，路险涧深，是通向城口、万源的必经之地。由红军名将许世友率红九军一部在此防守，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指挥所即设在马渡关。

^① 《时事周报》1934年1月21日。

1月19日，敌第三师第八旅刘若弼（代理旅长）部进犯马渡关。敌人首先集中机、炮兵各一营向红军阵地猛烈射击，后以步兵多组攻至棱线，在马渡关沿山边工事前与红军展开肉搏。红军则以疾风暴雨之势向来敌反击，敌军后有督战队威逼，虽积尸枕藉亦不敢稍退，双方在棱线上悬崖边连续两天不断厮杀。最后，红军终将敌人完全赶杀下去，阵地屹然未动。王陵基闻讯后狂叫：“我不信共军是三头六臂，马渡关就打不下来！”于是，王陵基亲自率其手枪大队及独立团杨勤安部到前方督战。他把第八旅代旅长刘若弼找来，对刘说：“你如把马渡关拿下来，当旅长我负责不成问题，不然就以军法从事！”王陵基还在阵前许愿：先攻占马渡关的奖洋3000元。不少敌人士兵在威胁利诱之下，像疯了一样向红军阵地猛扑，但在红军的英勇抗击之下仍然攻不上红军阵地。马渡关激战4昼夜，红军共毙伤敌2000余人，达到作战目的。1月22日夜，徐向前命令红三十军夜摸团队二六五团出发，向敌人“摸去”。红二六五团在团长邹风鸣、政委黄英祥率领下，秘密而神速地插入敌人左翼后方十余里。红二六五团23日白天在隘口西北大罗坪一线，与敌人从早上6点打到下午3点，阵地上的山石粉碎、工事坍塌，战士们打得十分辛苦。黄昏时分，敌人暂时收了兵，在对面山上构筑工事，以防备红军晚上反击。入夜后，身体疲惫的战士们，听说又有战斗任务，立刻精神抖擞跟着邹团长、黄政委消失在茫茫夜色中。而在阵地上惊慌地等了半夜的敌人，没见红军出击，似乎感到意外，其旅长猜测说：“想必是共军白天伤亡太大，无力反击了。”因此，就安心睡觉了。午夜1点多钟，正当敌人熟睡的时候，红军在敌纵深10里处的庆云场，向敌第四师十二旅预备队1个团发起突袭，敌惊起抵抗，但未及展开，就大部被歼。该旅位于前沿与红军正面对峙的另两个团，还未搞清情况，即受到红军正面猛攻。红二六五团遂向敌背后袭来，敌腹背受击，部队无力应战，士兵东逃西窜，乱做一团。红二六五团的勇士们此时

大大发挥了他们的过硬本领，在混乱的敌群中到处是臂系白毛巾的“夜老虎”，到处是“老虎”们吹响的竹哨声（联络用），他们挥起大刀，挺起枪刺，东刺西砍，所向无敌。天未亮时，敌人的1个旅即全部瓦解。程世才将军回忆说：“战后，我在一个连队里检查，发现有百分之八十的战刀都染有敌人的血迹。许多战士的刺刀卷了，大刀弯了刃。夜战的激烈，红军战士的英勇，由此可知。”^①

2月上旬，敌第四师仍被阻于东岳庙、石龙场一线；中路第三师虽进至马渡关及以东花池山一线，也逡巡不前；而右路第二十一军警备第三路副司令郝耀庭部则进到胡家场以北30里的马鞍山地区，显得冒进突出。同时，敌军深入根据地后补给开始感到困难，在红军不断打击下士气趋于低落。但是敌之各路头目这时却陶醉于表面上的某些进展，麇集成都互祝“胜利”，并下令部队休整。此时，东线红军与敌呈暂时对峙状态。西线各路敌军，犹豫观望，徘徊不前，亦无多大进展。

春节将临，陶醉在“胜利”声中的敌军开始休整，忙着搜刮民脂民膏，网罗鸡鸭鱼肉，准备过节了。甚至连敌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也悄悄溜回万县，同家人团聚去了。王陵基私回万县的情报，被红军后方电台侦知后，通知了前线总指挥部。

徐向前得知王陵基溜回万县过节的消息，不由心中一阵高兴：这说明敌人各部此时军心涣散，戒备不严，连一路主帅都敢掉以轻心！连日来，徐向前指挥作战连吃饭和休息都顾不上，一直在考虑如何粉碎敌军的围攻，何时反攻，在哪里反攻最为有力。川陕根据地的兵力、人力、物力、财力毕竟是有限的，如旷日持久打下去，显然对红军不利；红军的作战方针应是积极防御而不是

^① 程世才：《“夜老虎”》，《星火燎原》选编之二，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第466页。

消极防御；逐步收紧阵地是为了消耗疲惫敌人，伺机转入反攻。只有实行反攻，才能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赢得大规模歼敌的胜利。这时期，徐向前的指挥部与红四军王宏坤军长的指挥所在同一个村子里。一天，王宏坤对徐向前说：“我军采取分兵把口不是办法，敌人气焰太嚣张，要集中力量打它一路。”

徐向前回答说：“是呀，我这几天也正想这个问题。要寻找战机消灭它一路就好多了。”他决定在前线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研究讨论反攻部署。大家一致认为反攻时机已到：“一是敌军经过两个多月的消耗，伤亡万余人，疲惫不堪，补给困难，被迫停止了全线进攻；二是敌右路之二十一军郝耀庭部冒进突出，与左、中两路拉大了距离，便于红军实行‘腰斩’，乘胜进击；三是敌东线预备队尚在宣汉、达县一带，与前线距离较远，中间有一段‘空白’地带；四是敌军各部正准备过春节，军心涣散。据电台侦听得知，王陵基已回万县过节。”^①徐向前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向东线敌军发起大规模反击，首先消灭冒进突击至马鞍山地区的郝耀庭部和中路第三师第七旅，得手后转入反攻。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集中红四军、九军、三十军各1个师于2月10日（农历腊月二十六）行动。

2月10日夜，红四军十师、红九军二十五师、红三十军八十八师3支精锐部队，分别向敌后秘密穿插，迂回马鞍山、毛坝场等地。红四军十师从罗文坝东侧南出毛坝场；红九军二十五师在徐向前、陈昌浩、何畏率领下向敌第三师师部胡家场进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向毛坝场以西迂回。徐向前令善于夜战的红二六五团为第一梯队，执行先头突破任务。红二六五团冒着小雨夹雪进军，战士们换上软底鞋，用绳子绑上马嘴，用棉花包住马蹄，人不作声，马不嘶鸣，悄悄地向敌纵深毛坝场以西漏米岩摸去。部

^① 《徐向前传》，第185～186页。

队到达漏米岩下时，山上的敌人尚不知不觉，部队立刻分成两路登山，突击组竖木梯、搭人梯攀上山崖陡壁，后面的部队拉着突击组掷下的绳索迅速爬上山崖。当战士们用手锯锯木栏栅的时候，敌哨兵才发觉，但已为时太晚，红军蜂拥而上，趁敌人兵力没有展开，不顾一切地向敌纵深猛插。经过一阵激战，消灭敌人两个多营。这时，红军第二梯队红二六三团、二六八团也赶到并投入战斗，在马鞍山东南歼敌预备队1个团。红四军十师此刻也穿插到毛坝场附近，红八十八师得手后也向毛坝场猛扑，这样红十师在东，八十八师在西，两面夹击毛坝场，直捣敌郝耀庭部司令部，击毙敌副司令郝耀庭，敌毛坝场全线陷于瘫痪，红军乘胜扩大战果，歼敌两个团。缴获的武器、弹药、物资不计其数，其中仅敌人准备春节的腊肉，就有3万多斤，还有大量的糖果、香烟等物品。与红四军、三十军行动的同时，徐向前和陈昌浩率红九军二十五师行动，迅速攻占了毛坝场以西的红岩，11日攻到敌第三师师部所在地胡家场的街口，歼敌一部，进面向马渡关敌第八旅逼近，12日占领池溪场，威胁马渡关敌右侧。至此红军收复了毛坝场、池溪场等要地，并对盘踞鸣鼓场之敌第三师第七旅形成围困态势。王陵基惊闻恶讯，立即命令其总预备队杨勤安独立团（杨团为特种编制，一团相当于一旅的实力）驰援。同时，“敌右翼第二十三军见郝耀庭部被歼，忙将主力移守灯笼坪附近阵地；敌第五路第一师第二旅、第二师第五旅即推进至傅家山、江华山，一面策应第七旅，一面巩固胡家场、毛坝场以南阵地，以掩护第五路总指挥部”。杨勤安独立团则进击“至红岩、佛耳岩一线，以固第七旅右翼。敌中路第三师也以位于马渡关以南在罗坪的第九旅向东延伸，巩固隘口附近的阵地，协同第二旅、第五旅和第二十三军两个旅拼命阻击红军前进。”^①红二十五师和八十八师分别在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272~273页。

池溪场、毛坝场地区向敌连攻两天，均未能获得成功，战斗转成相持。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停止进攻，转入防御。部队就地构筑工事，在马渡关、红灵台、毛坝场一线与敌对峙。

马鞍山战斗，是红四方面军以准备战机转入反攻为目的而实施的一次反击战。经过5天战斗，歼敌1个多旅，在宽约20余里的地段上向前推进30余里。由于夜袭成功，捕捉战机准确，突破点选择得当，取得重大战果，震撼了全线敌人。

新春佳节，正聚在成都过节的军阀头头们，在摆满酒菜的宴席上突接损兵折将的电报，犹如五雷轰顶，一个个呆若木鸡。正值喜庆之际，敌第五路遭到如此令人晦气的打击，军心混乱，怨声四起。刘湘在震惊之余，急令各部相互靠拢，阻止红军的进击，并将擅离职守、私自返回万县的王陵基，匆忙从前线召回成都，撤职查办，软禁起来。改任第一师师长唐式遵为第五路总指挥，许绍宗继王陵基任第三师师长。红军指战员则吃上了缴获来的鸡鸭鱼肉、罐头、食品，过了一个欢乐的春节。刘湘的第一期进攻，就这样在损兵折将的懊丧气氛中，仓皇收场了。

2月3日，刘湘在成都召集川军各路将领召开“剿匪”军事会议，会商第二期“剿匪”计划，四川各路“诸侯”邓锡侯、田頌尧、李家钰、罗泽洲、杨森等均出席。2月17日，刘湘颁发第二期“剿匪”作战计划。敌人企图在1个月内，将西线红军压至通江和巴中以北，木门以东地区；在东线，敌人企图占领万源，推进到石盘关至竹峪关以东之线，封锁川陕边界至镇巴门户，截断红军退往陕南的通道。

3月3日，刘湘下达第二期“剿匪”总攻令。3月4日，西线敌军首先出动。敌第一路邓锡侯部进攻旺苍坝；第二路田頌尧部进攻恩阳河；第三路李家钰、罗泽洲部进攻玉山场、鼎山场；第四路杨森部也撕毁了“双方互不进攻”协议，向巴中之兰草渡进

攻。西线之敌以四路大军齐头并进，攻势颇猛。防守西线的红军，在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指挥之下，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抵抗，使敌每前进一步都付出沉重的代价。红军在主要阵地上，依托着凭险构筑、遍设鹿砦等障碍物的坚固工事，奋力阻击、消耗敌人，在敌人发动集团冲锋时，红军仅以少量部队进行狙击，灭其锐气；待敌仰攻至主阵地前时，再亮出红军的一大“绝招”，甩手榴弹，大炸敌人；乘敌气竭力衰，再以另一“绝招”，白刃刺杀，消灭近前的敌人。红军在给敌以大量消耗后，从7日至19日，先后主动退出玉山场、鼎山场、旺苍坝、恩阳河、巴中城和木门，退至通江附近的杨柏河、得胜山一线，构筑工事进行防守。

东线之敌鉴于第一次全面进攻失利，损失惨重，乃改用重点进攻，企图集中优势兵力，突破一点，再全面推进。3月5日，敌第五路新任总指挥唐式遵赴双河场就职。3月12日，唐式遵先以其第五路第四师3个旅和独立旅，从北山场、青龙场向红三十军及红四军各一部固守的板庙、红灵台发起猛攻，企图从红四方面军东西线结合部打开一个缺口，插入根据地的腹心地带，但几次进攻都毫无进展。13日敌人再次发起进攻，又被击退。19日，红军利用夜袭战术，从红灵台四路楔入敌纵深，在李家山、卧牛山等地给敌第十旅周绍轩部、第十二旅孟浩然部以沉重打击，敌阵地动摇，敌第四师师长范绍增、副师长罗君彤获悉后，连忙夜驰前线督战，方使该师免于全线崩溃。天亮时，红军撤回原阵地。敌人见对红灵台的进攻不能得手，遂于3月22日集中第一、二、四、五、九旅5个旅的兵力改向红军东线中段防线毛鹰嘴、毛坪一线进攻。红三十军、九军、四军各一部恃险据守，以昼防夜攻，对付敌之昼攻夜防。经两天激战，歼敌2000人。红军阵地岿然不动。至此，敌人在这里的重点进攻又被挫败。

这时，陕南方面的敌十七路军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出兵配合刘湘的进攻，被红军堵了回去。所谓“互不侵犯”的默约，已被

对方破坏。恰在此时，红二军团转战到万县、奉节境内活动。刘湘认为：红军伤亡甚大，子弹缺乏，红军的核心部队（原鄂豫皖的老红军）业已分散配备到各部，向陕南发展的企图已被杨虎城部阻回。因此，红军向陕南发展的可能性很小，而集中主力突破下川东，进袭川鄂边境，与红二军团会合，另图发展的可能性极大。刘湘还认为：其“围剿”红军的第一、二、三、四路各路当面的红军不断收紧阵地是兵力减少的缘故，而第五、六路当面红军的进攻战斗，常有激战，则是兵力增加的表现。他误认为这是红军将以主力突破第五、六两路而下川东的意图。因面，刘湘特意命令唐式遵密切注意，并以其独立第二旅杨国桢部、第一师第二旅饶国华部、第二师第四旅王泽浚（后林毅）部、第五旅刘光瑜部、独立第四团（该团为特种编制，实力为一旅）佟毅部、第二十一军边防第一路（5个团）陈兰亭部等共20个团加入第五路，防堵红军南下，并积极准备发起第三期总攻。

3月26日，刘湘颁发第三期“剿匪”计划，妄图在东线完成夺取万源的原定计划，西线进占南江、通江，然后东西两线相向全围，消灭红军。4月3日，刘湘下达第三期总攻击令，限期会师通南，完成第三期“剿匪”计划。

红四方面军为进一步集中兵力，继续诱敌深入，再次收紧阵地。4月2日、3日、7日，西线红军主动退出江口、长池、南江，撤至贵民关、观光山、得胜山一线。在撤退过程中，红军分别在杀牛坪、梁炮台、甑子垭等地，给尾追之敌以很大打击。红军东线部队也于4月上旬开始相继撤至万源城南20余里的亮垭子，西经石人坝、河口场至镇龙关、刘坪一线。东线红军在收紧阵地过程中也给敌以重大打击。4月23日，敌第三师师长许绍宗，指挥该师全部及第二、第四、第五旅，连续向镇龙关、石窝场、高白寨一线猛烈进犯。红军经6天激战，将敌击溃，杀伤颇众。在镇龙关地区防守阵地的是红四军。镇龙关是通江的重要屏障，东西

群山连结，危岩耸立，绵亘数十里。敌人由南面入关，只有一条独路，红军凭此险隘，顽强阻敌进犯。指挥镇龙关战斗的是红四军军长王宏坤和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战前，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在王宏坤陪同下察看了地形，并把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调来做预备队。

王宏坤、李先念将红十一师3个团部署在镇龙关以南从东到西山头一线，要求各团根据各防守段的地理特点，据险筑工事，严控垭口，实行梯形布置，加强纵深，多留预备队。另以红八十八师作为总预备队。红九军二十五师也从麻石口附近转移到这一线，加强了红军预备队力量。王、李首长将其置于东北面。不久，敌人即开始进犯。敌首先集中了十多个团的兵力向红军东面的石窝场、高白寨一线阵地猛攻，红四军十师和十二师三十六团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与敌激战多日，歼敌2 000余，将敌击溃。接下来，敌人又集中十五六个团的兵力向镇龙关阵地发起攻击。敌人先用飞机炸、大炮轰，使红军的部分工事受到严重破坏，轰炸过后，便是敌人步兵的集团冲锋。这一天，敌人将攻击的重点放在东南面垭口的红三十二团阵地，红三十二团在前沿防御的指战员们坚决阻击，拼死命打退了敌人接二连三的集团冲锋。大量敌人陈尸阵前，战斗在最前沿的一排红军全部牺牲，敌人乘机占领前沿阵地。但在天黑前，红三十二团另两个营在预备队红九军一个营的配合下，夺回了前沿阵地。敌人在红三十二团阵地面前未得逞，又向红三十一、三十二团阵地发起攻击。敌人分两路向红三十一、三十二团扑过来，红三十一团经过一阵阻击给敌一定杀伤后主动放敌进入阵地前，这里山坡陡立，敌人大批涌来，不顾一切地朝山头爬，红军居高临下，待敌进入30米内，一齐猛烈开火，敌人成片地倒下，其余敌人见势不妙，向后急退，红三十一团乘势大举反攻，将敌击溃，俘虏数百人。同时红三十三团也坚决顶住敌人的进攻，使疲惫不堪的敌人在红军阵地前面一筹莫展，下午4时，

王宏坤、李先念下令总预备红八十八师出击。红八十八师从红三十二、三十三团结合部插下，一举击溃当面之敌，并以一部向东迂回，结果，在红军正面部队配合下，近两个团的敌人被歼灭。敌人见镇龙关久攻不下，而自己则死伤累累，即将部队扎在红军阵地对岸的山地上，筑起工事，与红军长期对峙。红军则采取分头“夜摸”的办法，不断深入敌阵袭击骚扰敌人。红军在镇龙关及附近地区近20天的防御中，敌人连续猛攻了五六十次，损失兵力8000多人，仅镇龙关战斗即被歼4000人，却始终未能前进一步。至此，敌人第三期总攻又告破产。

从1933年11月中旬到1934年4月底，敌人尽管连续发动了三期总攻，付出3.5万人以上的代价，依然未能达成其摧毁川陕革命根据地和消灭红军的狂妄计划。而随着围攻的旷日持久，其困难就日益增加，内部矛盾也有所发展。敌第一、二、三四路军阀都疑惧日深，唯恐一旦“剿赤”军事结束，刘湘便转过头来吞并他们。所以，当敌第五、六两路在绥、宣、城、万与红军激战时，西线各路都借口后勤供应困难，一再姗姗而行，实际是作壁上观。刘湘对此颇为忧虑，亟欲寻求对策以缓和其内部矛盾，完成“剿赤”计划。四川军阀之间的勾心斗角，也使在南京的蒋介石十分担心，为使四川各路军阀同心协力共同“剿赤”，他也颇费了一番心机。5月4日，蒋介石致电四川各路“诸侯”，力劝其同心“剿匪”，电文说：

成都刘总司令，广元邓总指挥，三江口李总指挥，阆中田总指挥，香檀场杨总指挥，宣汉唐总指挥，刘总指挥：（密）综合川中最近情报，匪我已到决战时期，故旬日以来，我军死伤颇大，如五路军镇龙关之役，一日伤亡几在2000以上。若不铲除私意，齐力共趋，则为匪所乘，恐有影响全局之虞。希各将领化除轶域，推诚相与，

务以竟戚共同之心，求动作一致之实，则烬陈残匪，自不难一鼓聚歼，迅奏半功矣，幸共勉之，至所企盼。中正支（四）日申印。^①

在蒋介石的劝说、企盼和刘湘的周旋之下，5月15日，四川“剿匪”总司令部在成都召开第三次“剿匪”会议。刘湘在会上答应拨出300万元军费和300万发子弹接济各路军阀，同时，为消除各路军阀的疑虑，刘湘又支使唐式遵出面，担保军事结束后各路都得到“安全保障”。这样做以后，刘湘还不放心各路“诸侯”都能听命于他，于是，在计穷力绌之余，居然想借助于“神灵”帮助他挽回败局，并控制各路“诸侯”。他在这次会上把“刘神仙”抬了出来，示意各路军阀公推其为四川“剿匪”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进驻南充指挥各军。

“‘神仙’名刘从云，是个野心勃勃、踌躇满志的会道门首领。从20年代起，他就在四川组织‘一贯先天大道’，结交权贵，网罗道徒，自称‘刘备转世’，妄图‘治国平天下’。后与刘湘深交，鼓吹‘以神治军’，‘一川不容二流（刘）’，积极为刘湘夺取四川的霸业，令其二十一军大小军官通通入道，拜‘神仙’为师。这次进攻我根据地，损兵折将，久战未下，刘湘眼见各路军阀灰心丧气，疑惧日增，便想出了借助‘神仙’号令全军的把戏。”^②刘湘其实是利用刘从云为工具，原因仅在于刘从云不但是刘湘的所谓“老师”，而且四川各路军阀也和刘湘一样，都先后拜在刘从云门下，称其为“老师”。此刻，既然“老师”出来指挥“剿匪”，各军阀“理所当然”要唯命是听了。其实，这仅仅是刘湘自己打的如意算盘。四川各路军阀名为“刘神仙”的学生，实际上并不把

^① 《时事周报》1934年5月13日，第6卷第2号。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55页。

刘从云看得很重，甚至刘湘的部下王陵基即从未把刘从云放在眼里，对于刘从云历来视为“刘妖”，曾对刘湘有“钧座（刘湘）之命，绝对服从；刘妖之言，誓死反对”^①的电报，表示对刘从云的轻蔑。杨森也对成都会议期间，刘湘率领各路“诸侯”向“刘神仙”顶礼膜拜，执弟子礼，大为不满，事后大发牢骚说：“我妈死了我都没有磕头，今天是我最大的耻辱，我是为我的几万人拜福。”四川的舆论界，对刘湘此举也没有予以多少支持，认为：“刘从云即世所称之刘神仙，一片神话，毫不知兵。识者预测剿匪前途，将遭受意外之挫折。”^②刘从云确实是说了一些“神话”。当他就任“剿匪”总司令部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后，刚到南充就借占卜问封、画符念咒之机，大大张扬了一番：“只需三十六天，我将三十六天罡遣齐之后，不费吹灰之力，共匪自然消除。”此番神话，连国民党也不相信，将其看作为一派胡言乱语。

成都“剿匪”会议制定了第四期进攻红军的计划。敌人企图集中力量夺取通江、万源，西线主力则自通江北部川陕边界向东横归，以达到最后消灭红军的目的是。为此，刘湘还调暂编第二师、教导师第二旅、模范师一个旅组成总预备军，以教导师师长潘文华任总指挥。这样，敌军参加围攻的总兵便达到了140余团，其中刘湘已投入其全部兵力的五分之四，计80余团10万余人。刘湘组织的所谓第四期总攻，拿出了他的大部分家当，已经到了孤注一掷的地步。整个5月份，敌人忙于整补部队，调整部署，前线没有大的冲突。红军部队也在进行积极休整，准备新的战斗。

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川陕根据地的范围日益缩小，面临的困难也越来越大。红四方面军总部、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卷），第380页。

^② 《民国川事纪要》（1934年4月3日）。

政府，在敌人忙于调整兵力部署的同时，也在根据地内进行大规模的准备反围攻的工作。一方面加紧部队的军事训练，补充战斗连队，另一方面深入进行政治动员。动员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突击扩大红军，加强地方武装，努力生产，厉行节约。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四方面军总部在经过研究之后，“决定从西线敌之左侧依托巴山进行反击，首先打击敌第一路邓锡侯部，成功后转入反攻，由北向南横扫西线敌军，尔后转进东线。”^①

为了迷惑敌人，打乱其战略部署，更好地集中兵力创造战机，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西线红军放弃通江以南得胜山一线阵地，接着，撤出通江县城，又派红三十三军二九七团在游击队配合下向东出击，击溃敌陈国枢部，攻占城口。这一系列的行动于6月21日完成。敌人果然认为红军将“由城口出巫溪、奉节，直冲云阳、万县”，与川鄂边境的红三军会师。于是，急忙重新调整部署，将第五路主力第一、二、三师及第六路廖震师由通江地区东移万源地区。新任敌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刘从云，到达前方后即指挥发起第四期总攻。其时正为红军主动撤出通江等地，“刘神仙”特为此大大吹嘘了一阵“占卜有灵”，狂妄发表所谓“三十六天内消灭赤匪”的宣言。6月22日，敌人第四期总攻一开始，刘从云便将总预备队全部投入战斗，以东线为重点，集中50余团向万源城南至通江城北一线红军阵地猛犯，妄图迅速攻占万源，围歼红军。

红四方面军总部见调动敌主力东移的目的已经达到，徐总即令红九军二十五师和红四军、红三十军各一部，坚守万源以南迄通江城北一线阵地；另集中10余团兵力于西线，准备在贵民关、观光山之间的分水岭地区开始反击。此时，敌第一路邓锡侯部正根据第四期总攻计划向东进攻，6月26日猛攻红军分水岭红军阵地。红军在给敌以迎头痛击后，立即转入反击。27日拂晓，红军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278页。

分三路冲入敌阵，右路红军将敌第二师第五旅杨倬云、陈永昌两个团包围于官田坝，并歼其 500 余人；中、左路红军经一昼夜激战，连续破敌数十道阵地，直逼敌主阵地马鹿寨。28 日夜，红军冒着倾盆大雨继续猛攻，敌凭险固守，战斗转入相持阶段。“由于这次反击没有向敌实施大纵深的穿插迂回，以致在敌凭险顽抗下未能续获进展”，又由于“暴雨骤至，小通江河水猛涨，严重妨碍了红军后续部队的运动的粮弹供应”^①。徐向前遂决定停止反击，将部队撤回小通江河以东，隔河与敌相峙，另寻反攻战机。

在此期间，东线红军除 7 月 7 日主动撤出城口外，在万源至通江一线上，有力地阻止了优势敌人的猛烈进攻。敌人死伤累累，未能前进一步。

敌人在东线进攻的企图一清二楚：即重点夺取万源，截断川陕通道，一举将红军消灭在通江以北地区。而红军已经退却到根据地的后部，扼守东起万源以东的甄子坪，西经大面山、孔家山、南天门、插旗山、火嵌子山、鹰龙山，向北沿小通江河东岸至碑坝一线，纵横仅一二百里地的范围。如果万源失守，红军则有被压出川北的危险。刘湘也将其“剿赤”总兵力的五分之四，80 余团 10 多万人压向东线，投入战斗。面对敌人的强大攻势，7 月上旬，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万源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作战方针。出席会议的有西北军委、红四方面军、川陕苏维埃政府等各方面的负责人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熊国炳等以及红军东线部队的师以上干部，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副军长程世才，红四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副军长刘士模，红十二师师长张才千，政委徐长勋，红十一师师长陈再道、政委叶成焕，红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许世友、二十五师政委陈海松等和少数团营干部。会议由总指挥徐向前和总政委陈昌浩主持。在会议上，有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 279 页。

人提议放弃川陕根据地，北进汉中，另找出路。徐向前不同意这种主张，他认为：虽然红军的困难越来越大，敌人的攻势越来越猛，但红军战胜敌人还是有条件的，绝不能轻易脱离根据地。他说：“实际上，当我们感到最困难、最熬不住的时候，往往也正是敌人最困难、最熬不住的时候。打仗，就是要熬得过这个‘最后五分钟’。我们一方面咬紧牙关，硬着头皮顶住，不退，一步也不能退。退到汉中，我是坚决反对的。另一方面，准备反攻。”^①他说：“汉中那里我们去过，回旋余地不大，又没有群众基础，去那里有什么出路呀！现在唯一的出路是硬着头皮打，消耗敌人，待机反攻。”^②陈昌浩在发言中支持徐向前的意见，他分析说：“差不多刘湘所有的兵力都拿出来了，总数约在80团以上，消灭刘湘的剧战主要的就是消灭刘湘这80团的主力。”陈昌浩列举了从反六路围攻开始到目前刘湘不断增兵这一似乎是“强大”的表现，说这恰恰是“刘湘主力节节失败，后方部队节节增援，而节节遭我们各个击破所致，假令刘湘是有办法，绝不得把他全身气力都用上来。”^③他进而指出：“8个月的血战，实在表现出了我们工农群众之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如果不看清这一点，只是看见敌人力量，其结果必然是走到畏惧敌人，而丧失消灭敌人的决心。”“现时敌我力量之对比，决定了我们消灭刘湘争取最后胜利是有把握的。”^④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也写文章支持徐向前和陈昌

① 徐向前：《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上），第15页。

② 《徐向前传》，第188页。

③④ 陈昌浩：《敌我力量之判别与我们胜利的前途》（1934年7月10日），《干部必读》第84期。

浩的意见：“同志们：起来为最后的胜利而拼命呀！”^①徐向前、陈昌浩和张国焘的看法和决心，使与会者统一了思想。会议从东西线敌情、地形着手，研究了反攻作战方案。认为：西线反攻不利于红军的发展。东线敌人虽强，但受到的打击最重，阵地与红军南北对峙，红军居高处，敌人位于下方，反击得手后，可顺着山脉走向直捣敌后方，大纵深迂回歼敌。徐总根据敌人进攻态势和兵力部署，判断敌人下一步将重点夺取万源。因而，会议决定：反攻从东线开始。西线红军在小通河左岸钳制敌第一、二、三、四路于原阵地。利用万源附近有利阵地，以少数部队实行坚守防御，继续耗损敌第五路有生力量。参加会议的各方面领导人，“一致同意领导的作战部署，决心誓死保卫万源。”^②

万源，地处巴山腹心，历来号称“秦川锁钥”，是四川东北的门户。万源县城座落在一个小平坝上，四周群山簇拥，地势极为险要。东有奇峭绝险的花萼山、笋子梁雄峙，南有雄浑挺拔的大面山、孔家山、香炉山环列，西有峥嵘嵯峨的南天门、玄主殿屏障，平均海拔在1500米以上。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既定方针，将主力部队放在第二线休整，做好反攻准备；并根据万源军事会议精神调整了红军部署：以红九军担任主要方向的防御任务，坚守大面山、孔家山一线阵地；以红四军十二师大部坚守万源西南的玄主殿；以红四军十师和红三十三军3个团，及红十二师三十四团大部，分别置于万源两侧之黄中堡、花萼山，阻击敌左右两翼的进攻。另以红三十军八十八军、八十九师和红三十一军二七四、二七九团为总预备队，分别配置在万源周围。

7月上旬，敌人第五、六路在万源方向的兵力已增至15个旅

^① 张国焘：《从收紧阵地，到最后胜利》（1934年7月21日），《干部必读》第85期。

^② 《陈再道回忆录》（上），第268页。

以上。通江方面范绍增师的4个旅及陈兰亭部正陆续右移。刘湘这时看到红军于7月7日退出城口，判断红军已不可能南下川东，乃令各路再次发动总攻。坐镇南充的敌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刘从云，通过占卜，择定7月11日为“黄道吉日”，他用黄缎子包裹命令，下达给各路军，要求统一于是日开始总攻。

7月11日，敌人开始了以万源为主要目标的全线猛攻，妄图完成第四期总攻计划。第一路向川陕边界的两河口推进，拟切断红军人陕道路；第二路和第三路以得汉城、第四路和总预备军以竹峪关为进攻目标；第五、六两路企图攻占万源及其以西一线。其中，以唐式遵的第五路担任主攻。

一场以万源为重点的激烈攻防战开始了。此役，便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中著名的决战防御“万源保卫战”。

“万源保卫战，是积极防御中的一个决战防御，打得极其艰苦。敌人精疲力尽，我们也是精疲力尽。”^①“万源保卫战，是关系着川陕革命根据地和川陕红军生死存亡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②《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这样记载：“7月16日，唐式遵以8个旅进攻万源正面孔家山和以西的南天门等阵地。敌军以猛烈炮火掩护，进行波浪式的冲击，但在红军步机枪火力和手榴弹、滚木、礮石的杀伤下，前进进一步都要遭到重大损失。当敌人消耗许多兵力方夺得一角阵地时，红军又以迅速有力的反击夺了回来。22日和27日，敌先后两次向大面山、甑子坪红军阵地猛烈进攻，以整团、整旅兵力轮番冲击。但每次蜂拥前来，都留下一批尸体狼狽而去。10余日间，万源前线红军打退了敌人三次猛攻，连同6月下旬的战果，共毙、伤敌团长以下7000千余人，缴获长短枪千余支，机枪20余挺，迫击炮10余门。

① 徐向前：《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

② 张才干：《回忆反六路围攻》，《艰苦的历程》上，第451页。

“刘湘见连攻不克，焦灼万分，乃于8月初发布奖惩条例。宣布以3万元作夺下万源及其附近阵地的奖赏，规定擅自放弃阵地者军法从事，师长、旅长在所属两旅、两团上阵而不亲临前线指挥者处死。但是重赏严罚并不能挽救他的失败。8月6日，敌倾全力发动第四次猛攻，唐式遵亲到大面山前线指挥。以第一师与陈国枢等部攻击甑子坪、花萼山，迂回万源东侧；第六路廖雨辰、汪铸龙两师进攻南天门，迂回万源西侧；第二、第三师向万源正面玄祖殿、孔家山攻击。敌东线其他部队和西线第一、二、三、四路全力配合。在进攻中，敌将营以下的军官组成敢死队冲锋，指挥官赤膊督战，对畏惧不前者就地枪决。但是激战终日，红军阵地屹然不动。当晚，敌猬集红军阵地前沿不退，7日拂晓先以密集炮火向红军主阵地轰击，随后在飞机掩护下发起冲锋。英勇顽强的红军指战员，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一当十、十当百，奋勇击退了敌人多次冲击。坚守在老鹰寨、青山的3个连，曾抗住敌人两个旅兵力的轮番进攻，最后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将其击溃。在大面山，敌曾以4个旅兵力轮番猛攻，并乘炮火将鹿砦打着，烟雾弥漫之际冲了上来。防守该阵地的第七十三团第二营两个连，立即跳出工事，冲入敌群，挥动大刀，与敌拼杀，敌人尸体遍布鹿砦附近，终未能前进一步。当日下午，红军在击退敌八九个团的冲击后，乘势组织多路出击，一气追杀7里许。8月6—7两日战斗，是敌人进攻的顶点。红军缴获步枪数百支，机枪十余挺，迫击炮10余门。敌损兵4000千，遗尸千具。”^①

以上战史的记载简略了一些。从当时亲自参加万源保卫战的老战士的回忆中，更可看出战斗的艰苦和激烈程度是异常惊人的。

许世友回忆：“7月16日，……敌军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进行波浪式的冲锋，一上午就有五六次之多。敌人是赶鸭子战术，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280～281页。

冲锋时像看大戏一样人山人海。我军依托阵地沉着应战，待敌人冲到阵前几十米处，各种火器一起开火，滚木礮石倾泻而下。陷入我火网之中的‘双枪兵’就像鸭子炸了群一样四散奔逃，抱头鼠窜。我军战士跳出堑壕，挥动大刀，猛追猛杀，杀得敌人尸横满山，血染山坡。敌人的冲锋就是这样被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

“敌人不到完全输光是不肯败下阵去的。唐式遵把他的队伍稍加整顿后，于7月22、27日又先后两次对大而山及其以东的甑子坪我军阵地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战斗进行的异常激烈。前沿阵地不时被敌突破，营的敢死队、团的预备队都投入了战斗，同敌人进行反复争夺，战斗达到白热化的程度。”^①正当红军在前线与敌浴血奋战的时候，后方的张国焘给许世友打来电话询问：“大而山能不能守住啊？”作为川陕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不能不为前线激烈的战斗担忧。许世友回答说：“刘湘就那么两下子，没什么了不起！他们人多，我们也不少，就是不还手让他杀，也够他杀几个钟头的。你放心，我们保证人在阵地在了就是了。”^②许世友放下电话，就直奔大面山前沿阵地。“敌人的一次冲锋刚被打退。到处弥漫着刺鼻的硝烟，阵地被打得像刚耕翻过的土地，一脚踩下去就是一个深深的脚印。战士们正在加修工事，一个个满脸烟尘，满身泥水，只有那一双双眼睛还是那样坚定自信、那样炯炯有神。七十三团团团长刘理运同志告诉我，有些地段土少石头硬，工事打平了来不及修，头对脚、脚对头地垒起来，上面再盖上浮土，就成了简易工事。我说，这倒是一种发明创造，一切都取之于敌。他说，现在好多事都是这样，子弹打完了到敌人死尸堆里去拣，枪支打坏了到敌人尸体堆里去取，有些烟瘾大的战士还到敌人尸体堆里去找烟叶、纸烟哩！”^③

王宏坤回忆：“进攻我十二师玄祖殿阵地的敌人在第一天就拿

^{①②③} 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第275～276、276～277页。

出了一个旅的兵力向我发起猛攻。敌人先以密集的炮火向我阵地进行破坏射击，然后分数路扑来，我坚持前沿阵地的十二师三十四团一营的两个连待敌爬至距我三四十米时，猛烈开火，打得敌人像山崩一样倒下去。这一天，敌人猛攻3次，死伤累累，我阵地岿然不动。下午4点，该营指挥员瞄准敌人‘过鸦片瘾’的机会，派出几个小分队，从几方面对敌突然发起攻击，打得敌人失去指挥，乱成一团，狼狈而逃。这样，敌一旅的进攻就被我两个连击溃了。……第二天，敌人再一次向玄祖殿猛攻，但仍然惨败而归。

“川北气温高，雨水多，前沿部队守在塹壕内，风餐露宿，日晒雨淋，塹壕里经常积水盈尺，战士们长期浸泡在里面，不少人闹病，前沿处于激战场所，敌人的死尸腐烂发臭，气味熏天，这时红军控制的区域，处于纵横仅一二百里处的大山中，山区本来人口就稀少，物资粮食缺乏，不能满足军需，加上部队收缩，都集中到这一块，困难越发加重了，最伤脑筋的是缺粮，开始还能马虎每天喝上一二顿稀饭，以后没有了，地里未成熟的土豆也吃掉了，再到后来完全靠采集野菜、野果、竹笋之类充饥。”^①

万源保卫战的激烈战况，牵动着红四方面军领导的心，在战局最吃紧的时候，总指挥徐向前亲自来到大面山红二十五师的阵地。许世友陪同他视察了红二十五师阵地，并向他汇报了情况。徐向前对红二十五师阵地坚固，部队士气旺盛，敌人没有能够前进一步，表示十分满意。回到红十五师指挥所，他告诫许世友：“大面山是敌人的主攻方向之一，是全线的重点阵地，一定要守住。你们右翼的三十军，左翼的四军，都打得很好。敌人还会发动更猛烈的进攻，你们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

许世友当即坚决地表示：“横竖是有我无敌，有敌无我，有我

^① 王宏坤：《我的红军生涯》，第226～227页。

们二十五师在，敌人就休想过大面山！”徐向前快意地笑了，他站起来对许世友说：“相信你们，等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万源保卫战进行到敌人和红军双方都破釜沉舟，决一死战的局面下，红四方面军总部再次对战局进行了分析讨论，“在这种罕见的困难情况下，就产生了问题：这种打法行不行？再熬下去还有没有希望？要不要早些把二线兵力投入战场？西线那边，兵力单薄，主要是招架招架，牵制敌人。东线这边，主力集中，既要顶住敌人，又要准备反攻。这个时候，收紧阵地已达极限，前线部队十分疲劳，形势艰险。有的同志感到，顶下去太困难，主张兵退汉中；有的同志认为，一线部队太吃紧，主张动用二线兵力。”徐向前的意见是：“我不同意。不退，一步也不退。退往汉中，放弃川陕根据地，坚决不能干。二线主力不能动用。‘不见兔子不撒鹰’，要熬到总反攻，投入到总反攻中去。”^①

徐向前再次坚持他的“最后五分钟”理论。

从7月下旬到8月上旬，近20天时间里，敌人共发动了5次大规模的进攻，死伤万余人，却未获进展。刘湘抬出来的那位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刘“神仙”，窜来窜去，一次次地拈香卜卦，选定黄道吉日下令进攻，预言川军必胜，以振军心，结果却一次次损兵折将，大败特败。时值酷暑季节，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敌军病员大增，逃亡不断。有些连队只剩下20—60人不等。敌人抓来运粮食和作战物资的民夫也大批逃亡，供应也发生了严重困难，弄得士气极坏，官兵怨声载道。敌人的报纸也惊呼：“前线士兵，形同乞丐。有开回者，令人视之，惊为僵尸。”红军则乘机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用战场喊话、释放俘虏、顺河流放宣传牌形式，瓦解敌军。敌人士气更为沮丧低落，骂声盈野，指责刘“神仙”是骗人妖道，害苦了他们，必欲啖其肉而后快。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61页。

红四方面军总部认为：总反攻的时机到了！

反攻突破，关系全局，必须慎之又慎，力争万无一失，选择突破口即成为很重要的一着棋。当时，东线敌人80多团兵力，分布在万源周围100多公里的战线上，如果反攻突破口选择不当，即可能带来意料不到的损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根据红四方面军总部电台侦察的情报，提议以青龙观作为反攻的突破口。徐向前、陈昌浩赞成这个意见。

青龙观，作为红军反攻的突破口，有它独具的条件。那里由敌二十三军汪铸龙师1个旅驻守，该部是刘存厚的部队，已被红军打怕了。该敌处于敌第五路右翼一、二、三师和左翼第四师等部中间，是东线上的薄弱环节。青龙观地形异常险要，悬崖壁立，易守而难攻。红军战士在此驻防时，晚上出去放哨或解手，稍不留心滚下山去就完了。地势之险可见一斑。这个最险要的地方，却也是敌人守备最薄弱的地方，战斗力最差的地方，意想不到红军会进攻的地方。红军从这里突破，不仅会出乎敌人意料，而且便于分割其第五路，达到迂回包抄刘湘主力的目的。

红四方面军为此制定的反攻部署为：第一梯队由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十六师，共14个团组成，担任突破敌防线的任务；第二梯队由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九十师和红三十三军九十九师组成，协同第一梯队向纵深发展，迂回歼敌。其余部队继续坚守阵地，相机转入反攻。战法是夜袭突破，大纵深迂回包抄。奇袭青龙观的任务，交给红九十三师二七四团执行。

红二七四团是红四方面军善长夜摸夜袭、打近战、夜战的团队之一。为了保证夜袭青龙观战斗的顺利成功，徐向前带着红三十一军军长孙玉清、红九十三师师长叶道智和随从参谋杜义德等人，亲自去红二七四团具体部署、动员、检查。徐总根据自己亲自去过青龙观实地的经验，告诉战士们：青龙观海拔2500米，矗

立在南天门对面。山北是一壁悬崖，直上直下，险峻至极。山南较坡些，但敌碉林立。东西两侧通往山顶的小路，敌也有重兵把守。为出敌不意，总部决定以红二七四团二营从山北攀崖而上，山顶开花，一、三两营从东西两侧夹击，一举歼敌。他还告诉战士们：这是关系整个战局的一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关键是准备充分，胆大心细，运用红军夜摸夜袭的特长，打破敌人的天险壁垒，为全军的总反攻打开通道。

8月9日傍晚，红二七四团副团长易良品率领突击营（二营）由南天门出发，向青龙观前进。“那天晚上没有月亮，云缝间只闪烁着几颗星星。全营着装整齐，精神抖擞，准备攀登开路用的绳子、竹竿、铁钩、砍刀等一应俱全。”当时的二营营长陈金钰回忆这次战斗说，“部队在荆棘丛生的山上穿行了三个多小时，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了青龙观脚下。部队休息片刻，整理武器装备后，即开始从青龙观西侧向上攀登。传说这里是‘天鹅抱蛋’的地方，山势陡峭，险石林立，表面上长满了青苔，脚一上去就打滑，峡谷口的‘风洞’，呼呼作响，吹得人站立不稳。战士们全靠攀藤附葛、搭人梯和用红缨枪、带铁钩的竹竿、绳索，艰难地向上攀登，随时都有滑下去的危险。当时我随尖刀排前进，刚爬到半截，就一脚蹬空，失去平衡，和两个战士一起摔了下来。我幸好落在一根树杈上，脸上、身上划出了不少血口子。那时也顾不得这些，立即爬起来继续上。等到打完仗以后，我们站在青龙山上往下看：悬崖绝壁高达几十丈！不由得一吐舌头，真险啦。”^①待全营陆续到达山顶后，即向敌旅部发起冲击，敌人顿时惊慌失措，旅部一片混乱，红军乘势从三面向大庙进攻，经短暂激战，占领了敌旅指挥所，旅长周绍武化装脱逃。8月10日晨，敌1个团分三路向红军发起反冲锋，被红军击退。红二七四团另两个营也沿

^① 陈金钰：《奇袭青龙观》，《艰苦的历程》上，第484页。

山路突上主峰，迅即向敌两翼出击，在红军三面夹击之下，经过近一小时激战，敌大部被歼，余敌见大势已去，纷纷逃窜。红军全部占领青龙观，将敌人自西向东 500 余里长的防线从中间撕开一个口子，为全线反攻创造了重要条件。

8月10日晨，红二七九团继红二七四团之后，由突破口楔入敌纵深阵地，向石人场、赵塘方向的溃敌追击。红九军和红四军主力则自左右两翼发起进攻。敌人见青龙观阵地被突破，其左翼位于龙池山附近的独立第二旅和右翼位于青花溪的第五旅，连忙相向靠拢，并调边防第一路陈兰亭部和第四师第十二旅向石窝场方向前进，企图填补缺口，阻止红军前进。无奈敌人已是惊弓之鸟，在红军的勇猛攻击之下，敌人的企图宣告失败。

“12日和13日，第九军攻占青龙观以东之青花溪、田家坝，击溃敌第五旅。14、15两日继向西南之长坝场追击。这时，第四军一个师已连占青龙观以西的周家坝、黑钵山，16日又与攻占青龙观南石人场、赵塘坝的第九十三师，共同夹击敌独立第二旅于龙池山，将其大部歼灭。第四军另一个师进占了龙池山以西的五龙台、石窝场，并击溃由镇龙观方向前来堵击之敌边防第一路陈兰亭部和第四师十二旅，随即进至河口场、庙堰场。至此，敌人防线，便如高堤溃决，缺口越冲越大，越发不可收拾。17日，方面军第二梯队——第三十军主力和第三十三军一个师，也进至河场地区。”^①

突破青龙观和向敌纵深发展的胜利，造成了进一步分割包围敌人极为有利的态势。这时徐向前主张向东即向左对敌实施大迂回、深包围，歼灭万源附近的刘湘主力第一、二、三师。这样迂回地形极为有利，可获得重大战果。“左旋地形有利，又能消灭刘湘的主力，机会难得。如果我们搞掉刘湘的一、二、三师，他要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284～285页。

恢复元气是很困难的，下江东的地盘就有落入红军手中的可能，我军的武器装备会大大改善，这是左旋的好处。”^①然而，后方的张国焘却打电话命令红军向西，迂回打击与红军部队处于平行地位的范绍增第四师。“右旋向西，西面的敌人同我们距离很近，两军处于平行地位，地形也不利。你还没有旋过去，敌人就能跑掉，而且，他们又不是刘湘的主力。”^②徐向前在电话里与张国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辩。据徐深吉将军回忆：“张国焘在通江的洪口场，徐向前、陈昌浩同志还有各军的领导同志，在宣汉的马渡关，前后相距200多里，电话听不清，让我在州河岸边的罗文坝传电话。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大雨后的一天下午，天气很闷热，从下午两点多钟开始，一直讲到晚上七点多才结束。五个小时的长电话，几乎说破了嘴，张国焘还是死硬坚持他的错误主张，别人的正确意见半句也听不进。”“在电话里，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等同志，先后讲了关于追击方向的利弊关系。”^③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等都在电话里讲了向东追的好处，证明各军在前线的领导人意见一致：向东追击为上策。而张国焘则反反复复强调向西追的“好处”，坚持向西追击！“他们讲一句，我就传一句。张国焘就是听不进别人的半点意见。”

“后来，张国焘有些不耐烦地喝问：‘你们听不听我的意见？’停了停，亮着大嗓门喊：‘告诉他们，听，就按我的意见办；不听就算了！’”^④

“他是中央代表、西北军委主席，说了算，我们最后只好服从命令，率军西旋。”^⑤徐向前后来不无感叹地说，“范绍曾是土匪出身，滑头的很，跑起来比兔子还快。没等我们旋下去，他已带着

^{①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65页。

^{③④} 徐深吉：《徐向前同志在红四方面军》，《艰苦的历程》上、第40~41、42页。

^⑤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65页。

队伍从喜神滩掉头鼠窜，5昼夜窜了400余里，后卫筑起工事凭险固守。右旋没有旋成，我们只好转回来左旋，但左边的敌人早已退了下去。部队追着敌人的屁股打，没能消灭多少。他们在宣汉附近的马家场、东升场一线，筑起防御阵地固守，我们啃也啃不动。这样，东线反攻就告结束。”^①东线反攻消灭了大量的敌人，共计“歼敌第二十三军第二师一个旅，第二十一军独立第二旅，第二师第五旅和边防第一路陈兰亭三个团，其余敌第一师两个旅、第二师第四旅、第三师三个旅、第四师三个旅、独立第一旅和第二十三军第一师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失。仅第五路就损失人枪一万四五千。由于张国焘的错误命令，东线反攻未能更大量地歼灭敌人。”^②

西线敌军见东线第五、六路总崩溃，各路震恐万分，仓皇调整部署：第四路由通江撤至得胜山、元山场一线；第三路由通江西北草池坝向鸣盛场、得胜山延伸；第一、第二路仍维持原防线，企图北起贵民关南迄江口，依托通江河西岸山地构筑防御阵地，阻止红军西进。8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总部在通江附近开会，决定主力向西线反攻：留一部兵力于东线，由孙昌浩总政委指挥，牵制敌人；徐向前和王树声率红三十军、红四军、红九军主力及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迅速西转。

8月28日，红军从通江城南上老官庙渡过通江河，从敌第三、第四路结合部——得胜山附近的冷水垭，利用夜袭，成功突破，继而向前发展。敌人急忙缩至清江渡和巴中间的同观寨、右垭口、南坳场一线企图继续顽抗。红军再度夜袭，突破右垭口，并迅速向巴中前进。西线敌军见红军攻势勇猛，自知很难拦阻红军，于是开始全线溃退。李家钰第三路向仪陇方向退却，杨森第四路向营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65～366页。

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285～286页。

山方向退却，北面的邓锡侯第一路、田颂尧第二路也准备逃跑。红军则顾不上连续作战的疲劳，甩开大步，昼夜疾进，同敌人抢时间。大家心里十分明白：时间就是胜利，耽误了时间，又会像东线反攻那样，失去战机，捞不到多少油水。王树声率红九军追击第三路，王宏坤率红四军一部追击第四路，徐向前和李先念带红三十军及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直扑巴中。9月11日，红三十军攻克巴中。此时，尚在北面的第一、第二路虽在原防地，但随时准备西逃。徐向前和李先念在巴中商定：要大纵深迂回，直插黄猫垭、旺苍坝方向，免得敌人跑掉。

不料，这时张国焘又来电话了，命令位于巴中的部队向长池方向迂回。徐向前根据前此的东线教训认为这样迂回太浅，很可能还是追着敌人屁股打，张国焘对徐的意见不屑一听。两人在电话中讲来讲去，没有结果。张国焘最后很不高兴地说：“你们不听我的话算了，随你们的便吧！”^①

有了东线的教训，徐向前横下了一条心，不听张国焘的。他说：“那是抓兔子尾巴，抓不住的，这回就是犯错误也不听他的，打完仗再说，我负责！”李先念也说：“对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我们听总指挥的命令。”

徐向前说：“好！我们来个机断专行，搞大纵深迂回。”^②徐总当即命令程世才先紧急集合身边一部兵力，沿风仪场、雪山场，直插木门以西的黄猫垭、旺苍坝，向敌第二路兜去。他对程世才说：“一定不能让敌人跑掉，我们随后就到！”

程世才率红三十军先头部队急速穿插，徐向前、李先念带后续部队跟进。红军和川军展开了抢时间、比意志的急行军。在红军行动之时，田颂尧发现第三、四路溃逃后，已下令部队西撤了。

① 《徐向前传》，第195页。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67页。

红军经一个多月的连续作战，日夜追击，疲惫到了极点。部队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有人跑着跑着就一头栽倒在路边的草丛里，呼呼睡起来。害烂脚病的人拖着红肿的双腿，吃力地赶路。长满藓苔的小路，又湿又滑，跌得战士们浑身都是泥污、伤痕。战马也由于疲乏饥饿摇头摆尾喘粗气，拿鞭子抽也不想动弹。行进的队伍越拉越长，掉队的人越来越多。

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赶到黄猫垭的才刚够一连人！

红军刚把阵地占住，敌人恰恰退了下來。他们挑着枪支行李，大摇大摆向黄猫垭走来，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当了红军的俘虏。程世才带领的红军先头部队从抓来的俘虏口中得知，这些人是打前站的，大股敌人还在后面，于是，立即投入紧张的战斗准备。

黄猫垭是以山上有块岩石发黄，形状像猫而得名，周围皆崇山峻岭，是敌军西逃的必经之地。徐向前和李先念带的后续部队带到时，程世才正指挥红军死死地顶住敌人的攻势。徐向前向程世才简要询问了一下情况，长长地舒了口气，高兴地说：“好！这下我们可要痛痛快快地打个歼灭战啦！”旋即命令部队展开，包围敌人。

红军在黄猫垭一下包围了敌人10多个团。经过一天一夜激战，红军全歼这股敌人，共1万余人，缴长短枪7000余支，迫击炮40余门，获得反攻以来歼敌最多的一次大胜利。接着，红三十军主力继续前进，于9月22日攻克苍溪。

在此期间，红三十一军两个师于通江北对敌第一路发起反攻，先后在分水岭、官田坝等地给予退却之敌以有力打击，9月17日收复南江。继在南江以西三江坝、旺苍坝等地又歼敌第二师第四旅、第五旅和第三师第七旅各一部，前锋直逼广元城郊。追击敌第三路的红九军一部，16日收复仪陇，继之收复阆中县嘉陵江以东除县城外的广大地区，先后缴枪千余支。

至此，北起广元、南至阆中的嘉陵江东岸地区均行收复。敌第一、二、三路逃至嘉陵江西，第四路逃至营山、渠县地区。刘湘大肆吹嘘的六路围攻计划全部破产。

红四方面军彻底粉碎敌之六路围攻后，四川各路军阀垂头丧气，士兵士气极度低下。刘湘也自感极为丢脸，万没想到会落个如此凄惨的结果。他在致南京蒋介石的电文中不得不哀叹：“剿共”一年，“耗资千九百万元，官损五千，兵折八万”，要求辞去四川“剿匪”总司令职务。敌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刘从云，被迫通电辞职，从南充潜回成都。四川各派反对势力则把战争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刘从云，强烈要求刘湘将刘从云砍头示众，以平众怒。

反六路围攻斗争历经 10 个月，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总计毙、伤敌路副司令郝耀庭等以下官兵 6 万余人，俘敌官兵 2 万余人，缴枪 3 万余支、炮百余门，击落敌机 1 架，基本上恢复了宣达战役后的根据地辖区，并扩大了部分新区。这一伟大胜利，严重打击了四川军阀的暴虐统治，大大鼓舞了川陕边广大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同时，红四方面军经过这次反围攻斗争也锻炼得更加坚强。

四 强渡嘉陵江

1934 年 1 月，正当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深入进行反敌人六路围攻的时候，远在江西的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博古主持了会议，并作了报告。这次会议，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顶点。这即是：“第一，不顾敌强我弱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的不利形势，照搬共产国际第十二次执委会决议，判断‘中国革命的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

——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极力夸大革命形势，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急剧崩溃，从而断定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将决定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并估计这个问题将会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得到解决。第二，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第三，主张集中火力反对中间派别，在反帝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只搞下层统一战线。第四，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等口号下，在党内和军内继续推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①

“左”倾冒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中央苏区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只能执行错误的战略战术，从而在蒋介石发动的大规模的进攻面前遭到严重的损失。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江西广昌，博古、李德（奥托·布劳恩）等命令调集红军主力保卫广昌，同敌人进行“决战”。18天之后，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1934年5月始，国民党军队分兵向中央苏区中心兴国、宁都、石城等地进攻。中央苏区红军又奉命实行“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结果进一步陷于被动局面。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已推进到中央根据地腹地，兴国、宁都、石城相继失守。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分别自瑞金、雩都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中央红军踏上征途的时候，在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还正沉浸在取得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胜利之中。然而，随着红军反围攻的胜利，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困难局面也突出地显现出来。徐向前说：“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固然以我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

^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

终，但川陕根据地的元气，却受到了严重损伤。我们的面前，废墟一片，困难重重。战役结束后，我从前线回到后方，沿途所见，皆为战争破坏带来的灾难景象。良田久荒，十室半毁，新塚满目，哀鸿遍野，令人惊心惨目。”^①但是，更令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所担心的，还是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情况。张国焘感到江西红军脱离瑞金根据地，向西行动，“这是使我们十分震动的事”^②。

1934年11月1日，红四方面军在通江县毛浴镇召开党政工作会议。到会的连以上政治工作干部800余人。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陈昌浩主持了会议。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政治报告和总结。陈昌浩作了党政工作报告，徐向前作了军事工作报告。毛浴镇会议历时9天，至11月9日结束。“会议讨论了当前形势与任务，总结了反六路围攻以来的党政工作，并根据政治工作长期积累的一些经验作出了《红四方面军政治与党务工作决议案》，制定了《团政治处暂行工作细则》、《军、师政治部的暂行工作细则》和《红四方面军军训训词》。此外还表彰了战斗英雄、模范和提出了开展竞赛活动。”^③大会强调指出：“我们目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在坚决的进攻路线之下，彻底消灭刘湘，冲破川陕反革命的‘川陕会剿’来汇合红二、六集团军、中央苏区红军，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实现。”^④

毛浴镇党政工作会议，是红四方面军继木门会议后政治工作建设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对于统一思想，加强政治工作，提高政治干部的责任感，鼓舞广大指战员的革命意志起了重要作用。实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80页。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200页。

③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291页。

④ 《红四方面军第一次党政工作大会的总结》（1934年11月9日）。

实际上也是一次冲破敌人“川陕会剿”计划的政治动员。徐向前后来评论说：“这是一次着重从政治上建军的重要会议，在方面军历史上有不可磨灭的意义。”^①

毛浴镇会议结束后，红四方面军军事工作会议于11月中旬在巴中县清江渡召开。会议由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主持，参加者为师以上干部和少数团的干部。这次会议除总结反六路围攻的经验，研究加强部队军事建设和训练工作外，着重研究了打破敌人“川陕会剿”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会议还制定了军事教育、参谋、经理、医务、组织等工作大纲。清江渡会议期间，红四方面军总部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央红军转战的情况，并拟定了向川陕甘发展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是：依托老区，发展新区，以打击敌胡宗南部为主要目标，夺取甘肃南部的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将川陕根据地发展为川陕甘根据地。

毛浴镇党政工作会议和清江渡军事会议结束后，随着这两次会议决议的传达贯彻，进一步推动了红四方面军从反六路围攻胜利后即开始的部队整训工作。

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获得巨大胜利后，四川军阀被打得焦头烂额，各路“诸侯”遭受巨创，元气大伤，全省统治阶级一片混乱。敌人舆论惊呼：“形势险恶”，四川终于成了“江西第二”。刘湘在其辞呈中也称，“川虽僻远，关系全局甚重”^②。国民党统治集团获悉四川军阀惨败，极为震骇，哀叹“西望云天，伤心不已”。四川的军阀、地主、资本家、官僚惊恐之余，纷纷将存款汇往上海，以致申汇暴涨，出现在四川交200元，在上海只收百元的事。在成都的官僚、地主头面人物，在惊恐万状之中，于西御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28页。

^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卷），第314页。

街“剿总安抚委员会”召集会议，商筹挽救“危局”的办法。会上对四川“剿匪”军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刘从云大加指责，认为军事失利，皆因其指挥谬误所致，决议以“安抚会”名义致刘从云，要其自裁，以谢川人。前方各部也纷纷攻讦刘从云毫不知兵，指挥不当，以致全军溃败，第三师第八旅代旅长刘若弼，电请刘湘杀刘从云以安军心。刘湘也十分清楚，四川各路军阀、地主、资本家、官僚、政客对刘从云横加指责，其实是对他自己的指责。在上下交迫的情况下，刘湘计无可出，一方面通电辞职，另一方面自成都出走重庆，以表示辞意甚坚。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刘湘乘汽车从成都去重庆途中，经内江裨木镇时，从汽车中跑了出来，表示要投江自尽，演了一场假投江的滑稽剧。

刘湘到重庆后，表面装作消极，其实是以退为进，既不办公又不见客，在幕后开始了一系列活动。他首先派飞机将范绍增接到重庆，对范抚慰备至，并拨给大笔作战活动经费，意在鼓励范绍增继续卖力，抗拒红军。另派其妻弟周成虎、亲族刘树成携带大批慰问品到前线慰劳各将领，还运去大量械弹，充实各部的战斗力。除此之外，刘湘还严令下川东20多县的县长集中团队，每县至少须调出反动地主武装1500人以上开赴前线，并须广募兵员，补充前方作战部队。同时，刘湘日夜召集亲信幕僚，商讨准备以后的打算及作战计划，并决定在近期内到前方召开将领会议，命令其第二师师长王缙绪速到重庆，随同前往绥定、宣汉等地视察战地情况，及参与今后第五、六路的作战指挥。

刘湘的种种手法，早为谙熟于此道的蒋介石看穿。所以自从刘湘8月23日宣布辞职之后，南京方面对此并无多大表示，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忙于对中央苏区的大规模“围剿”，另一方面也由于川军六路围攻尚未被红四方面军彻底粉碎，西线第一、二、三、四路还在其防地犹豫彷徨，蒋介石需要再观望一阵。刘湘也十分清楚蒋介石的用意，加之他与蒋介石之间矛盾颇多，现在又遭惨

败，各方多有责难，因此，唯恐蒋介石与四川其他军阀携手合力将其排挤，不好应付；同时刘湘也看到蒋介石正在江西用兵“围剿”中央红军，暂时无力西图四川，而他自己在川中军阀间乃为老大，在当前的局势之下，并无实力人物能继其任。刘湘是不甘寂寞的，复职之心早在跳动。因为南京方面以刘湘的去留问题，直接涉及到四川“剿赤”的重大关系，蒋介石于8月27日致电刘湘以示挽留，加之各方面尤其是四川各地军阀豪绅、土劣官吏的“恳切”慰留，刘湘乃在9月6日向成渝绅商官兵表示：复职事在考虑中，同时，宣称“日内决赴前方布置军事，准备与匪一战。”^①刘湘此举实为给蒋介石看，以表明他有复职之心，同时也是向蒋介石卖关子要价。蒋介石心里当然明白，但没有立刻答复。9月8日，刘湘致电蒋介石表示：“愿以在野之身，权支危局”，又说什么现刻绥安、宣汉吃紧，第三、四两路相继告急，乃决定即驰赴前线视察整理，期能暂时稳定，以待“中央”处置云云。此时，四川各路军阀，尤其是西线第一、二、三、四路的军阀，田颂尧、李家钰、罗泽洲、杨森等部正在遭受红四方面军的沉重打击，向后溃散之际，根本无力与刘湘一争高低，也纷纷发电促刘复职；同时，蒋介石在中央苏区方面发动的第五次“围剿”，随着国民党军队逼进中央苏区腹地，也大局初定。中央苏区红军正在做撤出中央苏区的准备，各线红军向瑞金、雩都等地集结。蒋介石在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即将得手之前，对四川的“剿赤”所遭巨挫深感不安，进而积极准备对川陕根据地进行新的“会剿”。

9月16日，蒋介石致电刘湘及川军各路总指挥，指责川军各路将领：“自五、六路挫败后，一、二、三、四路，又复节节后退。南江、巴中相继沦陷；巴河险要，也竟放弃。三路既遭失败，二路又受到创伤，遂使苍溪、阆中、仪陇、营山、蓬安等处，均觉

^① 《民国川事纪要》（1934年9月6日）。

岌岌可危；此实各路互相猜疑，彼此坐视不救之必然结果。各个击破，前言悉验，惟有痛心！盖兄等虽各矢言开诚协力，然从未声明某路被攻，某路赴援策应，或弃间实行夹击者，各不相谋，事实昭然；故虽为六路会师，实则皆各自为战。加以各路自身贪存，勉强周旋；有相提自保之意，绝无背水背城，硬扎硬打之决心；往往稍一交绥，即图引退。基上两因，致匪深知进无苦战，后无顾虑，尽可肆意突击，放手穷追；故各路不败则已，败则损失奇重。”^①由此看来，蒋介石对四川军阀确实是太了解了。因此，在指责了一番之后，又告诫川军各将领说：“今一、二、三、四各路阵线，已逼近嘉陵江岸，则全川存亡，及诸军生死最后之关键，实是临头，再不死拼，唯有坐待灭亡。”同时指定川军各路防线为：“一路扼守长池，二、三两路扼守恩阳河南岸之线，以保仪陇；杨军固守佛楼寺三溪口，左连鼎山之线，以固营渠；借以稳固阵地，速图整理；务盼兄等恪切遵行。”蒋介石深恐其令难以发生作用，又要求说：“对于上列规定各要点之阵线，已有转移逾越者，应即赶紧力图恢复，嗣后拼命死守。倘仍不努力夺回规定阵线，或再任意放弃，或不相策应援救者，不问原因如何，中央定予严惩。”该电还要求刘湘：“尤应克日复职，主持一切。”^②尽管蒋介石威逼利诱，苦口婆心，费尽心机，但川军一、二、三、四路丝毫无能抵挡红四方面军的猛烈进攻。在蒋介石电令后不到一星期，川军一、二、三、四路，就损失 14 000 余人，连丢苍溪、仪陀等城。红四方面军即完成西线反攻，胜利完成了反六路围攻。

蒋介石也为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所取得的胜利所震慑，深怕红四方面军继续发展壮大，席卷整个四川，从而使四川成为全国各地红军的汇聚之地，成为“大患”。因此，蒋介石为了稳定四川反动统治，积极着手布置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川陕会剿”，除

①②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

了连电刘湘复职外，还飞到西安，与陕西实力派人物杨虎城策划从北面进攻红四方面军。刘湘在蒋介石的催促之下，于10月22日通电宣布复职，即日赴开江前方督师与红军作战。

11月20日，刘湘到南京与蒋介石商谈“会剿”红军问题。双方经过反复折冲尊俎，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协议。蒋介石应允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大力支持刘湘，刘湘则同意蒋介石集团向四川发展其势力。南京政府一方面任命刘湘为四川省政府主席，统一指挥全省军队，并拨给其军费240万元及武器弹药一部作为“剿匪”补助；还运进白银1000万两，以稳定金融，维系人心，允许四川发行公债。另一方面，南京政府为进一步控制四川，调其嫡系部队胡宗南第一师由甘南入川，接替广元、昭化川军防务；第四十七师、五十四师进入川东奉节、万县一带；上官云相第四十四师和独立第四旅，经鄂西进入陕南安康地区，准备经紫阳、安康、平利、岚皋，夺取万源；同时，蒋介石还派财政部要员陈绍炳到四川任整理财政特派员；又命其南昌行营在重庆设立驻川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副主任杨吉辉，以监督川军“进剿”红军。12月中旬，刘湘从南京返回四川后，一方面电令各地方长官“抖擞精神”，“坚定民心”，“整饬民众武装，充实自卫能力”。另一方面，采取“北守南拒”方针，急调潘文华为南路总指挥，率领40余团兵力开赴川黔边境阻挠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在川北调兵遣将，调整部署，督饬各路广修碉堡，坚筑工事，深沟高垒，纵深配备，据险扼守，加强对红四方面军的封锁。

刘湘调整兵力后的部署为：第一路邓锡侯部担任昭化以南，射箭河到江口一段江防；第二路田頌尧部担任江口以南到南部新政坝一段江防；第三路李家钰、罗泽洲部分布于南部、蓬安、仪陇等县边界地区；第四路杨森部分布在渠县、营山地区；第五路唐式遵部和第六路刘邦俊部，布防于北起城口，南经官渡场、厂溪、罗江口至渠县的三汇镇一线。从敌人兵力布防可以看出，敌人已

经形成了对川陕根据地的包围态势。但是，由于四川各路军阀在六路围攻中遭受严重的损失，加之蒋介石正在忙于集中主力在川黔边境追堵中央红军，“会剿”计划迟迟未开始执行。

为了迎接艰巨的斗争，打破新的“围剿”，川陕根据地的党政军各级机关，广泛深入动员群众，争分夺秒加紧工作。鉴于大片恢复区饱受反动军队的蹂躏、摧残，人口减少，田园荒芜，乡村残破，经济濒于崩溃，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按驻地划分区域，派出大批工作队到地方，协助党政机关开展工作。同时，领导群众恢复生产，开办农村合作社，促进物资交流；关心群众生活，特别注意解决少数贫苦农民的实际困难；稳定群众情绪，提高群众的生产、备战的积极性。红四方面军各级领导机关抓紧对部队的调整、补充和训练，同时在部队中开展大规模的政治教育和各项战备工作。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工作，根据地的各项事业和工作，都有了很明显的恢复。红四方面军的扩军工作成绩显著，到1935年1月，即有2万名新战士补入部队。

在此期间，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四方面军总部的一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曾就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方向交换过意见。张国焘在毛浴镇会议期间与徐向前闲谈时曾征询徐的意见：“你看将来该怎么办？现在根据地物力、财力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起新的进攻，该怎么个打法？去汉中行不行？”徐明确表示不同意离开川陕苏区，他对张国焘说：“西渡嘉陵江的战机已经丧失，敌人筑碉防御，我们再向南部一带发展，有很大困难。汉中地区是块盆地，南面有巴山，北面有秦岭，回旋余地不大，去不得的。我看还是依托老区想办法比较好。”^①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以无比的英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84页。

勇，战胜了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追、围、堵、截，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于12月15日进入贵州。12月19日，中革军委《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要求“四方面军应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野战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①。这样，“配合中央红军行动”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任务”^②。193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对于挽救当时红军和革命的危局，进而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决定的意义。会后，中央红军向川黔边的赤水河进军，拟从泸州至宜宾一带渡江北上，向川西北转移。

为贯彻清江渡会议期间确定的川陕甘计划和策应中央红军行动，冲破敌入的“川陕会剿”，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乘敌“会剿”一时难以开始之际，组织广（元）昭（化）战役。广元，为川陕之咽喉，又在嘉陵江东岸，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那里是嘉陵江的上游，江而不宽，容易渡过。我们拿下了广元、昭化，就控制了嘉陵江两岸，进而可图川西平原、甘南、陕南，伺机策应中央红军和红二十五军。”^③这时，敌胡宗南部丁德隆旅刚奉令入川，进据广元、昭化地区。该地有5个团和两支游击支队（相当于营），统归独立旅长丁德隆指挥。其中驻广元两个团（张钟麟独一团、刘超寰独三团）和丁德隆独立旅部；驻昭化1个团（甘竞生独二团）驻羊模坝、三磊坝一线两个团（第一旅第一团和补充旅第一团）；两个游击支队活动于川陕交界的得胜关、转斗辅等地。1935年1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即以红三十一军全部、红九军主力和红三十军、四军各一部共18个团，向广元、昭化地区集结。广昭战

①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00、314页。

③ 徐向前：《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上），第20页。

役的目的是歼灭广元、昭化地区的胡宗南丁德隆旅，夺取广元、昭化两城，以利尔后向甘南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发展，寻歼胡宗南主力。红四方面军总部确定的作战计划是：首先扫清广元、昭化外围敌军，并以主力突击敌侧背，以割断两城敌军与外部联系，然后相机转入攻城或打援。

1月22日，战役开始。红四军十师和红三十一军一部进逼广元城，形成对该城的包围。同日，红军一部向转斗铺敌军展开进攻，上午10时，红军又派一部约200人经黄坝河附近迂回转斗铺侧背，断敌退路。驻转斗铺的敌第一游击支队在红军南北夹击之下，大部被歼，小部向北逃窜。敌第二游击支队奉命由得胜关往援，当其进抵黄坝河附近之李家坪时，被红军预伏部队包围，经3小时激战，伤亡甚众，残部乘暗夜突围逃回得胜关。红军即占转斗铺、黄坝河地区，使主力部队得以顺利渡江西进。

红军另一部向羊模坝敌军进攻。红三十军、九军于22日晚由朝天驿渡江，间道迂回羊模坝，23日下午5时许将羊模坝敌人包围。敌胡宗南部补充旅第一团团部及第二、三营，凭借有利地形进行防御。当晚，红九军主力向该敌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全部占领敌各阵地，歼敌绝大部分，敌另1个营由大坝口来援，也大部被歼。这时驻三磊坝之敌第一旅第一团惧怕被红军聚歼，在红军与羊模坝之敌接触时即放弃防地逃向碧口。这两次战斗共俘敌800余人，缴枪600余支。战斗中红军第二十五师副师长潘幼卿和第八十八师副师长丁纪才牺牲。

同时，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于22日晚从昭化、广元间渡过嘉陵江，占领河湾场，切断广元、昭化两地敌军的联系；并以一部进至昭化以北宝轮院，乘势进围昭化城。1月25日，红九十三师开始向昭化守敌独立旅第二团发起进攻。战斗异常激烈。1月26日，红军包围广元的部队也开始攻城作战。红三十军在三十一军部队配合下，于27日占领广元飞机场，29日又占机场东侧敌重要

外围阵地乌龙堡，并歼敌一部。但因昭化、广元两城的敌军凭坚固守，攻击数日进展不大；而胡宗南也不派兵增援，还将驻阳平关的1个团调回碧口，意在凭坚固守县城以疲惫红军。此时，敌邓锡侯第二十八军一部已逼近广元、昭化，威胁红军侧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鉴于攻打广元、昭化未克，吸打援敌计划难以实现，无法大举西进，而长期屯兵坚城之下，也非所宜，乃决定放弃原定战役企图，下令撤广元、昭化之围，执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准备强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

广昭战役期间，红四方面军总部收到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1月22日来电，内称：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的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因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也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也较不利；西线则田部内讧，邓部将南调，杨、李、罗兵单力弱，胜利把握较多，与我军配合较近，苏区发展也是有利的。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宜集中主力，从敌之堡垒间隙部及薄

弱部突入敌后，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敌人，于运动战中包围消灭之。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利。同时我们要估计到敌人可能以较少兵力利用堡垒钳制四方面军，而乘野战军立足未稳之际转移主力实行突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因此你们作战方针从速决定电复。

中央政治局及军委^①

接到中央电报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于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对中央电报作了认真的研究。徐向前回忆：“中央发出这个电报时，红一方面军已离开遵义，向川黔边的赤水方向前进。形势紧迫，不容我们犹豫不决。我从前线匆忙赶回旺苍坝，出席总部举行的紧急会议讨论这一牵动全局的作战方针。”“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运动歼敌，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江北进。这就是说，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将离开川陕根据地，向嘉陵江以西发展。大家认为，如果不是中央红军的处境相当艰难，中央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因而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是头等紧要的事。会议决定，第一，暂时停止与胡宗南的角逐。第二，由三十一军和总部工兵营，火速搜集造船材料，隐蔽造船，解决渡江工具问题。第三，适当收缩东线兵力，准备放弃城口、万源一带地区。第四，即以主力一部出击陕南，调动沿江敌人北向，为在苍溪、阆中一线渡江创造战机，并接应已经进入陕南商县一带的红二十五军。”^②会上，还讨论了是否以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直接与中央红军打通的问题。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在走哪条路，需要多少兵力，能不能打到长江边等一系列问题上议论很多。一来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第379页。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93～394页。

红四方面军力量有限，派部队出去多了，川陕苏区东、南部有刘湘、李家钰、罗泽洲、杨森等部共 100 多个团配置，川陕苏区就有丧失的危险；二来派部队少了，如去 1 个师，等于拿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四川的地形，山险路隘，敌人把路一截断，红军则无处可走。还有的说先派 1 个团去吧，有的说那就更别想回来啦。因红四方面军力量有限，没有把握，在这个问题上，只好作罢。根据各方面情况考虑：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以红三十一军和总部工兵营迅速搜集材料，隐蔽造船，积极进行渡江准备，并监视昭化、广元敌人。集中红四军 6 个团、红三十军 4 个团、红九军两个团共 12 个团的兵力出击陕南，以迷惑和调动敌人，创造在苍溪南北地区渡江的有利条件，并策应已进至陕南商县一带的红二十五军。另以红九军二十五师置于转斗铺地区，保障进攻部队左翼侧后的安全。

2 月初，红四方面军开始陕南战役。敌驻守陕南的孙蔚如第十七师，辖 3 个旅另 1 个独立旅，共 13 个团。其兵力部署为：独立第一旅刘文伯部 3 个团，驻宁羌、沔县地区；第四十九旅王劲哉部 3 个团，驻南郑地区，第五十旅段象武部 3 个团，驻南郑、褒城一带；第五十一旅赵寿山部 4 个团，驻防西乡、石泉、镇巴、汉阴一带。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不是真正打杨虎城，只是虚晃一枪。陕南西北军孙蔚如部过去怕胡宗南的势力入陕，侵占西北军地盘，曾和红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默契，双方一度相安无事，并有些来往。但在四川军阀发动六路围攻期间，他们屈服于蒋介石压力，出兵攻打红四方面军。同时孙蔚如部还任凭胡宗南的势力伸向川陕边，威胁红四方面军侧背，也使红四方面军上下十分恼火。红四方面军这次出于战略上的需要，出击陕南，顺便给孙蔚如点颜色看看，以示惩戒，也是必要的。尽管如此，红四方面军还是做到仁至义尽，在红军出击之前，派人送信给宁羌守军敌独立第一旅第二团团长杨竹荪，要他主动撤兵，勿作抵抗。

但杨竹荪对此置若罔闻，令其部队坚守。

2月3日，红十师主力和红十二师一部向宁羌敌外围据点发起攻击，经一昼夜激战，连克贺家梁、七星池、东山观等地。2月4日上午，红军开始攻城，经过短暂激战，宁羌城的4门均被突破，敌大部被歼，残存者仅30余人。宁羌战斗，共消灭敌人1个团部和两个营，活捉敌团长杨竹荪，打死敌县长白成斋。2月5日，红四军、九军、三十军各一部，分三路从铁锁关、宁羌、阳平关向东北挺进。敌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急调该师第四十九旅王毅武（劲哉）部及独立第一旅第一团，经沔县向西迎击。7日，该敌进抵新铺湾，立即构筑工事，企图阻止红军前进。8日拂晓，红军向敌发起攻击，激战半日，进展不大，与敌形成对峙。9日拂晓，红军第四军十师、三十军八十八师，向据守新铺湾的敌人实行正面进攻和侧翼迂回，并以一部直趋沔县断敌退路，敌军心动摇，随即溃乱。红军乘机猛攻，一举将敌四十九旅和独立旅第一团大部歼灭。接着，红军乘胜前进，溃敌骑兵团，占领沔县，围攻褒城，直抵南郑城郊。红军在进军陕南的十多天内，先后占领了宁羌、沔县两城和阳平关重镇，歼敌4个多团及一批地方民团，缴机枪70余挺，步枪5000余支，俘敌团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到此时，蒋介石赶忙调整兵力部署，向川陕边境增援。胡宗南部丁德隆旅由四川广元、昭化调至阳平关地区，防备红军进攻其后方甘肃天水地区；川军邓锡侯部5个江防团北进接替广元、昭化防务，并北出与胡宗南部策应，将河溪关以南江防交田頌尧部；敌第四十九、六十、六十一师，也向陕甘南部移动。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总部见陕南战役已经达到了调动敌人的目的，遂撤褒城之围，停止进攻，并于2月中旬回师川北，准备渡江西进，以策应中央红军入川。

红四方面军完成陕南战役，自陕南回师川北后，情况又发生

了变化。2月16日，中央军委发出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为中央红军改变渡长江计划、争取创造川滇黔根据地致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电：

国焘徐陈项贺任萧王：^①

甲、我野战军原定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赤化四川，及我野战军进入黔边区继向西北前进时，川敌以十二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曾于一月二十八日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也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

乙、本月我野战军在向金沙江前进中已调动川敌12个旅向兴文、长宁、高珙、筠连、横江地域集中，滇军主力也向威信、镇雄防堵，因在该地域作战不利，现我野战军已折向赤水河东乌江以北活动，并以黔西敌人为主要作战目标。

朱、周、王^②

当中革军委改变渡江计划的电报到达红四方面军总部之前，红四方面军一直是按照党中央和军委1月22日来电指示进行活动的。1935年1月24日，《干部必读》第100期发表李特的文章即说：“我们目前之紧急任务是集中兵力乘敌未备，先发制人，积极进攻，来消灭刘、邓、胡等匪部，与中央西征军及红二、六军

① 即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项英、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

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第389页。

团会师重、万，冲破‘川陕会剿’，赤化全川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①直到2月16日，陈昌浩仍发表文章说：红四方面军的大举进攻“正是配合全国红军冲破五次‘会剿’之有力支柱。”^②

中央红军改变行动计划，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人表示充分理解。徐向前认为：中央红军“土城一仗没打好，我看主要是部队连续转战，疲劳不堪，敌人以逸待劳，火力又强，不好对付。我们从鄂豫皖向川陕边转战途中，尝过那种苦头。部队连续行军，吃不上饭，睡不好觉，疲劳的要死，仗怎么能打好呀，不容易的。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懂得这一点。”“既然土城受阻，中央红军根据当时的敌情、我力，临时改变1月22日的作战方针和行动计划，是完全必要的。”^③“但是，红四方面军因受1月22日作战方针的牵动，已若箭在弦上，非进不可。”^④因为红四方面军主力在陕南作战期间，减弱了川陕根据地的防御力量，于是围攻川陕根据地的东线、西线敌军都向根据地进攻。2月3日，敌东线第二十一军占领万源；2月8日占领巴中；9日占领通江；敌西线之敌罗泽洲暂编第二十三师于2月5日攻占仪陇，田颂尧部罗乃琼第三师于2月21日占领苍溪。川陕根据地的地盘越来越小，红四方面军的后方机关也转移到南江地区。红四方面军总部为继续贯彻原定向川甘边境发展的方针，配合中央红军在川南、黔北的活动，决定仍在苍溪、阆中间西渡嘉陵江。

为了制止四川各路敌军对根据地的进一步侵犯，扫清渡江作战的障碍，方面军总部决定首先消灭仪陇、苍溪之敌。1935年3月初，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三十一军各一部向驻仪陇、苍溪等地的田颂尧、罗泽洲部发起进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八十九师

①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第381、386页。

③④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96页。

以夜袭手段，一举占领苍溪东南的老鹤场、红山庙，全歼敌田颂尧部罗乃琼第三师两个团，敌余部急忙向南败走，退至河溪关、碑院寺、火烽山等地固守。红军乘胜袭击罗泽洲凤青山阵地，并向两翼包抄，敌仓皇败退至老鹤场西南之鸡山梁，企图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进行顽抗。3月5日，红三十军在红九军配合下，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不给敌以喘息之机，连夜向敌展开攻击，经过激烈战斗，歼灭敌罗泽洲部第九团和第八团大部。此前，罗泽洲命其第三旅一部由玉盘山前往鸡山梁增援，中途被红军围歼，损失重大。罗泽洲部随即全线溃退，红军分路追击，在九节梁、玉盘山将敌3个团分别包抄，予以重创，并迫使另一个团缴械投降。罗部遭此沉重打击，溃不成军，官兵争相逃命，直到蓬安嘉陵江西岸，才停下来收容整顿。红三十军和九军一部向兴隆场、日兴场、大风场等地发动攻击，歼灭敌四川边防军李家钰部千余人。与此同时，红三十一军以主力一部向苍溪东河沿线之敌罗乃琼师、王志远路、何德隅路各部进击，11日克复苍溪，守敌一部向阆中溃退，一部退守嘉陵江西岸。红三十一军乘胜在苍溪附近的张坝实施强渡，拟一举突破敌嘉陵江防线，但因准备不足，没有实现。

苍溪、仪陇地区作战，歼灭了田颂尧、李家钰、罗泽洲6个团的全部或大部，俘敌官兵4000人，缴长短枪5000余支，特别是罗泽洲师仅伤亡逃散官兵即在5000以上，再也不能担任作战任务。蒋介石以“罗泽洲督伤不严，精神废弛，影响全局”为名，将其“撤职查办”；对田颂尧以“督伤不严，记大过一次”^①。至此，北起广元至南部城的嘉陵江东岸，除阆中城外，悉为红军控制，从而扫除了渡江作战的障碍。

红四方面军总部鉴于三十一军强渡嘉陵江计划未能实现，乃决定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另行组织渡江战役。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卷），第461页。

嘉陵江是四川的四大河流之一，江宽水深流急，两岸多是悬崖峭壁，地势非常险要。程世才将军这样描写：“横在我们面前的嘉陵江，就像一匹放任不羁的野马，奔腾不息，一泻千里。又像一条巨龙，被周围的高山挤压得发了怒，它咆哮着、怒吼着，扬起一个个浪头，狠劲儿地拍打着岸边的峭崖。宽阔的江面上，大大小小的漩涡一个套着一个，向前奔流而去。两岸多是高山峭壁和崎岖的羊肠小道。‘好家伙，真够险峻的！’”^①为了摸清敌人的江防部署和选定渡江地点，徐总亲自带领参谋人员，沿江勘察地形，选择强渡地点。他带领一行人，沿着苍溪附近的山间小路，走一程，停一程，仔细观察和标记沿江的地形、水情、敌情，晓行夜宿，沿江跋涉三四百里，最后选定了在苍溪附近至阆中以北的3个渡江点。主渡地点位于苍溪东南的塔子山、石家坝一带。对岸守敌是田颂尧部，兵力不强，又是红军手下败将。塔子山雄峙于江东岸边，居高临下，利于红军发挥火力，掩护部队强渡。山后是块宽阔的平坝子，集结部队和船只都较为理想，不易被发现。该处江面开阔，水流平稳，船渡也比较有利，对岸又是一片平滩，越过平滩为丘陵起伏地，易于部队迅速展开，向纵深发展。

此时，嘉陵江沿岸及其以西地区，系由敌田颂尧部和邓锡侯部两部防守，由邓锡侯统一指挥。兵力主要集中在北起广元地区，南至南部县境的沿江一线，共52个团。其后方直至涪江沿岸地区十分空虚，仅在邓锡侯第二十八军军部所在地绵阳及其以北之江油地区，有主力一部驻守。针对敌人的兵力部署，徐向前制定的作战计划为：“实施重点和多路突击相结合的战法，以三十军为主攻部队，从塔子山强行突破后即向剑阁、剑门关方向进攻，协同三十一军消灭该地守敌；以三十一军从苍溪以北之鸳溪口渡江，直

^① 程世才：《强渡嘉陵江》，《艰苦的历程》下，第21页。

插剑门关，进而向广元、昭化进攻，保障右翼安全；以九军从阆中以北附近渡江，尔后以一部协同三十军向北进攻，另一部消灭阆中、南部之敌，保障左翼安全；以四军为第二梯队，接上述第一梯队于苍溪地区渡江，主力相机向梓潼方向发展；方面军炮兵营配置于塔子山上，掩护三十军强渡。”^①根据红四方面军总部的指示，各部队广泛地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反复向战士们阐明渡江作战的意义，解除顾虑，增强信心，使部队树立了坚决顽强，奋勇前进，突得破，站得稳，彻底歼灭敌人的思想。同时，川陕根据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渡江作战给予巨大的支援。很多船工、木工、铁工，由各地跋山涉水赶赴苍溪，为红军渡江造船。群众还从远处运来了造船用的大批木材，筹集了大量的废旧钢铁。余洪远回忆说：“当时造船地点就选在离苍溪塔子山渡口约10里的王渡场，工地设在附近的山沟树林里，周围放上哨，严禁行人进入。省委从苍溪、南部、阆中、江口、巴中等县选调造船的技术工人140多人和青壮民工200多人，由王渡船工工会委员长李在安同志负责，日以继夜地加紧施工。为了保证质量，加快进度，以后省委又派我去督导这项工作，并负责在这一带为红军筹粮。2月初，我从宁强（原宁羌）赶回元坝子，带着保卫局的谢凡同志和我的警卫员祁怀安同志一道奔赴王渡。我们一进工地，只见到处热气腾腾，一派繁忙景象。当时正值隆冬，阴雨霏霏，寒风刺骨，许多工人衣着单薄，且未带被盖。为保持大家旺盛的情绪，我和几个同志商量，立即派人砍树枝搭简易棚子，使大家在休息时有个栖身之地。接着又召开了支部大会、积极分子大会、党团小组会，反复进行思想动员，要求党团员模范带头，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动员的口号是：‘打过嘉陵江，扩大根据地’、‘为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加快造船’。同志们听说迎接中央，情绪更高，干

^① 《徐向前传》，第205页。

劲更足，争着拼命干活，不肯休息，实在困了就三五一堆背靠背地蹲一会。由于工地上不准生火，吃饭由附近村子送来，大家成天喝凉水，吃冷饭，始终无一怨言。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终于造成了木船100余只，其中大船70多只，小船20多只。大船长约12丈，宽约7尺，中间有格船舱，每只可容纳一排人。小船长约1丈4尺，宽约5尺，每只可容纳1个班。”^①

3月8日，朱德来电询问敌情及红四方面军“目前所采取的战略方针与发展方向如何”^②。3月11日，红四方面军致电中央，报告了敌人动态，提出：“目前，我军在南路大捷，拟大进，彻底灭敌，配合西方军行动。”^③表明了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行动的决心。

3月28日，渡江战役开始。徐向前下达渡江命令，当夜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两个营和总部教导营，于塔子山附近以神速秘密的动作渡江。第一批突击队员以瓢代桨，轻声划船。夜来风起，江面的浪涛哗哗作响，像是有意掩护红军行动，战士们以神速的动作向对岸偷袭。驻守这段江防的是敌何德隅部陈择仁营。敌连长排长等一伙人正聚集在哨棚内赌博，因而对红军奇袭渡江毫无察觉。当红军突击队登岸后连续摸掉三道岗哨，行至第三道工事园堰梁碉堡附近，向东岸红军发出胜利登岸号后，敌营部哨兵慌忙走出营部，刚到门口，就被红军击毙。这时，敌沿江防线射出密集炮火，妄图封锁江面，炮弹在江水中炸起高大的水柱，冲击着木船。奇袭立即转为强攻。红军在塔子山上的炮兵阵地和重机枪阵地数十门火炮和几十挺重机枪立刻向敌猛烈射击，掩护渡江部队继续强渡，陆续登岸。突击部队冒着枪林弹雨划向西岸，离岸20多米时，争先恐后跳下船，涉水展开冲杀，敌军顿时一片混

① 余洪远：《力量的源泉——胜利的保证》，《川陕革命根据地论丛》，第11～123页。

②③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第396、397页。

乱，弃阵溃逃。红军登岸部队以极其神速的动作，猛冲猛打，很快全歼守敌3个连的兵力，占领了敌人一个营的沿江防区，控制了要点。随后，又击退了南北两翼敌人的反扑，巩固了杜里坝、老君堂、胡家场一带滩头阵地。后续部队趁势架起浮桥，陆续过江。3月29日拂晓，红八十八师第二梯队两个团，陆续过江投入战斗，扩大战果，乘胜攻占了飞虎山、高城山、万年山等制高点，攻克蟠龙庙，捣毁敌团指挥所，毙敌团长陈崇朴。接着，猛攻东青场。守敌不支，弃城向阆中思依场方向溃逃。红军乘胜追击，击伤敌旅长陈继善，并在后续部队配合下，击退由思依场方向敌江防总预备队派来增援的1个旅，敌人向剑阁方向逃走。

与红三十军强渡嘉陵江的同时，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在苍溪上游鸳溪场之石落锅强渡成功。红三十一军占领鸳溪对岸滩头阵地后，一举攻克敌险要阵地火烧寺，击溃敌刘汉雄师1个旅。红军主力另一部从侧翼向北进袭，防守张王、江口、青牛庙一线之敌覃世科旅还蒙在鼓里，当该旅谢安华团、张全民营被全歼后，覃世科才慌忙率队向剑阁方向败退，红军在追击中又歼敌一部。

红九军主力也同时在苍溪、阆中交界的洞溪口强渡成功。红军登岸后，一部沿苍溪东青场向剑阁方向进击，协同红三十军在剑阁、苍溪交界的马鞍山予溃敌刘汉雄师以重创；另一部向阆中城附近守敌第二十九军王志远路、第五旅、第七旅进击，于31日攻克阆中，守敌逃向盐亭。

3月29日拂晓前，徐向前在塔子山附近接到报告：红三十一军、九军分别从各自的渡河地点强渡成功，当即命令第一梯队留守人员注意保护好浮桥和船只，保证大部队顺利通过，并命令第二梯队的红四方面军准备跟进投入战斗。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徐向前带着前线指挥部人员，站立在塔子山前，目送一批批红军指战员，从浮桥、木船上渡过江去。待主力部队半数兵力已经过江后，徐向前一行人也踏上浮桥，向嘉陵江西岸走去。

红军第一梯队占领渡江要点之后，立即向敌纵深和两翼发展攻势，第二梯队红四军也很快从苍溪渡过嘉陵江投入战斗。红军渡江部队左翼红九军一部在红四军一部配合下，经阆中地区南下，于4月2日攻占南部县城，歼敌李炜如部3个团；右翼红三十一军击溃刘汉雄部后迅速向剑门关推进；中路红三十军及九军另一部于3月31日占领剑阁后，以红八十九师控制该城，以红八十八师向东北疾进，协同红三十一军进攻剑门关。

剑门关，确实险要。唐代诗人李白描写：“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剑门关位于剑阁县城东北60华里的大剑山上，横跨剑阁、昭化之间的山上隘口，扼川陕孔道。四周群峰耸立，北高南低，两旁均为数十丈高的悬崖绝壁，山间只有一条小路相通，古称“剑门天下险”。由于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经川敌在此长期设防，山上地堡成群，堑壕密布，是敌人江防纵深的重要支撑点。由敌邓锡侯第二十八军宪兵司令刁文俊率3个团在此防守，企图依托剑门关两侧山头险要地势构筑的集团工事固守，控制川西北通道，阻止红军西进。王树声副总指挥按照原定的作战方案，指挥红军部队从东西南三面包围剑门关守敌。4月1日，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和九十一师1个团最先抵达剑门关附近，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从剑阁经汉阳、天生桥一带，于4月2日拂晓配合红三十一军完成对敌包围。敌人依托剑门关天险力图固守。红四方面军前方指挥部决定从南向北对敌各个集团工事实行逐点攻击，很快扫清了外围各个据点，击溃守敌1个团，迫使敌防御阵地逐渐缩小。临近中午11时许，天空乌云密布，起初下起毛毛细雨，不久，雨越下越大，地上的雨水顺着山沟往下淌。王树声副总指挥命令攻击开始，红三十一军在东，红三十军在西，攻击全面展开。敌人据险死守并拼命反扑，红军同敌人在雨中多次展开肉搏。红八十八师向剑门关的后关门逼近，封锁敌人后路通道。红二七四团奉令向敌主峰阵地发起进攻。敌人见隘口东西侧山峰均

已丧失，乃凭工事顽抗。红二七四团二营在营长陈五和（即陈康）率领下连续向敌主峰发起攻势均失利。陈五和带伤在前沿阵地动员：“同志们，只要拿下主峰，剑门关就破了！”接着陈营长向全营高喊：“同志们，冲啊！”说罢，带领全营立即跃出阵地，端着刺刀，以泰山压顶之势，一鼓作气冲上山顶。王树声副总指挥在二营发起攻击前命令炮兵连长：“敌人已经集中在主峰阵地上，那是一个集团工事，”他用手指给炮兵连长看，说：“我命令你每三发炮弹必须有一发准确地落在敌人工事里，压制住敌人的火力，掩护二营再次发起冲锋。”炮兵连长向王副总指挥保证：“这一次我亲自上去打，请首长放心！”¹一发接一发的炮弹落在敌人主峰上的集团工事里，战士们高喊杀声，直冲敌阵。红二七四团二营战士迅速冲上山头。溃退的敌人越跑越多，东一群、西一群。二营陈营长也被这意外的情况弄怔了。原来敌主峰上只有一个营的集团工事，另一个营隐蔽在树林中作预备队。由于二营攻击太快，敌预备队来不及使用，两个营的敌人就一齐溃退，漫山尽是人丁。²二营乘胜夺取北山主峰，切断敌向北逃跑的退路，随即将敌人全部歼灭。红军一举占领了敌人所谓“插翅难飞”的剑门关。剑门关战斗，历时半日，歼敌近3个团，约3000人。“敌团长陈林当场被击毙，敌另一团长杨作荣化装潜逃，在营盘嘴坠崖而死；向关外逃散的500余残敌，最后也被红军追击部队消灭了。”³红军攻克剑门关后，敌人纷纷向西逃窜。红三十一军、三十军一部受命乘胜北进，于4月3日占领昭化，歼敌1个团。

至此，敌人沿江防线悉被摧毁，红军控制了北起广元、南至南部约400余里的嘉陵江西岸地区，渡江战役第一阶段遂告结束。敌人在红军突破嘉陵江后，守卫江防的部队迟迟不敢向其上级报

1/2) 陈康：《攻克剑门关》，《艰苦的历程》下，第34～36页。

3) 《红军长征在四川的战斗历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6页。

告，想以最快的速度将红军逼回江东，演个“掩耳盗铃”的把戏，似乎嘉陵江上从未响过枪声，以瞒过其主子。但红军却势如破竹，分三路同时强渡嘉陵江，使敌人顾此失彼无力招架。守敌见红军渡江已成事实，无法隐瞒过去，才于3天后电告蒋介石和四川“剿总”。田頌尧为了减轻战败之责，存有一种以退为进的侥幸心理，乃发电蒋介石请给以“削职示惩”，随着将刘汉雄、何德隅、杨特生、陈继善等一干人等拟定处分报蒋。殊不知蒋介石于4月2日“手令川、中各军将领，田頌尧撤职查办，由孙震暂率二十九军，戴罪图功”^①。指责田頌尧军“防守不严”、“作战不力”、“实属玩忽命令，贻害地方，断难再事宽容。”^②被红军击败之敌川军第二十九军江防部队纷纷逃向射洪、盐亭、三台地区集结；邓锡侯第二十八军主力退缩于广元及其以北地区，另有3个旅和军部所率之部分机动兵力，布防于梓潼、魏城、江油、中坝、绵阳地区；胡宗南部仍在碧口地区迄以西松潘一线。

红四方面军为取得战役的全胜，决定集中主力歼灭梓潼、江油地区之邓锡侯部，并伺机向甘川边展开攻势。4月上旬末，徐总命令红三十一军主力向北推进至羊模坝、三磊坝地区并围困广元；令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出青川、平武分割广元、江油敌军并阻击敌胡宗南部南下，以保障右侧安全，红九军、红三十军和红四军主力，则分别向江油、梓潼地区实施进攻。剑门关战斗后集结于青林口地区的红三十军和红九军各1个师，立即分两路以迅雷之势直趋江油，攻占南部县城的红九军另一部，已于4月4日撤离该城，随后跟进；红四军则以主力一部从剑阁南面的金山、元山、五河一带向梓潼疾进，10日攻占梓潼。

与此同时，红三十军主力、红九军和红四军，分别从剑阁、南部、苍溪、阆中直趋江油。4月10日凌晨，红九军先头部队在当

①② 《民国川事纪要》（1935年4月2日）。

时的江油县城附近的牟家滩渡口乘敌不备渡过涪江，包围了江油县城（今武都镇）的守敌第二十八军杨晒轩第一旅。同时红军前锋直迫中坝（今江油县城）这个当时川陕公路上的要地。红军这一攻势，使四川反动统治中心成都大为震动，邓锡侯的老巢绵阳更受到直接威胁。邓锡侯为解江油之围，保成都安全，拼凑18个团的兵力，由他亲自率领，在飞机掩护下经中坝向江油大举增援。红军侦知这一情况后，除以红九军二十七师继续固困江油（敌被困40天，靠空投度日）外，集中红九军二十师、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及红四军十、十一师各一部布于江油以南打敌援兵。14日，红军与援敌激战于塔子山、雉山关一带，给敌以重大杀伤。15日，红八十八师攻占塔子山主阵地，红二十五师迅速向敌右侧包抄，敌顿时动摇，红军乘机全线展开攻击，将敌援兵全部击溃，歼其4个团，俘敌3000余人，邓锡侯险些被生擒。红军乘胜于17日攻克中坝，18日攻克彰明，21日攻克北川。

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和红三十一军一部于4月上旬向川西北方向推进。目的是出青溪、平武，分割广元、江油之敌，并阻击胡宗南部南下。红三十军三十九师从昭化的宝轮院、白水等地出发，兵分两路，一路向甘南碧口方向急进，打算相机夺取碧口，控制北出甘肃的通道；另一路经先锋、板桥，直趋乔庄（今青川县城）。红三十一军一部从宝轮院沿白龙江西岸，翻山越岭，经观音、骑马、板桥，也向乔庄逼近。红军于十日攻克乔庄。接着派一支部队去攻占川甘交界的摩天岭，歼灭敌胡宗南部1个营。14日，红军占平武。向碧口进攻的红军，被胡宗南部所阻，相持十余日，未能攻下碧口阵地，但起到了阻止胡敌南下的作用。不久，红军撤离碧口阵地，从乔庄经青溪转向平武西进。

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

强渡嘉陵江战役历时24天。总计歼敌12个多团，约1万余人。攻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平武、彰明、北川等

8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迄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给敌第二十八、二十九军以沉重打击，使其不少师、旅失去作战能力。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后南克中坝、彰明，直接威胁成都；北占青川、平武又有北出甘南之势，迫使蒋介石一方面忙着调兵到陕西、甘肃，防止红军北上，另一方面又将刘湘主力13个旅西调绵阳地区，这就打乱了蒋介石原来的战略部署，牵制了大量川军于川西地区，从而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西入云南，北渡金沙江的行动，为以后红一、四方面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西渡嘉陵江战役，还使红四方面军获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的补充，也使部队得到充分的休整。同时，红军在嘉陵江以西的广大地区内，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和群众武装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受到广大劳苦大众的热烈欢迎。他们筹粮筹款，运送物资，踊跃参加红军，支援红军作战。所有这些都为红军以后的斗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由于长期战争的消耗，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实力受损，已无法支持大规模的反围攻斗争。为了摆脱困境和打破敌人正在准备的“川陕会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确定了“依托老区，发展新区，向甘南发展”的方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的胜利，冲破了敌人“川陕会剿”的计划。然而，当红四方面军主力进行嘉陵江战役的时候，川陕根据地内尚留下的红三十三军、4个独立师和妇女独立团以及若干支游击队，在张国焘、陈昌浩统一指挥下抗击着东线敌人和在逐步收缩战线。“但在收缩战线过程中，根据张国焘的指示，不适当地实行‘坚壁清野’，给人民财产造成了损失；不适当地把地方武装集中起来编为4个独立师全部带走，给以后根据地坚持斗争带来困难。”“3月28日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后，向根据地进攻的敌人，胡宗南部于28日占宁羌，王缙绪部4月4日占南部、16日占阆中，唐式遵部8日占南江、长池。在敌人重兵

压迫下，方面军后方机关、省委机关、第三十三军和地方武装，以及部分地方干部，陆续撤到嘉陵江以西，仅刘子才、赵明恩等300余人枪留在根据地支持斗争。敌唐式遵部遂于4月14日占旺苍坝，21日占苍溪。至此，敌人占领了嘉陵江东岸地区并封锁了嘉陵江。从此，红四方面军离开了战斗27个月的川陕根据地，踏上了新的征程。”^①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14～315页。

第三章 抚边相会

一 “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 中央红军

嘉陵江战役后，红四方面军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达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新区。方面军主力集中在涪江地区进行休整，发动群众，筹粮扩红。部队发展到5个军11个师33个团，共8万多人，加上川陕根据地撤出的党政机关人员和职工，总计不下10万之众，武器、弹药、粮食、被服、经费等，也都获得较大的补充。

1935年4月下旬，蒋介石为防止红四方面军在陵嘉江与涪江之间建立新的苏区，同时阻止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合，决定对红四方面军实行南北夹击，其具体部署是：以刘湘主力王缙绪部13个旅为右路纵队，由罗江地区出绵阳、魏城，沿涪江东岸向彰明、两河口、重华堰进击；以邓锡侯第二十八军和孙震第二十九军各一部为左路纵队，由三台、绵阳出动，沿涪江西岸经香水场、双合场向中坝、江油进攻；以胡宗南部南下青川、平武，配合左、右两路军夹击；广元以北的邓锡侯一部南下，向剑阁推进；唐式遵一部守备昭化至阆中一线；李家钰部防守阆中及其以西左壁堰、店子堰一线，阻止红军南下。从总的战略部署来看，蒋介石希望能一举将红四方面军歼灭在涪江地区。

5月初，各路敌军从南北两面向红军逼近。为打破敌人的合围计划，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张国焘讲了四方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北上，以及两军会合后，建立川西北根据地，赤化川、康、陕、甘、青等

省的计划。并提出四方面军下一步应首先占领北川、茂县、理县、松潘一带，在岷江地区建立川西北根据地。考虑到岷江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他还认为应成立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以便于开展工作。与会者一致同意张国焘的意见。

全军指战员得知总部关于建立川西北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北上的计划后，个个士气高昂，精神焕发，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方面军总部决定：首先突破邓锡侯在土门、北川河谷设置的防线，占领岷江流域的松潘、茂县、理县、汶川。

5月上旬，部队先后撤出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向西进发。

初夏时节，天热多雨。部队西进要经过山谷交错的地区，山路崎岖泥泞，江河水位增高，北川河、湔江和它的数条支流，看起来河面很窄，但水深流急。两岸多为悬崖峭壁，河上没有渡船，大都是铁索桥和竹索桥；大部队行军遇到了很多困难。

西进岷江地区，北川、土门所在的一条狭长走廊是必经之路。在这条走廊之间，矗立着伏泉山、大堰口、千佛山、老君山、观音梁子等大山，绵亘蜿蜒约百余里，号称川西平原和成都坝子的“北边城墙”。

红军主力进入北川后，敌四川“剿匪”第一路总指挥邓锡侯十分惊恐。多年来，邓锡侯一直兼任松潘、理番（今理县）、茂县、懋功、汶川屯殖督办，把这一带视为他自己的地盘。为了阻止红军西进岷江地区，邓锡侯精心制定了守备北川河、封锁土门的方案。经重庆行营参谋团和刘湘批准后，即令李炜如旅为先遣，驰驻墩上；令二十八军第五师副师长兼十三旅旅长陶凯，率8个团兵力，驻守土门、干沟、观音梁子、土地岭一带，封锁红军的必经之路。另调藏族奴隶主的马队600人控制干沟。

陶凯为把守土门，布下了三道防线：以一部兵力驻墩上，为前进阵地；以5个团又2个营兵力置观音梁子一线，为主阵地；以

不足两个团的兵力占领土地岭一线，为第二阵地，马队置于干沟附近。敌军凭借有利地形，筑垒据守，层层设防，企图阻止红军西进。

在徐向前指挥下，红军以优势兵力包围了盘踞在伏泉山的敌李炜如旅。这一带的山多呈马鞍形和锯齿形，山头与山头相隔不远，火力可以互相呼应。敌人依仗有利地形，从山脚到山顶，层层布防，又以密集的炮火封锁，采用强攻不仅难以得手，而且会损失巨大。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委郑维山经过商议，决定以二六八团从正面进攻，吸引敌人；以二六五团迂回到敌侧后，从敌人认为无法攀登而守备薄弱的一条峡谷绝壁摸上去，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乘势夺取制高点。

二六五团是长期实战中锻炼出来的一支队伍，打过许多漂亮的夜战，被总部授予“夜老虎”奖旗。他们常常能在敌人鼻子底下行动，搭人梯、登悬崖、攀绝壁、钻草丛、潜深沟，悄悄接近敌人阵地，给敌人以措手不及的打击。每当进攻敌人有准备的防御阵地时，师部总是先把这个团拉上去，将敌人主阵地拿下来，然后同二六三、二六八团配合，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二六五团接受任务后，由团政委黄英祥带领第一营在前，师政委郑维山和团长邹丰明带第二、三营跟进，天黑后从敌人防御阵地之间的一条狭谷洼地往上摸。沿途尽是密密麻麻的灌木丛和峭岩，战士们的脸被荆棘划破了，手被石笋刺伤了，还有的一脚踏空，滚到了山沟里，但谁也不叫一声苦，只是悄悄地爬起来，再往上攀登。这样，用了四五个小时才爬上山顶，于凌晨3时到达主峰。

敌人压根没有想到他们层层设防的阵地会被红军突破。一阵手榴弹的爆炸声，睡梦中的敌人才被惊醒，他们不知红军从何而来，更不知究竟来了多少人，有的敌人还没有醒过神来，已经成了红军战士的刀下鬼。在混乱的敌群中，只见到处是臂系白布的

“夜老虎”，到处是闪着寒光的大刀。敌人匆忙之间，无法组织还击，只好纷纷弃枪弃炮，四处溃逃，有的跌下了悬崖，有的挂在山涧的大树上，高呼救命。二六五团拿下主峰阵地后，一面组织兵力坚守阵地，一面以一部分兵力由山顶向下进攻，配合山下二六三、二六八团等兄弟部队，对残敌实行两面夹击。一时间，山上山下都是红军的喊杀声，敌人难以招架，纷纷夺路而逃。伏泉山阵地全部被红军占领。

邓锡侯得知伏泉山阵地被红军攻破，十分震惊，急调其纵队司令王铭章率8个团，从安县赶到伏泉山南侧的擂鼓坪一带集结，同时派特科司令游广居率7个团赶到草鞋街一带策应，企图夺回伏泉山阵地。

5月5日午后，王铭章在强大火力和飞机的掩护下，将兵力分布在曹山坡、苏仓沟一线，向扼守伏泉山的红军发起全线进攻。

红军指战员坚守阵地，敌人冲上来一批，被打退一批，结果留下了成堆的尸体也未能攻破红军防线。无奈，敌人只好改变战术，以其主力向漩坪东侧运动，企图迂回夹击红军，半路上却遭到红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的痛击，只得再退回擂鼓坪一线固守。红军几支队伍会合后，乘胜猛烈追击，向西扩大战果，于5月6日、7日，先后攻占了东大堰口、百家林等敌人的主要阵地。5月9日，兵临千佛山。

千佛山是北川河谷南侧的最高点，主峰海拔2900米，为“北边城墙”的中心支柱。山势险峻，突兀高耸的山顶上有一佛祖庙，左右是万仞绝壁，只有半山腰有一天然石洞“天门洞”，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守卫千佛山主峰的敌人是四川军阀豢养的“金堂帮”头目赖金亭，他带着由各地民团拼凑起来的“剿共”自卫团和帮会分子，盘踞在佛祖庙，扼守住“天门洞”，配合川军封锁红军西进之路，气焰十分嚣张。

开始，红军从正面仰攻，出师不利，伤亡了部分战士。于是只好再次采取“夜摸”的战术突击队携带短枪、大刀、手榴弹，乘夜由“天门洞”侧后悬崖攀摸上去，突然出现于敌后，一举歼灭敌人一个排，拿下了“天门洞”。后续部队也乘机攻上山顶，占领了佛祖庙。守敌大部被生擒，一些负隅顽抗的被击毙，还有不少在惊慌奔命中跳崖摔死。

与此同时，红二十五师也以猛烈的攻势，占领了千佛山周围几个制高点。5月11日，一举攻下千佛山西侧的大垭口，歼灭敌陶凯一个团。

在千佛山东面，红军第四军、三十一军经过激战，打退了从茶坪方向赶来的敌增援部队，先后攻占了巴罗山、皇宫山、大坪山等敌据点。至此，北川峡谷通道基本上被红军控制。接下来就是攻破西进的最后一道屏障——土门。

位于茂汶、北川、安县交界处的土门，北有连绵耸立的群峰，南有观音梁子、上下横梁子为屏障，易守难攻。坐阵土门的陶凯，曾在江油、中坝战斗中领教过红军的厉害，这次受命封锁土门后，便设置了三道防线，每一道防线重迭配置各种火力，形成密集交叉的火力网。

经过侦察摸清敌情后，总部决定集中兵力先攻取敌人的主阵地观音梁子，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5月15日拂晓发起攻击，二六五团一个营夜袭敌主峰阵地一举成功，其他部队从正面和两侧同时发动攻击，顿时，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交织在一起。两个小时后，敌前沿阵地被突破。二六三团奉命扼守阵地，阻止敌军，其他部队乘胜追击。在嘹亮的号声中，指战员们纷纷冲向敌群，同敌人展开白刃战。前来增援的敌机，由于山林茂密，打不到目标，一阵狂轰滥炸之后，掉头飞去。战斗一直进行到14时左右，红军才攻占了观音梁子阵地。

16时许，红军分两路攻取土门：一路越冷水坪，出大沟口；一

路自老君山直指雨淋蹬，如同两条铁臂，把包括土门在内的敌右翼阵地团团围住。这时，占领墩上、桃坪等地的部队也赶来支援，形成了南北夹击敌人之势。

队守上门右翼阵地的敌军共5个团，由陶凯亲自指挥。战斗一打响，由于红军分割包围，使敌军各不相顾，纷纷乱窜，更多的是钻进了密密麻麻的箭竹林中，使红军不能集中消灭敌人，抓更多的俘虏也很不便。战斗持续到第二天早上，才全部摧毁土门封锁线，陶凯带着残部狼狈而逃。土门封锁线被红军摧毁后，整个北川通道掌握于红军手中。蒋介石的参谋团得知土门防线被攻破，大为恼火，严电刘湘饬其一、二、六各路军，重整旗鼓，趁红军立足未稳之机进行全线反扑，限期夺回伏泉山、千佛山阵地，重新封锁土门，堵截红四方面军西进岷江流域。邓锡侯、孙震、王缙绪等川军头目接令后，聚集安县紧急会商，集合了30多个团，分别从绵阳、江油、绵竹、灌县等几个方面压过来。坚守伏泉山、千佛山阵地的红四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以坚韧不拔的意志，与敌人展开浴血奋战。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等亲临前沿阵地组织指挥，鼓舞士气。部队扼守阵地两个多月，掩护后续部队和党政机关全部顺利地通过了北川峡谷。

5月中旬，先头部队占领茂县后，一部沿岷江南下，控制了文镇关、雁门关、威州等地；一部直逼汶川，占领理番（今理县）。后续部队四军、三十一军一部，则进至镇江关、片口等地，至此，红四方面军控制了以茂县、理番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茂县，位于川西北西进藏区、北进回民区域的要道之上，全县约六七万人口，羌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川西北羌族人最集中的县份。羌族人多从事畜牧业或经商，农业以种植苞谷、红薯、土豆为主。茂县县城约有几百户人家。红四方面军总部就设在这里。

5月下旬，中央红军已进入川康边，正经会理、冕宁北上。所

以，红四方面军总部到达茂县后的首要任务，就是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并做好迎接中央红军的准备。为此，总部决定立即派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该军第八十八师及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西进小金川地区，打清敌人，迎接中央红军。同时动员部队做好两军会师的准备工作，要求以坚守战斗岗位、多多消灭敌人、认真执行民族政策、大力筹集和捐献慰劳品等实际行动，欢迎中央红军的到来。

当时，四方面军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能否在茂县、理番一带站住脚的问题。一方面，部队虽然控制了茂县、理番一带地区，但敌人并没有放弃对红军的围攻。胡宗南部和川军不断发起新的进攻，激战一直不停。由于兵力有限，四方面军只能暂取守势。另一方面，茂县一直在邓锡侯的控制之下，人民备受军阀的压迫，民族积怨很深。加之邓锡侯的反动宣传，当红军到达这个地区后，不少人弃家出走，逃进了深山老林。红军离开了群众，就像没根的浮萍，失去了根基，不仅语言的障碍无法消除，就是基本的给养也无法解决。不要说迎接中央红军到此，就是四方面军的生存也面临严重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首要的问题是稳定军心。为此，总政治委员陈昌浩号召以饱满的战斗热情，克服眼前的困难。5月24日，他在《干部必读》发表了题为《克服一切困难！百倍坚决奋斗！争取更大胜利！》的文章，指出：“我们必须了解，一切物质的困难和粮食的缺乏，都是国民党土匪军阀罪恶的结果，我们遭遇到的粮食的部分的缺乏，正是万恶军阀整害穷人焚烧粮食的结果。为要消灭这一困难，我们的斗争的任务，就是百倍坚决奋战，彻底剿灭蒋介石及刘湘、邓猴子残部！斗争才能克服困难，消灭敌人才能战胜困难。”为了尽快克服眼前的困难，争取少数民族工作就成为四方面军的重要工作。为了使这一工作能够有组织地顺利开展，四方面军成立了西北特委。西北特委颁布了少数民族政纲，其

中有：实行民族自决权，回、番民自己组织政府；没收国民党邓锡侯、汉官、奸商、放高利贷等发财汉人的土地、牛羊、衣物财产、金矿等，分给穷苦回民番民享受；遵从回、番民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信教自由，男女一律平等。西北特委还要求干部战士学习回、番民族的语言文字，以便普遍宣传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并且严令红军必须买卖公平，照货给价；不准乱动回番民家中的一切物件；遵守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等等。

为了适应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四方面军在张国焘主持下成立了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张国焘任主席，下设回番夷少数民族委员会，周纯全任委员长。5月20日，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临时政府回番夷少数民族委员会发布布告，向全西北的少数民族指出：“在过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卖国贼政府的统治之下，回、番、夷等少数民族人民真是好比住在黑暗的十八层地狱下面！……只有苏维埃政府才是全国穷人和被压迫少数民族的政府，是唯一主张解放少数民族的政府，是解放西北回番夷少数民族的救星。”布告还宣布了解放少数民族的12条主张。

在发挥政治宣传工作作用的同时，部队还派战士们想方设法接近少数民族群众，以实际行动感化少数民族群众，赢得少数民族群众的信任。战士们热情地帮助群众背水、劈柴、治病。所有这些，使原来对红军存有疑惧的人打消了顾虑，一些跑进深山老林的人也纷纷返回家园。红军便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把没收汉官的财产分给他们，严格遵守他们的风俗习惯，不随便拿他们的一针一线。所有这些，渐渐感动了他们，他们开始把红军当作亲人，不仅纷纷杀猪宰羊，慰劳战士，还积极报名参加红军。严重的困难初步得到了克服。

为了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也为了给以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5月30日，红四方面军正式宣布组成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少数民族委员会和西北特区委员会。张国

焘任联邦政府主席，熊国炳、刘百成任副主席，周纯全任民族委员会委员长，执行委员共48人。西北联邦政府成立的当天，张国焘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宣言》认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正当着百战百胜的红四方面军大举西征得到无数胜利，西北革命猛烈发展的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树立了西北革命斗争的中心，统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从此南取成都、北定陕、甘，西通青、新，进一步与中央红军西征大军打成一片”；“只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才是中国和西北民众自己的政府，唯一救中国救西北救穷人的政府。”^①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政策，如建立藏族苏维埃和人民政府，实行民族自决，保护信教自由，增加工资救济失业，没收地主阶级和汉官发财人的土地财产牛羊布匹粮食茶叶衣物分给穷人，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劳苦民众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保护劳动妇女和劳动青年的利益等等。

要做好少数民族的工作，就必须依靠党的领导。为此，西北特委作出了《关于党在番人中的工作决议》，规定党对领导番族解放运动的基本路线是：主张番人独立，实行彻底的无条件的民族自决权，实行番人自决领导和组织番族广大民众起来推翻国民党汉官统治阶级的统治，建立番人自己的苏维埃和人民革命政府，同时根据他们自己的意志和中国的工农群众建立革命的联合战线，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打倒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和帝国主义，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决议》还规定了党领导番人解放运动的策略，这就是联合战线的策略：番族穷苦民众，为了要使民族解放斗争能够迅速扩大到很广大的范围，就必须和反对民族压迫以及赞成民族独立解放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喇嘛和一部分小土司土官建

^① 《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9--450页。

立联合战线，来反对汉官统治阶级。

经过强大的政治宣传和红军指战员各方面的艰苦工作，才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迎接中央红军的准备工作有了积极的进展。分得土地的群众，纷纷把自己的财物捐献出来，使部队在短时期内就筹集到羊毛、羊皮、牛羊、盐巴、茶叶等大批物资。群众工作愈深入的地区，筹集工作就做得愈好。一时间，从前线到后方，从总部机关到连队，从地方政府到人民群众，处处在为迎接中央红军而忙碌着，气氛热烈，情景感人。

为了准备迎接中央红军的礼物，指战员们不仅忙着打草鞋，还学会了缝制皮衣服。学会了撕羊毛、捻毛线，用来织毛衣、毛背心、毛袜子。也许这些制成品并不一定都合体，但一件件都浸透着战士们对一方面军指战员们兄弟般的情谊。

这个地区是个缺盐的地区，平时四方面军的战士们都十分珍惜难得的盐巴。考虑到一方面军长途跋涉，艰苦转战，肯定各种物资都极其缺乏，尤其是缺食用的盐巴。战士们想方设法，遍访当地群众，终于得知不远处的白云山上有一种白石头，缺盐的年月当地群众用它熬过盐，只是熬出的盐味道有点苦涩。于是，战士们向群众借来铁锤、筐子，在当地群众的引导下，找到了那种白石头。接连几天，他们白天上山敲石头，晚上回来生火熬盐。熬出的一钵钵的盐凝结了战士们多少汗水和情谊呀！

为了及时与中央红军取得联络并请示今后的行动方针，6月2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致电中共中央，内容大略为：我们已派一小队向西南进占懋功，与你们取得联络。你方先头部队确取联络后，请即飞示以后行动总方针。川西一带情况，都“有利于我们消灭敌人作战，巩固之后方根据地”。

从这封电报可以看出，张国焘等人在西渡嘉陵江之后，对于以后的行动始终处于犹豫之中。从表面上看来，张国焘成立了西

北联邦政府，并且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帮助地方建立了人民政权，似乎要在川西北扎下根来，开创新的根据地，而且在刚渡过嘉陵江之后，总部也是这样向部队动员的。但实地考察川西北的情况后，张国焘又动摇了自己的决定。川西北山高地广，人烟稀少，地瘠民贫，物资匮乏，又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历史上留下的民族隔阂影响了红军和少数民族的沟通，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建立根据地，可能要遇到很大的困难。究竟怎么办？张国焘一直举棋不定。徐向前认为还是原来的川陕甘计划比较好。如果中央红军上来，两军的力量加在一起，可以消灭胡宗南的一部分主力，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与通南巴游击区打通联系，可以更好地发展。但四方面军总部始终未能形成一致的決定，所以只能等待两军会合后，由中央作出今后行动的部署。不过，张国焘等人并没有彻底放弃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打算，认为川西“有利于我们消灭敌人作战，巩固之后方根据地”。

此时，中央红军已经渡过大渡河，占领天全。6月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出指示：“今后我军战略任务，是以主力乘虚迅取懋功、理番，以支队掠邛崃山脉以东，迷惑敌人，然后归入主力，达到与四方面军会合，开展新局面之目的。……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但在遇特殊情况使我们暂时无法直达岷江上游时，则以大、小金川流域为临时立足之地，争取在以后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

李先念率部于5月底从岷江地区西进之后，为了切实做好接应中央红军的工作，徐向前特地把九军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找到设在理县下东门的总指挥部，亲自向他下达任务。徐向前说：“有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交给你：你师立刻做好准备，为中央红军进入懋功打开通道。会师后，向中央首长汇报我们四方面军的情况，还要掩护中央红军安全通过夹金山，以后的具体行动，将由三十军

政委李先念指挥你们。”徐向前还告诉韩东山：“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率领的红一方面军撤离中央苏区后，蒋介石调集大量敌军前堵后追，天上还有飞机轰炸，但是在毛泽东同志正确指挥下，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抢占泸定桥，即将翻越大雪山和我们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这是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历史时刻！你韩东山是迎接毛主席的第一个红四方面军的代表，说不定将来还得给你上书呢！”徐向前对会师前后应注意的事项，尤其是如何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和搞好同中央红军的团结等问题也一一作了具体指示。^①

考虑到中央红军的物资供应问题，徐向前又把川陕省苏维埃副主席余洪远找到军部，对他说：“毛主席、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已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正向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开来了！我们正准备致电党中央，报告所处位置和敌情，并坚决表示我四方面军全体同志，正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红军。’先念同志已率八十八师和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由岷江地区日夜兼程西进，迎接中央红军去了。叫你来，是想要你带领省政府、省委机关一部分和妇女独立团，赶去懋功一带，为迎接中央和一方面军做物资准备，主要是筹措粮食。”“懋功这个地方是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基础没有根据地好，出产也比较差，在那里筹粮困难是很大的。但中央机关和一方面军长征以来，长途跋涉，历尽艰辛，亟需得到粮秣补充，不管有多大困难，也希望你一定完成好，并且要做到‘十二万分热忱’。”^②

接受任务之后，余洪远等人以最快的速度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川陕省委机关一部分和妇女独立团组成了迎接中央红军筹粮

^① 韩东山：《攻克懋功 会师达维》，《艰苦的历程》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49页。

^② 余洪远：《光荣的使命》，《艰苦的历程》下，第42～43页。

工作队。考虑到刚去懋功时准备物资有困难，他们找来几头大骡子，驮上从中坝带出来的食盐、豆豉、海椒面、酱菜和资阳豆瓣，每个同志的水壶里也全都装上这些东西，干粮袋也装得满满的。6月初，工作队由一个工兵营开路，一个战斗团和政府警卫营掩护，向懋功疾速前进。

李先念率部于6月初到达汶川，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带领二六五团、二六八团正在这个地区活动。李先念告诉郑维山等人，中央红军已渡过大渡河，正向四方面军而来，李先念到汶川就是要带领八十八师两个团和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一部，西渡岷江，经懋功，南下宝兴、芦山、天全，去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

从汶川到懋功，行程320里，中间多为少数民族地区，沿途崇山峻岭，还要翻越红桥山，山上长年积雪，空气稀薄，特别是下山时必须经过一个300多米的大雪槽，槽里厚厚的冰光溜溜的，槽两旁则是悬崖峭壁。红九军二十五师是进击懋功的先头部队，他们以急行军的速度前进，仅用3天时间就走完了全部路程，沿途还打了大小20多仗。

6月8日，先头部队在歼灭守敌邓锡侯部两个营和地方武装近千人之后，占领了懋功县城。韩东山师长命令两个营据守懋功，其余部队星夜兼程，奔赴县城东南的达维镇。

6月9日，韩东山师长命令七十四团团长江树华带领三营从达维出发，向夹金山方向前进，一方面警戒灌县之敌，一方面寻找中央红军。三营行进到巴朗地区时与敌人遭遇，全营战士奋不顾身，英勇战斗。敌人被打退了，营长陈玉清和60多名战士却壮烈牺牲了。红军两大主力会师的道路上洒下了多少革命战士的殷殷鲜血啊！

为了保证红一、四方面军能够胜利会师，四方面军总部时刻注意着敌军的动向，并及时向中央红军通报敌军调动的情况。同时，迫切希望得到中央对今后行动的指示。6月12日，张国焘在

给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的电报中，报告了四方面军的军事情况，要求“请立发整个战略，便致作战，请指定会面地点”。电报中还表示说：“数月来，我方战略为与西征军^①配合行动。今日汇合，士气大为振奋。西征军艰苦卓绝之奋斗，极为此间指战员所欣服。诸同志意见，认为目前西征军须稍微休息，可立将我军包抄打主要方向，南打薛岳、刘湘，或北打胡宗南。”

同日，徐向前在致中央的报告里，进一步表达了等待中央指示的焦急心情和盼望两方面军会师的热情。报告在详细汇报了敌我的军事部署之后，指出：“目前我军之当前任务，必先消灭其一个，战局才能顺利展开。因之或先打胡，或先打刘，须急待决定者。弟等意见，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然长途跋涉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也属必要。最好西征军暂位后方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究以先打胡，先打刘，何者为好，请兄方按各方实况商决示知为盼。”“以后关于党、军、政任务如何组织，行动总方针应如何决定，兄等抽人来懋，或我们抽人前来，请立即告知。”报告结尾以炽热的语言写道：“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千万工农群众，正准备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②

二 拥 抱

1935年6月12日，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

中午，一个参谋冒冒失失地跑进了二十五师师部驻地，人未到声先至：“师长，师长，电话，电话！”师长韩东山腾地站起来：

① 即中央红军。

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1～52页。

“什么电话？哪来的电话？”参谋手舞足蹈，结结巴巴地报告说：“来了！来了！七十四团……电话……和中央红军——会师了！”^①

会师了！在夹金山与达维之间，红四方面军的策应部队——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终于迎来了盼望已久的亲人！他们与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会师了！从未谋过面的两军指战员们犹如久别重逢的兄弟，相互握手、拥抱、欢呼、跳跃，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喜悦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战士们肩并肩向达维走去。

此时的达维，已经欢腾起来了。明不吞卯部下命令，战士们已争先恐后地清整驻地，挑水做饭，张贴标语。镇内外到处是三三两两的人群，人们议论着，猜测着，更有不少心急的战士站在镇外的高坡上，向着那朦胧中的夹金山方向久久眺望……

当晚，在达维的一个大坪上，一、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召开了联欢晚会，欢笑声、鼓掌声、歌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一方面军的指战员们齐声歌唱了早已学会的《两大主力会师合歌》，这支歌是陆定一根据《二次全苏大会歌》的曲调填写的。歌词是：

两大主力军，
 祁连山脉胜利会合了，
 欢迎红四方面军百战百胜弟兄，
 团结中国革命运动中心的力量，
 哎！团结中国革命运动中心的力量，
 坚决争取大胜利！

万余里长征，

^① 《艰苦的历程》下，第51页。

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
铁的意志，血的牺牲，
换得伟大的会合，
为着奠定中国革命巩固的基础，
哎！为着奠定中国革命巩固的基础，
高举红旗向前进。

这首歌充分表达了一方面军指战员们与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欣喜心情和争取更大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两个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的当天，由余洪远率领的工作队还在前往懋功的途中。6月13日，工作队翻过了红桥山，到达懋功境内的两河口。当他们听到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已经会师，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将来两河口的消息后，高兴得忘记了翻过红桥山的疲劳和伤痛，连夜准备迎接一方面军的物品。有两条米袋的，让出一条新的来；有两副绑腿的，让出一副好的来；有两双草鞋的，自己只留下一双；有的同志随身的干粮也舍不得吃了，小心翼翼地包起来，准备留给一方面军的战友们。不少同志还连夜动员群众磨糍粑，做干粮。

6月14日清晨，工作队向离懋功20来里的卓木碉镇出发。一方面军的一部分将从这里通过。到了卓木碉，他们抽一些人去城里设粮站，留下的人就在路边埋上几口大锅烧开水，设上粮站，搭宣传鼓动棚，并且组织了一支由工作队员、掩护部队的战士和当地群众参加的欢迎队。一直等到下午两点，一方面军的队伍才开了过来。

小小的卓木碉镇立即沸腾起来。欢迎的队伍迎上前去，与一方面军的战士热烈拥抱，幸福的泪水夺眶而出。一袋袋来自江油、中坝的大米，一包包来自南部盐井的白盐，一壶壶来自资阳、郫县的豆瓣，还有川北山地的茶叶，川西平原的海椒面，阿坝草原

的酥油糌粑和工作队员们亲手缝制的米袋、绑腿、草鞋及一针针编织的毛衣、背心、毛袜、手套……这些凝聚着全川人民和四方面军指战员们深情厚意的物品，一件件送到了一方面军战士的手里。一方面军一个因受伤躺在担架上的团干部，感动得握着余洪远的手说：“感谢老大哥部队呀，可给了我们最大的支援啦！”^①

6月15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代表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中央红军全体指战员发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电，其中说：“你们胜利的转战千余里，横扫西南，为了反帝的苏维埃运动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历尽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造成了今日主力红军的会合，定下了赤化西北的最有利的基础的条件。我们与你们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指挥之下，共同去争取西北革命的胜利。直至苏维埃新中国胜利。”

同一天，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第21期《红星》报，以《伟大的会合》为题发表了社论，高度评价了一、四方面军会合“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决定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发展的事件。这一伟大会合的成功，是五次战役以来最大的胜利”。社论回顾了红四方面军的斗争历程，赞扬“红四方面军是现时中国苏维埃运动三大主力的最大的一个。它的长期的光荣的战斗历史，是不亚于中央红军的。”社论指出两大主力的会合，“使两大主力能在统一的指挥之下，集中力量，赤化全四川，为赤化全中国的事业奠定巩固的基础”^②。

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代表中央红军全体指战员给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们发出了回电，电文是：“来电欣悉。中国苏维埃运动二大主力的会合，创造中国革命史上的新纪录，展开中国革命新的阶段，使我们的

① 余洪远：《光荣的使命》，《艰苦的历程》下，第43~45页

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6页。

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惊惶战栗。我们久已耳闻你们的光荣战绩，每次得到你们的捷电，就非常欣喜。此次会合，使我们更加兴奋。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携着手，打大胜仗，消灭蒋介石、刘湘、胡宗南、邓锡侯等军阀，赤化川西北。我们8个月的长途行军，是为苏维埃而奋斗。我们誓与你们一起，为苏维埃奋斗到底。特此复电。”^①

鉴于两军主力已经会师和四方面军领导人急需今后行动方针的指导，中共中央于6月16日致电四方面军领导人，指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就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至于目前的行动计划，中央认为：“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始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良策。”“我野战军于12日已全部通过天全、芦山之线，18日主力及中央机关可集中懋功、两河口之线，因粮食极少，不能休息，约月底全军可集中理番地区，并准备渡岷江。”

当时，中共中央的战略计划是，两大红军主力会师以后，合力粉碎刘湘、邓锡侯、胡宗南以及薛岳、杨森等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赤化以四川为中心的川陕甘三省广大地区。为此，总政治部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7页。

指示一方面军的战士“与四方面军会合后不是可以放下枪杆，安心休息，而是要战斗，要学习红四方面军以少胜多、顽强作战的勇气；发扬中央红军固有的灵活机动、猛打猛追的特长，与四方面军共同作战。”

中央关于今后行动方针的指示，使张国焘心中甚为不快，因为中央的方针和张国焘计划有矛盾之处。张国焘刚刚在6月13日写了一篇题为《新的胜利和新的形势》的文章，发表在6月14日的《干部必读》第127期，他在文中对今后的行动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西进西康、青海、新疆，到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区域去发展；一是南下，直到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中央的复电恰恰否定了他的方案。张国焘心中虽然不快，经过与陈昌浩磋商后，他于6月17日复电中央，表示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但对两军的具体行动路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东出北川和北打松潘，地形与敌情均极不利，因而主张一方面军沿金川地区北进占领阿坝，四方面军则从茂县、理番北上进占松潘以西，然后两军去青海、甘肃，以一部组成远征军占领新疆，觅机东向陕西发展。为解决给养，隐蔽作战企图，暂时可南下先取岷江以西的天全、芦山、各山、雅安等地。

这样，张国焘与中央领导人还没有会面，便在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6月17日凌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由新寨子出发，翻越了海拔4000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道路险峻的夹金山，下午到了达维，受到在此等候的韩东山及四方面军部分指战员们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十分关心四方面军的情况，刚一安顿下来，就详细询问部队的情况，从军队的建制，干部的成分，思想状况，战士们

的生活、训练、学习，一直问到师团的历史，党的组织建设，部队战斗力，军民关系等，问得十分仔细。

当天晚上，红军总政治部组织了一、四方面军联欢会。联欢会场设在达维镇的一个晒场上，在晒场一端搭起了一个简易的讲台，讲台四周悬挂着几盏油灯。联欢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宣布：“今晚上，我们欢迎四方面军的同志。”话音刚落，台上台下立刻爆发了一阵笑声，他这种反客为主的风趣开场白，使会场立刻活跃起来。

韩东山代表四方面军首先讲话。他介绍了四方面军的战斗历程，并表示今后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完成党交给的一切任务。

毛泽东接着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他说：

“我们一、四方面军会合了，这是红军史上百战百胜的记录，是中华苏维埃有足够战胜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和完成北上抗日任务的力量表现。我们在中央苏区就知道四方面军同志在党的领导下，作战勇敢，创造了川陕苏区，消灭了大量敌人，各方面都有很大成绩。

“我们中国工农红军是打不垮的队伍，是劳动人民求解放的队伍。我们从离开苏区那天起，每天都同超过我们几倍的敌人作战。敌人前堵后追，飞机轰炸，不仅没有消灭我们，反叫我们把他们消灭了不少……一方面军这一次长征，虽然在战斗中有些伤亡，但是，我们锻炼的更坚强，扩大了革命影响，沿途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今天胜利会师了，我们一、四方面军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努力工作，互相学习，搞好团结，为消灭蒋介石反动派，赶走日本帝国主义面共同奋斗。”

朱德总司令也讲了话。

接着，军委文工团演出了在行军过程中赶排的节目。晚10点

左右，欢乐的晚会才告结束。^①

6月18日清晨，灿烂的阳光散撒在达维镇上。毛泽东一行告别了达维，前往川西重镇懋功。

在懋功，早已等候在此的李先念热烈欢迎了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向李先念仔细询问了红四方面军的情况，表示了对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关怀和慰问。

在一座富丽堂皇的天主教堂里，总政治部举行了红一、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盛大联欢会，庆祝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代表四方面军致欢迎词，毛泽东、朱德分别发表了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号召一、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开创革命新局面。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庆祝胜利翻越夹金山！”“庆祝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红军万岁！”的欢呼声响彻在懋功上空。战士们互相拥抱，喜泪盈眶，情景十分感人。尤其是一方面军的战士，更是激动万分，杨成武的话准确地表达了一方面军战士此刻的心情：“200多天，一万多里的征战，我们遭遇到的是敌人的层层堵击和想像不到的重重困难。此刻突然和另一红军主力，最亲密的同志会合了，我们怎能不激动！怎能不欢欣若狂！”^②

接下来的几天里，懋功一直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之中。

6月21日，一、四方面军驻懋功的干部开了一次同乐会。在会议未开之前，两方面军的干部互相交流战斗情况，气氛十分热烈。会议开始后，博古和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治部讲了话。接着便是五大碗的会餐。之后，“火线”剧社、“猛进”剧社和“太阳”纵队表演了节目，赢得了大家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① 韩东山：《朝霞映照达维镇》，《回顾长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2～315页。

^② 杨成武：《翻越夹金山，意外会亲人》，《回顾长征》，第307页。

6月23日，一、四方面军篮球友谊赛又为两军会合后的热烈气氛增加了别样的色彩。开始是分开打，然后是混合打，双方的球艺虽然由于长期行军和作战而显得生疏，但活跃的精神，友好的合作，却为双方留下了美好的印像。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互赠慰问品也成了表达友好感情的方式之一。中央红军干部团和军委纵队，为了慰劳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们，分别捐出700多元。四方面军慰劳一方面军的，都是指战员们亲手制做的礼品，仅三十一军就有：衣服495套、草鞋1386双、手巾152条、鞋子169双、毛袜子419双、袜府191双、毯子100床、布袜子12双。

从6月初开始，四方面军总部与中央的联系电报一直未断，但两军相会时，除李先念外，所有的四方面军高级干部，都正在各自的岗位上，没有机会享受这令人感动的时刻。6月20日，为了统一两军会合后的行动，中央致电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商谈一切。

尚在茂县的张国焘接到中央的电报后，怀着既兴奋又复杂的心情上路了。自从他到鄂豫皖之后，虽然不时得到中央的指示，偶尔也略知朱、毛等人的一些情况，但始终没有再见面的机会。张国焘在鄂豫皖、川陕艰难奋斗时，朱、毛等人也在江西等地苦苦抗争，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大家更是经历了千辛万苦，忍受了百般磨难。能有机会叙叙旧，正是张国焘久已盼望的事情。但是，从中央的数次电报中可以看出，对于今后的行动方针，中央与他的意见不一致，能不能说服他们接受自己的意见？张国焘没有把握。

由茂县到懋功的两河口，沿途多为藏族聚居的村寨。这一带河流湍急，河上的交通工具是竹索桥、木桥、牛皮艇和吊索等；茂密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一座座彼此相接的高山险峻挺拔；被急流冲断的山路崎岖泥泞，所有这些，都给张国焘及其卫士增添了不少困难。3天后，张国焘赶到了两河口镇。

6月25日，两河口热闹纷繁。早一天到此的军委纵队，已经让战士们镇外搭起了台子，布置了会场，镇里的墙上也刷出了大幅标语：“欢庆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尽管天空中浓云密布，大家的热情却丝毫未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刘伯承等中央领导同志，很早就等在镇外的会场上，一方面军的指战员们也排着整齐的队列，欢迎张国焘的到来。

突然间，大雨倾盆而下，滂沱如注，等候的人们不由得焦急起来。

下午5时左右，透过浓密的雨丝，人们看到一行人骑着马奔过来。来人正是他们久久等候的张国焘等人。

毛泽东从遮雨的帐篷中快步向张国焘迎去，翻身下马的张国焘赶快上前去拥抱毛泽东。大家都感到脸上湿漉漉的，是雨水？是泪水？谁也说不清楚。

会场上响起了嘹亮的歌声——《两大主力会合歌》。在歌声中，毛泽东、张国焘并肩走上主席台。

朱德总司令首先致欢迎词。他说：“同志们！……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欢呼快乐的不只是我们，全中国的人民，全世界被压迫者，都在那里庆祝欢呼！这是全中国人民抗日土地革命的胜利，是党的列宁战略的胜利。”

张国焘接着代表四方面军讲话，他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胜利大会师，是两军指战员们英勇的结果，我们欢庆我们的成功！我们欢庆我们的胜利！我代表四方面军的全体同志，向党中央致敬！四方面军过去一直远离中央，没有直接接受中央领导。现在好啦，中央就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在一起。今后我们要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去战斗，去奋进。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藏、回），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大局面的更好条件，我们一

定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①

雨渐渐地小了，欢迎会在歌声和口号声中结束。

会后的酒宴充满了亲情。毛泽东、张国焘、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以及张国焘的秘书黄超等相互敬酒，共同为二、四方面军的会师干杯。久经患难的战友，今日终于相逢。酒宴上大家互诉离别之情，披肝沥胆，充满赤诚的欢欣。

三 拉 拉 扯 扯

二、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一有机会就在二方面军中广交朋友，特别是对二方面军的主力一一一、三军团的领导，更是关怀备至。本来，同是革命队伍中的战友，张国焘略尽地主之谊，也是分内之事，不应该挑剔和指责。但因为他抱着拉拢人心、网罗亲信等目的，因此让人感到这种拉拉扯扯的做法，不是一个党的高级领导人应该有的作风。

两河口会议期间，一天，张国焘邀请二军团的政治委员聂荣臻和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吃饭。当聂、彭二人来到张国焘的住处时，受到了张国焘的热情接待。张国焘与聂荣臻还是在1927年南昌起义时见过一面。那时，张国焘是中央特派员，聂荣臻是第十军党代表。从那以后，斗转星移，转眼8年过去了。一个成了统帅四方面军的首领，一个当了一军团的政委，两人相会，自然感慨万千。张国焘热情地拉着聂荣臻的手，问这问那。对于初次相识的彭德怀，也分外亲热。

为了招待二位客人，张国焘准备了在当时看来十分丰盛的筵席。席间，张国焘对二方面军长期转战所遭受的艰难困苦发出许多感叹，而对于二方面军最终摆脱敌人，与四方面军会师又表示

^① 参见莫休：《大雨滂沱中》、《党史资料》1954年第1期。

万分钦佩和高兴。考虑到一方面军减员严重，张国焘还告诉他们，他决定拨两个团补充过去。

告别了张国焘之后，聂荣臻若有所思地问彭德怀：“张国焘今天为什么请我们二人吃饭？”彭德怀笑笑，答非所问：“人家拨兵给你，你还不要？”聂荣臻忙说：“我要。”但心里的疑云却未散去。

其实，聂荣臻对张国焘是有所提防的。聂荣臻后来回忆：“两河口会议是张国焘野心暴露的起点。这时，经过万里之行的中央红军，军衣破破槛槛，五光十色，在张国焘的眼里，还不如‘他的’队伍有战斗力。本来不管哪个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都是党的部队，谁有战斗力都是好事，可是张国焘他动了野心。我们当时看到四方面军的队伍人员比较充足，除5万多部队外，还从川北带来一些帮他们运东西的男男女女，总共约有8万人。张国焘把这些都看成是他闹独立的资本。另外，在两个方面军会合以后，一方面军中也确有人从一种不正确的动机出发，歪曲地把一方面军的情况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偷偷地告诉了张国焘，也使张国焘起了歹心，认为中央红军不团结，他有机可乘。对张国焘这个人，过去我是了解的。他狡猾阴险，个人野心很大。所以，我对他是有警惕的。”^①

后来，当张国焘与中央再次发生争执时，聂荣臻告诫一军团团长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因为当时聂荣臻获悉张国焘有个方案，要把他调到三十一军去当政治委员，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任军长。林彪听了聂荣臻的话，不以为然，说聂荣臻是宗派主义。聂荣臻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我说这是路线问题。林彪却反驳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聂

^①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第277~278页。

荣臻回答：蒋介石的人更多哩，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两个人谁也不肯退让，竟然动气拍了桌子。”^①

这也说明，张国焘拉拉扯扯的手段并未奏效。

不几日，彭德怀再次得到张国焘的“关怀”。

那是在两河口会议之后。徐向前带着一路部队从理番地区出发，沿黑水河北岸行进。黑水河河面不宽，但水流湍急，浪涛翻滚，深不可测。两岸山势陡峻，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茂密无间。岸上只有崎岖的小道可以行走。沿途的藏族居民因受反动宣传的影响，早已把牲口和粮食转移到了深山老林，有的还不断向红军放冷枪。尤其是藏族上层反动分子进行的袭扰使部队行动不时受阻。

7月中旬，当徐向前部正向维谷开进时，已经抵达黑水、芦花一带的三军团长彭德怀亲率一个团的兵力赶来接应。由于维谷渡口的索桥被敌人破坏，两支队伍只能隔河相望。第二天早晨，徐向前从维谷赶到也念附近，找到一条绳索，坐在竹筐里划过河去，会见了彭德怀。两天以后，徐向前才率部队通过新搭好的桥抵达芦花。张国焘、陈昌浩和党中央领导机关也陆续到了芦花。

就在这个地方，张国焘再次向彭德怀施展小恩小惠的拉拢手段。

一天，张国焘的秘书黄超来到离芦花不远的也念，找到正在这里执行接应任务的彭德怀。黄超对彭德怀说，也念这个地方给养困难，他是特地来慰劳的。彭德怀很受感动，安排黄超住了下来。

彭德怀见黄超送到几斤牛肉干、几升大米，另外还有二三百元银洋，虽然吃了一惊，但开始并没有在意。只是由于黄超后来的一番话，才引起了彭德怀的警惕。

^① 《聂荣臻回忆录》，第283～284页。

黄超住下后，首先就十分关切地问两军会师前，中央召开的会理会议的情形。因为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写信给周、毛、王的林彪，对林彪所谓“走了弓背”的右倾悲观论调大加驳斥。由于林彪信中提议请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这实际上是要剥夺毛泽东的指挥权，所以毛泽东又指责彭德怀，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甚至对张闻天也有怀疑。^①

实际情况是，林彪的信是彭德怀在参加会理会议时才看到的。他看了信后，当时并没有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②但毛泽东却把问题看得严重，而且把根子找到了彭德怀、张闻天那里。关于这一点，两军会师后，张国焘在与中央和一方面军干部的交谈中，已经有所耳闻。也许正因为有这一件事，张国焘才特别看重彭德怀。

黄超询问会理会议的事，引起了彭德怀的警觉。他暗自思忖：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不明白问话者的企图，所以只轻描淡写地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有什么。”

黄超见彭德怀不愿谈论会理会议，便话头一转，很认真地说：“张主席很了解你，知道你很会打仗。”

接着，黄超谈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他说两军会合后，应该在川康一带好好发展一下，待时机成熟后，再行北进。并举出诸葛亮“欲北伐必先南征”的战略名言来说明南下川康的道理。

彭德怀回答说，那是诸葛亮为了巩固蜀国后方的战略计划，与我们目前的战略意图不符合。

黄超又谈到西北的马家骑兵十分厉害，红军没有同骑兵作战

^① 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222页。

^②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199页。

的经验，一旦遭遇，恐难以制胜，等等。

黄超的一席谈话引起了彭德怀的万千思绪。他想到两军会合以来的一些情况，包括张国焘同中央在行动方针上的冲突，张国焘要求纠正政治路线的提议。把所见所闻的情况综合起来进行思考，彭德怀才发现黄超来意非善，是替张国焘来当说客的。其目的无非是想拉拢更多的人反对中央的北上计划，挑拨一方面军的内部关系，阴谋破坏党内团结。彭德怀想到此，立即对张国焘产生一种反感，认为张国焘把全国形势看成漆黑一团，把王明路线造成的恶果同客观形势新的发展混为一谈，否认遵义会议纠正王明路线的伟大胜利。联想到黄超带来的礼物，彭德怀更是甚为反感：送了一点点吃的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元银洋给我是什么意思？这完全是旧军阀的卑鄙手法。想到此，彭德怀立刻警觉起来：张国焘有野心！

在后来的北进途中，彭德怀对与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九军共同行进的前敌总指挥部的领导甚为担心，因为他知道张国焘有野心，而中央似乎没有察觉到。所以从前敌总指挥部抵达巴西后到离开的5天时间内，彭德怀每天都从约20里远的驻地赶到前敌总指挥部和毛泽东的住处。并且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泽东住处不远的地方，以备万一。^①

张国焘万万没想到，自己费尽心机拉拢的人，却成了自己的对立面。

请客、送礼、送人、送枪，张国焘希望通过这些拉拉扯扯的手段，博得人们的好感。不过，在他认为是原则性的问题上，却采用强硬的态度，坚持己见，毫不让步。

如在后来的两河口会议期间，张国焘找到张闻天，专门反映了对党的政治路线的看法。他认为，党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苏

^① 《彭德怀自述》，第200～201页。

维埃运动的政策是错误的。中共中央死抱住苏维埃这个“左”的躯壳，实际执行的却是军事上极右的退却路线，所以一方面军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而四方面军之所以能发展到8万多人，就是因为联邦政府这些正确的政治纲领。因此，他认为，目前最重要的不是解决今后的军事行动问题，而是首先要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遵义会议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如果还不解决，我们就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遭受惨重的失败。如果我们能根据实际情况，放弃既定公式的束缚，放弃成见，大胆地改变错误的政治路线，我们还有希望。

张闻天表示，政治问题只能待军事情况稍有转机时才能讨论。^①

此后，张国焘多次提出要纠正党的政治路线问题。这种不顾实际情况的要求，干扰了军事行动的计划 and 实施，引起了党内许多人的不满。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240~242页。

第四章 争 论

一 两河口会议

鉴于两大主力会师之后，张国焘与中央领导人在今后行动方向上有分歧，中央为了统一思想，于1935年6月20日致电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为了避免各种干扰，中央领导人决定会议在懋功附近的两河口镇举行。

懋功境内的两河口，处于小金川发源地的支流中间和横贯绵亘的虹桥山脉脚下。尽管已是盛夏，但山上的积雪、河里的流水却使这里气候宜人，非常凉爽。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在这里的一座喇嘛庙里举行。

会议的前两天，6月24日，张闻天写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并在当天出版的《前进报》第一期发表。张闻天的文章，为两河口会议定下了基调。

张闻天在文中指出，现在两个方面军所在的松（潘）、理（番）、懋（功）等县地形上不利于作战，物资给养也非常困难，而敌人正在全力封锁这一地区，并进而压迫我们到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青、康地区去。所以如果在这里长久停留或西进青、康，正符合蒋介石的封锁政策。所以，我们现在必须集中全部力量，首先突破敌人的北面防线，将红军主力转入川陕甘的广大地区内寻求在运动战中大量地消灭敌人。因此，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的地区，消灭胡宗南部，已成为整个野战军与四方而军创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最重要的关键，也是目前我们红军的紧急任务。如果

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仍旧以到达一定地区为我们的行动中心，实际上就是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为无止境的逃跑。我们必须同这种逃跑主义的倾向做坚决的斗争。

张闻天的文章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明确指出张国焘坚持西进青、康是右倾逃跑主义。这实际上表明两河口会议的基本思想已经确定。两河口会议的目的，在于统一思想，也就是要说服张国焘同意北上的主张。

6月26日，两河口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博古、张国焘、刘少奇、凯丰、刘伯承、李富春、邓发、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等人。

会议开始后，首先由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军委作报告。他着重分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讲了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战争指挥等问题。在谈到建立新苏区时，他指出，在什么地方创建新苏区，首先要有利于我们作战。在地区的选择上，应是：（1）地域宽大、好机动；（2）群众条件好，汉族人口多；（3）经济条件比较优裕，能解决红军给养的地方。松潘、理番、懋功地区虽然广大，但其他条件不符合，不宜建立根据地。党中央认为川陕甘三省具有上述优良条件。因此，决定我军去川陕甘创建革命根据地，并应迅速前进。他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新的战略方针即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首先占领甘南。因此，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意志，统一指挥，指挥权要集中于军委。^①

张国焘在发言中，对今后的行动提出了3个计划：一是以现在所占领的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名为“川甘康计划”；二是转移到陕西北部行动，夺取宁夏

^①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160页。

为后方，以外蒙古为靠背，即“北进计划”；三是转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以新疆为后方，名为“西进计划”。并且依次分析了3个计划的利弊，总的指导思想是：暂时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以便有时间整理我们的部队，训练对骑兵作战的战术。如果我们经过试验，能够实现川康计划，那又何必北进或西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行北进或西进仍未迟。即使那时北进路线被敌封锁，仍可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所不易封锁的。^①

从张国焘的发言可以看出，他仍然醉心于固守在川西北一带的计划，并认为此计划的优点还在于可以向南向成都打，消灭南部的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向东打地势限制。松潘北边情况还没有确切调查，因此北上有危险。我们去甘南也是站不住脚的。^②

毛泽东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批评了张国焘的计划。他提出5点意见：（1）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造苏区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他们是要打成都的。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实现向北发展的可能。（2）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3）应看到哪些地方是蒋介石制我命的，应先打破它。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4）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们野战，我有20个团以上，是够的；如不与我打野战，守堡垒，就一定要打破驻点，牵制敌人。现在就是迅速打破胡敌向前夺取松潘。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228～230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60页注〔3〕。

在6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5) 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①

彭德怀、林彪、博古、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张闻天，依次发了言，一致同意周恩来代表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博古发言指出，现在川陕甘首先在甘南，依靠群众工作，游击战争，这就影响全国。这是我们的战略方针。夺取松潘，打击胡敌，实现战略方针的枢纽。王稼祥批评了主张退却的错误，指出，如认为一面无敌，后退无穷，这就错了，这是逃避斗争。邓发则认为，一、四方面军会合了，红军主力就在这里，党的力量也在这里，发展前途是推动中国革命的前途。我们现在向前打击，不是打通苏联，而是向前，向甘南发展。朱德强调，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一致行动去打击敌人，并要从政治上保障战争的胜利。

张闻天作了总结性发言，他指出，北上的战略方针大家意见一致；应一致来实现。这个战略方针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可是发生另外一个方针，准备过草原，把口子守了，这是退却的，不适用的。要实现北上这一战略方针，首先要进攻或控制松潘。^②

张国焘在会议上完全陷于孤立的境地，最后不得不表示同意中央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但他心里仍然没有放弃西进计划。

其实，从当时的敌情来看，张国焘的主张是极其错误的。还在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刚刚会师之后，6月20日，蒋介石行营参谋团即判断：红军会合后，稍事整理，势必合力会攻汶川、灌县，进而袭取成都，以谋赤化全川，如果不逞，再向甘、青北进，以期达接通国际路线之目的。根据这种判断，敌人的作战方针是：

^①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60~461页。

^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35年6月26日）。

“我军以先巩固碉线封锁，再行觅匪进击之目的，除于甘、青边境趁时宣抚番夷，坚壁清野，筑碉设防外，对川西地区，应限期巩固各纵横碉堡封锁线，并分集重兵于要点，防匪进犯，及准备尔后之进剿。”并进而制定了十分详细的作战计划，调动胡宗南部、薛岳部、邓锡侯部、孙震部、李家钰部、杨森部、刘文辉部等全力对付已经会合的红军主力。^①可以想见，如果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没有坚持北上的方针，而是同意张国焘的计划，后果将不堪设想。

会后，朱德为了打通张国焘的思想，与他进行了彻夜长谈。朱德对张国焘说，蒋介石虽然派来10万人攻打我们，可是我们也有大约10万兵力。四方而军经过长期休整，兵强马壮，占领松潘地区，夺取战略要点，借以打开北进的道路是没有问题的。但张国焘仍然有顾虑，认为敌人的防御工事强大，攻打松潘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

尽管如此，张国焘还是决定执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6月27日，他向徐向前、陈昌浩发电，就战略方针及北进部署要点作出指示。电文如下：

向、浩：

（甲）战略以首先集中兵力消灭松潘之胡敌，迅速转到甘南，用运动战向前灭敌的方略，创造川陕甘赤区。同时，以小部在洮河、夏河区域行动，以便将来在甘、青、新、宁广大区域发展成为后方。

（乙）战役部署草案：进攻松潘区分为两纵队，左由马塘、墨洼，右由芦花、毛儿盖分进。松平沟、红土坡

^① 《国民党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档案出版社1986版，第281~283页。

方面出右支队，制小姓沟之敌。岷江东岸留箝制部队。懋功方面留掩护部队，理番、卓克基、阿坝地域为作战后方。

(丙) 金、什、彭^① 三弟即开马塘，向墨洼进。

(丁) 速令墨水部队，设法向石碉楼、芦花进，占要点，侦察敌情、地形，集粮食。纯全^② 速等干粮、皮衣、帐棚，河东粮食速运威州，河西病号速运。威州桥搭好否？二六七团或可由马塘去芦花。六包树、锁江桥、都坝河一带尽量游击，不必增兵力去，必要时收到小坝底河西来。

(戊) 部署详情，俟商决后再告。焘或于二日后回关口，面见商执行军委所示任务。

国焘

6.27^③

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了由张闻天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写出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其主要内容是：(1)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2)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3) 必

① 四方面军部队代字，依次指第三十军第二六五、第二六八团和第九军第七十四团。

② 指周纯全。

③ 《张国焘关于战略方针及北进部署要点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5年6月27日)。

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4) 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5)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6月28日，中革军委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林彪、聂荣臻等，决定将一、四方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军，并以12个团组成岷江支队、懋功支队，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前进，进攻胡宗南部。同日，张国焘电徐向前、陈昌浩将部队分为右、中纵队，主攻胡宗南部。

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会议听取了博古关于华北事变、日军向北平进攻等情况的报告，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或通电，写文章，准备向国民党军派工作人员。为了统一军事指挥，会议还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

同一天，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等人根据两河口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制定了关于松潘战役的详细计划。

《计划》根据敌人兵力部署的情况，决定松潘战役的纲领是：以运动战为消灭敌人的手段，北取甘南为根据地，以赤化川陕甘之目的，首先进行的战役，就是要迅速、机动、坚决的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计划》对左、中、右三路军及各支队的政委、兵力、地区及经过道路都作了详细的部署，对各路军和各支队的出发地点、出发日期、第一步集中地点、集中日期、撤动日期等，也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为了保证松潘战役取得胜利，《计划》还对各部队的通

信联络和后勤供应作了仔细的安排。

根据《计划》，中路军由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委，兵力为二十五师、八十八师、九十三师，共10个团，经马塘、壤口、墨洼、洞垭，向黄胜关前进；右路军由陈昌浩任司令员兼政委，兵力为十师、十二师、九十师，共8个团，经墨水、芦花、毛儿盖，向松潘前进；左路军由林彪任司令员，彭德怀任副司令员，政委聂荣臻，副政委杨尚昆，兵力为一、三、五、九军团及八十九师，共16个团，经卓克基、大藏寺、噶曲河、色既坝，向两河口进。中央军委及总司令部随中路军行进。

6月3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离开两河口北进。

同一天，张国焘也离开两河口。

两河口之行，在张国焘看来是很不愉快的。与他来时怀着急切、兴奋的心情完全相反，离开两河口时他的心情是很沉重的。他认为除了朱德之外，其他人如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是联合一起来对付他；另外，他还认为中共中央由于苏维埃政策的错误，招致了军事失败，如今只有乞怜于控制手段。^①对于中央委他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一职，也甚为不满，觉得自己是拥有8万大军的高级党政军领导人，只给了一个军委副主席的职位，也未免有点看轻了张某人。他认为，中央之所以给他个军委副主席，是出自急于控制四方面军的意图，也就是由中央来直接指挥四方面军，达到立即实行北上的目的。张国焘越思越想越感到失望。以后怎么办？张国焘心里想：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二 喜怒芦花镇

张国焘从两河口返回茂县的途中，经下东门时见到了徐向前。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246页。

徐向前急于想知道张国焘会见中央领导及两河口会议的情况，不料张国焘却不愿多谈。他只告诉徐向前，中央红军一路很辛苦，减员很大，和四方面军刚到通南巴时的情形差不多。徐向前最关心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张国焘说：“中央的意见，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甘南，徐图发展。我看还是先取川西南比较好，否则，粮食、给养都不好办。”徐向前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北打有北打的困难，南打也有南打的困难。平武那边，地形不利，硬攻不是办法；松潘地区不利大部队展开。我和昌浩商量，准备扣住黑水，分路迂回袭击，或许能够取胜。南下固然能解决目前供应上的困难，但一则兵力有限，二要翻越雪山，且不是长久立脚之地，万一拿不下来，北出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听了徐向前的话，张国焘沉思良久，最后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未放弃南取邛崃山脉地区的意见。

张国焘回到茂县后，又打电话给徐向前，要他按中央的决定，攻打松潘。具体部署是：以王树声率岷江支队4个团于岷江东岸，控制北川至茂县一线阵地，继续阻止和牵制川军，并吸引胡敌南向；以徐向前、陈昌浩分别率中路和右路，分路经黑水、芦花北进，出毛儿盖，迂回松潘。7月6日，徐、陈率部从理番、茂县出发。

两河口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派出慰问团赴杂谷脑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进行慰问。慰问团成员有：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等。

杂谷脑镇处于川西高原的东端，逶迤起伏的草原，缓缓延伸，与远处苍茫的群山相接，阳光下繁茂的花草争奇斗艳，充满了诗意。如果不是在战争年代，这如诗如画的情景会令人心旷神怡，生出无限的遐想。然而，此刻张国焘的心里却是另一番滋味。

7月初，中央慰问团到达杂谷脑后，张国焘一面安排迎接慰问团的工作，一面暗自思忖：中央为什么要派慰问团来？再一看慰

慰问团到处宣传两河口会议精神，对干部战士十分关怀，受到了广大干部战士的热烈欢迎，红九军政治部编印的《不胜不休》小报更是登载文章，号召广大指战员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统一指导下，彻底消灭川敌残部和胡宗南部，为赤化川陕而奋斗。张国焘心里在想，中央慰问团此行的目的不在慰问，而在向四方面军传达贯彻两河口会议精神。莫非他们信不过我张国焘？

张国焘决定利用中央慰问团来杂谷脑的机会，开始他向中央争权的第一步。两河口会议上，他深深感到自己人单势孤，无法形成多数意见；自己的方案和意图也就无法得到贯彻。鉴于此种情况，他决心利用一切机会，一方面为自己争权，一方面在中央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尽量安插自己信得过的人。他认为凭着自己的实力，这个企图是可以实现的。

从当时两个方面军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的实际情况来看，的确需要在军事上有个统一的指挥中心，以部署和协调各部队的军事行动。但张国焘想利用此机会向中央争权的企图也是明显的。

当中央派出的慰问团在杂谷脑时，张国焘就与慰问团的成员谈话，再次提出解决统一组织问题。从7月6日李富春给朱德、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中，就可以明确地看出张国焘的意图。电文如下：

朱、周、王、毛、张：

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为急图，尤关心于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以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

富春

六日一时

7月8日，张国焘在杂谷脑召开了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抓住《前进报》批评“西北联邦政府”那件事大作文章，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发泄两河口会议以来的怨气。

在张国焘的策动下，随四方面军长征的中共川陕省委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反对对西北联邦政府的批评，建议在全党开展反倾向斗争。此电完全反映了张国焘当时的思想，电文如下：

党中央：

（甲）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是在两大主力未会合以前适应客观环境的需要成立起来的。在理论上、在组织上都是正确的，事实上现在已团结了广大的群众在联邦政府的旗帜下而斗争。最近看到前进报上凯丰同志对联邦政府的批评，据云并未经过组织局正式计划，这一批评，我们是认为不正确的。在目前，苏区必须建立政权，才便于实际领导群众，仍用西北联邦政府名义或改名，究用何名及如何组织，请指示。

（乙）自两大主力会合后，整个革命形势有新的发展与推动，要求中央作一决议，估计目前的形势，并指示各级党部的工作；同时建议在全党要大大发展反倾向斗争，反对对创造苏区失掉前途的情绪，对会合意义的估计不足，失败情绪，夸大敌人的力量，集中火力反对这种失败的情绪；同时要反对自寻的主观主义，不实际进行战斗动员的“左”倾，对红军中的反革命活动要发动斗争，来巩固红军工作情绪。有书面报告中央。

川陕省委

1935年7月8日^①

从电报可以看出，张国焘借《前进报》上凯丰的文章一事，挑动川陕省委向中央施加压力，以其达到他“解决政治路线”的目的。

次日，川陕省委又在张国焘的授意下致电中央，建议加强总司令部与军委，增设常委，电文提出：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部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

把这封电报与7月6日李富春的电报相比较，可以完全看出川陕省委是秉承张国焘的意志而发的，也是张国焘再次向中央争权的一次表演。

从7月初开始，一、四方面军即按松潘战役计划开始行动。左路军在林彪等率领下，于7月2日翻越长板山雪山，进至芦花、黑水地区。接着，翻越打鼓山、仓德山雪山，于10日进抵毛儿盖地区。

与此同时，四方面军除韩东山八十八师先行北上，与左路军同期抵达毛儿盖外，徐向前、陈昌浩也分别率中路军、右路军于7月初出发。途中因石碉楼一战遇到强敌，至7月8日方才攻下。当天，朱德、周恩来致电张国焘：石碉楼既下，请电徐、陈，河东部队应迅速抽调，并应即打通孟董沟到色耳古道路，以便能从多方面进兵。

7月10日，当张国焘得知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已抵毛儿盖后，致电朱、周、毛、王、张，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要能以坚决的意志，迅出主力于毛儿盖东北地带，消灭胡敌；特别要不参差凌乱地调动部队，而给敌以先机之利，及各个击破或横截的可能。此刻应速抽岷江部队分路北上，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4页。

开展我毛儿盖先头部队的战局地域。电报并对各部队部署情况作了安排。同时电告中央，“经马塘七十五团沿黑水进，于13日可到芦花；其余河东之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二七〇团及二七七团，共六个团，则沿黑水于16日可到芦花；三十六团经由红土坡向小姓沟前进中。”

同日，已经抵达芦花的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鉴于四方面军主力未到黑水、芦花一带，致电张国焘：“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弟等今抵上芦花，急盼兄及徐、陈速来集中指挥。”

7月11日，张国焘因“各路挤在芦花一处，红土坡不能使用多兵，黑水交通阻隔，致主力不能如期集结”等事，再次致电朱、毛、周、王、张，提出：“右、左、中三纵队走到一路，宜速令向前、昌浩统一前敌指挥。”

在中央的电令催促下，张国焘于7月16日到芦花。

7月17日，徐向前率部经过艰难的行军，抵达芦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刘少奇等会见了徐向前等四方面军指挥员。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敌情，并分析了形势，指出，今后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红一、红四方面军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毛泽东还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徐向前红星奖章，以表彰他在红四方面军中的贡献。

当陈昌浩从朱德7月16日电中得知张国焘、徐向前日内即到芦花后，于7月18日致电张、徐并转朱德，提出：“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示决大方针后，给

军委独断决行。”^①

张国焘多次争权的电文，中央始终未予答复。但为了团结张国焘，芦花会议前，毛泽东和张闻天还是决定尽量满足张国焘的要求。据时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回忆当时的具体情况是：

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②

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芦花召开。会前，徐向前从朱德那里知道，一方面军保存的干部较多，兵员较少，便和陈昌浩商量，建议从一方面军派些干部来四方面军工作，提出抽调四团兵，补充一方面军。当他们就建议请示张国焘时，张国焘当即同意（后经中央同意抽了3个团去一方面军，即四军三十二团，1100人；三十军二七〇团，1600人；三十三军二九四团，1100人，共3800人。同时，中央又从一方面军调了些有指挥和参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9页。

^② 刘英：《难忘三百六十九天》，《瞭望》1986年第40~43期。

谋工作经验的干部，来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①。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他首先提出关于人事安排的意见：“军委设总司令，国焘同志担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4人，现增为5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国焘同志。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国焘同志尚未熟悉前，恩来暂帮助之。这是军委的分工。”在讨论中，张国焘提出，要提拔新干部，有的可到军委。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也需要人。目前必须抓紧战局的工作，迅速打击敌人。”张国焘见如此，只得作罢。张闻天最后宣布会议决定：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徐向前、陈昌浩为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和政委，博古为总政治部主任。

当天，中革军委通知各兵团首长：“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②

7月21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命致各军首长电》，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即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原第一、三、五、九军团番号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的番号不变。

根据中革军委决定，四方面军各军首长为：四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钧；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32～433页。

② 《中革军委关于朱德仍任军委主席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的通知》（1935年7月18日）。

李天佑；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政委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三十三军，军长罗南辉，政委张广才，参谋长李荣。

同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重定松潘战役兵力区分及部署致各军电》，鉴于我军调动未能高度迅速，及地理、气候、番民关系，致先遣部队与后续部队相隔过远，各方面的配合也尚未完全协调等情况，计划将一、四方面军混编为5个纵队和一个支队，继续北进，夺取松潘。为了确实统一军队指挥，电文指出：“任徐向前为前敌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前方一切作战部队均归其统率指挥，并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军委除发布上述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外，各部行动由总司令部并责成前敌总指挥、政委以命令行之。”

至此，张国焘的心情一直是很愉快的，甚至可以用“欣喜”二字来形容。由徐向前、陈昌浩统一前敌指挥的要求已得到满足；张国焘本人虽然未能担任军委主席职，但能任总政委也可喜可贺。因为这样一来，军队行动的决定者主要是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在张国焘看来，朱德为人谦逊，不擅争权；徐向前、陈昌浩又是他的人，所以，实际权力将掌握在他的手里。张国焘认为目的已基本达到，于是欣然就职。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使张国焘恼羞成怒，与中央的分歧进一步扩大，甚至对毛泽东等人产生了怨恨情绪。

7月21—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开会，集中讨论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博古、王稼祥、李富春、邓发、凯丰、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张国焘首先发言，他系统地汇报了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对敌斗争情况及反“围剿”战略方针等情况。徐向前接下来发言，他讲了四方面军军事斗争的一些情况，着重指出：这支队伍的优点是工农干部多，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听指挥，纪律较好；作战勇敢，打起仗来各级干部层层下放，指挥靠

前，兵力运动迅速敏捷，长于夜战，以二七四团、二六五团夜战最好；平时注意军事训练，射击、手榴弹操练很勤，战后注意总结经验。缺点是文化程度低，军事理论水平及战略战术的素养不够，参谋业务薄弱。陈昌浩也对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作了简略的汇报，他说：“平日每一个政工人员，必须带头执行党所交给的任务；他们无一例外的又带兵又打仗，以自己的勇敢行动保证政治工作发挥更大的威力。”他还特别详细地介绍了敌军工作小组的成立，对敌军官兵的瓦解和争取等工作。

毛泽东发言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起，关于红军的扩大巩固，两个苏区的发展和巩固，无数次击破敌人，总的看路线是没有问题的，但有缺点和错误。军事指挥上的缺点，军委将另行讨论。在鄂豫皖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时，没有充分准备，没有准备打，又打得不好。在通南巴打退了刘湘部队，胜利后又放弃，是个严重错误。毛泽东还指出：红四方面军领导对建立政权有不足和错误的地方，没有严格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切关系，提出西北联邦政府在组织上、理论上都是错误的。^①

张国焘听到毛泽东批评四方面军的缺点，登时怒火中烧。毛泽东刚一说完，他就辩解说：“通南巴固应保卫，松潘也应当控制，但这决定于四方面军的力量，而非决定于主观愿望。我们当时的主要努力是策应一方面军，而我们的兵力有限，不能过分分散使用。如果中央并不以为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的行动是多余的或错误的，就不应苛责四方面军不能完成力不能胜的其他军事任务。川北苏区即使当时留置了较多的兵力，事实上也不能达到保卫的目的，而一方面军当时能否渡过大渡河到达懋功，尚成疑问，四方面军果真全力北向夺取松潘，中央不会批评我们隔岸观火，看

^①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63~464页。

轻忧戚相关的大义？”^①

会场一阵沉默。

只有陈昌浩发言附和了张国焘。

博古发言，他肯定了四方面军的成绩，同时指出了张国焘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②

朱德在发言中认为，对四方面军应给予正确的估量。他肯定了四方面军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力量，多次打破敌人“围剿”中取得的成绩，也分析了在部队政治工作、地方工作及战略战术配合等方面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希望总结教训，加以改进。他对四方面军的工作没有提出过于尖锐的批评，主张目前正处在行军作战期间，一切服从战争的胜利，暂缓讨论军事以外的问题。^③

张闻天作了总结性发言。他首先肯定四方面军很有战斗力，同时指出其缺点和错误在于：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时领导对形势估计上有“左”的倾向，后当敌人分兵合击时，未能抓住敌人弱点，集中打他一路；通南巴打了胜仗还是放弃了，反映对根据地的重要了解不够；退出通南巴时把所有干部、游击队通通带走也是不好的；出通南巴后缺乏明确的战略方针，没有一定的发展方向，造成了现在一些困难。张闻天还指出，四方面军对待少数民族也有些问题，如在两河口把藏民的土地拿来分，引起群众反对；关于西北联邦问题，实际也未弄清楚怎样才算“联邦”，少数民族还没有发动就首先成立“联邦”，结果必将是徒然的。他还强调，在新的环境下创造新苏区是当前的中心任务，揭示过去工作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254页。

^② 李志英：《博古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201页。

^③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0页。

的弱点是为了总结经验。^①

会议最后肯定了四方面军的战绩，认为四方面军执行的是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实现了苏维埃政权的建设，执行了土地革命的政策，对蒋介石和各地军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打击。同时指出了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批评退出通南巴和退出后发展方向不明的错误，以及成立西北联邦政府不妥的问题。会议对四方面军的评价是—分为二的。但张国焘却对中央的批评十分不满，以至于怨恨情绪不断膨胀，不断深化，成为他心中永远也忘不掉、抹不去的阴影。

三 波澜再起沙窝

芦花会议之后，红军主力继续北上，经过长途跋涉，于7月28日到达毛儿盖。

毛儿盖位于松潘以西约150公里处，若尔盖大草原的边沿，在一个比较开阔的山谷之中。山下流过毛儿盖河，山谷上零零落落有几个小寨子，藏民的住房破旧不堪，只有一座相当讲究的喇嘛寺庙透出几分文化气息。

密切注视红军主力的动向的蒋介石行营参谋团于7月18日已判定红军的行动计划是：“先以一部分向毛儿盖、阿坝探进，其余必跟续分途北进，并以大部经毛儿盖，进窜岷县，一部经阿坝，进窜夏河，期达越过洮、黄两河，接通‘国际路线’，或由陇中窜向陕北、宁夏，与陕匪合股，如其不逞，仍回窜川北。”为此，制定了《川甘边区歼匪计划大纲》，除严令胡宗南部在松潘地区筑碉固守阵地外，以王均第三军布于洮河沿线，主力控岷县、临潭；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布于天水、甘谷、武山、陇西一线，主力控陇西；

^① 程中原：《张闻天传》，第241～242页。

以青海、宁夏的马家军布于贵德、同仁、循化、皋兰、临夏地区，主力控临夏。另以第四十五军出懋功，向抚边、阿坝追击；第二十一军越岷江，向理番、毛儿盖、班佑追击；新编第六师李家钰部出威州、茂县，向镇江关，松潘追击；暂编第二师彭诚孚部出白草场，向镇江关追击；战略预备队杨森部控懋功；郭勋祺部控新津；王瓚绪部控绵竹；薛岳部控平武。总的战略目的是：死扼松潘，压迫红军经草地出甘肃、青海，而后在“临潭、临夏、夏河、同仁间，将其聚歼”^①。

徐向前、陈昌浩和叶剑英商定，以多路突击的办法，攻打松潘。但是，由于松潘地形险要，胡宗南兵力众多，凭碉固守，我军火力不足，不论正面突击或迂回攻击，均难奏效。而薛岳部和川军已从东南方向压来。至7月底，红军已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

抵达毛儿盖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首先开会研究敌情，确定行动部署。会议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以红军主力西指阿坝，北进夏河地区，争取在洮河流域消灭阻敌，进入甘南。徐向前和陈昌浩在会上提议，集中红军主力，向一个方向突击。而张国焘却主张分左、右两路行动。会议采纳了张国焘的意见。

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计划》指出，松潘战役由于预先估计不周，番兵阻碍及粮食困难，颇失时机。现特改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计划》规定：中央红军第五、第三十二军和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共20个团，编为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指挥，以主力一部迅速经卓克基，打通到大藏寺、查理寺、阿坝道路，消灭番兵马队。阿坝攻下后，则

^① 《国民党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285～286页。

应急以主力向北控进，以一部兵力打通阿坝到墨洼路，以接引右路军；另以一部兵力在抚边、党坝坚守要点，积极打反，以掩护我军主力转移，同时川敌如进，应坚决扼阻，在有利时机应集中兵力一部，实行回击而消灭之。中央红军第一军和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共12个团，编为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指挥，经竹勋坝向班佑、阿西侦察，准备走此路遭遇和消灭胡敌一部，然后向北转移，以争取进占夏河流域的先机。万一由阿西北进无路，则再改经阿坝前进。除左、右两路军外，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第十一师和第三十五团共7个团，为箝制部队，沿小姓沟至羊角塘箝制松潘之敌，以掩护左、右路军及一切后方前进。中央红军第三和第二六九、第二十九团共6个团，为总预备队，策应各方，并首先打通茨坝、杂窝到波罗子道路，以便在有利进机，经此路循右路军后北进，归右路军指挥。《计划》还规定：后方地区以杂谷脑、卓克基、阿坝为中心。目前仍以卓克基地区为总后方，一切器械资材及伤病员统向该方转移。党及苏维埃工作应在这一地区特别加强，首应准备迅速向阿坝开展。中共中央、红军大学随右路军前进。^①

《夏洮战役计划》确定后，部队即忙着做北上的各种准备。

但张国焘此时另有打算。他对芦花会议上对四方面军的批评一直耿耿于怀，认为只批评四方面军而不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是不公平的，而且在他看来，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不解决，以后的军事行动还会遭到失败。为了压迫中央承认其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张国焘在部队忙着准备北上的这个节骨眼上，召开了一次紧急的干部会议。在会上，他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并提出要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5～97页。

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这次会议的召开，造成了四方面军对一方面军异常恶劣的关系。

为了抵制张国焘的错误方针和破坏团结、反对中央的行为，从全局和全党全军的团结出发，求得共同北上计划的实现，也为了促进张国焘的转变，争取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决定在距离毛儿盖约10公里的沙窝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前，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人就沙窝会议的内容进行了商讨，提出两项议程：一是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二是组织问题。关于第一项议程，张闻天经同毛泽东等人交换意见后，拟就了一个决议草案，并经过征求四方面军的陈昌浩、傅钟等的意见，得到了他们的赞同；关于第二项议程，张国焘先着人带给中央一个增补四方面军同志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张闻天同毛泽东交换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又同陈昌浩、傅钟商量了几次，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做好了沙窝会议的准备工作的。

8月3日21时，张闻天致电张国焘：“请准予明日10时到达沙窝开政治局会议，并请通知傅钟、博古、邓发、凯丰、富春赶来到会。”

8月4至6日，在沙窝这个三面环山，树木葱茏，隐蔽静寂的藏民小村子里，经过无数艰苦磨难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前途，再次同张国焘进行了斗争。静静的沙窝，经历了这样一场中共党内两种不同意见不平静的激烈交锋。

8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沙窝正式开始。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发、博古等。

会议开始后，首先由张闻天作《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草案的报告。接着，大家进行讨论。

张国焘的发言采用了迂回的战术。他没有直接指出中央政治

路线是错误的，而是说：中央的政治路线可能是错了，也可能共产国际错了，也可能是我们执行错了，也可能是时移势易而必须改变。但是，我们要求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决不等于推翻整个中央。我们都经过艰苦奋斗，都为共产主义卖过力，党不能舍弃我们，我们也不能舍弃党。虽然我们不宜贸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所有的苏区都丧失了，红军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我们退到了藏族地区，这些失败的事实是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飞机大炮的厉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主要还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以，不能不从中央的政治路线上找原因。他还利用这次会议吹嘘自己如何正确，再次对中央的批评表示不满，不承认退出通南巴是由于轻视根据地的思想造成的，而是为了接应一方面军。他还对一方面军提出了种种指责，要求一方面军的领导应检查自己的缺点和错误。^①

陈昌浩发言积极为张国焘辩护，并担保张国焘没有反党思想。

周恩来发言指出，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现在的最高原则是取得作战胜利，其他问题要服从这个原则。

朱德发言强调一、四方面军的团结是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有力保证，不能轻率地说谁好谁坏，有缺点错误可以改正。

毛泽东发言讲了3个问题：（1）西北地区进攻的敌人主要是蒋介石。蒋介石用了全部力量对付我们，受了极大损失。从总的方面看，蒋介石的统治不是强了，而是削弱了。（2）西北地区的特点，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西北地区的困难是人口稀少，物质条件缺乏，交通不便，气候条件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258页。

不好等，这些都能克服。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在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有了总的方向，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会取得更大的胜利。(3) 领导全国革命的党中央在这个区域的第一个任务，是要使一、四方面军像兄弟一样地团结。过去我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合的经验，今天可以利用。两个方面军要互相了解，以诚相待，中央军委应负起使两个部队融洽起来的责任。^①

针对张国焘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问题，多数人发言表示同意遵义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即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经遵义会议已得到了纠正。毛泽东也不主张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因为当时军事问题最具紧迫性。

张国焘见大多数人并不支持自己的观点，又提出召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并说明他在鄂豫皖和川北时，曾屡次举行过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成绩都很不错。特别是现在一、四方面军的干部互有隔阂，对中央也有不满，这样，扩大的会议更有必要。他还说，大家不用惧怕这种会议，认为一定会吵架散场，如果我们现在研究好一致的意见，提交高级干部会议讨论，解释一些过去的误会，嘉许两军奋斗精神，提倡互相学习，反面会收团结的实效。^②

由于张国焘的提议根本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尤其是紧迫的军事问题急待解决的情况，所以没有人响应他的提议。张国焘深为失望。

当会议进行到第二项议程——讨论组织问题时，张国焘又开始发难了。

第二项议程一开始，张闻天即本着“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

^①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65页。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259页。

中央工作”的精神，代表政治局提出预先经过磋商的名单，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正式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增补陈昌浩为正式政治局委员；周纯全为候补政治局委员。张国焘一听，这个名单不符合他原来的意图。他原来的意图是增补四方面军干部9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便在数量上压倒当时只有8人的中央政治局。因此，他十分不满意地说：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的原则上，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并借机发挥说，吸收新人参加工作，只是实施党内民主，并不是什么推翻中央领导的阴谋。反之，不让新人参加中央工作，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问题也不让同志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这就无异阻塞了团结之路。他进而提出，应该从一、四方面军遴选少数干部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军委会和其他中央机关的工作，将有百利而无一害。

毛泽东对张国焘说：“四方面军有很多的干部，而我们只提出这几个同志，是很慎重的。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是在特别情形下这样做的。其他干部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之机关工作。”

张国焘大有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气势，他说：“本来我们的意见，要提这几个同志都到政治局的，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际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作。”

毛泽东肯定地说：“国焘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四方面军的好干部将来很可以吸收到中央机关及其他部门来。”

张国焘仍不肯让步，在组织问题上争来争去。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已看透张国焘的用心是企图形成多数来控制党中央，所以在中央委员的人数上坚决不松口。但为了大局，尽一切可能与张国焘搞好团结，在组织问题上还是作出了一些让步，决定陈昌浩、周纯全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会议进行了两天之后，8月6日，张闻天作了总结性发言。认

为，对决议案大家意见无大分歧，同志们也都是保持一致，这是一、四方面军胜利前进的保障。他再次强调遵义会议决议肯定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要求四方面军中党的支部应该讨论遵义会议决议。他还提出西北联邦政府是过早的，在决议中应予指出。在谈到四方面军同志对一方面军的批评时，他首先肯定这样做是好的，是帮一方面军同志来纠正缺点的，同时指出，须注意可能发生的不良影响——过分的批评会妨碍团结的。他认为切实紧要的是现在就要实际去做，通过整顿部队来纠正缺点。

会议最后决定，基本上通过决议案，由常委进行修改。

8月9日，中央印发了沙窝会议通过的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决议》。

《决议》指出，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形势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由于敌人的进攻，红军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部队远离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城市，交通不便，给养困难，内部不统一与冲突，减员、疲劳、冻饿、不满意与失败情绪增长，财政支付空前不敷等。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大大增强了苏维埃革命的武装力量，展开了苏维埃革命伟大胜利的前途。

《决议》提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基本任务是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肯定了中央“北上”的方针，否定了张国焘“西进”、“南下”的方针。《决议》认为要完成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任务，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决议》不点名地批评张国焘，“红军中个别的同志，因为看到党在某些工作中的错误与弱点，而认为是党中央政治路线不正确，这种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决议》对一、四方面军分别作出了估价，而且相当严格地批评了一方面军的弱点，提出“立刻整顿部队”的任务。

《决议》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地域正在少数民族区及今后在西北地区活动的实际出发，指出争取少数民族对于中国革命胜

利前途有决定意义；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组织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是不适当的；对“西北联邦政府”这个引起争论的问题，作出“目前建立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是过早的”结论，其理由是：“目前在少数民族中的基本方针，应首先帮助他们的独立运动，成立他们的独立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应公开号召蒙、回、藏等民族起来为成立他们自己的独立国家而斗争，并给这种斗争以具体的实际的帮助。在他们成立了独立国家之后，则可以而且应该根据他们自愿的原则，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为真正的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中华苏维埃联邦。在这个时候联邦的策略才是正确的。”

《决议》在规定了目前中心工作的12项任务之后，提出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和悲观失望，一方面反对“左”倾空谈和对自己力量的“左”倾估计。认为“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的主要目的，是在教育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以一切努力与牺牲来完成他们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只有对于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党才不迟疑的采取纪律的制裁。”

《决议》最后指出：“放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们相信一、四方面军在党中央及军委领导之下，我们自信能够完成这些任务，能够创造川陕甘西北苏区，以争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①

对于沙窝会议这个决议，张国焘自然是不满意的。徐向前回忆：

沙窝会议之后，张国焘满肚子不高兴，脸色阴沉，不愿说话。陈昌浩向我发牢骚，说中央听不进国焘的意见，会上吵得很凶。我对张国焘、陈昌浩说：现在不是吵架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26~540页。

的时候，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吵好不好呀！当时的确到了闹粮荒的严重地步，我心里着急得很。部队天天吃野菜、黄麻，把嘴都吃肿了。……我想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要命第一。我一再催促张国焘、陈昌浩早走，以后再吵，原因就在这里。^①

四 毛儿盖重定大计

为了使夏洮战役计划能够顺利实现，沙窝会议之后，左路军各部开始以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右路军各部开始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

与此同时，8月15日，党中央在离毛儿盖不远的斜藏村，召开了一、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朱德总司令在会上作了战前动员。他分析了目前的敌我形势，号召全军团结起来，打出松潘地区去，赤化川陕甘边，推动苏维埃，推动全国抗日救国高潮。他指出，现在周围的敌人把重要的交通要道都堵住了，逼得我们非走草地不可。我们要坚决克服困难，打掉草地这只“拦路虎”。两个方面军的同志要团结一致，互相帮助，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胜利地北上。

徐向前也讲了话，他要求两个方面军的同志团结起来，在困难的道路上共同前进，迎接胜利。

会后，朱德即赶往卓克基。当天，左路军先头部队就出发北上，执行夏洮战役计划。

同日，朱德、张国焘电徐向前、陈昌浩等：“我一纵队现在陆续北进，19号可进攻阿坝，续向夏河进，并以一部出班佑方面与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38～439页。

右路联络。右路军及三纵队应速由徐、陈部署，马上蝉联北进，经班佑向洮河右岸移动。……”^①

沙窝会议后尚在沙窝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经过对左、右两路军行动计划的分析，决定改变原夏洮战役计划中关于左路军主力经阿坝北上的决定。于朱、张从卓克基出发的当天（8月15日）致电朱德、张国焘：

（一）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

（二）新麦虽收，总数不多，除备行军十五天干粮外，所余无几。此事甚迫切，再不出动，难乎为继。

（三）目前洮、夏敌备尚薄，迟则堡垒线成，攻取困难。气候日寒，非速到甘南夏河不能解决被服。

（四）毛儿盖到班佑仅五天，到夏河十二天。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两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5K、32K^②即速开毛。

（五）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

（六）望立复。^③

但张国焘仍坚持西出阿坝的方针，甚至提出深入青海、宁夏、新疆的主张。

① 《朱德、张国焘关于右路北进致徐向前等电》（1935年8月15日）。

② 即五军、三十二军。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41～542页。

8月18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左路军大部不应深入阿坝，应从速靠紧右路，速齐并进。

8月19日，朱德、张国焘回电徐向前、陈昌浩，主要内容是：一纵主力与右路齐头靠紧前进，为战胜敌人的先决条件。已令振堂带电台率五军主力于19日由查理寺向班佑探查北进平行路，为一纵由班佑西前进具体准备。阿坝仍需取得，一是财粮策源，必要时可助右路，二是可多辟北进路，三是后方根据。大金川、大藏寺有三四条平行路向阿坝北进，人粮甚多，比芦花、毛儿盖好多了。

从这封电报可以看出，张国焘仍然坚持左路军主力西进阿坝的计划，并且为此提出许多有利条件。

同一天，朱德、张国焘又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指出“查理寺情况不明，由查理寺至班佑路更不知。事实上，右路与左路联络困难，左路若不向阿坝攻击，将无粮并多番骑扰害。”又提出放弃西进阿坝的不利之处。

为了对今后的工作实行有力的领导，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沙窝召开了会议。到会者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列席，周恩来因病未参加。会议主要讨论了中央常委的工作分工问题和宣传问题。会议认为，应该加强常委会的工作，发挥常委会的作用。决定：常委会每周至少一次，各部有临时发生事件，由各部书记商量，必要时召集临时常委会。这一决定，使得在党内矛盾趋于尖锐的形势下，统一领导的权力集中于常委会和党中央书记。会议经过充分讨论，确定中央分工如下：张闻天兼管组织部，李维汉副之；毛泽东负责军事；博古负责宣传部；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会议决定加强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干部必读》和《斗争》分别成立编委会。《干部必读》由张闻天兼主编，编委李维汉、陈昌浩；《斗争》由博古主编，编委张闻天、王稼祥。

会上，王稼祥提出要同张国焘作斗争的问题，毛泽东说：在毛儿盖时已经说过，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目前我们应采取教育的方式。写文章，不指名，不引证。可指定专人搜集材料，研究这个问题。^①

为了实现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周恩来因病，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已去左路军，叶剑英带右路军先头部队先行，彭德怀率三军殿后，均未参加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报告。

毛泽东作了关于夏洮战役后行动问题的报告。他说：我们向北行动以后，存在着两个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向东是转入反攻，向西是退却。蒋敌之部署，正是迫我向黄河以西。向西去，无论敌情、地理、民族、经济、政治等条件，都对我不利。向东发展，则可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西北与陕西交界地区。因此，主力应向黄河以东，支队应向黄河以西去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

王稼祥、陈昌浩、博古、凯丰、徐向前等在会上发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主张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

博古发言说：我们现在有两个口号，一是创造苏维埃新中国的口号，那就应当向东，而另外一个向西到达新疆，新疆少数民族还没有进到土地革命阶段。向西不仅是军事上的退却，而且是政治上的退却，是放弃创造苏维埃中国的退却，所以我们应当向东发展，支持毛泽东北进陕甘的意见。

徐向前说：原则上的问题，中央早已决定。北进夏河后，坚

^①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67页。

决向东发展的意见我赞成。我军北出甘南后，应坚决沿洮河右岸东向，突破岷州王均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东岸向东突击。

陈昌浩也坚决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方针。

毛泽东作了会议总结。他说：今天的讨论意见是一致的。第一，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向东，是积极的方针，我们必须采取这一方针。否则，将被敌迫我向西，陷红军于不利境地。第二，为配合全国红军，全国革命运动，也应向东。第三，从洮河左岸或右岸前进，可视情况而定。如有可能，即采取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北出。这一路线，可集中3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昌浩最大限度集结兵力的意见，是正确的。占领西宁，目前是不对的。第四，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可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可不经阿坝而向右路军靠拢。左路军应看成战略预备队，战役预备队还赶不到，不能指望。总之，必须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决不应因遇到一些困难，转而向西。最后，张闻天宣布：“由泽东同志起草一决议，补充上次政治局会议。”

会后，毛泽东起草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指出：在目前具体的敌我情形之下，为实现6月28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继续发展之有力的支柱与根据地。决定认为，甘陕地区对于我们不论目前与将来的发展都是有利的，而且依据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并为此提出了4点有利的条件。决议又指出，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并为此提

出 3 点不利的条件，强调指出：显然的，如果我们目前采取这种方针，将使苏维埃与红军遭受着损失，并限制其发展。所以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决议最后号召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以工农红军特有的英勇，团结在中央的路线之下歼灭敌人，实现赤化川陕甘，而为苏维埃中国确立巩固不拔之基础。

毛儿盖会议是两河口会议和沙窝会议的继续。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在于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同时，会议对于克服张国焘的阻挠，促进红军北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五章 分 裂

— 张国焘排除异己

沙窝会议之后，张国焘来到左路军的集结地——卓克基。在这里，张国焘一面部署部队行动，一面为另一件事伤脑筋。这件事搁在他心里已好长时间了，他觉得这件事一日不解决，他就一日不得静心。现在，他要率领左路军北进了，如果夏洮战役计划成功，将来红军有可能在川陕甘重整旗鼓，再显往日辉煌，甚至有可能解放全中国，达到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目标。所以，搁在心里的这件事是非解决不可了，如果现在不解决，将来有可能成为心腹之患。

张国焘准备要解决的这件事情，就是被押的曾中生。

张国焘和曾中生的矛盾由来已久……

那还是在1931年4月，当时曾中生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刚刚到达鄂豫皖的张国焘，秉承王明中央的意旨，无视苏区的大好形势，指责“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没有健全的组织，并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路线”，提出要以四中全会为准则，进行彻底的转变和改造。

5月11日，张国焘根据王明统治的中央的决定，宣布撤销鄂豫皖特委，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和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邝继勋任分局委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从此，与张国焘共事的曾中生备受张国焘独裁专权和军阀主义的迫害。

1931年6月，在鄂豫皖红军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之后，张国焘同曾中生等红四军领导人在部队的行动方针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分歧，并由此导致了骇人听闻的白雀园大肃反。

当时，曾中生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和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围剿”的情况，认为红四军主力应主动出击，积极向外发展。在敌人第三次“围剿”尚未到来之前，以一部兵力发动群众，结合地方武装肃清根据地内的反动势力；以主力南下向外发展，恢复蕲春、黄梅、广济地区，进而威逼长江，牵制敌人，以配合中央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但是张国焘却在“巩固苏区”、“一寸土地也不让敌人蹂躏”的口号下，说曾中生的建议“揭开了立三路线的而具，带来了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将会招致敌人再来进攻根据地的危险”，否定了曾中生的建议。

不久，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召开。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等再次申明南下进攻方针的理由，经过激烈辩论，为了实现援助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迫切任务，张国焘才同意了红军南下向外发展的方针。但接下来，张国焘又在红军南下的方向问题上与曾中生等人发生了分歧。张国焘主张红四军在一个月内在打下英山后，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震动南京，进而直接配合中央苏区作战的行动计划。曾中生则认为，红军应有巩固的阵地来向外发展，援助中央苏区的任务，主要的不在于攻击敌人重要城市，而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巩固扩大根据地，以牵制敌人的兵力。因而提出出蕲春、黄梅、广济，占领武穴，截断长江，再沿江直取安庆。但张国焘拒绝接受这一意见，仍将自己的意见在军委会上通过。

7月中旬，红军在军长徐向前、政委曾中生的带领下挥戈南下。8月1日攻克英山后，徐向前、曾中生等将潜山、太湖、安庆地区的情况作了比较，认为蕲春、黄梅、广济地区的敌人兵力薄

弱，红军乘虚而入争取主动，可以调动敌人加以歼灭，对配合中央苏区行动也有明显的效果；而东出安庆，要通过近400里的白区，沿途驻有两个旅以上的敌人，突出冒进，毫无把握。因此，曾中生、徐向前一面将意见报告鄂豫皖中央分局，一面带兵南下蕲春、黄梅、广济地区。

从8月3日到9月1日，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红四军以5个团的兵力连克英山、浠水、罗田、广济4座县城，歼敌7个团，俘敌5000余人，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原拟派往江西中央苏区的兵力，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但是，张国焘对于红四军领导没有执行军委会上的行动计划面火冒三丈，指责红四军领导人改变东进计划是“违抗中央分局的命令”，“脱离后方无阵地的作战”，“重复立三路线”，同中央分局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严令部队立即北返，不得有丝毫的停留。

9月4日，曾中生在鸡鸣河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上公开了张国焘的指责信，并通过了由曾中生向中共中央写的申明书。与会同志都不同意张国焘的指责，要求在申明书中说明东进的不利和南下的正确。

会后，曾中生根据大家的意见，复信张国焘，表示除在组织上绝对服从外，在政治上不得不向中央分局及军委会作极诚恳的必要的申述。信中逐条驳斥了张国焘的指责，对攻打安庆的军事方针再次提出尖锐的批评。曾中生万万没有想到，他和张国焘的南下、东进之争引来的竟是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许多优秀的红军指战员在这次肃反中被迫害致死。

9月13日，红四军北返至麻埠后，陈昌浩奉张国焘之命赶到此地。他当即宣布分局决定：撤销曾中生政委职务，由陈昌浩接任。随后，红四军内开始了大规模的肃反。

9月底，红四军北返至河南省光山县的白雀园地区时，张国焘

亲自出马，主持了著名的大肃反。许多优秀的红军指挥员，如许继慎、周维炯、魏孟贤、熊受暄等，被扣以“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

10月上旬，张国焘又在波皮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处理曾中生等所谓南下的错误军事行动问题。会上，许多干部坚持认为曾中生在军事行动方针上是正确的。张国焘见自己陷于孤立的境地，于是避开军事问题，抓住曾中生在鸡鸣河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这一事实，指出曾中生这种做法是动摇党在红军中的威信，是最危险的，有利于敌人的行动，并进一步给曾中生扣上“反抗中央分局”、“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等罪名，宣布曾中生调离部队接受考察。

当时由王明把持的中央对张国焘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31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在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中指责：“在组织上四军违抗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自由的更改军事计划，拒绝中央分局的正确指示，召集非党会议来反抗中央局的决议，印发中央局的决议到地方党部及军队中下级党部去，并且不经中央局直接向中央报告，企图蒙蔽中央，是严重的反党的错误。这种错误非但是布尔什维克所不能容许，而且是污辱了工农红军中的政治工作的光荣”。“对于四军的主要负责同志，特别是红军积极分子会议的组织者中生同志等，决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同样，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职务亦是不能担任。”^①

在王明把持的中央的支持下，张国焘更是有恃无恐。就这样，曾中生被排斥出了主力军，后来才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黄安独立师长。

1932年秋，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鄂豫皖红军被迫撤出

^① 《中共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信——关于红四军军事行动问题》（1931年11月3日）。

苏区。在敌人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部队伤亡很大。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的错误指挥十分不满。12月10日，部队到达陕西南部城固县小河口的第二天，四方面军召开了部分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曾中生等批评了张国焘在领导工作中的错误和军阀主义作风，要求把部队的行动方针报告党中央。张国焘表面上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并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以便加强集体领导；又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但他却对曾中生这次对自己的批评耿耿于怀。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建立根据地以后，张国焘对于长期“不服领导”的曾中生开始罗织罪名，以便将其控制起来。曾中生的厄运随即到来。

1933年8月，陈昌浩在后方党团活动分子代表大会上，攻击曾中生。接着，张国焘又在《干部必读》上发表文章，称曾中生是“托陈取消派”、“右倾首领”，宣称“党再也不能让这种人来糟蹋，必须执行纪律”。进而宣布撤销曾中生的参谋长职务。

撤销曾中生的参谋长职务并不是张国焘的最终目的。

为了彻底整掉曾中生，张国焘等人煞费苦心地为曾中生罗织了五条罪状：第一，主张红军不应离开鄂豫皖，应分散游击，是企图让敌人来各个消灭红军；第二，在西征途中，提出“到哪里去”的问题，主张回鄂豫皖，计划派人向中央反映情况，这是根本取消革命，要红军向敌人投降，是公开组织开小差；第三，议论和批评张国焘搞个人独裁、军阀投机、家长制度，这是以反对个人来掩饰其反对革命，企图以推翻党的领导来间接推翻红军；第四，提出四川山大人稀、军阀太多、群众滑头不革命、红军不能创造赤区的理论，可是事实打了中生的嘴巴，中生又想把狐狸尾巴夹起来，待机面动；第五，早在鄂豫皖时期，曾中生就是一个立三主义者；立三的半托洛茨基的观点，得到了惯于军事投机的曾中生的极端拥护；中生曾以这种立三路线的观点反对鄂豫皖中

央分局的正确路线，形成小组织式的斗争，结果助长了改组派、AB团、第三党。

曾中生从此掉进了无边的苦难之中。他被逮捕、关押之后，遭受到严刑拷打，并被强令写“自首书”，交代小河口会议和鄂豫皖时期的错误。

当徐向前听说曾中生被关押之后，非常吃惊，立即去找陈昌浩。徐向前问：“这是怎么回事，中生同志也成反革命啦？”陈昌浩告诉他，从苏联回来的余笃三、王振华、朱光、杨白、赵箴吾等，过去就和托派有联系，被共产国际开除或处分过，现在查清，他们都是混进党内的“托陈取消派”。曾中生和他们在一起搞非组织活动。他的问题严重，所以中央同意免他的职，进行审查。陈昌浩说：“向前同志，你不了解情况，不要过问这些事。”徐向前回答：“别人历史上的问题，我不清楚，不敢打包票，但中生同志我们大家都了解他，中央也了解他，有话慢慢说嘛，关起来总不合适吧！”陈昌浩说：“不会关多久，搞清问题就放他，放心好了。”徐向前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嘴里也不好再说些什么。

由于曾中生不屈服于张国焘的压力，便被长期监禁起来。

1935年初，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撤出川陕苏区。曾中生拖着饱受摧残的病体，拄着拐杖，在看守人员的管押下，随着部队向西转移。

6月，一、四方面军会师。曾中生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他认为自己的冤案终于可以了结了。7月初，中央慰问团来到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杂谷脑，曾中生兴奋得立刻奋笔疾书，写信给党中央和张国焘，申述自己长期以来积压在心头的肺腑之言。但信到张国焘手里后，就被扣压了，曾中生的申诉犹如石沉大海。

现在，在左路军主力即将北上的时候，张国焘盘算着如何解决曾中生这个包袱。释放他？矛盾至今没有解决，再者他已被关押了这么长时间，这期间还受了不少皮肉之苦，放出去之后必然

会向中央反映情况，从他的申诉信就可以看出，一旦放他出来，会给自己造成许多不利的影晌。继续关押？左路军此次行军要过人迹罕至的草地，还要长途行军打仗，拖着这么个包袱，确实是个累赘；尤其是将来再与中央会合后，他仍有向中央申诉的机会。干掉他！只能干掉他！张国焘暗自咬了咬牙。

于是，一个杀害曾中生的阴谋在进行中。

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曾中生被押出了监禁他的地方。秋风萧瑟，不时吹起他身上的破烂衣襟，一阵凉意向他袭来，他不禁打了个寒噤。

押送他的人告诉他是去见张主席（国焘），他怀着一丝希望走在两个押送他的人中间。路越走越难走，曾中生支撑着病弱的身子，步履踉跄地走着，不时，树林里的葛藤菁草拉扯着他的衣服，好像在阻止他继续前行。

路越走越难走，月光照在茂密的森林里，只散下几星影影绰绰的光亮，不时传来鸟的哀鸣，给人一种不祥的征兆。曾中生正在疑心：“张国焘怎么会住在这里？”突然，一根绳索紧紧勒住了他的脖子，他痛苦地挣扎了几下，便永远离开了人世。一个35岁的年轻生命，一个戎马疆场、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在卓克基以北的森林里永远告别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

曾中生被秘密杀害后，有人在卓克基的南面大声叫喊：“曾中生通敌逃跑了！向敌人投降去了！快追呀！”

一些武装人员装模作样地到附近的山上进行“搜索”，整整折腾了一夜。

第二天，便有人说：“曾中生通敌，掉进河里淹死了。”

接着，看管曾中生的人被抓起来，审讯、关押，大有追查到底的气势。

结束了，张国焘导演的闹剧终于结束了。被害的人永远含恨；被蒙蔽的人很久以后才知道了事实真相；只有张国焘以及杀害曾

中生的人明白，杀害一个自己的同志和战友心里是何等感受。

曾中生被害后，由于张国焘严密封锁消息，中共中央一直不知道。1936年2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还特意请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电示张国焘：曾中生即使有反动嫌疑，亦须保全其生命安全，并给以优待。他们怎能知道，曾中生已在半年前被杀害了。

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彻底为曾中生平反昭雪，并定为烈士。

曾中生是中国共产党优秀的党员和卓越的红军指挥员，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曾经和曾中生一起戎马疆场的徐向前，怀着对曾中生深深的敬意回忆道：

“曾中生同志是个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的红军领导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对党忠诚，待人诚恳，才思敏捷，浑身充满革命者的战斗激情和力量。鸡鸣河会议和小河口会议这两次同张国焘的斗争，虽在组织原则和斗争方式上有缺点，被张国焘抓住了把柄，但瑕不掩瑜，他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他又是一个能够经受起打击迫害和忍辱负重的人。我记得鄂豫皖时期，因南下之争，被王明一伙和张国焘批得够呛，罢掉了他的分局军委副主席和红四军政委的职务，分配去地方武装黄安独立师当师长。他那时身患肺病，咳得厉害，体质很虚弱。面对政治打击和疾病的折磨，他毫无颓丧、失望情绪，日以继夜地工作，从而，很快使该师发展成为战斗力甚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力量，反第四次“围剿”时，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七里坪恶战，他指挥在前，脚负重伤后，躺在担架上随军转战到川北。在川陕边根据地，他不顾张国焘的继续打击（明的或暗的），一心扑在根据地和红军建设上。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身陷狱中，仍奋笔书就了《与“剿赤”军作战要诀》这篇重要军事著作，由西北军委会印发军干部，

人手一册，成为四方面军干部提高军事理论水平的基本教材。”^①

从徐向前的回忆中，一个优秀红军指挥员的高大形象矗立在我们面前。就是这样一个杰出的红军将领，他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却被“自己人”暗害了，留给后人的是无限的感慨。

二 分路北上

1935年8月下旬，朱德、张国焘率左路军从卓克基北上。

同张国焘合作共事，对朱德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朱德后来曾回忆说：

张国焘这个人，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一般的还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人。有些老同志对他印象都不好，但也没有谁说过他的坏话，因为他那时还是一个党的负责同志。也听说到他是一个‘机会主义’，但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

两河口会议后，在那儿革命军事委员会、党以及苏维埃政府代表们都开了会议，讨论了几天，作下了决议要继续北上。当面张国焘他并不提出反对，却在背后去阴谋来反对这个决议，不执行这个决议——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他素来就是反对中央的这种情形。他开过会回去后马上鼓动自己部下的队伍来进行反对了。……

当时他愿意北上，又不愿意北上的原因，就是想争官做……，到了毛儿盖后，他悲观失望了，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远远的去躲避战争，他却不晓得，在那里人口稀少，地理条件虽然好，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18～319页。

只想取巧，采用脱离群众的办法。他最错误的观念是想到一个偏僻最落后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中央完全否决了他这些意见，中央决定还是北上。……

张国焘的领导四方面军是一贯以个人为出发点，因此党的组织、军事上的组织也就很薄弱了。总之，一切都从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都要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赶走了，或者被杀掉了。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和正路的路线是势不两立的，结果，他搞的党、政、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成为一个独裁者。^①

张国焘这个“独裁者”，在同朱德共同领导左路军后，便极力排斥忍让大度的朱德，以个人意志挟制总部领导，以至于正确的意见得不到贯彻，中央正确的指示得不到执行，最终酿成了分裂的恶果。

从卓克基向西北行至阿坝，中间要通过草地的边缘。秋天的草地点缀着五颜六色的花朵，但行军的指战员却来不及细细欣赏。因为脚下并非平坦的大道，而是经过畜群践踏的小道，这些小道被泛滥的河水纵横分割，不时，会遇到低洼处形成的泥沼，人马稍有不慎，就会直陷下去再也不能出来。

秋天是多雨的季节，给行军带来了许多不便。战士们白天顶着雨行军，晚上又要露宿在潮湿的水草地上。幸亏每隔300里左右就有一座喇嘛寺庙，庙的周围有时还有少数民房和商店，红军偶尔也可以在寺庙中借宿。

由于行前每人带了3天以上的干粮，途中没有遭受饥饿的威胁。但由于以前从未有过草地的经验，露宿的工具极不完备，加之不停地行军，得病掉队的战士很多。

^①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第352～353页。

考虑到红军北进途中需要经过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和环境十分恶劣的草地，川康省委发出了《关于赤化川陕甘与通过草地时地方党的工作指示》。指示中首先说明红军北进的意义在于迅速消灭北边的敌人，在川陕甘广大区域内创造巩固的苏区根据地。为了达到这一战略目的，应该做好下列几项工作：（1）努力争取番民群众。（2）动员一切力量拥护战争。各地党部除动员大批群众参加红军、拿粮食、打草鞋拥护红军外，特别要组织番人在红军路过的地方烧茶、煮稀饭，收容沿路彩病号和掉队的，掩埋路旁尸体，帮助医院搬运彩病号等。并组织群众和红军的联欢大会，密切群众和红军的关系。（3）运用各种手段解决粮食问题，群众的粮食要用钱购买。（4）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切实说明北进的意义，鼓励士气，提高消灭敌人的决心。

毛儿盖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的当天（即1935年8月20日），徐向前、陈昌浩即致电朱德、张国焘：中政局决定，夏洮战役前途主要向东发展，拟右路主要由洮河右岸捷路向岷州哈达铺进，争取洮河岸，洮西及夏河县用一部力量，免大部分放在洮黄二河之间不利，不宜分兵出西宁。左路主力应速攻取阿坝，不然则向右路靠进，以便集中灭敌。^①

8月21日，陈昌浩、徐向前又致电朱德、张国焘：查理寺占后，阿坝又已下，左路可以一部经阿坝，不待肃清该敌，只可迅速向目的地前进。中央局决定，主要是以岷州为根据向东发展，首先以岷、洮、哈达铺为主要目标，争取在洮河东岸与敌决战。今后的发展，或向文县、武县、成县、汉中县，向东南；或向天水、庆阳，向东北，当依当时情况决定。目前主力西向或争取西宁不当。

8月21日，左路军王树声部攻占阿坝。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28页。

尚在西进途中的张国焘、朱德于8月22日到达安得山南。他们接到徐向前、陈昌浩的两封电报后，怎样决定今后行动方向的，后人不得而知，只是从他们当天发给王树声的电报可以看出，当时张国焘对中央关于左路军向东行动的指示仍存保留态度。电文是这样的：

树声：

- (1) 占阿坝后休息两天，速查清道路、敌情，严防敌飞机来袭。
- (2) 如有良好追击灭敌机会，应不顾疲劳的以一部追敌人。
- (3) 五军暂在查理寺不动。
- (4) 主力由阿坝前进时，应留相当兵力巩固阿坝。
- (5) 总司令部带二六七团两营今夜驻安得山南。
- (6) 向、浩今晨由毛去班佑。

朱、张

二十二日^①

8月24日，正在艰难地通过草地的右路军指挥徐向前、陈昌浩，得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按原计划向岷州移动，敌周岩部第十七旅到隆德截堵红军二十五军；夏河县已有马步芳部活动，等等，于是致电朱德、张国焘：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两路主力端出岷（县）、哈（达铺），抑出夏河、洮州？前者则主力向包座、岷州大路进，主要在洮河东打，后者则主力出豆木寺、双岔、班佑。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进，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进。主力合而后

^① 《朱德、张国焘致王树声电》（1935年8月22日）。

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给左路军的通报》，内容如下：

国焘同志：

政治局对于目前战略方针有如下补充决定：

（甲）我军到达甘南后，应迅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线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区域，有计划的大胆的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二省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力根据地，另遣支队向黄河以西发展，这一计划是估计到政治、军事、经济、民众各种条件而决定的，是目前我们主观力量能够执行的。

（乙）若不如此，而以主力向黄洮河以西或失先机，敌沿洮河封锁，致我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的大不利之地位。因这一区域，合甘青宁三十余县，计人口共不过三百万，汉人不及一半，较之黄河以东，大相悬殊。而新疆之不宜以主力前往经营，尤为彰明较著。

（丙）依上计划，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挖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断不宜以右路先出黑错、旧城，坐失先机之利。^①

虽然迭接右路军方面的电报，张国焘却一直按兵不动。直拖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32~133页。

延到8月30日，张国焘才发出了左路军向班佑集中与右路军靠拢的命令。朱德、张国焘率左路军第一纵队向东进入草地，向班佑前进，同时命令位于卓克基、马尔康等地的第二纵队北进，向右路军靠拢。

从张国焘为此发出的电报可以看出，张国焘这次向右路军靠拢并没有按照徐向前、陈昌浩的要求以及中央的精神，全力东进班佑，然后北上。而是看中了阿坝这个地方，因为指示中说：“川康省委以阿坝为中心，瑞龙在阿坝，将来三十一军政治部亦开阿坝，大大开展工作，使阿坝成为苏区一部。”

阿坝是川西藏族的中心，西部草原南边的一座名城，有“藏族成都”之称。城里有一座建筑雄伟的喇嘛庙，四周有千数的喇嘛住宅和上百户的店铺。城外是一片平坦的开阔地，大、小金川穿流其间，河边有大片的青稞地。红军占领阿坝后，喇嘛们大多已经逃亡，留下的粮食足供军队几个月之用。而阿坝以南的大金川、大藏寺也是比较富足的地方，人粮甚多。

张国焘留下部分力量在阿坝开展工作，并要将阿坝辟为苏区的一部，显然是与《夏洮战役计划》相冲突的。

8月30日，朱德、张国焘率左路军第一纵队离开阿坝，向东进入若尔盖大草原。比起前一段从草地边向阿坝的行程，这次左路军的指战员才真正知道了什么是草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水气弥漫，茫茫一片，看不见树木的踪影，听不见水鸟的鸣叫。脚下是终年浸泡在水里的烂草，踩上去软绵绵的，冒出枯草烂叶的气味。有些地方看上去与别处一模一样，实际上却是很深的泥潭，人马一旦踏上去，就会很快陷下去，眼看着也无法相救，直到被泥潭吞没。草原的天气变化无常，一会儿晴，一会儿阴，一会儿细雨霏霏，一会儿暴雨夹着冰雹。指战员们就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艰难地向东移动，许多人被大草地夺去了生命。

编入右路军的四方面军第四、三十军，于8月22日离开毛儿盖，在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下向班佑进军。中共中央领导人随行。

毛儿盖至班佑，是一望无际的若尔盖大草原。部队穿越草原的行军，是入回自然界的一场殊死搏斗。难道若尔盖大草原各处有相同的脾气？右路军所经过的草原如左路军所经过的一样，气候变化莫测，中午还是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下午突然间就黑云密布，雷电交加，一刹那，暴雨夹着冰雹铺天盖地而来。深秋的草原，夜间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穿着单衣的战士冰得瑟瑟发抖，彻夜难眠。被浓密的青草覆盖着的黑色泥沼，一不小心踩上去，人马就会被其吞没。最大的困难还是粮食问题，四野茫茫，渺无人烟，根本找不到粮食，野菜、草根、马鞍、皮带，都成了战士们充饥的食物，用来驮运辎重的牲口和干部们的坐骑，也都尽量腾出来宰杀食用。尽管如此，指战员们仍然要忍饥受寒，死亡和疾病时时威胁着他们的生命，有不少人因此而永远长眠在这人迹罕至的荒原上。唯一能够使大家鼓起勇气，团结起来，共同战胜这恶劣环境的，是一颗坚决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红心，一种坚决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意志。

如果说主力部队过草地已经感到十分困难，那么后卫部队更要经受大草原非人的折磨。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的二六九团就经历了这人间少有的磨难。

在右路军主力部队出发后的第四天，担任后卫工作的二六九团3000多人出发，这个团的主要任务是阻拦尾追之敌和收容全军掉队的人员。

茫茫草地，杳无人烟，部队一无电台，二无向导，全团仅靠一个指北针来确定前进的方向。为了避开沼泽和泥潭，有时不得不拐很大的弯子绕道而行，这样绕来绕去，有时就迷失了方向，再也找不到前方部队的踪迹。再加之已经收容了一部分伤病员，行进非常缓慢，与前方主力部队的距离越拉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大

家只有一个信念：走出草地，完成北上！只要有口气，就要战胜困难走出草地，就是倒，身体也要往前倒！就这样，二六九团独自开始了艰难的草地行军。

随身带的干粮已经在两天前吃光了，饥饿像无情的皮鞭，一阵阵抽打着大家的身体。放眼望去，四野茫茫，哪里有半点粮食的踪影。无奈，只好把准备用来供伤病员骑用的骡马杀掉。然后在驻地周围找野菜，无论谁只要发现有大量的野菜，总要马上通知其他人和兄弟单位来分享。草地能找到的水倒不少，但都是多年淤积腐烂发臭的死水，要找到一点干净的水是非常困难的，加之用来做燃料的牛粪也很缺乏，人们吃着半生不熟、又极不卫生的野菜，时间一长，许多人发生了浮肿，病号日增。有人因为病体不支或者吃了有毒的野菜而丧失了性命。面对这种情况，团领导决定：马上向北转移，寻找新的营地；把牺牲的同志掩埋好，不准丢掉一个病号、一支枪、一粒子弹。命令下达后，全团立即行动起来，重病号由大家轮流抬，轻病号两人负责搀扶一个，身体比较强的同志主动帮助弱者或病号，同志们发扬了高度的阶级友爱精神，互相搀扶，互相鼓励，拖着沉重的双腿，一脚水一腿泥地艰难行进着。痛苦的磨难并没有泯灭指战员们乐观的革命精神，他们编了一些顺口溜，用来鼓舞大家的勇气：“身无御寒衣，肚内饥；晕倒爬起来，跟上去，走到宿营地”；“天上无飞鸟，地上无人烟，茫茫草原，蓝蓝的天，只有红军亲眼见”；“天当被，地当床，暴雨来了当蚊帐”；“翻雪山、过草地，锻炼红军真本事”；“同志们鼓足劲，前面就是宿营地”……

草原上变幻无常的天气给这些病饿交加的红军战士增添了更大的困难。由于没有防雨和御寒装备，战士们白天顶着暴雨行军，夜间露宿在潮湿的草地上。草原的夜晚十分寒冷，大家只能相互紧靠着，蒙上几层褴褛的被单来抵御风雨和严寒的袭击，实在冷得无法，就烧起兽粪来取暖。因此，干兽粪成了宝贵的东西，战

战士们行军途中见到干兽粪，都十分珍贵地全部拣起来，烧不完的兽粪，还舍不得扔掉，再包起来带在身上。

就这样熬过了一天又一天，告别了一个又一个倒下的战友，终于碰到了前来接应的部队：二六九团得救了！这些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战士，在走出草地后的第三天，即同四方面军主力一起，参加了北上以后第一次激烈的战斗——包座之战。^①

右路军在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下于8月末全部走出草地，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

距离这一地区50多公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红军要北上甘南，必须消灭扼守在上下包座的胡宗南部。上下包座相距数十里，包座河纵贯其间，山高路险，森林密布。守敌胡宗南部独立旅二团分守大戒寺、求吉寺，两处凭借山险路隘，修筑集群式碉堡，构成了一个防御区，并备有大批粮食，可以长期坚守阵地。胡宗南得悉红军北进的消息后，急调其驻漳腊的伍诚仁等四十九师，星夜向包座增援，企图扼住红军北进的道路。

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到来之前，攻占包座，打开北上甘南的通路，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紧急任务。徐向前、陈昌浩考虑到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损失太大，战士们由于长期艰苦行军，体力来不及恢复，便向中央建议，由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来承担攻打包座的战斗任务。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

徐向前、陈昌浩研究了作战计划，决心在敌人的援兵到来之前，攻打上下包座，然后集中兵力打敌援兵。具体部署是：以三十军八十九师两个团和八十九师另外一部攻击包座以北的地区，相机打援；以四军一部攻击包座以北的求吉寺；一方面军作预备队，集结于巴西和班佑地区待机，并负责保护党中央的安全。

^① 潘峰：《艰苦的草地行军》，《艰苦的历程》下，第103～109页。

为了保证战斗取得胜利，徐向前将指挥所设在上下包座之间的末巴山山头上，这里北能看到求吉寺战场，南能观察到大戒寺全貌。为了观察敌人火力配置情况，徐向前亲自来到大戒寺、求吉寺几百米的地方，隐蔽在森林中进行勘察。不料，被敌人发现了动静，枪、炮一齐向徐向前等人隐蔽的地方射来。警卫员出于对首长的担心，几次劝徐总低姿观察，但他说：“太低看不清楚。这是北上途中关键的一仗，不把敌情、地形搞清楚，怎么行呢？”他不顾身边飞来的子弹、弹片，一边用望远镜继续观察，一边把敌人暴露的火力配置全部标记在地图上。

8月29日，红四军、三十军各部队指战员，怀着坚决打好这一仗的必胜信心，按照前敌总指挥部的命令到达指定位置。黄昏，二六四团向大戒寺守敌发起了攻击。敌人凭借已控制的制高点和外围松林六七个据点，向我进攻部队疯狂扫射，使红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刚刚战胜草地这个凶恶敌人的坚强的二六四团指战员，打得非常勇猛顽强。经过一夜激战，扫清了外围所有据点，歼敌两个连，攻占了大戒寺。余敌退据大戒寺山后的碉堡里负隅顽抗，等待援兵。为了诱敌援兵靠近，红军采取围而不打的方针。30日夜，援敌四十九师先头部队二九一团进抵大戒寺以南。为诱使援敌全部进入红军的伏击圈内，二六四团略予阻击后，奉命且战且退至大戒寺东北山区隐蔽，只留下少数兵力监视敌人行动。当夜，援敌进至大戒寺。次日，敌师长伍诚仁亲自指挥部队继续前进，狡猾的敌人先用一部分兵力搜索前进，待与红军接触后，先以局部战斗夺取有利地形，主力再继续前进。徐向前命令三十军主力隐蔽好，只以正面的二六六团进行节节抗击，继续诱敌深入。二六六团遵照命令，在一些次要的山头进行抗击，给敌人以杀伤和消耗后就步步后撤。敌人摸不清红军意图，又因包座告急，救急心切，结果正中了红军的埋伏。当天下午3时，当敌二九一、二八九两个团进到包座河西岸，二九四团进到包座河

东岸，敌师部进到大戒寺以南时，徐向前见敌人全部进入埋伏圈中，便下令总攻。隐蔽在山上的红军将士，一齐向敌人出击，顿时，枪声、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整个六七里长的战场上，成了一片火海。

敌人遭到突然袭击，便抢占要点，拼命进行反击。这时，红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由包座河以西像一把钢刀一样突然插入敌二九一团和二八九团中间，并切断了包座河东西两岸敌人的联系，将敌分割成三块。敌二八九团和二九一团拼命从南北两面向二六八团夹击，但二六八团将士英勇拼搏，连续打垮了敌人数次反冲锋。接着，二六三团在二六八团的协同下，猛攻包座河西北端的敌二九一团。激战一小时，即将该团歼灭。随后又向南面的敌人二八九团发起攻击。为了不使敌人逃窜，徐向前命令八十九师二六七团向敌左翼迂回，抢占大戒寺南山要点，断敌退路；二六六团从正面向敌人攻击，使其头尾不能相顾，协同二六三团歼灭敌二八九团。同时，隐蔽在包座河以东森林中的二六四团，以突然动作向敌人二九四团发起攻击。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红军居高临下，敌人背水为阵。不过，红军虽然在地理上占优势，但敌人有纵深配备，并占据了一些小山头，尤其是满山的松树的灌木丛，成了敌人用来作掩护的屏障，敌人依靠这些物体，进行拼命的顽抗。为了夺取战斗胜利，三十军所有师、团的预备队以及军部的通信连、警卫连、保卫排等都投入了战斗；军、师、团的机关干部和一些勤杂人员也都拿起枪参加了战斗。英勇的红军将士，不顾刚出草地的疲劳，忍受着饥饿，在包座河畔、在密林中，用刺刀、手榴弹、大刀和敌人展开了厮杀，整个战线展开了肉搏战，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又冲上来。有的战士负了重伤，已无法拿起枪来，但仍用一只手抓起手榴弹，用牙咬开盖，滚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大家只有一个信念：消灭敌人。

与此同时，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一部也向求吉寺的两营守敌发起猛攻。敌人凭险固守，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徐向前总指挥亲自来到战场指挥作战。求吉寺的围墙又高又厚，敌人在庙后的山上筑了坚固的工事，控制着制高点，给红军攻击造成了很大的威胁。红军将士前仆后继，虽然消灭了敌人一个多营，自己伤亡也不少。战斗中，四军第十师师长王友钧身先士卒，为了掩护部队攻击，他端起机枪，架在警卫员的肩膀上，向敌人猛烈扫射，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4岁。他同千百个在战斗中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们一起，为开辟北上道路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经过七八个小时的激烈战斗，红军终于取得了全胜。固守在大戒寺后山高地的200多敌人，眼见大势已去，在红军的政治攻势下，全部缴械投降。

包座战斗，共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机枪50余挺、电台1部，还有大批的牦牛、骡马、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使北上红军得到了很大补充。四方面军三十军、四军的将士们不顾疲劳、不怕牺牲，胜利完成了打开北上通道的艰巨任务，取得了全歼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部一个师的重大战果，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立下辉煌的战功。

包座战斗的胜利，扫清了红军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为实现党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做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在听了徐向前的战斗情况汇报后，高兴地赞扬说：“四方面军干部、战士英勇善战，打得好！”

三 事出噶曲河

包座战役结束后，蒋介石急令位于松潘、漳腊地区的胡宗南部绕道文县开往西固堵截红军北出。而胡宗南则要求待薛岳部到

松潘、漳腊、南坪接防后，才能北进。这时，东北军主力正在“围剿”陕甘红军，于学忠部尚远在陕甘交界的徽县、两当地区。甘肃南部的文县、武都、西固、岷县广大地区敌人兵力空虚，碉堡封锁线尚未筑成，正是红军北上陕甘的有利时机。

1935年9月1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要求催促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电文指出：“目前情况极有利于向前发展，……下包座地区去西固5天左右，去岷州6天，路大房多粮足，罗达以东，即完全汉人地区。”“右路军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线为度。”“候左路军到达，即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①

9月2日，已在草地上行军3天的左路军在东进的过程中被一条名叫噶曲河的河流拦住去路，张国焘利用这一时机，再次南下，另立中央，使许多革命战士的生命之花又一次凋谢在川西这块古老而荒漠的土地上。

康克清回忆：

过了几天，来到噶曲河边。董振堂带着红五军正准备涉水过河，张国焘却说河水看涨，谁也不准过河。老总（即朱德）问藏民，藏民说：“这河虽宽，但是不深，只要不涨大水，可以徒步过去。河面有近百米宽，水流不急，不像涨水样子。”但张国焘一口咬定河水正上涨，不能过。老总说：

“空谈无益，还是派人下去试试，”

张国焘不肯派人，潘开文（朱德的警卫员）站出来：“我去！”老总叫他骑上他自己的马。他问明了藏民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38页。

过河的路线，拿了一根棍子，同红五军的一个战士一起骑马下到河里，不大工夫，到了河中心，用棍子试了试河水深度。到了对岸，听见他高声地说：

“水不深，最深的地方才到马肚子，大家快过来吧！”

部队立即准备下水，张国焘吼叫：

“谁也不准过！叫他们两人给我回来。”然后对老总说：

“河水分明在上涨，我不能拿几万人的生命当儿戏。”

老总说河水并没有涨，即使涨，也涨得很慢，现在正是大队人马过的好时机。刘伯承也过来说，两个人都过去了，证明河水不深，应当抓紧时机赶快过河。董振堂过来请示：

“总司令，我们前卫队先过去吧！”

张国焘竟然不等老总说话，大声吼叫：

“不行！现在谁也不准过河，要等河水不涨了，才能决定。”

他的蛮横，使左路军只好在嘴曲河边宿营。

第二天早晨，天空密云不雨，河水明显地退了许多。朱总司令正在组织部队过河，作战局向他报告说，四方面军的部队已按张国焘的命令返回阿坝去了。这时红五军长董振堂来见朱老总，气愤地说，他因为坚持要过河，不等总司令的命令决不后撤，遭到张国焘的训斥，还被张国焘打了一记耳光……①

潘开文回忆：

① 《康克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170页。

噶曲河离班佑很近，只要走三五天就可以与毛主席、党中央会合。但是，张国焘却借口河水上涨，说部队过不去，在噶曲河停止不前。朱总司令在河边看了看，便叫我去试一试河水的深浅。虽然当天下了一点雨，河水涨了一点，但是，我骑马趟过了河又返回来，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队伍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朱总司令看到这种情况后，多次提出要部队过河北上。可是，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张国焘总是按兵不动。^①

事实可以不辨自明了。

左路军9月2日抵达噶曲河后，张国焘即以朱德和他的名义给徐向前、陈昌浩发去电报，电文如下：

徐、陈：

（一）噶曲河水涨大，不易消退，侦察上下三十里，均无徒涉点，架桥材料困难，各部粮食只有四天。

（二）噶曲河水小时能徒涉，我们不能待，现在继续侦察徒涉点，并设法架桥，明日各部均在原地不动。

（三）请你们酌派（带工兵连）一二团兵力，由二十四马鞍腰，经牙磨河草区到达渡河点，与我们会合。噶曲河右岸有树林，可架桥。

（四）请速查清班佑、阿依跟康、上下三安曲、查理寺道路，以便将来二纵队改由该路进。

（五）注意右翼，防敌打断我们右翼联络。

朱、张

^① 潘开文：《临大节而不辱》，《工人日报》1979年7月6日。

九月二日^①

9月3日，张国焘又发出电报，完全改变了2号电报中所作的部署，内容如下：

徐、陈并转呈中央：

（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有两天，电台已粮绝。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赶回阿坝。

（乙）如此，已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粮绝，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

（丙）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执行。

朱、张
三日

这封电报虽然是以朱德、张国焘两个人名义发的，但此电及此后以朱、张名义发出的违背中共中央战略方针，以至反对党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的电报，都是张国焘盗用朱德的名义发出的。

中共中央在1936年7月14日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的报告中指出：“朱德同志过去与中央完全一致，分离以来受国焘挟制，已没

^① 《朱德、张国焘鸣曲河涨水左路军东进受阻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5年9月2日）；此电及此后以朱、张名义发出的违背中共中央战略方针，以至反对党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的电文，均系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朱德是始终拥护中央，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统一的。书中为保持文件原貌，均照录。请读者注意。

有单独发表意见的自由，但我们相信基本上也不会赞成国焘的。”

朱德在1960年11月9日的谈话中也曾说明：“到阿坝时，张就变了，不要北上，要全部南下，并发电报要把北上的队伍调回南下，我不同意，反对他，没有签字。”

徐向前接到朱德、张国焘9月3日的电报后，已经意识到张国焘是连北进的方针也不同意了，实际上是要南下。因为，他很清楚，张国焘电报中所提的“理由”并不能成立。一是所谓噶曲河涨水，无法徒涉和架桥。其实，四方面军有一支100多人的造船队，就在左路军，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具，不成问题。二是所谓粮食缺乏。其实，阿坝那一带，粮米较毛儿盖地区要多，张国焘以前也来电说过。徐向前根据右路军过草地的经历，认为：我们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稞，还不是通过了草地！他们的粮食，绝不会比我们少，过草地有什么不行？更何况我们还要派部队带粮去接应他们呢？所以，他断定：张国焘这是找借口，与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

这时，徐向前已令红一军一师为先头部队，向俄界地区探路开进。文县、武都、西固、岷州一线敌人兵力薄弱，筑碉未成，正是北上的好时机。中央一方面急切地希望早日北上，一方面又焦急地等待张国焘回心转意，希望一、四方面军能够合力北上，共同创建川陕甘苏区。

但这时的张国焘，决心一意孤行，彻底放弃北进的方针。

这样，张国焘与朱德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陈明义回忆：“在总部的一个帐篷里，张国焘和他的秘书黄超同朱总吵，要朱总同意南下，态度很激烈。当时我是总部一局一科参谋，不知道他们吵得对不对，但总觉得他们用这样态度对待总司令不对。张国焘还煽动个别人给朱总施加压力，但朱总一直很镇静，他说他是—

个共产党员，要服从中央，不能同意南下。”^①

9月5日，已经到达噶曲河畔的左路军第一纵队，在张国焘的强令下，开始返向阿坝，二过草地。

二过草地正值深秋，部队无衣无食，行军的艰苦情形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一望无际的草地，时常笼罩着阴森迷茫的浓雾，使人辨不清方向。茫茫的泽国，到处都是草茎和腐叶掩盖着的无底泥潭，又有不少战士牺牲在这泥潭之中。夜晚的严寒侵袭着战士们用破烂的单衣裹着的身体，大家只能背靠背坐在一起，互相温暖着冰冷的身体。随身携带的粮食已经全部吃完，只能靠野菜草根来充饥。风雨、严寒的折磨和饥饿的煎熬，使大家的身体越来越弱。不少人走着走着就倒了下去，长眠在这片荒无人烟的草地上。

如果说男同志难以忍受草地这非人的折磨，那么对于女同志来说，草地更是像地狱一般。在四方面军中，有许多女战士，她们其中有不少人在二过草地时牺牲了。据妇女工兵营当时的营长林月琴回忆：“我们只能吃一点灰灰菜。前面的部队将叶子摘光了，我们只好连梗子一起煮了吃。梗子上尽是筋，直拉嗓子，实在难以下咽。勉强咽下去，有时又从胃里翻上来……不少同志肚里无食，连冻带病，头一天躺下，第二天就起不来了。李中兰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她虽然仍然像喜鹊一样，断不了经常说个笑话，可声音越来越小，步履也越来越艰难。一个阴雨天，她拄着棍子一步步往前挣扎，在一块沼泽地里，她摔了一跤，就再也没有爬起来。她已经耗尽了自己的精力，在这茫茫草地上安息了。”^②

张国焘对抗中央北上方针，坚持南下，为了实现他的野心，葬

^①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第355页。

^② 林月琴：《回忆妇女工兵营》，《艰苦的历程》下，第230页。

送了多少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啊！

就在左路军返回阿坝的途中，9月5日，张国焘致电倪志亮、周纯全并转王宏坤，指示左路军第二纵队“应巩固阵地，伸前游击待命”；已经北移的部队，应遵照命令“移到指定地点，执行任务，并筹点粮食”；“其余各部队，各就现到地筹粮待命”。这封电报同时发给徐向前、陈昌浩。

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通过，率部返回阿坝，对此，徐向前、陈昌浩心急如焚。陈昌浩天天往中央驻地跑，希望能找出个妥善办法来。

9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根据所掌握的情况，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右路军先头部队已到旺藏寺、麻牙寺，沿途隘路、深河、桥多、粮富；右路军主力正在续围救济寺、脚仗寺，由上包座向南坪、黄胜关各处搜索百里无敌情，通南坪路上有粮房。而且胡宗南部不向岷县开进，故提出：“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电报中还对中央关于南下或北上的意见以及他们两人的意见作了汇报：“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要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明明要求张国焘与中央局商议后，再定北进或南进的问题。但张国焘接到电报后，根本没有与中央局商议的愿望，而是复电徐、陈停止北进，准备南下。电文如下

徐、陈：

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朱、张^①

陈昌浩收到张国焘这份电令后，即拿到徐向前处和徐商量。徐向前认为，这份电令表明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已发展到针锋相对的明朗化地步，成为牵动全局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于是，徐向前告诉陈昌浩：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陈昌浩马上带着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等人。

一次紧急会议在周恩来的住地开始。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共7人。会前，毛泽东等人已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会上念了一下，要陈昌浩和徐向前表态。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徐向前表示同意中央的意见。

接着，中央即以与会7人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严正指出左路军不应改道南下。电文如下：

朱、张、刘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的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41页。

(甲) 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泸、天、芒、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 经济条件，绝对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求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 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端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 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 因此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

(三) 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敌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先行行动，与廿五、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南，开展新局。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向前、
昌浩、泽东、稼祥^①

9月9日，中央为了再一次争取张国焘北上，再次发出指示：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编》（长征时期），第142、143页。

国焘同志并致徐、陈：

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向东发展。如何速复。^①

至此，中共中央对张国焘已作到了仁至义尽。

而张国焘却仍然执迷不悟，一意孤行。

9月9日，他致电倪志亮、周纯全：“现各主力团均不到千人，草地行军冻坏和肿脚者占三分之二，现天更冷，再北进，部队必被拖垮。拟改道南打，一路由阿坝经绥靖、崇化、丹巴；一路经卓克基、懋功，以向邛、大、天、芦、灌、绵、安进为目的。”

同日，张国焘致电前敌总部与中央领导人，再次力陈他南下的理由。电文如下：

向、浩并转恩、洛、博、泽、稼：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42、143页。

(丙) 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 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 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 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 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6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 现宜以一部自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6) 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①

由于朱德力主左路军应该执行中央北上的命令，因而拒绝在该电报上签字，张国焘只得以个人名义发出此电。

至此，张国焘与中央的争论已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白热化程度。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44页。

四 分 道 扬 镳

在张国焘无视党纪、军纪，公然违抗命令的情况下，党中央为了贯彻已定的正确方针，于10日凌晨率领第一、三军北上。当曙光散在前敌指挥部的驻地时，前方有人打电话来，问道：“中央红军走了，打不打？”

陈昌浩拿着话筒问徐向前：“这事怎么办？”徐向前毫不犹豫地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便对着话筒说：“不能打！”

不打是不打，但就这样让部队和中央走了，陈昌浩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想派人把他们劝说回来。于是就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一队骑兵去追赶中央和三军团。陈昌浩还特意写了一封信，要李特交给彭德怀。

李特等人骑马赶上中央和三军团的队伍时，毛泽东、叶剑英、彭德怀、杨尚昆、伍修权等人在一起讨论继续北上的有关问题。据伍修权回忆：

正谈话时，四方面军的副参谋长李特骑马赶来了。他大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米去！”毛主席很冷静，让他到旁边的一座教堂里去坐下来谈。李特说，你们这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毛泽东还是规劝他、开导他，说北上的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但是李特就是不听，强拉原四方面军的同志跟他走。最后毛主席说，你们实在要南下也可以，相信以后总有重新会合的机会。毛主席

又到外头对部队说：“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愿意北上的跟党中央走，愿意跟张国焘的可以回去。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的！”当时有的同志对李特的行为很生气。毛主席还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这样就同四方面军分道扬镳了。由四方面军补入三军团的人，有不少被他们“动员”回去了。我的饲养员原来是四方面军的，也被拉走了，我只得自己牵着牲口和一、三军团一起继续北上。^①

李特动员了三军团中的四方面军战士后，又去动员红军大学的学员。

李特和黄超赶上红军大学的部分队伍，高声喊：“停止前进！”另几个赶来的通讯员也喊道：“没有陈昌浩的命令，不准前进！”

这时候，从半山坡上突然传来了毛泽东洪亮的声音：“愿北上跟党中央的跟着走，愿回去跟张国焘的可以回去。你们将来还会回来的。”

一方面军原干部团的同志怒气冲冲地说：“你陈昌浩算什么？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队伍，你敢不准前进！”他们一齐高呼：“我们前进！”“我们跟党中央、毛主席没有错！”

四方面军的学员却跟着李特和黄超走了。

红军大学的另一部分队员也被陈昌浩派来的十几名骑兵追上了，他们一到就高喊：“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去！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去！”“你们不要跟他们走！”

工兵科主任谭希林见状，严肃地对学员们说：“大家不要惊慌，要沉住气，一切行动服从命令。从四方面军来的学员，要认真考

^①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虑考虑有愿意跟他们走的，也听便！不过希望你们多想想，我们北上抗日是正确的。”

工兵科四方面军的学员经过认真思考，决定还是跟着党中央北上。

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和学员就要离开党中央返回巴西去了。临走，毛泽东对他们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不愿意和党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以等一等。我们可以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我们先走，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来的。”

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一年以后，红军三大主力即在甘肃会宁实现了大会师！当时四方面军的一个师职干部王加善后来回忆道：“我还记得，当红一方面军跟着党中央、毛主席继续北上，即将和我们分开时，毛主席对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说：‘同志们，再见！’我还同别人一起嘀咕：‘一个向北，一个向南，屁股对屁股，怎么再见嘛！’毛主席还对一方面军其他同志讲：红四方面军迟早要回来的。可是我们当时就不能理解，事实证明，毛主席所说的都实现了。”^①

党中央于9月10日黄昏到达拉界后，即致电张国焘：

国焘同志：

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

^① 王加善：《三过草地话长征》，《湖北文史资料》第1辑。

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望你速复。

中央

九月十日^①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目前形势完全有利于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南下退回原路。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稀少，粮食缺乏，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通过，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也是在9月10日这一天，中央向陈昌浩、徐向前发出了指令。指令中说：“（一）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其多方考虑之理由，已详屡次决定及电文。（二）8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三）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四）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

接到中央的指令，徐向前的心情难以平静。他后来回忆道：“那两天我想来想去，彻夜难眠，忍不住偷偷哭了一场。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

^① 《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再致张国焘电》（1935年9月10日）。

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的确是心里话。我是左思右想，盘算了很久，才说出来的。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我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进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接着，中央又来电报要我们带着队伍北上。并说：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8日南下电令。陈昌浩决心南下，骂中央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啦，‘逃跑主义’啦，我想，是跟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一块，走着看吧！”^①

就这样，经过浴血奋斗、长途跋涉，会合还不到3个月的中国工农红军两大主力，只因为张国焘违抗党中央北上方针，强令大军南下，就此分道扬镳了。

一方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胜利到达陕北，同红十五军团会合，胜利完成了长征，实现了把革命的大本营奠基在西北的战略任务。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53～454页。

第六章 南下之旅

— 张国焘另立“中央”

张国焘得知党中央率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后，于1935年9月10日4时，发电给林彪、聂荣臻等人并转中央领导人，对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进表示“不以为然”，并声称：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又分离，党内无论有何讨论，决不应如是。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一、三军刻已前开，如遇障碍仍请开回。不论北进南打，我们总要在 一块，单独东进恐被敌击破。

这样，张国焘不但毫无悔改之意，反把“分裂”的罪名安到了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头上！

同一天，由四方面军政治部编印的《红旗》附刊第1期，发表了一篇《为争取南下每一战役的全部胜利而奋斗！》的未署名文章，号召四方面军全体将士紧急动员起来，为争取南下的胜利而奋斗。文章说：“南下的战略方针是首先消灭四川军阀赤化四川，然后进而至于赤化陕甘，创造川陕甘苏维埃根据地以至于赤化全西北、全中国。”文章在提出实现南下战略方针的五项准备工作之后，强调：“我们要百倍努力的保证这些工作的实现，首先必须高度的提高我们胜利信心，全体党团员和指战员团结像一个人一样，一切夸大敌人力量，不相信自己力量丧失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企图逃跑到偏僻地区的倾向，是我们目前主要的危险，必须开展无情的斗争。同时不放松左倾空谈主义，这是完成一切工作和南下战斗任务的重要保证，在南下进攻的行动中反革命分子必然要乘

着我们由北进转变到南下的关头，及利用部队目前某些客观困难（如粮食、气候、草地……等）进行反革命的造谣破坏。保卫局系统和全体指挥员必须机警的灵敏的和反革命进行坚决斗争，逮捕以至处决，……”

文章从表面看是一篇动员南下的号召书，为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吹嘘拍马，但字里行间却透出赤裸裸的杀机，有谁敢提出反对南下吗？那他就是“反革命的造谣破坏”，等待他的就是“逮捕以至处决”。所以，尽管当时四方面军的许多指战员都对南下想不通，但谁也不敢发表不同意见。张国焘以严密的政治纪律和政治保卫局系统来控制全军将士，才使他的分裂和南下计划得以实现。

9月11日，中共中央率红三军团到达甘肃迭部县俄界，同红一军团会合。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命令左路军立刻北上。电文是：

国焘同志：

（一）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备方针，再一次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二）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周副主席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在罗达、俄界集中。

（三）立即答复左路军北上具体部署。^①

张国焘接到中共中央的命令后，不仅置若罔闻，拒不执行，反而气势汹汹地于9月12日去电责怪中央和一方面军：“一、据徐、陈报告：三军撤去脚丈寺、班佑警戒，乘夜秘密开走，次日胡敌有番反占班佑。三十团开班佑，在途与敌遭遇，团长负伤，伤亡百余。贯彻战略方针岂应如此。二、红大已分裂，剑英、尚昆等均须(?)逃，兄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48页。

等未留下一人在徐、陈处，用意安在。三、兄等走后，次晨胡敌即知彭德怀部北窜，请注意反动乘机告密，党中央无论有何争执，决不可将军事行动泄之于敌。四、诸兄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其何以对国际和诸先烈。五、弟自信能以革命利益为前提，虽至最严重关头，只须事实上能团结对敌，无不乐从。诸兄其何以至此，反(?)造分裂重反团结，敬候明教。”

此电发出以后，张国焘仍不罢休。同一天，他又给一、三军负责人发去了这样一份电报：

林、聂、彭、李：

(甲) 一、三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

(乙) 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丙) 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论真会断送一、三军的。诸兄其细思吾言

并报徐、陈

国焘亲笔

十二月二十二时

针对张国焘坚持南下的错误主张和分裂党、分裂红军造成的恶果，中共中央政治局于9月12日在俄界召开了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同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他指出：中央常委决定的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请政治局批准。有同志反对这个方针，有他机会主义的方针，代表是张国焘。中央同张国焘作过许多斗争，想了许多办法与他接近，纠正其军阀主义倾向，但是没有结果。针对会上有人提出要给张国焘

作组织结论，开除其党籍，毛泽东说，对于张国焘，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最后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应马上作。关于今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央应继续坚持北上的方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是应该在川、陕、甘创建苏区。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北上，所以，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关于张国焘的错误及处理办法，毛泽东说，张国焘在通南巴苏区时已经犯了部分的严重错误；在粉碎四川敌人的六路进攻，退出通南巴苏区后，便形成了一条错误路线。张国焘的错误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军阀主义，或者反对中央，叛变革命。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作，因为它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他那里的很多干部的安全。你开除他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我们要尽可能地做工作，争取他北上^①。

与会同志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

张闻天在总结时对毛泽东的报告作了补充。关于同张国焘斗争的性质，张闻天指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军阀主义——张国焘主义。他分析了张国焘军阀主义路线形成的过程，指出张国焘错误发展的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但张闻天认为，“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②。

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其主要内容是：

^①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72～474页。

^② 《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页。

(甲) 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同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目前对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同志从对于全国目前革命形势的紧张化，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估计不足，更从中央红军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斗争中及突围后的二万余里的长征中所取得的胜利估计不足，而夸大敌人的力量，首先是蒋介石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以至丧失了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的方针。必须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机会主义的倾向，于胜利的粉碎了四川敌人对于通南巴苏区的进攻之后，自动放弃通南巴苏区时已经开始形成。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

(乙) 造成张国焘同志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表示在张国焘同志不相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不能战胜的铁的红军的主要条件，因此他不注意去加强红军中党的与政治的工作，不去确立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以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相反的，以非共产党的无原则的办法去团结干部。他在红军中保存着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以打骂的方式去凌驾地方党的政权的与群众的组织，并造成红军与群众间

的恶劣关系。此外，他以大汉族主义去对待弱小民族。这种军阀主义倾向是中国军阀制度在红军中的反映。这种倾向使英勇善战的年青的红四方面军，在其向前发展上受着莫大的障碍。

（丙）由于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所以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前面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

政治局认为张国焘同志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是有着他的长期的历史根源的。张国焘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内，犯过很多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行过不少派别的斗争。……很明显的张国焘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的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①

俄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由于中央出于与张国焘斗争的策略考虑，当时没有立即公布。到1935年12月间，才在党的中央委员范围内公布，在一方面军高级干部中口头传达。

根据俄界会议精神，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56～558页。

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的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的辞句，决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奋斗，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军、二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一、三军的首长与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负担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二十军之继续北进^①。

当张国焘得知中央率一、三军单独北上后，即开始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他扬言中央率孤军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并且预言一、三军一定不能北出，一定会被消灭、葬送。习惯于“老子天下第一”的张国焘，对中央拒绝南下的行动恼羞成怒，他从噶曲河返至阿坝后，即利用各种场合制造反党舆论。对于张国焘的这种举动，朱德总司令坚决反对，因而也遭到了张国焘的攻击。

几乎与中央政治局俄界扩大会议的同时，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了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委委员，还有工会、青年团、妇女部的一般干部，约100多人。在这个会议上，张国焘把他与中央的争论公开化，公然举起了反对党中央

^① 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55页。

的旗帜。

在阿坝的一个喇嘛寺——格尔登寺大殿，殿内挂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大横幅。张国焘主持会议并首先讲话，他攻击党中央率一、三军北上为逃跑主义，极力鼓吹他的南下方针如何正确。

参加过这次会议，时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的余洪远回忆这次会议：

会议的发言很乱，而且总是带着质问的口气：“北上是右倾逃跑，是错误的！”“什么北上抗日，完全是逃跑主义！”你一言，他一语，嗓子很高，“帽子”满天飞。我一听这乱哄哄的发言，更感到气味不对。我忙看看朱总司令，他从容镇定地坐在那里听着发言，时而翻翻放在面前的一本书，时而扭转头去看看坐在他旁边的张国焘。张国焘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劲地喝水。当人们发言不积极的时候，张国焘就装腔作势地说：“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呀？有意见就讲嘛？”他的话里带着明显的煽动。

接着，又是一阵起哄、围攻，有的甚至拍桌质问：“朱德同志，你必须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你必须当众表示态度！反对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北上抗日的决议！”

停了一会，朱总司令发言了。他镇定自若、和颜悦色地说：中央决定北上抗日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该担当起抗日救国的重任。我是个共产党员，参加了中央的会议，举手赞成这一决定，我不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的决定。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他挽救了党和红军的命运，我是完全信得过他的。

人家都叫“朱毛，朱毛”，我朱德怎么能反毛泽东？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我不能反对遵义会议的决定。

朱总司令转过头，问张国焘：“遵义会议精神，中央曾电告四方面军，你看到电报了吗？”张国焘支吾不语，只是点了点头，然后，凶相毕露地说：“你必须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承认毛泽东他们北上是在逃跑！”朱总司令大义凛然地对张国焘说：“我再重复一下，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决不会反对。毛泽东同志我信得过，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①

张国焘想借这次会议争取朱德共同反对中央北上的企图并没有达到，但他所造的声讨毛、周、张、博的声势仍然起到了很大煽动作用。会议通过的《阿坝会议决定》中说：“目前的革命形势是革命正处于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党的任务是组织好革命有秩序的总退却。可是，现在还有人要同国民党搞什么统一战线，北上抗日，那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实际上是逃跑主义。当前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利用川、康边少数民族和有利地形条件，建立川、康革命根据地，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决议还颠倒是非，声言：“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毛、洛、博、周等同志，继续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不顾整个中国革命的利益，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主力红军的团结，实行逃跑。”决议还美化张国焘的南下路线是“进攻路线”，提出对反对张国焘路线的、“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要给以“纪律制裁”。

阿坝会议以后，张国焘继续利用各种场合攻击党中央。有

^① 余洪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回忆敬爱的朱总司令》，《红旗飘飘》21。

次，张国焘在会上说，中央北上的时候，把仓库里的枪枝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朱德听后立刻愤然地说：“这纯粹是谣言！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宽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订的，对俘虏还要宽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还不够，动员大家吃野菜，怎么会把粮食烧掉？这种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①

张国焘搞分裂，坚持南下，最担心的还是怕从一方面军过来参加左路军的部队的反对，所以，他一方面派人盯紧他们的动向，稍有不慎，即以各种名义处分，另一方面向他们宣传他的南下错误主张。

据欧阳毅回忆：一天，张国焘亲自来给五军团的部队讲话。我们希望他根据毛儿盖会议的精神，讲讲关于加强一、四方面军兄弟团结的问题。可是，他对这个问题闭口不谈，却大肆攻击党中央、毛主席北上抗日是什么“逃跑主义”，南下建立川康根据地才是什么“正确路线”。那时干部战士都认为，在少数民族地区，言语不通，土地贫瘠，文化落后，无法建立革命根据地。张国焘指着背后喇嘛庙经幡上的一些藏文经符，唾沫横飞地叫嚷：“有的人说，这里缺少文化，难道这些不是文化吗？这些不是文化是什么呢？你们自以为文化高的，那就念给我听听，上面写些什么？”他还恶毒污蔑我们这些戴一方面军小五角军帽的是“尖脑袋”，是“机会主义”，叫嚷要肃清我们脑袋里的“机会主义思想”^②。

张国焘坚持南下，很怕有人议论北上的事，设法控制下级干部战士的思想和言论。总部作战局局长曹里怀就因私下谈论北上的话题面险些遭到厄运。一天，曹里怀路遇几个熟识的人，大家

^① 《朱德传》，第359页。

^② 欧阳毅：《朱总司令和我们在一起》，《回顾长征》，第678页。

因他在作战局，了解军事机密，便向他打听会不会北上。曹里怀回答说：“你们不要着急，那边（指一方面军）不断有电报来，他们已攻占腊子口，过了岷山、六盘山，到达陕北吴起镇了，我们肯定会要北上的，会与毛泽东同志会合的。”有人把曹里怀的话告诉了张国焘，他大为恼火，立即派人把曹里怀关押起来，并召开紧急会议，说曹里怀泄露军事机密，是反革命，要严加惩处。这时，朱德总司令站起来说：“曹里怀就讲了那么几句，你安他的反革命够不上，他这小鬼我知道，井冈山时期就跟我们在一起，你有什么理由乱杀人呢？”张国焘见朱德出来替曹里怀说话，才留了他一条性命，但还是撤掉他作战局局长的职务，开除党籍，送到总部军事学校当教员去了^①。

一般的干部、战士莫谈北上，就是刘伯承总参谋长也因支持北上的主张而被调离总部。对于北上还是南下这个问题，当张国焘让刘伯承表态时，刘伯承旗帜鲜明地说：“我同意北上，中央毛儿盖会议是正确的。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你们南下，是要碰钉子的。薛岳、李抱冰并没有走，你们向南去，就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②张国焘知道刘伯承像朱德一样，并不支持他的南下主张，便擅自宣布撤销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让他到红军大学任校长。

张国焘坚持南下，造成红军主力分裂，最痛苦的莫过于朱德总司令。他想率部队北上，又担心会造成新的分裂；他只能留下来与张国焘周旋，不管遇到多少艰难曲折，他也决心把部队带回到党的怀抱。

这样，为了维护南下部队的团结，朱德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当时，随左路军行动的原一方面军第五、九军团的指战员中，

^① 曹里怀：《我在长征路上》，《郑州党史通讯》1986年第2期。

^②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页。

有不少人提出要单独北上；还有的说，张国焘要拦我们，就跟他干！朱德了解到指战员们的心情，耐心地教育他们要顾全大局，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他对五军团的指战员们说：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有正确的斗争方法，要顾全大局，讲革命讲团结。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革命的，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有许多优点，英勇善战，吃苦耐劳，你们应该很好地向他们学习。你们五军团能攻善守，英勇顽强，优点也不少，但你们人少嘛，光有你们也不行。所以同志们要注意和他们搞好团结，切不要上少数人破坏团结的当。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①。

由于朱德同志的循循善诱，原一方面军干部战士的情绪才逐渐稳定下来。大家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勇气，相信只要坚持革命，坚持团结，掌握正确的斗争方法，眼前的曲折总是能克服的。

朱德还利用各种机会多方接触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他平易近人的作风，恢宏凝重的态度，赢得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尊重。一些一时不明是非当面辱骂过他的人，也逐渐转变了态度，对他十分爱戴。

1935年9月15日，张国焘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计划》颠倒是非，为南下制造借口，说什么“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的会合，使主力红军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大大增加，增加了我们大举消灭敌人的优越条件，可是由于中央政治局中个别右倾分子的逃跑路线，断送了我们大举北进进攻敌人的时机，右倾机会主义故意迟延我们北进中必要的准备工作，目前北方天气渐寒，草地不易通过，敌人在我们的北面已集结相当兵力，碉堡已完成一部，这种情况下，北

^① 欧阳毅：《朱总司令同我们在一起》，《回顾长征》，第683～684页。

进是显然不利的”。《计划》污蔑中央北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向北逃跑，完全是由于夸大敌人力量，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张皇失措，对战胜敌人失掉信心，不相信在西北有创造革命根据地的可能，对革命胜利失掉前途’”，指出：“必须坚决执行党的进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才能顺利完成我们南进的战略方针。”

为了保证南进计划的顺利进行，《计划》提出政治工作的五项要求。其一，部队内的动员。要求动员全体指战员坚决打击敌人，克服一切困难，不怕堡垒、不怕隘路，大大提高士气。加紧支部工作，发展党团组织，并切实考查各级干部，严紧纪律，坚决肃反。其二，战时政治工作。行军时，在先头侧卫及后卫部队中，应有得力的政治工作人员同行，适当组织宿营和休息。战时可采用各种方法（战前集合讲话；简单政治会议；班排讨论会等）来提高战士杀敌的决心，鼓励战斗士气，使全体战士了解整个战斗的目的，为完成这个战斗牺牲奋斗不胜不休。其三，群众工作。严紧纪律，反对任何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运用一切方法争取少数民族群众，不伤害少数民族的宗教感情，不许毁坏庙宇经堂，不准到群众家乱翻，不准毁坏居民房屋，在新赤区内特别要注意保护群众的利益，加紧对经理和事务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各级政治部处要帮助地方党和政权机关组织苏维埃，少数民族中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或苏维埃政府，成立游击队赤卫队并猛烈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其四，白兵工作。要利用一切方法散发告白兵的各项宣传品到白色士兵中去，同时进行火线上的喊话，清查俘虏，给以短期训练与对红军的良好影响释放回去，争取一部分表现好的参加红军。立即建立和加强各级政治部处中的白兵工作部、白兵工作委员会，白兵工作小组的工作，并经常供给他们以白兵工作的材料和指示。其五，克服物资上的困难。各级政治部处要有系统地帮助供给机关收集粮食和物资。在这中间，要特别注意遵守阶级路线和与群众的关系，同时要大大地在战士中进行宣传与解释，

只有坚决消灭敌人，才能克服一切物资上的困难。

9月17日，张国焘发布了南下命令，提出了“大举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他命令右路军中的四军和三十军从巴西地区南返至卓克基、马尔康、松岗一带；左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和原一方面军的第五、九军团及军委纵队一部，从阿坝地区南下，回到马塘、松岗、党坝一带。

为了再一次争取四方面军北上，9月18日，彭德怀等一方面军领导人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及各军首长：“一、我们执行中央正确路线，连日击溃鲁大昌师，缴获甚多，于昨17日占领距岷州哈达铺各30里之大草滩、占扎路、高楼庄一带，前锋追击岷州城，敌人恐慌之甚。二、此地物资丰富，民众汉回各半，十分热烈地拥护红军，3个半月来脱离群众的痛苦现在改变了。三、请你们立即继续北进，大举消灭敌人，争取千百万群众，创造陕甘宁苏区，实现中央战略方针。”^①

但张国焘执意南下，对彭德怀等人的电报置之不理。

在张国焘的南下命令之下，徐向前、陈昌浩带领四军和三十军从巴西地区南下，二次踏入草地。

二过草地，正值深秋，部队刚刚经过包座苦战，无衣无食，伤病员不少。面对寂静浩渺的大草原，有许多干部战士想不通：“为什么不跟党中央北上？”“为什么又要经过草地向南走呢？”“南下跑向什么地方去呢？”……对于红军战士来说，二过草地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都要经受非人的折磨。

黄草漫漫，寒气凛冽，草原弥漫着肃冷的气息。仍然穿着单衣的红军战士，带着战争的硝烟和疲劳，带着伤痛，沿着腐草烂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56页。

泥铺成的羊肠小道，一步步向前挪动。风雨像故意欺负这些饥寒交迫的战士，不时呼啸着冲向行军的队伍。大自然界无情的摧残使又一批同志倒了下去，长眠在这荒无人烟的大草原上。活着的人，看看刚刚倒下去的战友的尸体，再看看第一次过草地时那些无法掩埋的战友的遗骨，心头不禁一阵阵酸楚。革命是需要流血牺牲的，但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这些本不该牺牲的人们却默默地倒下了。他们没有牺牲在杀敌的战场上，没有人们为他们树碑立传，或许他们的名字也已经永远被人所遗忘，只有这茫茫无际的大草原知道他们的存在，只有这狂呼的风声、潇潇的雨声，在愤怒地控诉着张国焘的罪恶。人们无不百感交集，抑郁不已，在心里一千遍地喊：“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为什么？！”

不知度过了多少艰难的日子，不知牺牲了多少年轻的生命，9月下旬，部队终于穿过了草地，到达毛儿盖。

在毛儿盖略事休息，部队即沿着黑水、芦花以西的羊肠山路，向党坝、松冈方向行进。沿途有许多果树，正值收获季节，部队找藏民购买或交换到了苹果、柿子、核桃等用来充饥。

10月初，两支部队在党坝会合了。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余天云等军以上干部，约四五十人。会场在一座喇嘛寺庙里。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

张国焘发言说：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不单是军事路线问题。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是进攻路线。而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一、三

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他攻击说，中央领导人是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者，当他们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的时候才来参加革命；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

张国焘讲了这么一大堆话，只是一个铺垫，只是用来煽惑人心，接着，他才讲出了蓄谋已久的话。他说：“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了领导全党的资格。我认为，我们应该仿效列宁与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

张国焘突然提出另立中央，这是与会人员根本没有料到的，谁也不会想到张国焘会在反党的道路上走得这么远，竟至发展到公然分裂党，另立中央的地步！徐向前回忆说：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头一“炮”。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干部发言。这位同志在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①。

张国焘看看大家的激动情绪，心里掠过一阵快意，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朱德是不会违背众意的。于是，他别有用心地要朱德同志对另立中央的事表态。

朱德镇静地环视了一下会场，然后平心静气地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的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朱德的话犹如给张国焘浇了一瓢凉水。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59页。

张国焘不甘心，他又让刘伯承表态。

刘伯承也讲目前革命正处于困难时期，应该讲团结，不要搞分裂。

张国焘见朱德、刘伯承都不支持他，心里很恼火，但又不便发作，便阴沉着脸，宣布了“临时中央”的名单，“临时中央”主席由张国焘担任，为了借重朱德的声望，他宣布朱德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以多数通过的名义，形成了决议。

这时，朱德站起来严正声明：“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①

卓木碉会议在宣布成立“临时中央”的同时，还通过决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张国焘另立“中央”，不仅遭到朱德、刘伯承的抵制，就是一直同他在一起工作的四方面军干部，也有许多人想不通。徐向前回忆道：这次会议，明显带有突然袭击的性质。所谓“决议”，并未经郑重讨论，不过是一哄而起罢了。我在会上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表决，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既不理解，又很痛心。拥护吧，没有多少道理，原来就有党中央，这边又成立一个，算什么名堂？但自己有些事还没想清楚，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头一回遇上如此严重的党内斗争，左右为难，只好持沉默态度。会后，张国焘找我谈话，我表示不赞成这种做法。我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我的主导思想是希望团结，不要感情用事，免得越弄越僵，将

^① 《朱德传》，第359～360页。

来不堪收拾。张国焘呢？大言不惭地以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成立第三国际的事例为自己辩解，根本听不进我的劝告^①。

张国焘本来想通过另立中央来加强他对部队的控制，没料到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仅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强烈反对，就是四方面军中也出现了反对的议论，张国焘的威信开始下降，这是张国焘根本没有料到的。长期以来，张国焘靠着自己许多令人眩目的头衔和满口的政治口号，培养了四方面军指战员对他的崇拜心理。即使有人有反对他的言行，也会被他借肃反为名面加以清除。但是，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之后，人们对他的崇拜之心开始动摇，这是一种张国焘无法控制的情绪，它一旦产生，就会很快增长起来。

张国焘精心策划的另立中央的丑剧，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制造了党的分裂；而他自己除了身败名裂外，并没有从中捞到任何好处。而且他所立的“中央”，就像一个大包袱一样，压在他的身上，使他的境地十分难堪，到了左右为难、骑虎难下的地步。

张国焘另立的“中央”，既未经过民主选举产生，又未经过共产国际批准。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王明、博古又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所看重的人，中共与苏联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作为中共元老之一的张国焘是再清楚不过的。他知道一旦自己所立的“中央”报告共产国际后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轻则被否定，重则会使他自已身败名裂。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批准，他的中央又算什么“中央”？怎样来行使中央的职权呢？对此，他未免顾虑重重，犹豫不决。

使张国焘感到难堪的另一个原因，是朱德等人坚决不支持他的“临时中央”。朱德在党和红军中的威望，张国焘是知道的。张国焘虽然向来权力欲重，比较霸道，但对朱德这块难啃的骨头也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60页。

毫无办法，不敢为所欲为。自从他另立中央后，朱德就在这个问题上和他唱对台戏。朱德采取的是耐心说服的方法。只要一有机会，朱德就心平气和地对张国焘做工作，指出他的所谓中央并不是中央，应该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张国焘虽然总能找出各种理由，但总是气不壮，理不直，仿佛觉得自己比朱德矮了半截。他拿朱德没办法，说服不了朱德，也不敢过于得罪朱德。因为他知道，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只能是徒有其名。而朱德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总是不断地警告他，开导他，使张国焘的心里好像总有十五个吊桶在打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因此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

由于朱德等人的反对和制约，张国焘的“中央”始终不能行使其“中央”的权力，就连张国焘自己后来也觉得自己的“中央”是个怪物，自己另立中央只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

张国焘在回忆他另立中央一事时，这样写道：

我觉得事态发展至此，中共中央固然难辞其咎，但莫斯科的死硬作法，确是逼使我们走到这个牛角尖的主因。其实，我们中国共产主义者无论在一起或暂时分离，总是背靠背在作战；我们有争执，但也互相依存。我们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生存与死亡，我们主要的努力，也始终是对付敌人，任何时候，也不会因内争而忽略了对外。因此，这次分裂也不过是中共奋斗史上的一个插曲。^①

当年声嘶力竭地声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张国焘，处心积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273～274页。

虑地策划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在几十年之后，却十分轻松地 说这“不过是中共奋斗史上的一个插曲”。如此反差过大的言行， 使我们不能不相信徐向前元帅对张国焘的评价是多么恰如其分， 他说：“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 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 打哆嗦。朱总司令看透了他，一直在警告他，开导他，制约他。因 而张国焘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①

二 崎岖的南征路

在张国焘坚持南下的命令之下，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的五、九 军团开始南下，于9月下旬到达马塘、松冈，党坝一带，开始了 南下时期的艰苦历程。

红军大部队南下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四川军阀急忙纠集了50 多个团的兵力，沿大小金川地区层层设防。刘文辉二十四军的两个 旅，置于大金川沿岸的绥靖、崇化、丹巴一线；杨森二十军的 4个旅又1个团，布于小金川沿岸的懋功、抚边、达维一线；邓锡 侯二十八军的一个团，把守着抚边以东的日隆关等地。

为打开南下天全、芦山的通道，方面军总指挥部制定了夺取 绥靖、崇化、丹巴、懋功的战役计划，报请红军总部批准实施。

在战役计划的部署上，朱德总司令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虽然 坚决反对张国焘坚持南下的分裂主义的行为，但认为红军队伍都 是党的宝贵财富，部队既然已经南下，就应该打开局面，找块立 脚生存的地方。不然，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就得不到粮食供 应，没有饭吃，等不到四川军阀来打，自己就支持不住了。于是， 他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与徐向前研究作战部署。因为他在大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75页

革命时期就同川军打过交道，熟知川军的作战特点，他对指挥员们说：“川军向来欺软怕硬，惯打滑头仗，我们不打则已，要打就抓住打，狠狠地打！”他要求指挥员们讲究战术，发挥运动战的特长，以快以巧制敌，用小的代价去换取大的胜利。

1935年10月7日，张国焘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了《绥丹崇懋战役计划》，这一战役计划总的纲领是：“我军主力采取秘密迅雷的手段，分由观音铁桥及党坝沿大金川两岸夹河并进，配合夺取绥靖、崇化。跟即分取丹巴、懋功，以作南下出天全、芦山、邛崃、大邑的策源地。另以一部牵制并扼止鹧鸪山、马塘、梭磨、梦笔山一带之敌，以使主力得以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略取目的地。”具体的兵力部署是：以五军、九军二十五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组成右纵队，以上树声为司令员，詹才芳为政委，沿大金川右岸前进，抢占绥靖、丹巴；以四军、三十军、三十二军及九军二十七师大部组成左纵队，由总指挥徐向前和总政委陈昌浩率领，从大金川左岸进攻，直到崇化、懋功；三十三军及二十七师一个团，驻守马塘、梦笔山地区，屏障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卓木碉；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师部及二七七团、红军大学，留驻阿坝，掩护后方。

10月8日，左右两路纵队开始行动。

绥靖、崇化、丹巴、懋功地区，位于四川省的西北部，境内地形复杂，高山绝壁林立，峡谷急流纵横，利守难攻，不便于大部队活动。部队经两过草地，减员很大，也来不及得到休整，就投入了战斗。广大指战员不顾长期行军的疲劳和伤痛，发扬勇敢顽强、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机智灵活，英勇神速，充分发挥了夜摸、奇袭和小部队大胆迂回穿插等战术特长，渡激流，穿峡谷，破敌垒，夺要隘，表现了红军将士无坚不摧的优良战斗素质。

战役开始后，右纵队九军二十五师首先向绥靖以北的观音河向西强攻，以便渡河南下，与左纵队的进攻夹岸相应。但因守敌

刘文辉部凭坚固守，右纵队渡河受阻。方面军总指挥部遂临时调整部署，以左纵队之四军从党坝地区出动，强渡大金川。11日，四军渡河成功，即沿右岸疾进，12日，克绥靖，击溃守敌刘文辉部两个团，后继续向南发展，16日，克西康省境内的丹巴县城。

与此同时，左纵队之三十军亦向南急进，于11日渡过党坝河，15日占崇化。九军二十七师亦同时向南突击，于15日夜对绥靖东之两河口守敌杨森部第七旅发起攻击，经过3小时激战，将其全部击溃，并连夜跟踪追击，于16日克抚边，歼敌两个营大部。19日，九军二十七师将士又发动了对达维之敌的夜袭战，他们行动秘密、神速，当部队摸进街里时，敌人还在睡大觉。敌第四旅旅长高德州惊醒后，顾不得穿衣服，仓皇逃走，其余敌人被红军将士击溃。至此，九军二十七师创下17天5战、奔袭500余里的惊人战绩。20日，三十军一部攻克懋功，守敌杨森部两个旅向夹金山以南逃窜。进占达维之九军二十七师，立即主动截击，俘获甚多。接着该师迅速向东南发展，连克日隆关、巴郎关、火烧坪、邓生等地。历时10余日的绥崇丹懋战役至此结束。

此役红军将士共击溃敌杨森、刘文辉所部6个旅，毙、俘敌3000余人，占领了懋功、丹巴两城及懋功属之绥靖、崇化、抚边三屯和达维、日隆关等要镇，取得了南下初战的胜利。

红军南下初战告捷，震动了蒋介石。这时，蒋介石借“建设四川”之名，刚刚完成了对川军的整编，四川军阀完全由蒋介石一手控制起来。为了防止红军继续南下，保住成都，蒋介石和刘湘命令川军集中主要力量对付南下的红军。具体部署是：以刘文辉二十四军防守金汤、泸定、雅安至汉源一线；以杨森二十军防守宝兴至大碛碛一线；以邓锡侯二十八军防守宝兴以东大川场至水磨沟一线；以刘湘的“宠臣”杨国桢任师长的教导师和独立一、二旅守芦山，以其模范师守天全，并以新任命的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进驻名山，统一指挥驻天全、芦山前线的部队；另从绵竹等

地抽调 18 个团向西增援。刘湘严厉规定，凡在战场上不为他卖命的，上一级有权枪毙下一级，连长可以枪毙排长，团长可以枪毙营长，而他刘湘则可以枪毙师长、军长。

红四方面军总部经过研究，认为红军趁势南攻，打击川敌，夺取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地区，是有较大把握的。随即制定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10月22日，张国焘以第二“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了这一战役计划，指出此次战役的纲领是：“我军击溃刘、杨共 14 个团，占领绥、崇、丹、懋后，以主力乘胜速向天、芦、名出动，彻底消灭杨、刘，并迎击主要的敌人刘湘、邓锡侯部，取得天全、芦山、名山、雅州、邛州、大邑广大的根据地为目的。对康定、汉源、荥经、灌县方向，采取佯攻姿势，配合主力行动。”具体部署是：以四军和三十二军为右纵队，以四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为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由丹巴经金汤取天全，并以一部向汉源、荥经活动；以三十军、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及九十一师两个团、九军二十五师为中纵队，以王树声为纵队司令员，李先念为纵队政委，抢占宝兴、芦山，得手后向名山、雅安及其东北方向发展；以九军二十七师为左纵队，由该军政委陈海松为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以一部防守抚边、懋功、达维，以主力攻占邛崃以西之大川场，威胁灌县、大邑之敌；以五军为右支队，巩固丹巴地区；以三十三军为左支队，留驻马塘、两河口，相机威胁理县、占领威州，并开辟地方工作。这一部署，以主力夺取天、芦、名、雅、邛、大等县为目的，对康定、汉源、荥经、灌县采取佯攻态势，配合主力行动。

朱德总司令对整个战役的部署和战术要求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指出，这一次的战役与绥崇丹懋战役不同，部队已经打出了川西高原的险山隘口，作战形式将由山地战、隘路战变为平地战、街市战，由运动战变为阵地战、堡垒战。但红军一般的战术原则，在这种地形上也是适用的，即集中兵力打敌人的弱点；机动地寻求

打运动战，而不是被迫硬攻堡垒；即使打城市和打堡垒，也必须在野战中击溃敌人，再乘胜直追袭取之，或是在夜间或是在拂晓时发动袭击，并须注意对付敌人的阵地反击。针对部队进入开阔地形条件作战，蒋介石投入大批飞机参战的情况，他特别强调加强防空教育的重要性，要求既要消除畏惧敌机的心理，又要采取应付敌机的具体措施，万万不可掉以轻心等闲视之。他指出，我们是工农红军，不是拜物教主义者，绝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清道夫——蒋介石的飞机大炮，但是，又要承认敌机确有杀伤威力，要研究采取对付它的科学方法和具体措施，不应该空喊不怕，那只会使红色战士经受无代价的牺牲。他还对如何对空射击、对空侦察、对空隐蔽和伪装、疏散队形及战斗中应注意之点，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为了争取战斗的胜利，在此次战役发动之前，朱总司令还以他个人名义发出了《告川军将上书》，指出，蒋介石卖国残民，举国共弃，望川中各军袍泽勿受蒋的愚弄，与红军携手共谋国是。

10月24日，天芦名雅邛大战役拉开了战幕。

当天，中纵队以迅猛之势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随即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发起进攻。守卫宝兴的杨森部是被红军打怕了的，一触即溃，红军“打狗如打狼”，毫不松懈，穷追猛打，击溃杨森第二十军之第一、第五、第六共3个旅，于11月1日攻占宝兴。继而乘胜前进，连续打垮刘湘教导师之一个旅和一个团的阻击，直逼芦山城下。沿途总计俘敌千余，缴步枪2000余支，轻重机枪50余挺。

与此同时，左、右两纵队从两翼日夜兼程，进展顺利。

7日，左纵队攻占大川场，歼敌邓锡侯第七旅一部，前锋抵进邛崃县境。

右纵队沿大渡河、金汤河南下，首先攻占了国民党西康设置局所在地金汤镇，继向天全发起攻击。

攻占天全是整个战役中比较艰难的一仗。天全是由西康入川西的一道川口，西侧有大岗山和落西山屏障，两山之间有天全河西向流过，形成走廊地带。刘湘以他的王牌——“模范师”驻守该地，第一旅部署在灵关河以西，第二旅部署在大岗山和落西山北侧，第三旅为预备队，部署在老场、三江口地区，师部率直属队驻天全城内。另有刘文辉的一个旅部署在天全以西20公里的紫石关，形成了“模范师”的前哨阵地。敌人夸下海口：“纵有红军数万，也难飞越天全。”

根据敌人的部署情况，右纵队司令倪志亮与四军军长许世友商定，四军由金汤翻越夹金山，直取紫石关和天全。

金汤距天全约100多公里，4000多米高的夹金山横亘其间，山上坡陡路险，荆棘丛生，许多地段无路可走。四军以采药农民当向导，用大刀斩荆棘开路，一昼夜翻过了这座堆冰积雪的大山，随后迅速逼近紫石关。

红军的突然出现，使驻守紫石关的敌人大出意料，不知所措，慌乱不堪。在红军的攻击下，敌人有的举枪投降，有的向天全狼狈逃窜。

突破紫石关后，许世友命先头部队第十二师，尾随溃退的敌人，相机向天全发起攻击。守卫天全的敌人凭借工事和有利地形，以猛烈的火力向进攻的红军扫射，十二师的几次冲锋都被压了回来。

许世友军长亲临前线指挥，他在观察了地形之后，认为地形对红军不利，不宜正面强攻，便命令十二师暂停进攻，决定采取红军的拿手好戏，派精干的小部队从侧翼夜摸偷袭敌人。

深夜时分，由十二师战士组成的突击队向天全西侧的大岗山西南麓进行偷袭。一个小时后，许世友军长看到了偷袭成功的信号，便立即发出总攻的命令。

随着嘹亮的军号声，第十一师和十二师部队徒涉小河，向东

岸发起了猛烈冲击。突击队消灭了驻守半山腰的敌人两个连后，随即配合主力部队，从后面夹击河东岸守敌。敌人首尾不能相顾，一个团很快便被红军歼灭了大部。当黎明来临的时候，鲜艳的红旗已经插上了大岗山南麓。

与此同时，王近山师长率领的第十师，由当地群众带路，于拂晓前徒涉天全河，夺取了城南浮桥，随即向天全城守敌的手枪营发起进攻，歼敌一部后突入城内，经过一番激战，占领了“模范师”师部。

敌师长郭勋祺率残部逃至天全以东5公里的梅子坡，使用预备队向大岗山反攻，企图先夺回大岗山，再以全力收复天全城。所以红军立足未稳，敌人一个团便从大岗山北麓沿山脊反扑过来。一场激烈的白刃格斗在山顶上展开了。

红军战士以大无畏的精神，英勇顽强地和敌人搏斗着，装备精良的刘湘的“模范师”，被杀得死伤累累，溃不成军。敌师长郭勋祺见取胜无望，便带着残兵败将向洪雅方向逃去。

天全之战，四军共歼敌2000余人，取得了南下以来又一个重大胜利。

占领天全之后，右纵队随即向东迂回，协同中纵队包围芦山。刘湘为解芦山之围，急令其独立旅由名山地区增援。红军第三十军、九军各一部，当即分两路对援敌实行钳击，将援敌全部歼灭。并进而攻克名山西北的五家口镇，全歼守敌一个团。11月12日，芦山守敌在红军猛烈攻击下弃城溃逃，该城遂为红军占领。

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自10月24日起至11月12日止，仅18天时间，红军连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毙、伤、俘敌1万余人，击落敌机1架，占领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和懋功以南的川康边广大地区。

还在战役进行的过程中，10月31日，张国焘向总指挥部发出电报，提出改变原定的作战计划，建议红军主力向西取康定、泸

定，将来以道孚为战略后方，在西康地区发展。朱德、徐向前、陈昌浩认为，还是按原定的作战计划，重点加强左翼的攻击，夺取天、芦、名、雅地带为上策。因为这一带粮多人多，各地已开始成立游击队与扩大红军，物质基础很好，如能深入工作，补充人、物较易。而马上进西康，人、粮不易补充，天气寒冷，过冬困难。徐向前说：“现在不是‘山大王’时代了，我能往，寇亦能往，蒋介石不会让我们僻处一方，悠哉游哉的。”陈昌浩也认为，蹲在川康边，被敌人封锁住，红军的处境将会更困难。因而去电不同意张国焘的建议。张国焘未再坚持他的意见，总指挥部便按原定计划，挥军向名山、邛崃地区进攻。

四方面军南下战役的顺利进行，使张国焘十分欣喜，他认为这样一来，就有了向中央夸口的资本，于是，11月12日，他致电一方面军领导人及中央：“（甲）我军于占领天全后，又于本月12日攻占芦山，是役击（溃）刘湘之教导师、模范师、新编二师之第□旅、刘文辉之第五旅，并将刘湘独二旅全部缴械。敌仓皇溃退，我军正跟踪追击乘胜夺取名、雅，俘获在5000以上。（乙）这一胜利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胜利的基础，证明了向南不利的胡说，达到了配合长江一带的苏区红军发展的战略任务，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甚望你们在现地区坚决灭敌，立即巩固扩大苏区和红军。并将详情电告。”^①

次日，中央在复电中指示四方面军：“关于方针你们目前应坚决向天全、芦山、邛崃、大邑、雅安发展，消灭刘（湘）、邓（锡侯）、杨（森）部队，求得四方面军的壮大，钳制川敌主力残部，以利川、陕、甘、晋、绥、宁西北五省局面的大发展。”

红军南下战役取得的重大胜利，令蒋介石和刘湘十分恐慌。蒋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66页。

介石急令他的嫡系部队薛岳两个军迅速参加对红四方面军的围攻。刘湘也纠集了一切可能抽调的力量，以阻止红军凌厉的攻势，屏障成都平原。在刘湘的紧急命令下，川军主力王缙绪、唐式遵、范绍曾等部及李家钰部，星夜赶赴名山及其东北的夹门关、太和场、石碑岗地区，扼阻红军。连同原来的守敌，合计兵力达80余团共20多万人；刘湘还组织了地主、土匪、袍哥武装参战，企图在邛崃、名山地区与红军主力决战。此时，敌强我弱的形势非常明显，南下方针行不通已经显露。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认为川军是红军的老对手，对付川军，红军还是有点把握的。于是决定从名山和邛崃间的通道上，实施夜袭突破，完全切断两城敌军的联系，进而围攻名山，吸打邛崃方向的援敌，相机发动攻势，打到岷江西岸，控制青衣江以北、岷江以西、邛崃以南的三角地带。

11月13日，红四方面军的中纵队全部及右纵队四军共计15个团的兵力，由五家口向朱家场、太和场之敌发起攻击，击溃敌暂编二师两个团，于14日占领朱家场、太和场。16日，又攻占名山东北的要镇百丈，打退敌6个旅的反扑。九军二十七师乘胜沿百丈通邛崃的大路进击，势如破竹，当天下午占领了黑竹关、治安场、王店子等地。由于敌人沿邛、名公路纵深配备，碉堡林立，兵力集中，红军继续突进不利，只得暂停前进。总指挥部命令主力向百丈左右靠近。以九十三师围攻名山，三十二军向名山至洪雅的大路突击，吸引邛崃方向的援敌出动。

11月19日拂晓，敌人组织了十几个旅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向百丈地区发动进攻。刘湘为了保住成都，向川军下了死命令，要川军拼死夺回百丈，援救名山守敌，临阵不前者，一律就地枪决。所以，这次战斗，川军表现出了少有的凶猛。战斗一打响，敌人即集中强大炮火，向红军

突出于百丈地区 10 余里长的弧形阵地猛烈轰击，成批的飞机盘旋上空，疯狂地向红军阵地投弹轰炸。在大炮、飞机的掩护下，整团整营的敌军轮番向红军阵地猛攻。广大红军指战员忍受着疲劳和寒冷，与优势之敌展开了浴血苦战，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的进攻。

百丈，位于雅安通往成都的公路上，周围是大片起伏的丘陵和稻田，地形开阔，无险可依。部队在开阔地带运动和作战，不易隐蔽，又缺少对付敌机的炮火，所以伤亡甚大。红军战士拼死坚守阵地，消灭了大量敌人。但由于该地交通方便，敌人调兵迅速，后继力量不断增加，攻势丝毫没有减弱。一场恶战在百丈进行着。水田里，山丘上，深沟中，都成了敌我相拼的战场，杀声震野，尸骨错列。有的部队子弹打光了，就同敌人反复进行白刃搏斗；有的战士负了重伤，仍然坚持战斗；实在动不了的，便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经过 7 天 7 夜的搏斗，共毙、伤敌人 1.5 万余人。终因寡不敌众，百丈主阵地被敌突破，红军付出了伤亡近万人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长期固守阵地与敌拼消耗，对兵力处于劣势而又缺乏补给的红军来说，显然十分不利。因此，红军于 11 月下旬撤出百丈一带阵地，转进到北起九顶山，南经天品山、五家口，到名山西北之莲花山一线，扼险据守。至此，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被迫结束。

在四方面军主力与敌人决战期间，为了保障红军主力右翼的安全，四军和三十二军分别从天全、飞仙关南下，向荣经和汉源进击。11 月 25 日攻克荣经，继占汉源，歼守敌一部。12 月初，敌薛岳部由东面之洪雅地区向荣经进攻。红军在给予敌人大量杀伤后，自己也付出了惨重代价，红四军三十五团伤亡达三分之二，团长、政委均壮烈牺牲。12 月中旬，红军被迫撤出荣、汉地区。

百丈决战的失利，是南下红军从战略进攻被迫转为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也标志着张国焘南下方针的破产。

百丈战斗后，四川军阀主力集中于东面名山、邛崃地区；薛

岳6个师向南面之雅安、天全地区集结；敌第五十三师李韞珩部则位于西南之康定、泸定地区。敌人在集结地大肆修筑碉堡，加紧封锁，准备伺机大举进攻。这时，红军东进、南出均不可能，处境极为被动，只得以巩固天全、芦山、宝兴、丹巴地区为中心任务，在这一带与敌对峙，发动群众，准备过冬。

为了开辟地方工作，红军指战员和随红军行动的原川陕地方党、政干部，尽了很大的努力，在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地区，建立了一些党的组织和工农民主政权，组织了大金独立第一师和第二师及宝兴、芦山两个独立团，并发动群众进行了一些支援战争的工作。11月中旬，在金川地区帮助藏族人民成立了格勒得沙革命政权。

但这一带多为藏族聚居区和汉藏杂居区，情况非常复杂，由于历史上历代政府大汉族主义的统治，民族之间隔阂甚深。藏族反动分子，不仅组织反动武装反对红军，还利用一切机会煽动和威胁群众不与红军合作。因而，这里始终未能形成巩固的根据地。

老天爷似乎也专门和红军作对，时值冬季，天气异常寒冷，红军所在的宝兴、天全、芦山等地，下了多年未遇的大雪。部队派出筹集粮食、牦牛的人员，大都得了雪盲症，有些人冻死在雪地上。这一带人口稀少，生产落后，数万大军在此辗转作战，更难以满足兵员、粮食、被服补给的要求。尤其是“与民争粮”的矛盾日益突出，部队经常以野菜、土豆充饥，最好的时候每日也只能吃到两稀一干。敌军重兵压迫，战斗不止，当地虽有一些群众参军，但补充不了红军由于战斗和疾病的大量减员，有生力量日渐削弱。当地不产棉花，部队不得不以棕桐制成衣服来抵御高原隆冬的严寒。

主力红军的处境如此艰难，留驻后方金川一地的川陕省委、政府机关和几千名伤员共计两万多人的日子就更加难过。敌人乘主力红军南下，后方空虚，便纠集了两万多人围困金川，并企图将

后方红军全部消灭。在金川东北面的茅草坪、梭磨，北面的党坝、松冈，西面的卓斯甲等地，都是敌人的占领区。敌人在这些地区大肆抢掠财物，疯狂破坏革命政权，捕杀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并控制红军的出人道路。

由于敌人的封锁围困，金川很快粮食告缺，尽管机关人员都上山下地挖野菜、剥树皮，仍然难以维持两万余人的生活。尤其是大雪封山之后，野菜、树皮也难以找到，饥饿、寒冷的折磨，使不少人丧失了生命，部队一天天在减员，伤病员也在一天天地增多。

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部队曾在茅草坪、梭磨、卓斯甲打了几仗，但由于指挥不当，未能获胜。敌人的气焰越来越嚣张，派出的工作队不时被敌人全部杀光。敌人屠杀红军工作队的手段极其残忍，割鼻、削耳，然后碎尸；对待工作队的女同志更是不择手段，先用刀削去乳房，再用木棒插入阴道。不知有多少人就这样被敌人折磨至死。

为了保卫金川，省委把机关人员、妇女独立团、筹粮工作队和轻伤员全部组织起来，决心采用以攻为守的方法，主动出击敌人，打破封锁。经过几次战斗之后，敌人再也不敢袭击骚扰了。部队一面四出筹粮，一面恢复遭到敌人破坏的党组织和革命政权，最终保住了金川这个后方基地。^①

1935年冬南下红军的艰难处境，充分证明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行不通的，中央关于“南下是绝路”的预见是英明的，正确的。

南下红军百丈失利，而北上红军在党中央领导下，却在直罗镇战役中打了胜仗，全歼敌人一个师。当党中央把这个消息电告前敌总指挥部时，徐向前很高兴，拿着电报去找张国焘。他对张

^① 余洪远：《保卫金川》，《艰苦的历程》下，第138～142页。

国焘说：“中央红军打了大胜仗，咱们出个捷报，发给部队，鼓舞鼓舞士气吧！”张国焘一听，态度很冷淡地说：“消灭敌人一个师有什么了不起，用不着宣传。”徐向前听后，心里对张国焘不愿宣传兄弟部队的胜利很不满意。但张国焘的心情当时也是很矛盾的，不几天，他又允许把直罗镇战役消息在小报上登了出来。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看到了陕北红军打胜仗的消息，联想到南下以来的艰苦战斗，尤其是百丈战斗失利后的困境，愈发感到南下方针是错误的，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不少同志在私下议论，认为南下没有出路，还是应该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这一切，使得张国焘散布的“中央率孤军北上，不会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的谬论不攻自破。一种强烈要求北上的思想情绪开始在南下红军中悄悄酝酿。

三 争取张国焘

红四方面军及一方面军一部自9月中旬从草地南返，两个多月来连续作战，广大指战员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克服了重重困难，以英勇顽强的精神，取得了许多战斗的胜利。但是，由于张国焘南下方针的错误，尽管广大指战员拼死搏斗，仍然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百丈战斗失利以后，部队在敌人围攻之下，更是困难重重。

全国政治形势在此期间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自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野心越来越大，不仅侵占了冀东22个县和察哈尔省北部，而且又酝酿着“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同仇敌忾。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其势如波涛汹涌，标志着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这时，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林育英由莫斯科回国到达陕北，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听取了林育英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会议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认为中共有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所以党的任务是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提出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统一战线的最高组织形式。

然而，这一切形势的变化并没有动摇张国焘独裁的野心。

张国焘自另立“中央”以来，对南下部队的命令，多以第二“中央”的名义发出。南下碰壁并未使他改变自己与中央抗衡的决心。他认为仅在南下部队中以第二“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并不能证明自己的“中央”是真正的中央，于是他竟丧心病狂地于12月5日向在陕北的党中央发出一个电报，内容如下：

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乙、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丙、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党团中央^①

12月18日，张国焘致电林彪等转林育英，指责毛泽东、周恩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86页。

来等为“右倾机会主义”，北上行动是“逃跑”，要求“尽力反毛周路线”，并要陕北苏区及红军接受其领导。

12月22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要求他维护党内团结，一致对敌。电文指出：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因为目前的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组织问题本来有如下意见：因为中国土地之广大，交通之不便，政治经济的不统一与发展之不平衡、特别是中国革命在各地的爆发等原因，中共中央势难全部顾及，因此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方法。

张国焘另立中央和坚持南下的做法，使朱德总司令感到十分苦恼，他虽然多次劝说张国焘改变主意，放弃第二中央，但张国焘总是置若罔闻，一意孤行。12月30日，朱德第一次以个人名义致电党中央和一方面军负责人并转林育英，提出“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是对敌与互相情报即时建立”。

1936年1月1日，毛泽东亲自致电朱德，谈了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各方面的情况和他所了解的国内国际时局动向，电文中还指出：我处不但对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亦有发生联系，这是大胜利。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张国焘对陕北来电根本不予理睬，不顾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益严重，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加深，全党应团结一致共同领导抗日的大局，仍然重弹他所谓“反机会主义”的老调。

1月6日，张国焘致电林育英，指出了所谓“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的种种错误：将五次“围剿”估计为决定胜负的战争，在

受到挫折的条件下，必然成为失败主义的严重倾向；防御路线代替进攻路线；在过去福建和北方事变中，和全国抗日反蒋运动中，都因错误策略放弃无产阶级领导的争取；机械地了解巩固根据地，因此不能学习四次“围剿”在鄂豫皖红军在强大敌人压迫下退出苏区的教训；忽视川陕苏区和整个川、陕、甘的革命局势，因此对川陕赤区的没有帮助和指导，影响到苏、红在西北的发展；过低估计少数民族的革命作用，对革命在西北首先胜利的可能表示怀疑；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后来又将党向北进攻的路线，曲解成为向北逃跑，最后走到分裂党和红军。上述的一贯机会主义路线，若不揭发，就不能成为列宁主义的党^①。

为了挽救张国焘，党中央一面对其进行坚决斗争，一面对其进行耐心说服教育。1月13日，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致电张国焘：“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别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此间对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兄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出之。但对兄之政治上错误，不能缄默，不日有电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进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②

1月16日，林育英又致电张国焘，明确指出，“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

张国焘接到林育英的来电后，于1月20日复电林育英，别有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11页。

^② 《张闻天关于别立“中央”妨碍统一望自动取消致张国焘电》（1936年1月13日）。

用心地询问林育英：“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为何不将国际决议直告？”他还再一次要求中共中央取消中央名义，称“我们一切都经党中央同意，假冒党中央或政府机关名义发表重要文件，此间有公开否决之权。为党的统一和一致对外，望告陕北同志，自动取消中央名义，党内争论请国际解决”。

针对张国焘屡次要求中共中央取消中央名义，而以他另立的“中央”取替之的狂妄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月22日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

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公开的成立了他自己的“党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①

1月24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朱德，明确指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同时，张闻天也致电张国焘等：“党内统一一致，才是挽救殖民地危险，才有利于中国革命。”“弟等所争持者为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既愿放弃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28页。

第二党，则他事更好商量。”“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

但张国焘对党中央的让步并不满足，1月27日，他致电林育英、张闻天，提出：“强迫此间承认兄处中央和正统，不过在党史中留下一个不良痕迹，一方让步，必是种下派别痕迹的恶根，互相坚持必是互相把对方往托陈派、罗章龙派路上推。”在电报中，他仍然坚持应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并且以教训人的口吻说：“党内生活如果没有领导干部间民主的、互助的、同志的态度的互相商量，机械地运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妨碍自动性、创造性、积极性的发展，同时不能收得思想斗争应有的效果，反养成打官话的习惯，发展成为似乎是有原则的斗争。”他还打出“应急谋党内统一”的旗号，提出“此时或由国际代表替代中央，如一时不能召集七次大会，由国际和代表团商同我们双方意见，重新宣布政治局的组成和指导方法，亦可兄处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①。由此可以看出，张国焘认为，即使他的第二“中央”无法得到承认，也不能再服从于党中央的领导，至少他应该和陕北的中央领导人平起平坐，共同服从于共产国际。为了同中央争权，张国焘真是费尽了心机。但从这封电报也可以看出，由于林育英来电已讲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张国焘坚持第二“中央”的决心已经开始动摇。

瓦窑堡会议之后，党中央于1936年1月16日将会议的决议要点电告了张国焘。1月27日，张国焘致电林育英、张闻天并转各中委同志，对于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决议，“原则上一致赞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31～332页。

同”，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补充和修改意见共4条，其中指出：“在目前形势分析中，对于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你们单说陕北的胜利，把整个的胜利发展抹煞，这是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还多少保持着偏见的有害观点。”“关于统一战线的政权和军队，我们从早于去年十月革命纪念日发出的通电中，已提出抗日救国政府与抗日救国军作号召，为着对外的一致，还是用这个名义的好。而且国防政府可以使人曲解，抗日救国则是民族革命的鲜明旗帜，所以我们还是主张用抗日救国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名义。”“行动纲领我们增加了3条：（1）给民众以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和自由；（2）组织民众的抗日军、义勇军……等；（3）实行民族自决，联合国内各少数民族一致抗日，反对在日本卵翼下的反动民族运动。……”“在吸收新党员的条件上，我们增加为党纲奋斗的一点。”^①

对于张国焘对决议的补充和修改意见，张闻天来电一一给予答复：“（甲）国防政府十大纲领，是广泛的抗日纲领，重在动员抗日。故土地问题都一字未提。（乙）民主自由已包括言论自由等权利。（丙）武装组织中心在抗日联军。（丁）民族自决已为党的十大纲领之一，抗日纲领重在中国自己的民族独立。所以，主要的是联合一切被压迫民族实行抗日。（戊）四方而军及二、六军团的胜利，是包括在各地红军新胜利以内。（己）为党纲奋斗，中共党纲现尚没有。”^②

张国焘能基本上同意中共中央政治策略的转变，还是有一定思想认识基础的。1935年12月14日，他在《抗日反蒋与土地革命》一文中分析了日本侵略中国后，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策略，就是在日本吞并中国的紧急关头，积极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30页。

^② 《张闻天关于对中央政治决议的增修意见复张国焘等电》（1936年2月9日）。

组织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发展苏维埃和红军，发动广大农民和士兵的暴动，组织抗日救国军，大大发展基本群众抗日反帝的积极性，领导民族革命战争战斗到底，同时运用抗日反蒋联合战线策略，来广泛的发动民族革命战争，在抗日反蒋联合战线的运用中，彻底暴露蒋介石的汉奸作用。”“无论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抗日热忱是多么不坚定，和带着暂时性质，但这抗日热忱，是民族运动应当利用的。……抗日反蒋的联合战线就须利用这些动摇不定暂时性质的中间阶层的民族革命倾向，和反动营垒内部的矛盾。”^①

1月28日，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任家堡召开了各机关活动分子会议，重点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会上，张国焘作了《关于民族革命的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报告。他根据自己对党的统一战线策略的理解，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阐释，他回顾了福建事变后由于中共没有主动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而给抗日反蒋斗争造成的损失，说明实行战略转变的必要性；他还提出统一战线中争取中间力量的重要性，认为反对富农的口号是不正确的。关于统一战线中的土地政策、劳动政策、经济政策、苏维埃选举等问题，他也提出了具体的规定^②。

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致拥护中央的统一战线策略。

中央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和中央对四方面军的不断关怀，连同四方面军《红色战场》报上不断刊载的陕北红军的战斗捷报，无不在部队里引起了强烈反响。尽管张国焘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认为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但陕北红军胜利的消息却使他的诬蔑不攻自破，激励和鼓舞着广大指战员。而张国焘公开分裂党

^① 《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第457～458页。

^② 同上书，第479～513页。

和红军，南下碰壁的事实，也从反面教育和提醒广大指战员。因此，要求维护党的团结，要求北上抗日与中央会合的情绪，日益高涨。

此时，张国焘虽然仍坚持与中央平分秋色，同受国际领导的意见，但他的内心是很矛盾的，不稳定的。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相比，他显然占了下风。在政治方面，毛泽东等人得到了林育英这个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他们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符合国情，深得人心。虽然张国焘可以拿自己的入川纲领、西北联邦政府等来自慰，但这些毕竟没有理论上的系统性，也还没有产生全国性的效应。现在，由于大势所趋，他对毛泽东等人的正确策略不得不取拥护的态度，尽管他在拥护的同时仍然重提解决党内矛盾的问题，但可以看出，林育英也好、陕北的同志也好，都有捐弃前嫌，急谋党内统一的要求。而同他一起南下的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更是从一开始就反对他的分裂行为，甚至一向支持他的陈昌浩，此时也改变了态度，这使他在政治上成了孤家寡人。在军事上，他曾认为毛泽东等人率军北上死路一条，不料，他们不仅没有被拖死和冻死，反而发展壮大起来，有了坚固的根据地。而南下的部队，虽然一开始打了一些胜仗，但由于蒋介石调动主要力量来对付南下部队，结果百丈战斗失利，部队遭敌重围，减员严重，供给不足。两相对比，优劣分明。再拿搞统一战线来说，陕北方面在争取张学良方面已有了很大的成就，而张国焘虽然向西南军阀发出号召，要求他们一致抗日，共御外侮，但对方却毫无反应。所以，张国焘不得不承认，“我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①。

这一时期，经过林育英、张闻天等人的说服教育，以及朱德等同志的多次思想工作，张国焘虽不再坚持他的第二“中央”，但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297页。

仍然顽固地认为他不能接受在陕北的党中央领导。为了争取张国焘，以及出于对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关怀，党中央同意在四方面军组成西南局，由共产国际直接领导。对于党中央的让步，张国焘并不满足。他虽然感到自己在各方面已处于劣势，但反党活动并没有就此停止。

四 西进甘孜

1936年2月初，天全、芦山的形势日益严重，敌人集中了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及川军主力，开始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犯。红四方面军处于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的困境，粮弹得不到补充，仗打得十分艰苦。

继续与敌主力决战将对红四方面军极端不利，徐向前等人不得不于2月11日制定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决定以方面军一部位于邓生、碛碛、达维、抚边一线，钳制东南两方之敌，主力红军迅速西进，取得道孚、炉霍、康定一带地区，以便尔后之发展。

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对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提出了意见。来电指出：“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关于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计划，提出了3个方案供选择：

第一方案为北上陕甘。红四方面军东渡岷江，红二、六军团北渡长江，共同北进。第一步迫向岷江，第二步抵陕甘，为在北方建立根据地，同苏联红军联合对抗日本侵略者创造条件。

第二方案为就地发展。红四方面军依托现地，打破敌人的“围剿”，第一步迫向岷江，第二步进入岷沱两江间，实现夺取四川的计划。二、六军团则在靠近川南的云贵川建立根据地，与四方面军相呼应。

第三方案为南下转战。红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金沙江，与二、六军团取得近距离的会合，甚至转向云贵川发展，寻求机会前进。

中央认为，第一方案是上策。^①

四方面军领导人讨论的结果，一致赞同北上的方案。因为朱德、刘伯承、徐向前在此之前就指出张国焘南下的错误，希望北上与党中央会合。而张国焘由于南下碰壁，又见斯大林希望主力红军向北发展，靠近苏联，与苏联红军联合抗日，也就顺水推舟，同意北上的方案。

2月中旬开始，红四方面军分为3路，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道孚、炉霍、甘孜进军。刘伯承、李先念率三十军八十九师先行，为全军开路；红军总部与方面军总部从宝兴出发，随由三十军、四军、五军及九军二十五师组成的纵队出发；另一纵队由三十一军、三十二军组成，由王树声指挥，配合主力红军取康定，对天全、泸定方向之敌实行警戒，掩护医院之搬运。

西进红军开始了艰难的征程。2月的川西高原，没有一丝春意，天寒地冻。红军将士在缺衣少食的情况下，要翻越横亘在川西高原上的一个个冰雪覆盖的山脉，历尽之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西进路上，红军首先要翻越的是位于宝兴和懋功之间海拔3000多米高的夹金山。当地有首歌谣：“正二三，雪封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但红军将士在后有追兵的情况下，却不得不攀越这座“神仙也不攀”的夹金山。

夹金山上下有百十里路，为了避开午后凶恶的大风暴，部队必须在凌晨出发。山高、路滑、夜黑，不知有多少人摔进雪窝后再也没有出来。中午时分，部队爬上了山顶，身上的汗水早已浸透了单薄的衣服，微风一吹，冰凉直透肌肤。但徐向前总指挥顾

^① 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71～372页。

不得这些，望着眼前这冰雪的世界，心里生出许多感慨。他说：“去年6月初，一、四方面军就是在这一带会师的，这是座不平凡的雪山，它永远铭记人们的心中。”战士们也触景生情，吟出一些不太像诗的诗来：“夹金山呀，夹金山，高耸云霄戳破天，我站在你头上歇歇脚，凑着太阳抽袋烟”；“夹金山，有人说离天只有三尺三，人过要弯腰，马过要卸鞍。红军战士多豪迈，不弯腰，不卸鞍，要拨开乌云见青天”……谈笑间，透出一股乐观主义的英雄气概。

下山了，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突然云雾翻滚，狂风大作，山风卷着雪花，发出刺耳的呼啸声，冰凉湿冷的单衣被狂风一吹，完全失去了御寒的功能，战士们被冻得浑身哆嗦，只能咬牙坚持着，加快步伐向山下走去，遇到光滑的冰雪道，索性像坐滑梯一样滑下去。天黑时分，终于翻过了夹金山，找到了有人烟的地方。

翻过夹金山，部队又行程百余里，跨过两座悬挂在大渡河上空的铁索桥。桥下波涛汹涌，浪花翻滚，吼声如雷。人走在摇摇晃晃的铁索桥上，如同走在飘流在河里的木筏上，头晕目眩，心惊肉跳，似乎随时都有掉下去的危险。

过了铁索桥，部队在丹巴休息了一天，便沿着奔腾咆哮的大渡河支流格石扎河，向西北继续前进。

傍山临河的羊肠小径，曲折险峻，上看是悬崖，下望是深渊，湍急的河水在脚下咆哮，震耳欲聋，仿佛要把人席卷而去。沿河的大山里黑压压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时而太阳从树枝的缝隙间透过灿烂多彩的光柱，时而天昏地暗，云罩雾障。偶尔有一个小山寨，也坐落在半山腰，要到山寨去宿营，需要爬一二个小时的山。战士们跋山涉水已经太疲劳了，只能在河岸边露宿。找一块平地，砍些树枝，搭起棚子，顶上盖些茅草或细树枝，棚子里铺上厚厚的一层枯草和干树叶，就成了战士们最舒服的“绿色旅店”。

夜幕降临了，河岸边一片燃烧的篝火，战士们开始用铁锅、瓷缸等烧水、煮饭。没有油，也没有盐，白开水拌点炒面，便是一顿美餐。饭后休息的滋味也很不好受。由于连日来战士们负重50多斤，爬山涉水，日行七八十里，大家脚上还都穿着草鞋，走在冰天雪地里，寒风吹、冰凌刮、石块磨，脚上裂出了一道道血口。行军时，注意力集中在赶路上，还不觉得太痛，在这冰冷的夜晚一歇下，那张着的血口，就像针扎似的钻心疼。战士们躺在枯草上，被疼痛折磨得久久难以入睡。

沿着格石扎河行军两天之后，大雪山脉中段的党岭山成了红军战士将要征服的下一个目标。党岭山海拔5 000多米，顶天矗立，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不时有风暴、雪崩发生。经过长途跋涉的红军战士，忍受着饥寒和疲劳的折磨，一步一步地向山上挪动。越往上走，空气越稀薄，越觉得头晕脑胀，四肢无力，呼吸困难。年已过半百的朱德总司令，和战士们一样，艰难地向山上攀登，却把自己的马用来拖拉那些身体弱的战士向上爬。到山顶时已是中午，但太阳完全被弥漫的风雪遮住了，天昏地暗，就像傍晚一样。狂风卷着雪浪一阵阵袭来，战士们的衣服都冻成了冰筒，眉毛、胡子结满冰霜。不知有多少战士被风雪卷走，长眠在党岭山上。为了鼓舞战士的斗志，朱德总司令忍受着严寒的袭击，一边给战士们讲故事，一边鼓舞战士们战胜风暴雪山，胜利实现北上计划。

几万红军将士就这样互相搀扶着、互相鼓励着翻过了党岭山。

3月1日，红军占领道孚。

3月2日，张国焘致电金川省委，提出攻取康定、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主张。

3月上旬，四方面军总部制定了《康道炉战役补充计划》，对红军今后的行动作了进一步部署，指出：“我主力进出于道、炉、甘一带，相机取康定，准备消灭由康定方面进攻之敌，并肃清西

北一带之藏反。争取这一广大地区中部队之补充、整理、休息，待机行动。派一部出观音河地区活动，以开通将来主力北进之道路。对夹金山、巴郎山、虹桥山、大炮山、木壳口梁子应尽力牵制，并积极采取佯动姿势。

3月15日，红军攻克炉霍，总部机关即设在此地。

三十军继续西进，占领西康东北部重镇甘孜。四军则经炉霍向西南疾进，攻占瞻化，俘敌国民党西康宣抚使诺那喇嘛以下百余人。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及九军二十五师，分别由丹巴、道孚南下，钳击泰宁，守敌李抱冰五十三师一部弃城南逃康定。三十二军及九军二十七师，在懋功以南完成掩护主力转移任务后，跟进道孚、炉霍。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在宝兴南关、大垭口多次与追敌激战，击溃敌人两个团，胜利完成后卫任务后，亦从懋功、丹巴向炉霍地区转移。至4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达瞻化、泰宁，北连草地的大片地区。

张国焘错误地坚持南下，使红四方面军遭到了惨重损失，部队从南下开始时的45个团，8万多人，减少到28个团，4万多人，其中还包括红一方面军留下的红五、九军团在内。这是张国焘分裂主义造成的恶果。

张国焘南下方针的失败和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胜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在战斗之余，对两种不同方针产生的不同结果越来越有了深刻的反思和明确的认识，对张国焘的不满情绪也在日益增长。

为了统一干部战士的认识，继续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红军总部驻进炉霍的当天，张国焘便迫不及待地召开了红四方面军干部会议。在会上，张国焘作了《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在报告中，张国焘大肆鼓吹他的南下方针是正确的。他说：“在中国苏维埃运动遭受相当挫折，企图用反攻敌人保持原有胜利的基础上，而发动全党热烈的反对毛、周、张、博的机会主义逃

跑路线，与主力红军毅然南下是完全正确的。毛、周、张、博说南下是死路，南下有地形上的障碍，有优势兵力的敌人，同时还说南下是退却路线，这当然是胡说八道。”在攻击毛、周、张、博后，张国焘不仅不承认南下的失败，而且认为：“在相当的意义上说，南下是胜利，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南下打坍和消灭了敌人 80 个团以上，主力红军不仅取得了休息和整理，而且巩固和扩大了，开始在川西一带创造苏维埃区域，掀起了当地群众的斗争，整个部队在物资上得到了很大的补充，这也都是从我们坚决反攻敌人中所获得的成绩，这样，怎么能说南下是退却呢？！”“南下还给全国红军以极大的配合。假如当时一、四方面军全部到陕北去，那么薛岳、胡宗南、王均等共有 100 多个团可以跟着我们到陕北去，使我们发生更大的困难。正因为当时主力红军的南下，牵制与吸引了敌人，使一、三军能够顺利的达到陕北。同样也使二、六军能顺利的发展运动战。在这方面来说，南下也是有极大意义的。”在标榜了南下的正确和功劳之后，张国焘针对部队中有关南下的议论，决心用军阀主义的办法来制止这种议论的继续蔓延，但他却不得不打着共产党的旗号，他说：“我们是有政权与军队的党，党内的民主是受到一些限制的。每个同志现在要好好的约束自己，不要信口开河随便乱谈。在一切政治问题上服从党的决议，任何一种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遭受铁锤的打击。每个党员有意见可事先向领导机关提出，但决定后便要一致执行。故意引起猜疑，类似小组织的活动等等，只是一种帮助敌人损害自己的行为。每个同志应该慎重的来约束自己。”^①

张国焘这一番杀气腾腾的讲话，目的在抑制部队干部战士对他的批评，但铁的事实摆在那里，这是张国焘根本无法否定的。

^① 《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第 527～533 页。

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占领了道、炉、甘广大地区后，敌人便估计红军有两种企图：一是南进康定、雅江，以便与二、六军团会合；一是北进甘肃、青海，以便与陕北红军相呼应。所以，敌人除抽调兵力积极防堵红军实现上述两种企图外，仍留一部主力集结待命，乘机进攻。薛岳部之九十师、九十二师、九十六师、五十九师及六十一师仍集结天、芦、雅一带为机动部队，其第五师赵锡光部已开泸定。李抱冰部、刘湘部、孙震部、李家钰部及杨森部也都在积极调动之中。

根据敌军部署情况，四方面军总部制定了红军的行动计划：一是首先消灭李抱冰部，配合尚在滇、黔边行动的红二、六军团；二是赤化西康道、炉、甘、瞻等县，完成准备工作，以便将来向北开展。为了实现这两大任务，总部要求各军必须振作全体指战员的精神，号召艰苦奋斗，发愤图强，在日常生活中与一切散漫松懈消极投降困难等现象作斗争，严整纪律。命令三十军侦察康、甘、青一带情形，准备北进计划；九军准备消灭李抱冰取康定计划，并在部队中立即完成战斗准备；四军、三十二军应即准备攻取雅江、理化的计划；三十一军应即准备巩固现阵地及东渡岷江的各种计划；五军应即定出由观音菩萨河北进阿坝、班佑的计划，以及观音区与炉、甘区打通的计划。

为了有效地消灭敌人，总部要求各部队在准备战斗时期要加强部队训练，内容主要包括：（1）消灭蒋军主力战术的研究与训练，应着重打堡垒与夜间动作。（2）演习打番反和游击战术。根据当地番反情形、战术上的特点，与过去打反动的经验，和游击队配合起来。（3）每天补助教育，应抓紧瞄准、射击、投手榴弹，要求每个战士能于瞬间完成火力准备，且能命中精确。……

同时，总部还决定创建骑兵队伍，以适应西北地区作战的要求。对于巩固有生力量和扩大红军工作也作了具体安排。

注重政治工作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大特色，四方面军在政治

工作方面是要求很严格的。尤其是在部队进入川、康边少数民族地区后，方面军总部对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其中包括：在全体指战员中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深入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宣传；有计划地培养干部，组织各级军政学习组织；注意部队分散时的政治工作，克服在粮食困难中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及可能发生的失望情绪。尤其是对少数民族的工作更应抓紧，应加紧对少数民族的政治宣传，争取少数民族参加红军，帮助他们成立番人革命党；对于缴械投降的番反，要一律予以优待，等等。

总之，为了迎接更大的战斗，四方面军总部要求各部队做好战前的各种准备工作。

4月1日，张国焘在道孚又召开了机关活动分子会议，在会上作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我们当前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继续攻击党中央，并且提出“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要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就是说我们要在四川、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西康的几省中建立广大革命与抗日的根据地”。这完全是张国焘企图偏安西北边陲计划的暴露，与他表面上所同意的北上的方针是相矛盾的。他为了使与会者相信他的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计划能够实现，便在报告中说：“当然，这一地区比之于湖北、江西较为落后，可是我们有着伟大的前途。因为中国革命有如下发展的可能：可以在比较落后的区域，敌人的统治比较薄弱而其冲突与矛盾特别厉害的地方首先得到胜利，使整个中国的土地革命和民族革命与弱小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使国内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这样去取得中国革命最后胜利。”^①

为了实现继续向西发展的目的，张国焘还派余洪远和邵式平探寻去青海的道路。余洪远回忆说：张国焘“叫我和邵式平两个

^① 《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第534～535页。

到甘孜，任务有两个：一个是查明德格到青海的道路，一个是迎接二方面军。当时我一路调查，一路找喇嘛开座谈会，以后从甘孜一个铁棒喇嘛、绒坝岔一个喇嘛、德格一个喇嘛那里了解到这条路要走48个马站，就是马也要走48天，而且中间都是小路，没人烟，没粮食。他们喇嘛走都是马驮上粮食，边走边采野果补充，才能走到。有些地段水都没有，马还得驮水。我把情况告诉邵式平，发电报给张国焘，说此路根本走不通。”^①

“此路不通”，对张国焘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计划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而红军所控制的区域内的政治经济状况，也使张国焘看到了实现西北计划的重重障碍。

这一带原属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势力范围，是以藏民为主的藏汉杂居区域。藏族的土司、喇嘛权力很大，是实际的统治者。喇嘛寺林立，均拥有大批的土地、粮食、酥油、金银和牛羊等，并有自卫的武装。藏民受着宗教和封建农奴主的奴役和压榨，过着人间地狱般的悲惨生活。由于封建军阀多年来对藏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他们对汉人充满仇恨，对红军也持仇视态度。反动土司更是凭借武装，不断袭击和骚扰红军驻地，杀害红军派出的工作人员，牵走红军千辛万苦搞到手的牛羊。

为了改变这种窘迫的、被动的处境，红四方面军根据党中央瓦窑堡会议制定的统一战线政策，相应地制定了对于少数民族的政策和策略。

首先，成立了由藏民组织的波巴独立政府。利用一部分有名望有号召力的土司，作为争取下层藏民群众的桥梁。放宽对土司和喇嘛的政策，尽量通过和平谈判，令其停止武装抵抗。用借贷的方式，取得红军急需的军用物资。对于坚持反动立场、顽固抵抗者，则以武力解决之。根据这个政策，红军首先争取了甘孜西

^① 余洪远：《长征时期甘孜、阿坝、毛儿盖等会议的历史情况》（未刊稿）。

部的大土司德格，使他同红军达成了互不侵犯协议，并捐献了一批粮食和牛羊，慰问红军。红军则派人送去了枪支弹药，作为谢礼。这对于争取其他土司、喇嘛友好地对待红军，产生了较大影响。

其次，尊重藏民的宗教权利，提倡保护喇嘛和喇嘛寺、信教自由、还俗自由等。

再次，宣传藏民，搞好与藏民群众的关系。红军利用一切机会，向藏民宣传各民族一律平等、抗日反蒋、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等道理。并且以实际行动来赢得藏民的好感。红军战士常常深入农牧区，帮助藏民生产，给藏民治病。藏民群众见红军纪律严明，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便渐渐同红军亲近起来。

通过这些政策和策略的运用，部队的境况有了很大的改观，吃粮困难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也能买到不少牛羊，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

四方面军原来并不准备在这一带立脚，只想筹足必要的粮物后，即刻北上。因此，部队刚占道孚后，总部即指定由李先念、何长工、李天焕、曾日三等入，组成粮食委员会，全力筹集粮食和牛羊，以备北上。

然而，此时红二、六军团已从乌蒙山区突破了敌人的包围，进占了盘县亦资孔地区。3月25日，朱德、张国焘根据中央2月14日电报精神，致电红二、六军团领导人，提出红二、六军团过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北进的建议。2月30日，又致电红二、六军团，先以到达滇西北为目的，然后会合一同北进。红二、六军团立即复电，决定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这样，四方面军便在原地休整、训练，准备迎接红二、六军团，然后共同北上。

4月初，四方面军总部制定了《四、五两月战斗准备工作计

划》，根据这一计划，部队积极开展了整编、训练、筹集物资等工作。

整编部队是为了充实连队，适应新任务的要求。整编后的部队共6个军，19个师，4万余人。组织系统及负责人是：

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周纯全，副主任李卓然。

第四军：军长王宏坤，政治委员王建安，参谋长陈伯钧，政治部主任洪学智。辖第十师、第十一师、第十二师和独立师。

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第二十五师、第二十六师、第二十七师和教导师。

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代），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第八十八师、第八十九师。

第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兼），政治委员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朱良才。辖第九十一师、第九十三师。

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副军长罗南辉，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辖第十三师（原第五军团部队编成）、第十五师（原第三十三军部队编成）。

第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李干辉。辖第九十四师、第九十六师。

此外还有，方面军直辖妇女独立团，团长张琴秋；骑兵师，师长由骑兵司令许世友兼；四川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总指挥王维舟；金川省军区，司令员倪志亮兼，政治委员邵式平，辖独立第一师、独立第二师；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政治委员何畏、参谋长张宗逊、政治部主任王新亭。

部队整编后，立即开展了紧张的军事训练。根据未来北上时的敌情和地形，着重学习打骑兵、打堡垒、夜间战斗和强渡江河等战术。同时大力开展政治、文化教育和文化娱乐活动，而且专

门建立了领导部队文娱体育活动的组织——“红场委员会”。

由刘伯承主持的红军大学的工作，在这一时期搞得非常出色，对于提高部队干部的政治军事水平，促进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红军大学是由朱德、刘伯承等同志提议，于1935年10月在卓克基成立的，目的是保证和训练军、政干部，提高各级干部的军事政治水平，以便适应战争的需要，学员多是从各军抽调来的连排干部。红军大学的教育方式和内容多种多样，非常生动活泼。

刘伯承亲自抓政治教育。政治教育的内容有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历史及马列主义理论常识。刘伯承要求学员多学马列著作，并且提倡学斯大林的名著《列宁主义概论》，他说：“宋朝宰相赵普主张一部《论语》治天下，我们要学好《列宁主义概论》，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武器。”他对红军的性质、任务和宗旨的教育、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等都十分重视。针对张国焘推行军阀主义造成的官兵关系上的消极现象，刘伯承重点讲了“拳头不能打在工农阶级兄弟身上”、“官兵团结心连心，黄土变成金”的道理和增强官兵团结的重要性。

刘伯承还亲自抓军事教育，亲自讲解战略战役战术，传授战斗经验；讲解带兵、养兵等管理教育课；讲解军事地形课，结合北上途中的高山大川、重要关隘、雪山草地等情况和民族情况、敌人兵力部署等，进行教育。徐向前称赞说：“刘伯承同志主持红大的教学，亲自给干部讲打骑兵的战术问题，还编写了专门教材。我听过他的课，深入浅出，比喻生动，富有哲理性，让人感到津津有味，听了还想听。”^①

红军大学还创办了《红炉》校刊，刘伯承同志亲自写了刊头，并题词：“我们学校就是一个红炉，我们学习军事、政治、文化，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85页。

以及向一切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克服一切困难，就要在这个‘红炉’中锻炼。坚强的革命意志就是在通红的炉火中锻炼出来的。”^①

除了军事、政治、文化教育外，红军大学还针对炉霍交通不便，气候恶劣，经济条件差，粮食、被服缺乏等实际情况，对学员进行了一些适应环境的辅助教育：一是自制毛衣，解决缺衣问题。炉霍大喇嘛寺的羊毛很多，红大和驻炉霍的部队就地取材，用来织成毛衣、毛裤、毛袜等各种御寒的毛织品，准备过冬时用。二是学烧牛粪，解决燃料问题。大草原地区烧柴比较困难，居民普遍以牛粪作燃料。刘伯承便请当地参加红军的少数民族战士为教师，教学员学烧牛粪。通过这些辅助教育，对克服当时生活上的许多困难起了不小的作用。

总之，这一时期对于南下部队来说，是一个难得的休整和训练的机会，广大指战员一面恢复和充实自己，一面做会合红二、六军团共同北上的准备，部队驻地充满着紧张而热烈的气氛。

与此同时，部队和当地藏民群众的关系也进一步融洽起来。部队派出一批党政干部协助地方人员建党建政，建立藏民地方武装和百姓联合会、青年队、姊妹团等群众组织，并积极帮助群众发展生产。藏民也积极帮助部队解决粮食问题，有些人还参加了红军。这里尤其需要一提的是丹巴一带的一个藏族头人——马骏。他虽然身为头人，但思想开通，同国民党和四川军阀有着深刻的矛盾。红军到来不久，他即率自己的队伍投入红军，被总部授予大金川红军独立第二师的番号，任命他为师长。为了改造这支队伍，总部派李中权为政治委员、金世柏为副师长，另从各军抽调了100多名干部到该师部队中担任团政委、副团长、指导员等职。这些人为了便于工作，也穿着藏服。战士们个个强壮强悍，能骑善射，

^① 王波：《在雪山草地的红军大学》，《艰苦的历程》下，第129～130页。

作战非常勇敢，担负着以丹巴为中心，东至绥靖，西至夹金山约300公里交通线的警戒任务。马骏自参加红军后，不仅作战勇敢，而且利用自己和父亲在当地的影响，协助丹巴县委工作，为主力红军北上筹集了100多万斤粮食。

部队的情况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这一带自然条件很差，不适应大部队长期驻扎，所以，方面军领导人都在十分焦急地等待着红二、六军团的到来，然后一同迅速北上。

第七章 从甘孜到会宁

一 甘孜相会

为了迎接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总部对部队进行了动员和布置，要求各部队大力开展迎接红二、六军团的组织准备工作。

鉴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教训，徐向前在动员会上向指战员们指出：“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关系没搞好，要接受教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不能分家。现在老二就要上来，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长处、短处，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①

在贫瘠的地区，以什么礼物送给即将到来的兄弟部队呢？朱德号召大家献计献策，经过研究，最后决定用当地特产的羊毛捻成线，织成毛衣、毛裤、毛背心等，送给红二、六军团每人一件，这样既能表现兄弟间的革命情谊，也可作为北上时的御寒衣服。

从藏民那里购来的羊毛，又脏又黑，夹杂着羊粪、草叶、树枝、泥块，散发着腥膻气味。指战员们靠着从群众中学来的方法，又是煮，又是搓，硬是把这些羊毛变成了雪白松软的羊毛。捻毛线是个技术活。在朱德的带领下，大家都掌握了这门技术活。朱德利用开会的时间，总要谈捻毛线、织毛衣的事情，并推荐一些织得很好的衣物让大家传看学习。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86页。

不久，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不仅完成了送给二、六军团的两万多件毛衣裤，而且四方而军的御寒物品也大部分得到了解决。

与此同时，为了保证红二、六军团的侧翼安全，红四方面军派出三十二军和四军的十二师、独立师由道孚出发，南下雅江阻击敌人，以确保红二、六军团安全到达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

随着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日期的临近，红四方面军利用一切机会展开政治宣传，对会合的意义和会合后的行动等作出了明确的解释。

1936年5月5日，在马克思诞辰118周年纪念会上，张国焘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现在和二、六军团会合很近了，这将要更大的增强我们的力量，汇合各方面的斗争经验，更大的提高我们的战斗力。并且二、六军团的特长是运动战，将更能给我们以莫大的帮助。”“我们和二、六军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分歧。因此，就必须要在实际工作中证明能够和二、六军会合好。我们未免有些困难可以发生，这是我们要估计到的。但只要有正确的政治态度，在原则上团结起来，在党的路线上团结起来，在卧薪尝胆的时期中更加团结起来，坚决与敌人奋斗到底。因此，就要加速度的加强这保证。这是我们争取更大胜利的保障！”^①

5月6日，《干部必读》发表了郭潜的文章，题目为《伟大的会合 伟大的前途》。文中指出，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具有伟大的意义，“显示了中国红军艰苦奋斗，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精神，击碎了敌人的一切障碍，顺利的达到了预定的目的。同时，也说明了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企图消灭红军，消灭苏维埃运动，简直是梦想。……伟大的会合，将更剧烈的兴奋全西北的少数民族，全中国的人民，为抗日反蒋，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07～508页。

战!”^①

5月9日，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指出：“目前红军中政治工作第一等重要任务，是立刻在干部、党团员及全体红色军人中，进行战斗的动员，指出会合二、六军的伟大政治意义，根据党中央及总政最近的文件，说明伟大的会合，将使中国苏维埃运动发生新的有利的变动，主力红军和苏区丰富经验的聚集，领导指挥的集中，以及少数民族解放斗争的开展，我们的战斗力不仅是数量上而且是质量上和配合上的大力加强。”^②

关于会合后的行动方针，张国焘认为是“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他认为：“中国西北部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最薄弱的地区，地大物博，我们可进退自如，发挥我们运动战的特长，以西北为根据，向中国东南地带发展；其次，西北地区远离敌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敌人要进攻我们，增加更大的困难；中国西北少数民族解放运动掀起更是我们的助力；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有吸引陕北红军配合的可能；中国的西北部毗连苏联与外蒙人民共和国，夺取西北，可直接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③

远在陕北的党中央，对于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十分关切。为了争取张国焘迅速北上，5月20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等，恳切地指出：“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与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弟等对于兄等及二、四两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表示无限敬意，对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中央与四方而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针，总之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以和协

^{①②③}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10、515、522页。

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希兄等共鉴之。”^①

5月25日中央又来电，分析了目前形势，提出了红二、四方面军迅速北上的战略方针：

（甲）国内及国际的政治形势均取着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党的反日统一战线的成就，目前议事日程上的具体任务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以走向建立全国国防政府，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乙）西北的形势是：红军与东北军取得密切合作，与杨虎城、邓宝珊亦有联系。……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

（丙）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天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奉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②

而张国焘此时最关心的，还是他的权力，他十分急切地想知道共产国际如何处理他与党中央的关系。5月30日，他致电林育英：

育英：

（一）兄是否确与国际经常通电？国际代表团现如何

① 《林育英等关于当前策略与国内外情况致朱德等电》（1936年5月20日）。

② 《林育英等关于目前形势及战略方针致朱德等电》（1936年5月25日）。

代表中央职权？有何指示？对白区党如何领导及发展情况如何？对军事和政权机关各种名义，军委、总司令部、总政由何人负责？如何行使职权？对二方面军如何领导？

（二）我们赞成此间对一方面军暂取协商关系，对北方局取横的关系，原则上争论由国际或七次大会解决。

（三）弼时等快到了，不能再不确定，请速明白答复。

国焘^①

6月3日，三十二军在理化以南的甲洼与红六军团胜利会师。

在甲洼，应任弼时的要求，随三十二军出发的由陈昌浩率领的工作组，给任弼时送去一批包括《干部必读》等文件在内的学习材料，内有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北上“逃跑”，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指名道姓地诽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的内容。王震发现后，立即下令把文件材料烧掉，并向任弼时作了汇报。任弼时、贺龙等在和四方面军一些干部的谈话中，同样也听取了他们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言论。任弼时立即告诉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介绍过草地的经验，不准进行反中央的宣传。送来的材料一律不准下发。将文件材料保留一份，其余全部烧掉。

6月6日，张国焘召开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议，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对张国焘来说，是迫不得已的。自从他另立中央以来，虽然一直以“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但以朱德、刘伯承为首的一批人并不承认他这个所谓的“中央”，所以他总有一种“做贼心虚”的感觉。现在，同二、六军团的会合在即，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26页。

任弼时、贺龙无论如何是不会承认他这个“中央”的。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也只同意他与陕北发生横的关系，并不同意以他的“中央”代替在陕北的中央。这样，张国焘觉得自己似乎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成立“第二中央”，已经使自己十分被动，如果此时不取消“第二中央”，则会落得个孤家寡人境地，其后果难以设想。所以，他不得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但是，要取消“第二中央”，必须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并且不能承认自己另立“中央”是错误的，这对于一贯刚愎自用的张国焘来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所以他绞尽脑汁，极力淡化“取消第二中央”这些字眼，尽量强调成立“第二中央”的必要。今天我们有幸看到了张国焘这个发言，特把有关内容摘录于下，供读者评判：

“……第二个可庆贺的消息，就是我们的党，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也完全地归于统一了。去年12月时候，我们根据了共产国际的指示，通过了目前民族革命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决议，同时不论哪一方面——陕北或二、六军也好，也通过了同样的决议。在这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不管哪方面的党，是艰苦地为实现这一决议的精神而奋斗，并且已收获了显著的成绩。最近我们和陕北方面的关系也改善了。不但在政治路线上我们已得到了一致，并且在实际行动和军事战略方针上，都能够一致地行动了——这决不止于表现在与二、六军会合实现，并且陕北方面的行动也和我们在一致的战略方针下行动，这是非常可以庆贺的事，这对苏维埃运动是有莫大的意义的。”

“关于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大概大多数同志们已经看过了，这决议大家要好好去看，不要当做一个简单的通知。在决议中，我们指出了我们不但在政治上完全得到了一致，而且在组织上也得到了统一，即是，我们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国际的代表团暂行行使。如大家所知一样，国际的代表团中，

负总责的有陈绍禹同志，还有别的同志，代表代表团而回国的则有林育英同志等。在陕北方面，现在有8个中央委员，7个候补委员，我们这边有7个中央委员，3个候补委员，国际代表团大约有20多个同志，这样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中工作。此外当然还有白区的上海局、东北局，我们则成立西北局，统统受国际代表团的指挥。在这样的决定之下，我们同时要反对一切企图曲解这决定的分子。我们这决定为的是团结党，使党能一致的为新策略路线而斗争，这是党原则上组织上的大团结，是有非常大的意义。

“共产党的行动是站在原则上的，我们斗争的是错误的路线，倘这错误路线不存在时，我们就可以归于一致了，这是共产党员的原则上的态度。

“当五次战争之后，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我们应当取得休息整理的机会，并且当时我们必须用大的力量去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可是当时就发生了不顾一切的逃跑的倾向、不要少数民族工作的观念，以及向敌人的堡垒投降，认为无法创造根据地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动摇。这时候，那些悲观失望的同志，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便是带着一部分队伍跑，在当时那样的严重的情况底下，我们是否能慢慢的等待国际或七次大会来解决呢？那时候，实在不容许我们的犹豫，我们只能自己去解决问题了。当时的争论，是政治上、原则上、战略上的。这是非常正确的争论。当然到现在新的策略路线底下，这争论是成为过去了。以后这争论可以用党七次大会或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形式去解决，我们原则上是反对不正确路线，这是必须坚持的。

“……我们反对错误路线是对的，现在既然陕北同志们已回归到国际路线下，我们就应当一致起来，向敌人奋斗。过去我们的反对逃跑路线，是站在原则上的，现在为着党的一致，甚至采取相当的让步，这也是为着原则上的。我们的思想斗争是为着求得

党的一致。……现在陕北同志们已经表示了转变，并忠实执行国际的指示，这样我们就应该一致起来，过去的争论留待将来解决。我们现在不但与二、六军完全一致，并且和陕北的同志们也取得一致了。这个伟大意义必须使每个同志们深刻了解。”^①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尽管张国焘在多种压力之下被迫取消“第二中央”，但却把搞分裂的罪名转加于别人头上，而且为自己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寻找了种种理由进行辩护。正因为张国焘不是在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的基础上取消“第二中央”的，所以他取消“第二中央”之后并没有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而是寻找机会摆脱党中央的领导，乃至最后走上了背叛党的道路。

6月19日，中央来电指示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红军出至甘肃南，利于以后东出陕南策应时局”。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四方面军已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实际情况，6月28日，张国焘、陈昌浩、李卓然发出了《四方面军二次北上的命令》，其中指出：“二、四方面军会合后数质量大增，经验结合，士气猛旺，党内统一，指挥齐心，军政物资有备，困难可以克服；骑师、红大工兵有备，可以勇往前进”；“党目前战略方针是在创造西北广大与巩固抗日根据地任务之下，主力红军首先向松潘、甘南行动，消灭该地区之敌王均、毛炳文等部；进而与一方面军呼应，横扫而东援，……”

6月30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北上抗日政治工作保障计划》，规定目前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是：（1）立即在全体指战员中进行充分的战斗动员，保证二、四方面军兄弟的团结，着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33~540页。

重指出目前的有利形势与我们胜利的把握。如：（甲）国内抗日反蒋浪潮新的扩大。（乙）我二、四方面军胜利的会合，我一方面军在陕甘宁新的发展及对我们行动的策应。（丙）我军战斗准备完成，士气旺盛，敌军官兵动摇，日日生长着不愿与抗日红军作战的情绪。（丁）西北地区有许多有利于我们的条件；（2）百倍加强保持有生力量的工作：估计到北上的第一个时期，部队是处在行军情况，且必须经过一些粮食比较困难与草地雪山的区域，各级政治机关应根据总政治部的各种指示以及过去工作中经验，在行动前协同军事机关，供给卫生部门以及保卫局的组织，具体讨论行军中保持有生力量的工作；（3）保证与居民的正确关系，继续发扬我军在番民区域严明纪律的精神，组织各级政治机关及连队的检查队与一切破坏纪律的分子作坚决的斗争，在不妨碍军事秘密条件下，广泛宣传我们的北上抗日的主张，沿途张贴书写各种宣传品发动群众斗争，组织各种抗日救国团体，大大宣传并执行抗日救国的十大政纲，号召群众参加抗日红军；（4）保证行军中战斗准备以及侦察警戒的注意，提高每个战士对爱护与保管武器和物资的责任心，注意节省干粮与一切疏忽散漫以及浪费的现象作斗争；（5）保证行军与战斗情况中政治工作能经常不断的进行，为此，各级政治机关，须随时具体检查与督促行军中的各组织和工作，同时要发扬政治工作中机断、自动、灵活、敏捷与紧张的作风。除以上5项中心任务外，还规定了4项政治工作的特殊任务，以便从政治上保证第二次北上的顺利进行。

已经与四方面军三十二军会师的红六军团，于6月7日到达理达。在理达休整了几天，6月13日继续向北前进，17日到达新龙，22日到达甘孜附近的普玉隆，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会合。6月30日移居甘海子。红二军团也于30日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与红四方面军的八十八师会合。

前去迎接红二、六军团领导人的朱德、刘伯承，见到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后，非常激动。

朱德紧紧握着任弼时的手说：“好哇！你们这一来，我的腰杆也硬啦！”

任弼时笑着说：“总司令，我们来听你的指挥！”

贺龙握着朱德的手说：“总司令，我们二、六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和中央会合呢！”

朱德坚定地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①

为了及早让任弼时等人了解情况，朱德、刘伯承同他们秉烛长谈，告诉了他们一年来党中央同张国焘斗争的经过。朱德还同任弼时、贺龙等商量，如何将部队分开行动，防止被张国焘控制；并向贺龙出主意，向张国焘要求支援，后来张国焘答应将三十二军（原一方面军的九军团）编到第二方面军。20多年后，朱德回忆此事时说：“任贺来了，我和他们背后说，如何想办法会合中央，如何将部队分开，不让他指挥。贺老总很聪明，向他耍人要东西，把三十二军带过来了，虽然人数少，但搞了他一部分。”^②

朱德、刘伯承还同红六军团政委王震谈了一个晚上，王震明确表示要同张国焘斗争，但刘伯承告诉他要讲究斗争艺术。王震回忆说：“我们到甘孜，刘元帅就来通消息了，他说对张这家伙不能冒火，冒火要分裂。中央在前面，不在这里。”^③

7月1日，红二、六军团集结于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张国焘从炉霍赶来迎接红二、六军团的领导人。当张国焘与

① 王震：《忠诚的战士、光辉的一生——纪念贺龙同志》，《解放军报》1977年7月28日。

② 朱德谈话纪要，1960年11月9日。

③ 王震谈话纪要，1960年11月22日。

任弼时紧紧地握手时，两人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感觉。张国焘心里明白：这又是一根难啃的骨头！

红二、六军团的到来，受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四方面军筹集了粮食、牛羊，腾出了住房，备下了木柴和开水，还在沿途张贴了许多巨幅标语，上写“欢迎横扫湘鄂川黔滇康的二六军团”，“欢迎善打运动战的二、六军团”等；在夹道欢迎的队伍中，不仅有红军指战员，还有不少藏族群众。

7月2日，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举行了庆祝两大主力会师的盛大联欢会。

热烈的掌声过后，朱德开始讲话，他说：“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此外，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人烟稀少的草地，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他还介绍了甘孜地区的情况^①。

贺龙在讲话中，表示完全拥护朱总司令的讲话，并号召二、六军团要搞好同四方面军的团结，克服一切困难，同四方面军共同完成到达陕北，同一方面军胜利会合的光荣任务^②。

任弼时的讲话更是旗帜鲜明，他说：目前形势很好，中央已经到了陕北，根据地有了发展，中央红军东渡黄河也取得了胜利。现在中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了争取东北军、西北军的问题，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③。

接下来的场面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据康克清回忆：

在一片欢呼声中，开始赠送礼物。先把队伍分行作了插花调整，我们每人都面对一位二、六军团的同志，然后一声号令，大

① 谭尚维：《甘孜会师》，《回顾长征》，第554页。

② 《康克清回忆录》，第199~200页。

③ 《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1页。

家都掏出早已织好的毛衣、毛裤、毛手套、毛袜子……送给二、六军团的同志。他们接过礼品，激动万分，连连地说：

“太好了，太谢谢了，你们怎么想得这么周到？”

有的人翻过来掉过去地看，有的当场穿上，高兴地叫别人看：

“真合适，就像专门为我打的。”穿了又脱下来，怕弄脏了。

他们也有不少人拿出珍藏的小礼品，送给我们。有的手里没有东西，有些不好意思，我对他们说：

“这没有什么，今天是四方面军的同志欢迎二、六军团，不是交换礼品。”^①

二军团的一位战士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

“在稻城，我们还为衣服发愁，现在从吃的、住的到穿的都有了。大家感动地把毛衣左看、右看，穿了脱下，脱下又穿上。有人提议：把毛衣好好保存起来，带到陕北去送给一方面军的同志。议论了很久，最后还是小心翼翼地包起来了。

“我分到一双毛袜子。从那密密的毛线里，我好像看到它渗透着四方面军同志们的汗水和深情。他们到这里不久，装备并不比我们好，除了每人一个竹斗笠之外并不比我们多什么，像我们一样迫切需要御寒的东西。可是，他们先人后己，起早贪黑织出这样漂亮的毛织品送给我们。想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②

当天，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贺龙、徐向前、陈昌浩等收到了由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 68 人代表在陕北的党政、军各方联名签发了庆贺电报。电文中说：“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贺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与

① 《康克清回忆录》，第 200 页。

② 谭尚维：《甘孜会师》，《回顾长征》，第 554～555 页。

苏联、外蒙打成一片，与全国抗日人民、抗日军队、抗日党派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挽救中国于危亡，解放中华民族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我们相信你们将更加激励你们无尚的热忱，勇敢与自我牺牲精神，为全民族的解放而斗争，为苏维埃红军的光荣旗帜而斗争，为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而斗争。我们是准备着庆祝你们北上抗日的伟大胜利。”^①

晚上，当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指战员们沉浸在联欢会上热烈而愉快的气氛之中的时候，一场艰难的谈话却在张国焘与任弼时之间进行着。

而对着任弼时，张国焘不由感慨万分。记得1928年在莫斯科开中共六大时，任弼时还是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小伙子，张国焘管他叫“小弟弟”。但眼前这位蓄着胡子的人，经过了这些年的种种磨练，已显得相当老成，张国焘想，看来得管他叫“大胡子”了。

在张国焘看来，他与任弼时的这一场谈话进行得很不顺利。

张国焘提出要调换红二、六军团的首长，要任弼时离开，红二、六军团另派政委，被任顶了回去。

张国焘提出要召开党的会议，任弼时就向他提出：报告哪个做？有争论，结论怎么做？如果二、四方面军态度尖锐，我不负责。

当张国焘指责毛泽东等人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是毛泽东等人的疑忌太多时，任弼时却针锋相对地说：四方面军中一些人的反对呼声加强了这种疑忌^②。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69～570页。

^② 《任弼时传》，第359～360页。

话不投机半句多。

在任弼时面前碰了钉子后，张国焘转而找二方面军的其他干部联络感情。王震回忆说：“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张有阴谋瓦解二、六军团。贺、任、关是老旗帜。贺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之一，是革命旗帜；任、关是中委。张认为我们是娃娃，想把我和萧克及六军团买过去，反对毛、周、张、博”，“在甘孜休息时，张一个一个把我们召去谈话，送给我四匹马，给我们戴高帽子，说我们勇敢、能打。他那个军阀主义呀，简直不像话。刘元帅说：送给你，你就收下。后来和贺老总一说，贺说：这是我们以前干的！”^①

而贺龙见到张国焘后，更是老实不客气地责问道：“我过去当军阀，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共产党，找到了毛主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你是个老党员，现在却要反对毛主席，去走军阀的老路，你走得通吗？”问得张国焘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7月5日，中央电令由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这时迅速北上已成为迫在眉睫的行动。为此，张国焘主持召开了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参加的会议。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任弼时而对而与张国焘进行了斗争。据出席这次会议的余洪远回忆：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议。首先是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同志发言，这个会议主要是他发言，关键也是他的发言。他讲了几个问题，我现在能记得清的是四个问题。第一，批评张国焘盗用中央名义把他们调过来。那时二方面军电台不能直接和中央电台沟通，只能和总部通报，总部电台在张国焘这里，所以张就用中央的名义命令二方面军向中央靠近，准备

^① 王震谈话纪要，1960年11月22日。

在康定东南会师，因为金沙江渡江困难，转到康定西南才实现会合。过来以后，才知道张国焘的阴谋。任弼时同志反复批评张国焘，他说：你借用中央名义调我们是不对的。你把我们调来干什么？你要吞并我们！张国焘辩解说，因为你们处境困难，后面敌人跟着，和我们靠近一点，就能保持力量。其实这是胡扯。第二，他批评张国焘，你们南下路线是错误的，这样做分散了红军主力，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把我们逼到草地里，粮没粮，草没草，吃没吃，穿没穿，给红军带来严重损失。一方面军已经北上了，你北上又南下，南下又北上，在草地里拉来拉去，我们不少同志牺牲在草地里。任弼时同志越讲越生气，说张国焘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恶果，打算在天全、芦山建立根据地是妄想，在川北都没站住脚，能在天全、芦山建立根据地？！敌人教训了你们，吃了败仗，损失很大，这些力量用到陕北去，用到抗日前线去，那将起多大作用？！任弼时同志讲话比较长，讲得很详细，他又能讲，嗓子又大，批评得很中肯。张国焘没有反驳。第三，批评张国焘自立中央。任弼时同志严肃地指出，自立中央是严重的反党行为，是自绝于中国革命，是党纪决不容许的。他说：你们已经宣布撤销第二中央，我们欢迎。第四，任弼时同志讲了形势，他说目前形势很好，中央已到陕北，根据地有了发展，东渡黄河也取得了胜利。他还讲了全国形势：日本占领了东三省，使民族矛盾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中央已经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了争取团结东北军、西北军问题，中国革命又处于高潮时期。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北上，与中央会合。这个会开了就应立即北上，到青海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任弼时同志的发言很吸引人。我所参加的会议，只有这一次真正像个高级干部会议。任弼时同志讲话以后，贺龙同志说：同意任弼时同志的意见，北上。我们二、四方面军应团结起来，继续北上，与中央会合。三大主力会合以后，北方情况会有很大变化，可能中国革命的中心点要移到北方，在陕北根据地

落脚，再向全国展开。南下是不对的，任弼时同志已讲过了，你们这样做是分裂红军分裂党，给革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我们应团结起来，继续北上。以后，总司令讲了讲，他说：“我们原来就决定北上，张国焘同志一直坚持南下，我们也没有办法，现在南下走不通了，天全吃了败仗，敌人跟得紧，原来计划不可能实现了，只有一条路：北上，与中央会合”。会议是张国焘主持的，他问其他同志有没有意见，大家说没有了。张国焘因为南下碰钉子，青海又走不通，只好同意北上^①。

随后，朱德主持研究了北上的具体行动计划。朱德首先向与会者说明：中央来电指示二、四方面军趁甘肃敌兵空虚，速出甘南；并宣布了红军总部作出的北上部署：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北上，李先念率先头部队已开始行动，二方面军在甘孜稍事休整后，随左路跟进，分成两个梯队北上。与会者一致同意总部的决定。会议还决定，根据朱德的建议，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并负责教练打骑兵的战术。这是朱德经过多方考虑后面做出的安排：任弼时随总部行动，可以加强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可以摆脱张国焘的控制，还可以从外对张国焘起制约作用。

会后，朱德兴奋地告诉夫人康克清：“任弼时有思想水平，敢说敢干，一下就打中了张国焘的要害，使张国焘难以反驳。张国焘主持会议，神色很不自然。看到大家都同意任弼时和我的意见，只好宣布会后立即北上。”^②

不可否认，会议上任弼时的发言给了张国焘一个沉重的打击。在党中央来电要求迅速北上和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积极准备北上的形势下，他不得不同意北上。但北上以后自己会得到什么样的

^① 余洪远：《长征时间甘孜、阿坝、毛儿盖会议的历史情况》（未刊稿）。

^② 《康克清回忆录》，第200--201页。

待遇？张国焘的心里开始忐忑不安起来。

为了确保二次北上的顺利进行，四方面军各部队分别召开了支委会、干部会、军人大会以及供给、卫生、事务人员等会议，进一步深入动员和加强各种安全越过草地的保障工作，并组织了团和营连的收容队和收容组。

一切准备就绪。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为第二次北上摩拳擦掌、精神饱满，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和考验。

二 二次北上

1936年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先后开始北上。

红四方面军之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一师、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和红二方面军为左纵队，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于7月3日从甘孜等地出动，经东谷、西倾寺、阿坝向包座、班佑前进。

红四方面军之第九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独立师、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及方面军总部为中央纵队，由徐向前率领，于7月2日从炉霍出发，经壤塘、查理寺、毛儿盖向包座前进。

红四方面军之第五军及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为右纵队，由董振堂率领，于7月10日从绥靖、崇化地区出动，经卓克基、马塘、毛儿盖向包座前进。

为了保证部队顺利通过草地，四方面军总部派许世友率领在甘孜时刚刚组建的骑兵师提前出发，为部队侦察道路，筹集粮食。骑兵师的战士们在许世友的率领下，决心不管遇到多大困难，付出多大代价，一定要筹集到更多的粮食，保证主力部队通过草地。

6月27日晨，旭日东升，霞光万道，3000多骑兵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北上的征程。嘹亮的军号声，战马的嘶鸣声和铁蹄声，交织成一曲雄壮的乐章。驰骋的战马，威武的骑兵，耀眼的马力，构画出一幅气势磅礴的画卷。红军战士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英雄

无畏的气概在此情此景中充分地显现出来

当骑兵师催马来到色曲河畔时，牧民们听说红军要筹粮过草地北上抗日，便纷纷献出自己的牛羊、青稞、豌豆、酥油、奶渣。许世友命令部队按当地价格购买。许多群众不收钱，战士们就再三向他们说明：公买公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红军的纪律。第一天在色曲河两岸就筹集了400多头牛，1000多头羊，还有一部分粮食。虽然收获不小，但离上级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当地的反动土司占有大量的牛羊和钱粮，却不愿卖给红军。

当晚，许世友和各团指挥员研究了第二天行动方案，决定再找土司交涉。不料，会议刚刚结束，反动土司纠集起来的反动武装却来袭击骑兵师的驻地。

许世友立即指挥部队反击。第一个冲锋就把他们打垮了，还抓了几个俘虏，了解到反动土司的牛羊转移的地点。红军即刻出动，连夜搜索，按“破坏抗日红军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财产一律没收”的政策，把反动土司的8000多头牛羊全部收缴。

随后，骑兵师继续北上，在西倾寺、壤塘等地，又筹集了3000多头牛羊和4万多斤粮食。

当许世友率骑兵师北进到阿坝时，当地的反动土司已经得到了红军要经阿坝北上的消息，依靠反动武装把当地群众统统赶走，把粮食和牛羊等也全部转移到外地去了。战士们好不容易找到两个年长的藏民，了解到一些情况。根据藏民提供的情况，骑兵师分兵搜索，找到了600多头牛羊和1000多斤粮食。但未发现反动武装。原来土司的武装已转移到麦加而康、觉儿黄、赛苟共巴一带，准备在这里阻击红军。

当骑兵师发现了这支大约四五千人的反动武装时，决心消灭它，扫清大部队北上的障碍。但骑兵师经过长期征战，已有不少减员，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只能智取，不能强攻。许世友便和参谋长召集三个团的团长研究作战方案，决定乘敌人尚未发现红

军，毫无戒备之际，立即发起进攻，以奇袭的战术破敌。

夜色深沉，伸手不见五指。部队分多路迅速隐蔽地接近敌营。敌人围着为驱赶野兽而点起的火堆，横七竖八地趟在地上，马匹零零散散地拴在周围，做梦都没有想到红军战士已经近在咫尺。

许世友按照预定的时间，发出了攻击的信号，指战员们首先向火堆里甩出一批手榴弹。随着爆炸声，燃烧着的柴火腾空而起，敌人的马匹受了惊吓，嘶鸣着四处乱窜；敌人有的被炸死，有的被惊马踩得鬼哭狼嚎。红军指战员们冲上前去，举起马刀，将大部分敌人歼灭了。

这一仗打得很漂亮，是骑兵师组建以来最大的一仗，共缴获了近百匹马和一批枪枝弹药。

骑兵师继续前进，在安曲又给后继部队留下了1 000多头牛羊。

第三次过草地，对于骑兵师来说要相对容易一些，战士们渴望早日回到党的怀抱，所以士气高昂，行动迅速，比较顺利地走过了草地。

从甘孜到包座，这个新组建不久的骑兵师，一路上进行了大小72次战斗，筹集了二三万头牛羊和大批粮食，完成了上级交给的“筹集粮食，侦察道路”的光荣任务。但部队走出草地后只剩200多人了，绝大多数干部战士为完成这项任务献出了生命^①。

第三次穿越茫茫数百里的草地，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无不感慨万端，回想起几个月前第一次、第二次穿越草地的情形，看着前进路上死亡战友的骨骸，大家的心情十分沉重。

由于有上两次过草地的经验，所以这次过草地之前就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但这次过草地比以往两次的路程远、时间长，经

^① 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第336～340页。

历了更加严重的困难。所带干粮不足沿途食用，指战员们只得再次以野菜、草根、皮带、牛皮来充饥。

对于第一次过草地的二方面军来说，所遇到的困难比四方面军更大。朱德同志深切地了解这一点，并指示四方面军发扬团结友爱精神，帮助二方面军的指战员度过难关。在过噶曲河前，朱德看见四方面军的兵站正给各部队分发新缴获来的牛、羊，便对大家说：同志们，谁都知道，草地是北上最艰苦的一段路。红二方面军的同志们在后面，那就更苦了。沿途的野菜都被前边部队吃光了，他们连野菜都吃不上。所以，总指挥部决定，各单位所有驮东西的牦牛全部留下来，必须带的东西自己背上，把昨天缴获的羊和牦牛，全给二方面军留下。他还把自己驮帐篷、行李的牦牛交给兵站，嘱咐兵站负责人：“记住，告诉部队负责同志，牛皮、羊皮和肠、肚都不能丢掉。要珍惜每一块牛皮，不能浪费。这关系到四方面军后卫和二方面军几万同志的生命啊！”他又说：“从这里走出草地还得6天，咱们每人每天发的牛羊肉，连皮带肉不能超过一斤，其余的都留下。否则，后卫部队就过不了草地。”他又特别指示：“羊子杀了用开水烫，牛皮用火烧，肠肚也要吃掉。”

朱德对后卫部队及二方面军的关心打动了大家。人们纷纷从牦牛身上卸下驮子，将牦牛交给了兵站的同志^①。

北上途中，任弼时十分关心全党全军的团结问题，他分别与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人谈了话，详细了解张国焘与中央发生分裂的经过，以便找出圆满的解决方案，进一步消除隔阂。

徐向前在与任弼时的交谈中，谈了自己的几点看法：（1）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自己当时没有跟中央走，是

^① 杨以山：《噶曲草原设兵站》，《回顾长征》，第734～735页。

不想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2) 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很不应该，党内分歧可以慢慢地谈嘛！但是我说话他不听，朱老总的话他也不听。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有利。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免得引起新的争端。(3)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我们很高兴。但中央有的同志说四方面军是军阀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后呀，太过分了，伤害了四方面军的感情。我和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都想不通。(4) 我们从参加革命起，就表态拥护第三国际，臂章上也是那样写着的。由共产国际出面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成^①。

任弼时在与四方面军的主要干部交谈后，于7月10日致电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转王稼祥、邓发、刘少奇等，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电文如下：

我到甘孜后得知道：(一)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内的争论问题；(二) 现在陕北和川康边同志对目前形势估计和党的策略路线已经一致，为着不放松全国极有利局面，使我党担负起当前艰巨的历史任务，我深切感觉到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会的；(三) 这次二、四方面军向川甘北进，一方面军亦需向甘南配合接应，一、二、四方面军将靠近行动。我已取得特立、玉阶两同志之同意，特向六兄等有以下建议：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至少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或政治局委员外，一、二、四方面军主要干部参加，并要求国际派负责代表出席这会议，议程应列有总结在五次围剿斗争之教训和讨论党的目前紧急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87页。

任务，并产生党内和党外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四）万一对粉碎五次围剿和斗争经验教训不可能在这一会议上得到最后结论，则这一问题由七次大会或国际去解决；（五）二、四方面军部队战斗情绪极高，政治军事工作都有极显著的进步与成绩；（六）二、四方面军会合后二、六军情绪亦甚好，四方面军会以很大动员迎接慰劳二、六军。现在二、四方面军阶级友爱的关系极好。在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基础上是团结一致的……①

对任弼时的建议，中央极为重视，两天后，张闻天电复任弼时并告红四方面军：

中央已向国际请求批准召开六中全会，并对六中全会给予原则指示，同时派遣负责代表出席。关于开会之时间与地点，须俟国际回示并其出席代表到达或确定到达日期之后才能确定。此会自然应有全国的代表及红军代表到会，会议的主要日程为审查五中全会以来的工作及决定今后的政治任务②。

远在陕北的中央负责同志对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其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极为重视，他们相信朱德、任弼时等人不会支持张国焘。这一看法完全反映在中央于7月14日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内容是：“据弼时来电，已商得朱、张同意，认为亟须统一红军领导，主张到甘肃开会解决。我们已同意开六中全会，昨亦告诉你们了。”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73～574页。

② 《任弼时传》，第363页。

我们估计，弼时及二方面军的干部不会赞助国焘的观点，至朱德同志，过去与中央完全一致，分离以来受国焘挟制，已没有单独发表意见的自由，但我们相信，基本上也是不会赞助国焘的。”^①

党中央对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深为欣慰和关切，在部队通过草地的艰难日子里，不断给予重要指示。

7月13日，中革军委来电，指示红二、四方面军北出草地后应迅速攻占岷州，并指出此举将使红军在战略上大占优胜。

7月22日，中央电告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之进攻，迎接你们北上”，“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国际电台联络从6日起已畅通，望国焘兄将四方面军情形及意见见告，以便传达国际”。

7月27日，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

8月1日，当四方面军胜利攻占了草地边缘的包座之后，中革军委即来电祝贺，并指示：“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后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电文还比较详细地告诉了从包座到哈达铺的险隘以及对付的办法。

当天，中革军委又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告了敌朱绍良军封锁二、四方面军北进计划的部署。

党中央的关怀极大地鼓舞着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志。在接到中革军委电报的当天，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就致电陕北

^① 《任弼时传》，第363～364页。

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告知：“两方面军团团结巩固，士气高涨”；“俟兵力稍集结后即向洮、岷、西固，约8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以消灭毛炳文、于学忠部为目的来配合你军”；“在蒋敌进攻严重关头，我一、二、四方面军只有积极密切关系，基本上在一致战略方针下坚决对敌，才不致使敌各个击破，可能造成西北新局面。我二、四两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牺牲一切，谋西北首先胜利奋斗到底！”^①

红二、四方面军的迅速北进，使敌人手忙脚乱，为了阻止红军北进，敌军即在甘南仓促布防：王均第三军之第七、十二师在文县、武都、天水、西固；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之第八、二十四师在陇西、定西；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在岷州、洮州（今临潭）、西固，企图构成西固至洮州、天水至兰州两道封锁线。在青海方面，则由新编第二军马步芳部在循化至贵德和兰州以西之新城经西宁至湟源之线扼守，防止红军西进。但敌人的战线长，兵力分散，部署尚未就绪。同时，蒋介石虽急令已南下的胡宗南部由长沙兼程北进，但一时还不能赶到。

根据上述敌军的部署情况和中革军委8月2日来电中关于速出甘南、抢占腊子口、攻占岷州的指示，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人决定乘敌主力尚未集中岷、洮二州之前，以红二、四方面军先机夺取岷州、洮州、西固地区，以利红军继续北进。

8月2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岷洮西战役政治工作保障计划》。在计划中指出了岷洮西地区的战略地位：“岷洮西是甘肃东南部的重要城市，这一地区的粮食、人口不缺乏，我们依据这一地区，无论向东北或东南发展都是很好的形势。因此，夺取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11页。

岷洮西是我们会合全国主力红军，推动与展开在西北以至全中国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开始创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有力行动。”计划指出，本战役中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是：（1）加紧战斗动员与战斗准备工作。在部队中立即进行热烈的战斗动员，其口号是：“打大胜仗，夺取抗日的西北！”“打大胜仗，会合全国主力红军！”“大量消灭卖国贼，铲除北上抗日障碍！”“严守政治纪律，争取西北广大抗日民众！”等。应向全体指战员说明夺取岷洮西的重要意义与我们胜利的把握。发扬英勇无畏与艰苦卓绝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防止个别可能发生的疲劳松懈现象与不满的失望情绪。加强军政学习，研究夜间打骑兵、打碉堡、打围子的技术；注意防空教育与准备；加强侦察、工兵连队的政治领导与技术训练；保证部队的轻便化，以适应运动战的要求。（2）扩大抗日反蒋宣传，贯彻党的新的策略和路线。（3）必须向全体指战员及一切事务人员说明，争取回民是我们顺利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条件。西北各级政治机关，应根据总政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及“八要十不准”的政治纪律，立刻进行深入的传达，保证全部的执行。（4）扩红准备与筹集资财工作，巩固与扩大红军工作，是目前政治工作的第一等重要而迫切的任务。（5）学习运动战中政治工作的进行与养成连队政治工作自动性的基础。

鉴于上次一、四方面军从会合到分离的惨痛教训，《计划》中特别强调了与一方面军会师西北的动员与准备工作。指出：“要向某些同志解释说明，我们与过去党中央少数领导同志虽然发生过政治上的分歧，但因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在党的新的策略之下，现已完全一致。这种一致，是党的胜利，列宁主义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过去的分歧，我们可于适当时机，依照共产党的组织办法，以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为原则来解决，绝不能妨碍我们目前的统一与一致。在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应特别注意学习与研究过去与一方面军会合中的经验教训，开展必要的自我批评，纠

正过去的缺点，消除一切不满和误解现象。”这点在当时具有特殊的重要政治意义。

为了使全体指战员在思想认识水平上适应目前变化了的形势，尤其是在走出川西北，即将面临和为了适应一个新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环境，四方面军政治部于8月2日特意印发了《关于新策略路线的具体运用政治问答》，以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文字，向全体指战员进行了一次政治教育，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如：“问：对西北的各派别武装团体，我们应采取什么态度？答：我们具体运用抗日反蒋的口号，就不一定碰见谁就打谁，而是准备和西北任何派别、任何武装联合，提出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反蒋，但现在不一定提出将所有军队都看作是卖国军的口号，而是提出大家抗日的联合起来，一路去打日本和蒋介石。我们的口号就是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提出抗日十大纲领，建立西北抗日救国大同盟，组织全国抗日国防政府，成立抗日联军，首先组织西北抗日救国大会。”

正当二、四方面军积极休整，准备进行新的更大的战斗的时候，8月3日，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又向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发来了热情洋溢的电报，电文中说：“接8月1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8月5日，朱德、张国焘正式发布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其具体部署是：以四方面军之第三十军、九军、五军组成第一纵队，主力由包座、俄界经哇藏寺出哈达铺攻占岷州，该纵队应以相当兵力组成右侧支队，取道白骨寺、瓜咱之线，相机夺取西固，以佯动姿势，威胁武都敌人之目的。以四方面军

之第四军、三十一军组成第二纵队，以夺取洮州旧城消灭该地敌人之目的，成功后主力向临洮方向活动，并以一部向夏河、临夏发展，掩护我军左后侧。以二方面军为第三纵队，出哈达铺，策应第一、二两纵队，待洮、岷、西夺取后，该纵队任务另定。此次战役行动，以先机取得岷、洮、西地区，主力向兰州、天水方向进展，会合一方面军，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为目的。为保证此次战役胜利进行，《计划》中提出了5点“必须随时注意”的事项：（1）尽量争取抗日友军；（2）努力争取少数民族（特别是回、藏民众）；（3）广泛的大胆的运用统一战线争取下层群众；（4）开展和繁殖游击战争；（5）筹集资材、夏衣、冬衣与扩大红军。

在即将进入西北地区之前，中共中央西北局就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在西北地区建立革命政权的问题。因为全国形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苏维埃政权形式已经不适合形势的要求。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只有以建立抗日政权相号召才能最广泛地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最有力地打击顽固派。因此，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在二、四方面军即将进入西北地区之前，于8月5日作出了《关于目前红军进入西北地区组织临时革命政权问题的决定》。

《决定》指出：为着广泛地发展目前抗日反蒋的民族革命战争，并首先开展中国西北部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在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基本任务下，西北局认为我主力红军这次进入甘南地区，必须以“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为临时政权的组织形式。

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号召、动员与团结组织广大抗日群众及一切不当亡国奴的人民积极起来参加抗日反蒋战争，同时并应在斗争中注意满足基本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严厉镇压一切积极反抗和阴谋破坏抗日阵线的汉奸卖国贼的活动。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将依据群众斗争深入的基础，中国民族革命的开展和

深入程度以及无产阶级领导的壮大和他与基本农民的密切联合，而转变到人民苏维埃政权。

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基础，首先是广大的工农劳动群众（工人、雇工苦力、贫农、中农、手工业者、贫民等）以及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白色军队中的官兵实际参加抗日反蒋的武装斗争者（不论其阶级成分如何），均得有抗日革命政权下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个别富农、地主及曾经参加过其他政治派别的分子（如国民党员）在红军到时愿意参加抗日反蒋工作者，应由当地抗日革命委员会或群众代表依据其实际情况决定其有无公民权。

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的下层组织为乡革委会。乡以上为区、县、省的革委会。这些政权组织的产生都必须经过斗争得来。

在进入回民区域时则按当地实际斗争情况及根据回民群众意见组织回民抗日革命委员会、回民独立政府。

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的政纲，即为瓦窑堡会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应依靠各种基本群众组织，如抗日农民协会、抗日学生联合会、抗日妇女协会等，并与它们及其一切社会团体发生经常的联系，在物资上组织上帮助他们。

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在成立之后，必须有经常的可靠的武装来保卫自己，发动所有有公民权的成年民众受军事训练。在革命政权范围的抗日武装，如抗日义勇队、游击队、抗日青年义勇军等以及抗日革命委员会自立的武装组织，如警卫队、特务队等，共产党党部及红军中政治机关应特别注意对这些武装组织的领导，并经过他们来扩大与充实我抗日红军主力。

总之，《决定》适应新的形势，全面阐明了抗日救国的任务、纲领、政策，基本体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成为红军沿途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动指南。

三 曲折的征程

1936年8月5日至12日，红二、四方面军组成的三个纵队先后从包座地区出发，执行岷洮西战役计划。

红军的集结与行动，引起了蒋介石的密切注视。他电告驻守甘南的鲁大昌：红军“似有进窜陇南模样”，命令他“远侦布防”。鲁大昌即以其第一旅进驻哈达铺、阿乌河一带，以其第二旅布防中寨、梅川、红水沟一带，以其第三旅驻临潭，以特务团、机枪营、骑兵团防守岷县县城，并准备死守他的老巢岷县。

8月9日，我第一纵队之八十八师抢占天险腊子口。10日，八十九师攻占大草滩、哈达铺，歼敌千余人，缴获长短枪千余支。随后，徐向前率三十军一部进克漳县，陈昌浩指挥九军、五军围攻岷州。

这时，朱德、张国焘致电陈昌浩等，提出以“外交手腕多方与鲁（大昌）、毛（炳文）、王（均）等写信联合，以取得抗日反蒋的友谊关系”。并指示：“如岷县城袭击不下且不能迅速攻克时，应以一部监视城内之敌，主力迅占哈达铺，控制向东发展道路，完全突破敌之第一道封锁线。”

驻守岷州的敌鲁大昌部受到红军的包围，开始恐慌不安起来。他赶快把自己的老婆孩子撤往兰州，同时命令加强碉堡工事，挖掘战壕，搜集粮食，清查户口，烧毁民房以扫清射界，烧毁洮河渡船以断绝城乡交通，准备和红军决一死战。

10日晚，红军开始向岷州城南的天然屏障二郎山敌阵地进攻，毙伤敌千余人，缴获重机枪8挺、轻机枪3挺、迫击炮5门。敌人被打得丢盔弃甲，敌骑兵团擅自向梅川方面逃去。鲁大昌急电蒋介石求援。蒋介石致电鲁大昌：“希督励所部杀贼，用建殊勋。”朱绍良和王均也致电鲁大昌，要他“坚守待援”。鲁大昌只好凭坚

死守，等待援兵。红军多次围攻，都未能成功。

8月上旬，党中央根据红二、四方面军已经北上，两广事件的发展及日本企图进攻绥远等情况，于8月9日向张学良提出与东北军联合抗日，占领以兰州为中心的战略枢纽地带，从西、北两个方向同时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在取得张学良同意后，党中央于8月12日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对今后的战略方针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根据一、二、四方面军会合，东北军与我们联盟，日本指挥蒙伪军进攻绥远、内蒙，企图割断中苏关系及蒋介石注意西南、暂时无法顾及西北等情况，上述任务可能而且必须在较短时期内实行之。

第二，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打通苏联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配合东北军进据甘西。二、四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州，以甘南为临时根据地，休整补充。继而以有力一部出陇西，攻击毛炳文部，威胁兰州，以便东北军于学忠部三个师向兰州这一战略枢纽地带集中；另以有力一部出夏河，攻击河州，威胁青海，吸引河西走廊马步芳部东援，以便东北军乘虚接防甘、凉、肃三州，接通新疆。这一步骤，约一个半月内实现之。第二步，三个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第一步实现后，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12月起，以一个方面军留守陕甘宁苏区，两个方面军趁结冰期西渡黄河，消灭马鸿逵部，占领宁夏，完成从北面接通苏联的任务。

第三，巩固内部，形成陕、甘、宁、青四省的抗日革命发展新阶段。任务包括：新老根据地及红军的扩大与巩固，使之成为

西北局面之坚强领导中枢；东北军政治上的改造与军事上的立于不败之地；陕、甘、青三省各部统一战线的完成，反动分子的肃清，三省民主纲领之初步实现。以上任务的实现，使得西北局面政治上军事上均置于巩固的地位，一方面足以防御蒋介石在西南问题解决后转向西北之可能的进攻，足以防御日本向宁夏进攻而打断其隔离中苏关系之企图；另一方面，作为出兵绥远之准备，并准备使陕、甘、宁、青四省抗日革命化转向进一步的发展阶段。

第四，东北军与红军联合组成抗日先锋队，出师绥远，抵御日伪军的进攻，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

第五，与南京政府谈判，逼蒋抗日，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对敌。为此，我军目前暂不出河南，实行“你不来攻，我不去打”的策略，如蒋介石派兵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争取议和。

根据中央上述战略行动计划，西北局放弃了原定乘虚向东南发展的作战企图，作出了二、四方面军在甘南建立临时根据地的部署。于是，攻克岷县就成为首要任务。

8月12日，朱德、张国焘就攻取岷县的部署致电徐向前、陈昌浩，鉴于敌毛炳文部已集中陇西准备增援岷县，电报指示：（1）三十军主力集结岷县东山及其以东地区下扎里、虾蟆石、申都一带。（2）九军集结哈达铺地区，以一部伸出索乐口、燕麦口、龙荡沟一带向漳县、武山、礼县方向活动，以小部向武都、西固方向游击钳制王（均）敌。（3）三十一军到后，以一部接替三十军围困岷县；另以一部设法在岷州、野狐桥间渡河截岷敌退路。（4）四军以一部对西固并相机攻占之。（5）五军迅速开到拉子口，再行决定任务。

8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认为“如能攻占岷州城，则打马（步芳）、打毛（炳文）、打王（均）均十分有利，战略上大战优胜。万一攻不开，则围城打援。毛炳文现正以一部从陇西增援，是消灭他的好机会。朱总司

令宜速派人去见王均、曾万钟。彼等孤危，不难收效。城内鲁大昌，宜派人谈判，允许放他向临潭跑。”

这时，岷县县城已全部被红军包围，攻城的激战正在进行之中。守敌虽然受到重创，但仍凭坚固守。根据毛泽东等人的建议，方面军决定：如岷城未能攻下，决以一部监视该敌，主力迅速向哈达铺东发展，突破天水、兰州间封锁线，争取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

据此，军委决定以九军一部围攻岷县，其余部队集中力量打毛炳文的援兵。8月17日，红九军政治委员陈海松和参谋长陈伯稚制定了《红九军进攻岷州的战斗计划》，决定以九军教导师及军直属一小部围攻岷县；二十七师及特务团为突击队，策应教导师，协同消灭鲁大昌。

在九军攻打岷县的同时，徐向前命四方面军总值属队指挥、曾任八十九师政委的杜义德，率有名的“夜老虎”二六四团和三十一军的两个团袭取渭源。渭源守敌为毛炳文三十七军第八师的一个团，加上民团共2 000余人。红军集结在靠近陇西城的菜子河、官亭村，声东击西，摆出要强攻陇西城的架势，同时做好了一切夜袭的战斗准备。杜义德是夜战英雄，他决定实行夜间长距离奔袭，并亲自带领团营干部化装成老百姓，在党的地下组织帮助下直奔渭源城，仔细观察敌情，选定突破口。决定兵分两路，从主攻和助攻两个方向同时登城，夹击敌人。主攻方向的突击队由杜义德亲自带领。在一个狂风呼啸，乌云翻滚，大雨滂沱，道路泥泞的夜晚，杜义德带部队来到渭源城下，然后两路迅速登城。敌人慌忙组织部队分四路向红军主攻突击队反扑，战斗甚为激烈。在红军两路夹击下，敌人节节败退，血肉横飞，纷纷弃城逃跑。拂晓，红军攻克了渭源城。这一仗，击毙敌团长以下300余人，俘敌（包括伪政府人员）1 6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30余挺、追击炮6门、步枪千余支、电台一部。之后，红军在渭源筹集到万余匹土

棉布和洋布，以及部分棉花、羊毛、羊皮等物资。

由于东北军方面迟迟不见行动，中央只得考虑依靠红军的力量打通新疆与苏联联系。8月23日，中央来电征询西北局领导人的意见：依托现实力量，假如以二方面军在甘南、甘中策应，而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兄等认为有充分之把握否？假如在冰期前过黄河，能否解决渡河工具？兰州、青海线之黄河，何时开始结冰，冰期长短如何？^①

这时陈昌浩尚在岷县前线，徐向前率前敌指挥部驻漳县，红军总司令部驻岷州以西的三十里铺。接到中央来电后，张国焘打电话给徐向前，征求徐向前对中央电报的意见。徐向前答复说：四方面军有力量夺取甘西。事后，徐向前即派参谋人员搜集河西的地形、民情资料，考虑出青马敌后，进据河西走廊的问题。

关于红军今后的行动计划，中央虽有考虑，但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和条件，还是决定请求共产国际方面的指示。于是，8月25日，中央就红军行动方针问题密电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其主要内容是：

二、四方面军已经全部集中甘南，整个红军的行动方针，必须早日确定。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统一战线，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但要取得这一地带没有新的技术之及时的援助是很困难的，在时机上进取这一地带仅能利用冬季黄河结冰之时，红军虽能奋勇抵抗最冷的天候，因地冻，也不利于用坑道方法攻城，在坚城前面即在平时坑道法也是不能必克的。但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能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59页。

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

其具体行动计划为：以一方面军约 1.5 万人攻宁夏，其余担任保卫苏区。12 月开始渡河。因宁夏地形狭小，不利回旋；城寨甚多，守备坚固，估计红军本身只能占领其一部分，主要的多数的城寨非借助从外蒙来之飞机与炮兵没有攻克之把握，如机炮能在 12 月下旬或明年 1 月确实到达宁夏附近，则可及时占领宁夏。宁夏占领则陕北与甘北苏区均有保障，如不能及时占领则红军须乘河冰未解之际退回甘北，以后发展方面亦不得不往甘南与陕南。然主力向南之后，陕北与甘北苏区必被汤恩伯马鸿逵等逐步侵占而化为游击区。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

以四方面军 12 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之若干地方作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三州前进，约于夏季达到肃州附近。沿途坚城置之不攻，待从外蒙或新疆到来之技术兵种配合攻取。

以二方面军位于甘南，成为苏区，使陕甘苏区联系。

此方针如苏联赞同，则请王明代表红军直接向苏联关系方面谈判许多具体准备之问题，主要的是援助中国之技术兵种组成输送与按时到达，以及到达后使用的问题。如果苏联不赞成目前直接援助之计划，而我们与南京之谈判不能及时成立协定，或协定中不能达到使宁夏甘土著统治者自动让防之程度，红军攻取不克，结冰渡河时机又已过去，则我们只好决心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但这种做法将更加增加红军在军事行动方面的困难^①。

8 月 30 日，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目前的基

^① 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 661～662 页。

本方针是：（1）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介石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以达到两党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2）紧密地联合东北军，并进行西北其他各部的联合谈判，造成西北局面；（3）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准备冬季打通苏联；（4）发展甘南为抗战根据地之一，同时巩固与发展陕南苏区，使之成为另一战略根据地，与陕甘、甘北相呼应；（5）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根据这一基本方针，三个方面军在9月至11月的具体部署是：一方面军主力占领海原、靖远、固原及其以南地区，一部保卫定边、盐池、豫旺、环县苏区，一部保卫陕北苏区，另一部保卫关中（泾水、环水、洛水之间）；四方面军占领临潭、岷县、漳县、渭源、武山、通渭地区，尽可能取得岷、武、通三城，但岷州如无办法夺取，则用少数监视之；二方面军速向陕甘交界出动，首先插出王均防线之后，占领凤县、宝鸡、两当、徽县、成县、安康地区，再与王均对战。

为了执行中央这一战略部署，任弼时离开西北局所在地三十里铺，回到红二方面军参与指挥。

根据中央关于9月至11月的部署，四方面军之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向北进击。于9月7日占领通渭；红一方面军一师，由聂荣臻、左权、陈赓率领南下，直插静宁、隆德地区，逼近西兰公路；二方面军由哈达铺地区东出，于9月1日占领礼县，继向陕甘边发展，连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等城。

这时，中央又将陕甘宁根据地的困难情况向四方面军作了通报：“陕甘宁苏区版图颇大，东西长约1000余里，南北亦600里，现有盐池、定边、靖边、安定、安塞、延川、保安、环县、豫旺九城在我手中。”各县论地情则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部队运动，人口总数只有40余万，苏区内当红军的已超过3万，物产一般贫乏，农产除小米外，小麦、杂粮均缺，不能供给大军久驻。苏区群众斗争情绪较好，只

因地区贫困，经济上不能有大负担，故至今苏维埃除盐税以外，尚未任何税。苏区西部宁夏回地，筹粮扩红都较困难。”相形之下，西方面军现在甘南的处境还是比较好的。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中国，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国民党军队的部分将领提出了反对内战、积极抗日的要求，中共中央认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9月8日，中共中央电示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的要提出‘联合抗日’的口号。向毛、王等部派出人员进行接洽，仅要我们必要占领的地方，遇到他们反对才与之作战，但同时进行宣传与接洽，希望你们依据这个方针，把自己的宣传工作改造一下。”

9月9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就西渡黄河问题作出指示：“一方面军来电主张过黄河，在宁夏、宁夏、甘凉地区发展，不得已时才向川陕豫鄂发展。”“估计目前情况，我一、二、四方面军应以两个军渡黄为宜，两个军尽量在黄河右岸活动，现在须立即准备。”“准备事项如下：准备三十军为先遣军，现在至少抽出一师加紧训练。对全军训练要点，对西敌情、地形有熟练、冬季作战、行军、宿营注意点，对骑兵、防空、夜间动作、游击战争，印地图，造皮船和驾驶，利用六军争取回民，速发动群众斗争。10月上旬前，完成冬衣、鞋袜、水壶、练骑兵、卫生、给养，应注意事项和六大政治动员，使战士均知黄河北岸的优点，不怕北面寒冷，并知其前途。速训练新兵，保存有生力量

等”^①。

红四方面军进入甘南后，与一方面军的会合在即，为此，各方面都对此十分重视。政治部印发了《庆祝一、四方面军大会合战士讲话大纲》，供联欢会上战士代表讲话之用。其中写道：“我们会合了，我们应该以会合的热情，最亲爱的团结，创造广大而巩固的西北抗日根据地。回想到一、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合的时候，我们中间的个别战士，曾经因为一些细小的事故吵起来，因为一、四方面军习惯上的不同，致使我们中间发生了一些误解。现在这些事情早已经过去了，纠正了。现在已胜利的会合了，我们已经一致的在共产党中央领导下，坚决的为执行当前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再没有任何人能够破坏我们的团结，我们四方面军全体战士准备好用心的学习一方面军哥哥们的长处，希望我一方面军的哥哥，能够纠正我们的缺点，多多指示我们。”^②

9月5日，陈昌浩在谈到进军西北的战略计划时，指出：“最快与最实际的会合一、二、四方面军，使基本上已经统一的党的领导，得到圆满的集中，使目前民族革命战争与统一战线的领导，得到彻底的统一与集中，使各个方面军及全国红军的战略指导，得到真正的协同一致，使战胜敌人，完成党的任务得到更大的把握。”“会合与巩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这是最主要的教育工作，必须使个个指战员了解，一、四方面军的团结，是战胜敌人，完成战略任务的先决条件。一、四方面军分离后，彼此之坚决执行正确路线，艰苦奋斗，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成绩，实现了今天的会合，来共同担负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在‘拥护党中央领导’、‘一、四两方面军团结’、‘比赛打胡宗南’、‘手牵手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之下，把过去个别发生的不良影响完全抛

^① 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88页。

^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66～667页。

弃，把彼此特长互相学习而发扬，把各人的缺点相互帮助去纠正。坚决反对任何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的企图，反对任何的、无原则的个别成见是非常必要的。”^①

红四方面军在甘南的发展还是比较顺利的。至9月10日，四方面军已占领漳县、渭源、通渭、临潭四个县城；陇西、武山、岷县、临洮四县除县城外，其他地区均为红军占领。定西、甘谷、礼县、西和、武都亦有红军活动，而红军游击队甚至活动到兰州以西。

为了进一步开展甘南的工作，西北局还成立了两个省委，一为甘肃省委，以岷县为中心；一为陕甘边省委，以成县、徽县为中心。红军占领区域人口约80万。自8月20日西北局发出《关于扩大红军运动的指示》后，已经扩大红军3000余人，而且扩红还在积极的进行之中。

9月11日，中共中央终于盼来了共产国际书记处对中央8月25日密电的答复，其内容是：“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在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

为配合二方面军向陕甘边的活动，朱德、张国焘电令四方面军抽出两个军，东出西和、礼县，消灭王均部。陈昌浩则认为，以两个军出西和、礼县作用太小，不如集中主力出击通渭、静宁、会宁，与一方面军合力夹击西进的胡宗南部更为有利。将来四方面军主力应向陇东北发展，与陇东南的二方面军呼应作战。为了统一行动部署，朱德、张国焘电召陈昌浩从岷县前线赶到三十里铺，共商大计。经过磋商，朱德、张国焘、陈昌浩于9月13日向中央

^① 昌浩：《争取当前伟大胜利》（1936年9月5日），《前进》第6期（1936年9月16日出版）。

和徐向前提出了新的作战方案。具体内容是：

“敌以各个击破我军之目的，企图以胡、毛、王、孙四个纵队首先与我四方面军决战。我军为先机打破敌之既成计划，争取抗日友军，造成西北新局面，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时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四方面军尽量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具体部署是：（1）我一方面军主力由海源、固原地区向静宁、会宁以北地区活动，南同四方面军在静、会段以袭击方式侧击运动之胡敌，并阻止其停滞静宁以东。（2）我二方面军以主力在徽、两、风以北地区，并以一部进到宝鸡活动，虚张声势，扬言：二、四方面军即直出汉中，一方面军向南会合，以牵制王均于天水地区和吸引胡敌不敢长趋西进为目的。二、四方面军除以九十三师主力即向静、会段以南地区活动外，以一部机动兵力集结陇西、武山，并适时以 8 团以上兵力打击静、会间之胡敌，相机打通一方面军。

徐向前仔细考虑了这个方案，认为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人决战，红军会处于劣势。据情报说，胡宗南的第一师、第十八师可于 18 日抵咸阳，第四十三、四十七师随后跟进，再加上王均第三军和毛炳文师及马家军的兵力，敌优我劣的态势相当明显。而战场选在西兰公路附近，敌人运输方便，调兵迅速，我军南北夹击不成，反会遭到敌人的左右夹击。同时，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那里人口稀少，就粮困难，不便大部队久驻，也是严重问题。因此，徐向前向朱德、张国焘建议，以一部兵力速围马步芳的家乡河州，吸引马敌，主力乘虚从永靖以南的莲花渡过黄河，进据古浪、永登、红城子一带，与兰州的东北军配合，控制这一战略枢纽地区，休整补充，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打通苏联，创造有利条件。但是，他的建议没有被接受^①。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 496 页。

由于共产国际批准了红军夺取宁夏和甘西的计划，9月14日，中央就占领宁夏的部署电示四方面军：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一方面军主力9—10两个月仍在海原、固原地区，10月底或11月初开始从同心城豫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12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一方面军之其余部队保卫陕甘北苏区。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10月底或11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12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四方面军互相策应，并联络陕南游击区。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

9月15日，中革军委又来电：一方面军已向海原、固原出动，一军团派第一师出静宁、隆德大道，策应四方面军。四方面军宜在5—7天内以主力出至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大道，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之有利基点，迟则界石铺通渭大道有隔断之危险。9月16日，中革军委又来电：胡宗南部队大部已到西安，现陆续向西运。四方面军宜迅速占领隆、静大道，否则将被截堵断。9月17日，中革军委再次来电指示：胡宗南以进占界石铺为目的；四方面军主力务须在3天内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胡军乘汽车将在二三日内控制界石铺。

中革军委电报的意图改变了朱德、张国焘关于一、四方面军主力南北夹击敌人的计划，而要求四方面军在西兰通道上单独迎击胡敌。

9月16至18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的红军总部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西北地区的地方工作等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朱德、陈昌浩、傅钟、

曾传六、李卓然、何畏、萧克、刘少文等。会议由张国焘主持。

朱德在会上发言说：蒋介石是要置我们共产党于死地而后快。可天下的事情不能随他一厢情愿。……全国人民不愿当亡国奴，也要逼蒋介石抗日；就是蒋介石军队的内部，像张学良、杨虎城那样的主张抗日的将领也大有人在。现在蒋介石所以还搞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是因还没有把他逼到非抗日不可的地步。这就靠我们的工作，宣传我们的主张，动员群众，争取友军。陕北比我们做得好，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去年12月提出的口号，2月变了一次，现在又变了，越变策略性越强，团结面越广。他还说，去年开始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来，我们做得不够，思想没有把它放到首要位置，想问题做事情只看眼前，以后应有一个转变^①。

大家都对统一战线工作各抒己见。

每天会后，朱德、陈昌浩就与张国焘讨论军事行动问题，双方总是争论到深夜。朱德、陈昌浩主张北上静宁、会宁地区，会合一方面军，与敌决战；张国焘则认为，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立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他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双方只好同意把自己的意见汇报中央。

会议开到第三天，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带着警卫员和骑兵住到岷江对岸的供给部里。朱德气愤地说：“他不干，我干！”于是找来作战参谋，挂起地图，着手制订部队行动计划。当天黄昏，张国焘又派人通知继续开会。朱德、陈昌浩和西北局成员赶到张

^① 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80页。

的住处开会，参加会议的多数人都支持朱德、陈昌浩的主张。最后，张国焘言不由衷地说：“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你们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①

9月18日晚，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联名向在漳县的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部发布《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决定：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先机占领静、会及定西通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夹击该大道上之胡敌与静宁之骑七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

9月19日，中革军委复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向宁夏、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并提出：如使胡宗南确占定会地区会合毛炳文后，既可加强马鸿逵，使我们攻宁夏计划失败，又可加强马步青，使你们攻甘西计划失败，只有集中先占领宁夏方免此失。”

同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致电中央：“决定四方面军全部向定西、会宁、静宁线活动，以会合一方面军夹击与迎击胡部为目的。先头师二十四、二十五日到界石铺，大部月底到达。”“请大动员并选择最快与适宜地点同你们会见，商决一切。”

为了夺取静会战役的胜利，朱德、张国焘于9月19日致电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各军首长，指出：“静宁、会宁战役是消灭胡宗南，争一、四方面军会师的重要关键，望即在干部及战士中进行热烈的战斗动员，提出活捉胡宗南与一方面军会师，扩大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建立西北抗日政府，……联合苏联和外蒙，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等中心口号，大大提高士气”。“努力巩固新战士工作，争取地方武装参加红军”；“加紧行军中的收容工作与防

^① 潘开文：《临大节而不辱》，《工人日报》1979年7月6日。

空教育，高度保持有生力量，保证直属机关的轻便以充实连队”；“大大发扬阶级友爱，保障一、四方面军亲密的兄弟团结”。

张国焘虽然在岷州会议上勉强同意了静会战役计划，但在实际行动上又另搞一套。据陈昌浩回忆：

“岷州会议是西进与北上的争论。张国焘是不会合的。会议开了好几天，张国焘坚决主张向青海之西宁进军，怕会合后他就垮台了。我们坚决反对西进，与他争。他最后以总政委的身分决定西进，决定后就调动部队。那时，我和朱总司令、刘伯承都谈过了，无论如何要会合，甘孜会议的决定不能在半路上违反。向前那时不在，可能他先到的漳县。我认为张国焘的决定是错误的，我有权推翻他的决定，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名义下达命令，左翼部队停止西进，准备待命；右翼部队也停止西撤。

“命令下后，张国焘就知道了。他深夜三点多钟找我来了，谈了三点：（1）我无权改变他的计划；（2）命令是错误的，今天革命形势应该保存四方面军；（3）会合后一切都完了，要让我们交出兵权，开除我们党籍，军法从事。说到这里就痛哭起来。我当时表示：（1）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要求，而你的决定是错误的；（2）必须去会合，会合后就有办法了，分裂对中国革命是不利的。我们是党员，错误要向中央承认，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谈到这里张国焘就走了。我以为他回去睡觉了，准备明天再去漳县对向前说明。但哪知当天晚上他就连夜到漳县去了。我知道后立刻骑马赶了去。张国焘到漳县后又要西进，经过争论，最后还是北上了。”^①

9月20日清晨，张国焘到达了设在漳县附近三岔的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部。进门二话不说，就让徐向前把周纯全、李特、李

^① 陈昌浩：《北上和西进的争论》，《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63页。

先念等几个人找来，对他们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他向众人谈了与陈昌浩在军事行动上的分歧。因这是张国焘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尖锐的分歧，加上张国焘又有个另立“中央”的包袱在身上，所以情绪很激动，他流着泪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在大家的劝说下，张国焘才安静下来，并开始申述自己的理由。他指着地图，边讲边比划。他说：四方面军北上静会地区，面临西兰通道，与敌决战不利；陕甘北地瘠民穷，不便大部队解决就食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

从军事观点看，徐向前等人认为张国焘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于是，当场制定了具体行动部署：四方面军以两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脚点；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部；以两个军继续布于漳县、岷县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后这三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这个方案，一是避免了在不利地区同敌人决战；二是吸引胡敌南向，减轻了对一方面军的压力；三是并不违背中央关于两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战略企图；四是便于解决四方面军的就食问题^①。

部署商定后，张国焘于9月21日电告朱德，提出“坚决反对静会战役计划，自主即速采取第二方案”，“请你负责本夜令军委纵队电告停止待命”，“请你即来漳县面商”。

当陈昌浩于21日晨赶到漳县时，见众人都同意张国焘的方案，也就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

而当朱德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一夜未眠，连夜拟好3封电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98页。

报。一封是给徐向前、周纯全并转张国焘，内容略为：“国焘同志电悉，不胜诧异。为打通国际路线与全国红军大会合，似宜经静、会北进，忽闻兄等不加同意，深为可虑”；“静、会战役各方均表赞同，陕北与二方面军也在用全力策应，希勿失良机，党国幸甚”。并提议在漳县再召开西北局会议，续商大计。

另一封是给党中央及二方面军负责人，内容是：“（甲）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乙）现在将西北局同志集漳县续行讨论，结果再告。（丙）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

第三封是给在外地筹粮的曾日三同志，要他速去漳县开会。

不料，电报稿送到电台，电台工作人员拒绝发出，说：“张主席有指示，没他签名的电报一律不发。”几次派人做工作，答复均是：“不能发，不能违抗张主席的指示。”

朱德很是着急，便去找傅钟，对他说：“你是四方面军的，又是西北局的组织部长，你出面吧，给他们讲讲组织原则。”

傅钟认为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便立刻去电台交涉。

电台同志也感到问题严重，也许有分歧，发生过争论。所以当傅钟进门时，气氛仍较紧张，个个面无表情。为了缓和气氛，傅钟先与大家说了几句闲话，然后转入正题，他说：“有人要推翻岷州会议决议，总司令不赞成，要向中央报告，也要召集人继续讨论，这是关系红军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党的原则的大事。总司令有命令应该执行。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遵守党的纪律和原则，维护党的决议，下级服从上级。现在我代表西北局组织部问问大家，怎么办？”

沉默了一会儿，电台负责人王子刚首先站起来表态：“给朱总司令发报！”

电台同志一致响应，立刻开始工作。

当三封电报发出时，已是22日凌晨了。

之后，朱德带领随总部行动的西北局成员连夜出发，催马扬鞭，直奔漳县。

甘南的初秋，凌晨时分寒气袭人，但由于众人心情急迫，策马飞驰，便觉得汗流浹背。朱德一路上很少说话，心情十分沉重。许久，他才对傅钟说：这次一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能书记说了算，书记也要执行集体决议^①。

当朱德一行赶到漳县后，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等着他们。9月23日，西北局会议在漳县附近的三岔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召开。朱德在会上几次发言，坚决维护岷州会议关于北上的决定。他说：“第一个战役计划和第二个是有很大区别的。第一个计划是有利的。”“所以我坚持第一个计划。现在即决定第二个方案，对整个形势不能抓住，会合要迟，联合战线受影响。”他反复表明，四方面军北上同一方面军会合，对整个形势是有利的。他责问张国焘：现在迅速北上，可以不经过同敌军决战而实现会合，可能会合为什么不会合？岷州会议的决定是由西北局成员集体讨论作出的，张国焘当时既然表示服从并签了字，为什么到漳县就完全改变了，不经过西北局重新讨论就改变计划？张国焘即使是党的书记，也要根据决议来工作，这是关系到组织原则的严重问题，应当弄清楚。张国焘蛮横地说，他是书记兼总政委，调动部队他完全负责，经他决定了可以不经朱德同意，当他不能执行职权而别人要调动军队时，他要提出抗议。张国焘坚持他的西进主张，他说：“西进的地区人口稠密，部队供应解决，过黄河的困难也不大，青海、甘北的马步芳、马鸿逵总比胡宗南好对付，从那里也可以和一方面军会合。再说，北上静会作战也要充分估计我们的能力。部队刚

^① 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82～783页。

刚走出草地不久，到甘南又连续作战，没有休整，相当疲劳，人员弹药都不足，单说五军，炸弹十个有五个打不响。胡宗南呢？近年几乎没有多少战斗消耗，人员装备齐全，且供应充足。两下一比，我们不得不作万一之想。上回我说北上会静是断送红军，不是吓唬人的。”^①

张国焘的一番话，抛开他怕见中央不谈，单从四方面军这个局部考虑，大家认为他的看法也有道理。部队三过草地，在芦、天、宝地区，尤其是在百丈遭受了大损失，元气大伤，与强敌作战确实困难。

基于这种考虑，大多数人表示同意张国焘的西进方案。再僵持下去更会延误时间，朱德只好无可奈何地说：那就暂照第二方案执行，大家做好工作，减少损失。我建议向中央报告，如中央不同意，就坚决执行第一方案。他还要求张国焘对这个改变负责，并说：“若强我们赞同是不可能的。”^②

漳县会议后，张国焘一面起草电报报告中央，一面命令部队停止北进，向西前进。

这期间，中央于9月19日接到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的联名电报，建议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委主席团，集中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同一天，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三个方面军须迅速统一指挥，商量态度不便作战。”9月21日，中央电告二、四方面军负责人：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贺、刘、关四同志之意见，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毛、彭、王

① 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84页。

② 朱德在西北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9月23日）。

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三同志一起工作。

中央虽然有此决定，但在战争环境下，并不能迅速实施，因而并不能对张国焘产生约束力。

在张国焘的命令下，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徐向前带领下西向洮州进发。广大指战员自进入甘南后，一直在“北上抗日”、“与一方面会师”的号召下奋勇杀敌，士气旺盛。现在掉头向西，使大家很是疑惑，于是议论纷纷：“日本鬼子在东面、北面，往西走抗谁去？”“不是又让过草地吧，可不能来第四次！”疑虑不小，人心浮动，部队逃亡现象增多。留下来的人也是心情沉重，情绪低沉，行军的动作也很迟缓。由于有跟随张国焘错误南下的痛苦教训，大家心里都盼望着能够早日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的早日会师！

四 会 宁 会 师

张国焘推翻静会战役计划，命令部队西进，对此党中央甚为关切，为了使四方面军能按原计划北上，实现三个方面军的会师，党中央多次来电，希望张国焘能改变西进的决定。

9月23日，中央致电二、四方面军领导人，提出：“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根据自我批评精神与国际指示讨论了9个月来统一战线工作，正在写决议，不日电达”；“育英准备来前方一行，俟二兄到达界石铺后即动身”。

由于得不到张国焘回电，毛泽东甚为失望。9月25日，他致电彭德怀：“四方面军决心向西，从永靖度河，谋占永登、凉州，其通渭部队24日撤去。据云渡河后以一部向中卫策应一方面军占宁夏。此事只好听他自己做去。”^①

当日，彭德怀复电中央，认为“国焘动摇北上方针，其主要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18、719页。

原因对时局认识不清，怕胡宗南侧击，如果与我们会合了，他的政治、军事领导破产。你们前次电告组织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张也未必同意，张请国际直接指挥，朱总也有些恐惧。”为了争取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彭德怀建议：“一军团主力尽量与四方面军靠拢，免被敌人隔断，为此去影响其师、团干部及群众，因为我们经过七、八、九月的训练，部队有相当整齐、严肃，并且很是雄壮。团结四方面军的工作，我们在8月中即开始各种动员，一般干部有了正确的了解。”^①

但是，当彭德怀看到张国焘关于西进部署给毛、周、彭的电报后，于9月26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指出，张国焘的西进计划“其目的在黄河、洮河间背靠青海南部，回避胡宗南，使该敌以全力对付我一方面军，破坏打通国际计划，其反说是完全同意国际指示”。“由永靖渡黄河抢占永登，一部出中卫援助一方面军夺取宁夏，这完全是鬼话，事实上很少可能，因须渡河器材，黄河既无桥梁又无船只，造船需时过久，敌备更严。要二方面军吸引胡敌任务完毕后，走略阳、眉县打通一方面军，这是自欺，目的是使二方面军回岷县就张之范，或出陕南，使之在事实上不能与一方面军会合，证明其军阀主义思想更进了一步。”

9月26日12时，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致电中央，说明采取西进的原因是：如果一、二、四方面军都集中西兰公路向北，万一敌将宁夏兵力加强，甘北凉、古浪、永登形成封锁，敌主力由西兰公路向北压迫，整个红军将陷于狭小地区。如果准备决战，红军集中在一块是不利的，否则不如在宽广地区互相配合行动，更为有利。因此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可接通外蒙和新疆得到国际帮助，并可接应一、二方面军占领宁夏地区。根据上述估计，因此我们决定四方面军即应行动，先机抢占永登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18、719页。

一带地区，将胡敌向北吸引，对一、二两方面军是为有力配合。敌若以主力入甘北，即给一、二方面军在现在地区以大大活动机会，由四方面军以有力一部接引一、二方面军合力取宁夏，则宁夏是有把握取得，现部已按此决定调动，不便于更改，务祈采纳。

值得注意的是，这封电报在强调“统一领导万分重要”的前提下，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北局应如何组织工作，军事应如何领导，军委主席团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均请决定指示，我们当遵照执行。”^①这说明，张国焘在宣布解散“第二中央”之后，再次放弃了与党中央平分秋色、坚持由国际直接领导的错误要求，而同意接受党中央的领导。

同日20时，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致电贺龙、任弼时等人及党中央，再次解释西进的有利方面，指出：四方面军先机抢占永登、红城子一带地区，很少可能陷一方面军于困难环境与难能西渡。敌最怕我打通远方。若四方面军转到甘北，胡敌必向四方面军压迫，不会转其凶锋对一方面军。电文中表白说：“此次西渡计划决定，决非从延误党和军事上统一集中领导观点出发，而是在一、二、四方面军整个利益上着想。……西渡计划确系站在整个红军利益的有伟大意义的正确计划，现我们仍照西渡计划行进，望以此实情多方原谅。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请求中央明令停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

中央接电后，一面复电朱德等人，指出：“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而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背后粮食不成问题。若西进到甘西，只限制青海一面，尔后行动困难。”一面致电任弼时等人，要他们力争张国焘执行北上计划。

22时，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复电中央及任弼时等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21~722页。

人，提出：“不知兄等有何根据来估计在隆、静、会、定道上不致有严重战斗？”“如四方面军西渡，兰州、凉州间约距 560 里，敌决不可能限制我于青海角。”同时表明服从中央的命令：“现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行动。……如兄等认为西渡计划万不妥时，希即明令停止西渡并告今后方针，时机急迫，万祈鉴察。”

与此同时，又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通渭已无我军。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原计实施，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我们在一月内能在靖远附近会合，请善解释，决不可使全党全军对会合失望。”

9 月 27 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复电，明令禁止四方面军西渡，其内容是：

（甲）迭接二十六日两电，敬悉一切，并有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西渡计划行动等语。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详细慎重的讨论了这个行动问题，特将结果奉告如下：

（乙）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两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且胡敌因西兰路断怕我攻击，又怕东北军不可靠，不敢向隆德、静宁，拟向天水靠近王均。如四方面军西渡，彼将以毛军先行，胡军随后，先堵击青、兰线，次堵击凉、兰线，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偏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虞。

（丙）因此，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

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一方面军目前一面确占界石铺，一面立即出四团以上通过隆、静线，直迫秦安、天水，使胡敌不敢动作，以便四方面军十分安全的北上，务请顾及整个局势，采纳此方针，亦即九月十八日朱、张、陈三同志之方针。

(丁) 请诸兄速决速复。^①

同日，陕北方面明确地以“党中央”名义致电“朱总司令、张总政委及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命令：“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尔后向宁夏、甘西，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牵制敌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动。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应领导全体指战员发扬民族与阶级的英勇精神，一致团结于国际与中央的路线之下，为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

在洮州，西北局再次开会讨论部队行动方向问题。由于党中央迭电反对西进，又由于先头部队从老乡处得知现在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西渡黄河的计划难以实现，与会者都同意放弃西进计划。

但张国焘却竭力阻挠北上同中央会合，他说：打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打通国际路线，得到装备再打回来，与一方面军会合也不迟。大雪封山，可不可以从南边绕道。

陈昌浩立刻说：从地图上看那又要走一片草地，部队走怕了，再走草地开小差的增多，部队怎么带？

徐向前也语重心长地说：鄂豫皖出来的同志不想再折腾了。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 727 页。

朱德劝道：是回头的时候了，不能一错再错。

萧克、李卓然、王维舟、余洪远、傅钟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示了执行静会战役计划的意愿。

张国焘看到无法再坚持自己的主张，也只好同意北上静会地区^①。

9月27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及二方面军负责人：“（甲）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现时据考查兰州西渡河时须较长，有可能失去占领永登一带先机之利。（乙）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决不再改变。”

9月28日，朱德、张国焘发布了《通庄静会战役计划》，指出：“我军西进计划，因受到地形、天候及河川的限制，不能按期到达目的，恐失先机之利。目前需要争取全国红军之迅速会合，以消灭敌人。”“四方面军以迅速进出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铺地区，争取迅速与一方面军会合，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先头部队；巩固扩大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日友军接通外蒙、苏联为目的。”

9月29日，朱德、张国焘等人将通庄静会战役部署电报中央。中央接电后，当即回电表示“各同志十分佩服与欢慰”，指示四方面军“宜即用原占通渭部队，日内进占通渭以取先机”，并告以策应部署：“我一师仍在隆、静以北之线，一个团在界石铺。我二师30日从固原北部出发，取直径相机袭占庄浪，威胁胡敌，尔后在渭水与平凉大道之间，包括华亭、陇县，纵横游击，成为三个方面军之中间的战略支队，策应二、四方面军。”

从9月30日起，四方面军分作5个纵队，先后由岷州、漳县

^① 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争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85～786页。

等地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前进。第一纵队为第四军，经官堡（今会川）、渭源、华家岭攻占青江驿、翟家所；第二纵队为第三十军，经鸳鸯铺、榆盘镇袭占通渭；第三纵队为第九军，经野狐桥、中堡里至新市镇；第四纵队为第三十一军，进至通渭、马营一带；第五纵队为第五军，随第九军之后向庄浪、威戎镇方向发展。

10月2日，一方面军部队攻占会宁县城。

10月8日，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四军第十师在会宁之青江驿、界石铺与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胜利会师。

10月9日，徐向前率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城，受到一方面军部队的热烈欢迎。

10月10日，朱德、张国焘抵达会宁城，受到红一师师长陈赓及部队的热烈欢迎。

当天，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为一、四方面军的会合，致电毛泽东：“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已胜利的实现了，全世界的群众奋起了，全中国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举起了空前未有的民族的高潮，将使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战栗发抖，以至滚向坟墓里去。在会宁我们已经与红一师的战士们携手见面了。他们英勇杀敌的气概、和蔼亲诚的态度使我们景仰钦佩。兹派方政（即四方面军政治部）青年科长姜启化同志率九军特务团一个连前来与你们联欢。请予接洽并使双方工作经验互相交换为盼。”

10日，会宁城内万众欢腾，庆祝会师联欢会在热烈的气氛中举行。红一方面军将久已准备好的慰问品——毛衣、毛袜、毛手套和肉、菜等纷纷送给四方面军。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为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向全军发出贺电，向三个方面军的领导人及全体指战员致以热烈的慰问和祝贺，并且指出：“我们在这一抗日前进阵地会合，说明强盗的侵略是快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

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说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说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我们即刻就要进入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这就是创立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新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线的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抗日前进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西北而战，保卫华北而战，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

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10月21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率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在隆德西北的平丰镇与左权、聂荣臻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领导人会合。次日，一、二方面军主力在隆德将台堡会师。

会宁会师，胜利地结束了红四方面军历尽艰难险阻和曲折复杂斗争的长征。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从1935年3月西渡嘉陵江开始，到1936年10月会师会宁，经历了长达一年零七个月的艰难曲折的过程。由于张国焘的干扰，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增加了困难和曲折。但是，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以对党无限忠诚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和南下的挫折，进行了大小上千次战斗，粉碎了数十万敌入的围追堵截，粉碎了张国焘的错误干扰，终于实现了会宁会师，结束了长征。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的路线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张国焘不断进行斗争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的结果。

第八章 悲壮！西路军

一 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造成了雄峙西北的态势。刚刚处理完两广事变的蒋介石，急忙部署西北“剿共”计划，第一步是组织“通渭会战”。具体部署是：胡宗南第一军进至秦安、清水地区，王均第三军及关麟征等两个师向天水、甘谷集结，毛炳文第三十七军向陇西、武山、榆盘集结；东北军于学忠部从兰州抽两师进至定西，王以哲部控平凉、隆德、静宁，董英斌部抽两师至固原策应。目的是要在东、南、西三路向静宁、会宁地区的红军进攻，给红军主力以致命打击，防止红军西渡黄河，进据河西地带；第二步是组织最后“围剿”。其设想是：集中几十万大军，配属 100 架新式轰炸机，将红军主力压迫在黄河以东、西兰通道以北地区，一举消灭。

10 月上旬，张学良把蒋介石的计划通报中共中央，希望红军及早进行宁夏战役，打通苏联。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0 月 11 日，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其中给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11 月 10 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渭）马（营）静（宁）会（宁）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

期可能在10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同时，中央还决定三个方面军的行动统由朱德、张国焘分别以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的决定组织指挥。

根据中央的战役部署，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以三十军开至靖远的大芦子地区，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准备渡河事宜。以四军、五军、三十一军，沿会宁、界石铺、华家岭、马营、通渭、宁远镇、葛家岔、静宁等地，梯次配置，抗击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等敌；以九军置于会宁至靖远之间，作预备队。如三十军渡河成功，九军即迅速跟进；如渡河不成而南敌突击，则以四、五两军牵制敌之侧翼，而以三十一军、九军反击南敌，为三十军渡河争取时间。

由于西渡黄河成为首要急务，所以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在总部领受了任务后，连饭都顾不上吃便赶回部队。四方面军有一支百十来人的船工队，这些人便成为造船的骨干力量，而李先念又当过工匠，指挥起来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三十军在距离靖远约20公里的大芦子附近，找了片柳树林，隐蔽赶造船只。为了支援四方面军的造船任务，中央特令红一方面军火速搜集木板、石灰、桐油、铁钉、棉花等材料，并挑选木匠、铁匠等技术人员，送往三十军驻地。

10月16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并毛泽东、周恩来，根据《十月份作战纲领》，对全军作出具体行动部署，确定：“我军以控制西兰大路20日以前在我手中，以运动防御手段尽量迟滞敌人前进，相机消灭敌人一部之目的。”其中对四方面军的部署是：“三十军渡河成功后，九军即速跟进，该两军以主力控制一条山、六墩子、永登一带地区，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三团以上兵力向中卫扫击。四军主力位置于会宁、定西线，以一部由贡马井、冯家堡向兰州、定西间活动。五军、三十一军在界石铺、通渭、马营、宁远店之线牵制前进之敌；三十一军主

力应位置于青家驿、界石铺之线。如渡河不成，则应以四、五两军担任钳制任务，集中九、三十一两军对前进之胡敌为有效之突击，消灭胡敌之一部，争取时间。”

10月18日，朱德、张国焘电告毛泽东、周恩来：三十军来电谓20日晚即可开始偷渡。19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三十军渡河以至少备足10个船开始渡河为宜，恐船过少载兵不多，不能一举成功。20日渡河问题，是否推迟数日，请依具体情况斟酌。”

这时，敌西北“绥靖”主任兼第三路总司令朱绍良，在蒋介石的“进剿”命令之下，发布了《剿匪计划纲要》，命令其第一、第三、第三十七军等部，于10月21日分别从东、南、西三个方面，向静宁、通渭、会宁地区猛进。次日，蒋介石飞临西安督战，逼迫东北军和西北军参加对红军的进攻。敌人仰仗优势兵力，在飞机掩护下向红军阵地猛攻。

阻击和挫败敌人的进攻，是保证宁夏战役计划顺利完成的先决条件。四方面军之第四、第五、第三十军等部，在界石铺、通渭、马营、华家岭、宁远镇、葛家岔等地进行顽强抗击。由于地形开阔，利于敌人飞机、大炮火力的发挥，红军打得非常艰苦，与敌人多次展开肉搏，双方伤亡都很惨重。在华家岭战斗中，五军副军长罗南辉不幸壮烈牺牲。五军撤至会宁附近后，又遭敌机猛烈轰炸，伤亡800余人，损失达1/4。22日，敌第三十七军攻占华家岭等地，23日，又占会宁县城；敌第一、第三两军，也分别占领了通渭、静宁、界石铺等地。接着，敌全力向靖远、海原方向前进，企图压迫红军于黄河以东歼灭之。

战局的发展使渡河问题刻不容缓。这时，三十军已造船16只，还在当地搜集了部分船只。徐向前、陈昌浩于10月22日电告朱德、张国焘：三十军在靖远附近，决于23日晚抢渡黄河；四、五、三十一军以运动防御迟滞敌人，以争取时间为目的。23日，朱、张电令三十军立即渡河，九军跟进，如渡河不成，南敌继续突进，则

以九军配合南线部队击敌。

渡河地点选在靖远以南，这一地区水面较开阔，水流相对稳定；沿岸的树林遮天蔽日，是红军隐蔽集结和偷渡的理想之地。30日晚，由三十军中抽调的渡河前卫团首先开船偷渡。当船行至河中心时，遇到浅滩受阻，偷渡未能成功。红军总部下令24日继续渡河，并命令三十军军长程世才、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带人另寻渡河点。

10月24日，朱德、张国焘在打拉池与彭德怀、徐海东会面。朱、张电告中革军委：“关于根据新任务由彭德怀同志提出之战役计划要旨，我们完全同意，正根据今日情况研究具体之方案。”同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要他与朱、张商量，“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似以暂不渡为宜，尔后北进至海靖线防御”。

24日半夜时分，三十军从靖远以南10公里处的虎豹口（今河包口）渡河成功，从而揭开了宁夏战役的序幕。25日晚，三十军全部渡过黄河，并摧毁了马家军的防线，控制了纵横上百里的沿江地带。三十军渡过河后，徐向前、陈昌浩即电朱、张，决定九军续三十军之后渡河。

10月25日，彭德怀电毛泽东：

“（甲）三十军昨晚渡河已得手，本日黄昏前可渡毕，第九军继续，估计蒋敌在我军既已渡河（将）集中兰州一部占永登，可能一部仍向郭城驿、靖远追击前进。（乙）已提出部署意见如下：（1）四方而军主力以三个军渡河，两个军抗击会宁之敌。（2）二方面军应逐渐向沛干池抗退一部敌六营、七营以北。（3）一方而军主力应集中王家团庄、高崖子、同心城，在金积、灵武之线为主渡点，中宁、中卫为次渡点。（4）已渡河四方而军主力，渡河

后应向兰州北岸永登、景泰扩大占领区。”^①

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于同时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就今后行动作出部署：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和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机动部队，守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适时协助一方面军在中卫、灵武段渡河。其河左岸郭城驿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吸引会宁方向之敌，该掩护部队将来如必须渡河时，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一方面军主力应速集结同心城、关桥堡地区，准备渡河技术。并着重指出，此次行动部署的纲领是：“根据中央军委历次关于战略方针指示，我三个方面军在这一时期以占领宁夏地区，扩大甘北活动地区和尽量巩固陕甘宁赤区以及维持扩大活动地区，吸引毛、上、关诸敌于西兰大路一带，接通远方，争取抗日统一战线的公开形成，为战斗（略）目的。”^②

毛泽东、周恩来收到上述电报后，根据变化了的敌情，提出下述意见：

甲、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认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我处南北两敌之间，北面作战带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至20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北。

乙、因此部署应如下：

（一）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两军迅

^{①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39，839~840页。

速占领黄河湾曲处西岸头卢塘、眼井堡、大营盘、大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袭取战略要地之定远营。

(二) 四方面军除渡河之两个军外，尚余以九军为中心三个军，二方面军除派赴七营部队外，尚余其主力，对南敌不须多加抵抗，如在若干天内逐渐集结于打拉池南北地区对敌则坚壁清野诱其深入，对我则构筑阵地，鼓励士气，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足以停止南敌矣。

(三) 一方面军之主力于四方面军两个军控制河西枢纽地带后开始行动，以突然手段占领金积、灵武地带，徐、陈拨造船技术队二分之一或更多附属之，迅速造船准备渡河。

(四) 在南敌因受严重打击而确实后，第九军从中宁渡河。此时整个战局进入以北面为重点之第二步，而以四方面军之两个军与二方面军全部防御南敌如何盼复。^①

徐向前、陈昌浩接到中革军委的电报后，只好命令已经开到河边的九军待命行动。不料，10月26日凌晨，中央军委又致电朱、张、彭：“甲、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需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乙、等二三日如真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一个军渡河不迟，目前瞬南村敌应取击破手段，仅取抗击手段不够。”^②同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张、彭：为开展目前战略方针，争取主动，吸引敌人于兰州方面，并尽力能迟滞会、定前进之敌，我们

^{①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41、842页。

即遵 25 号提议之电，决以三十、三十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大力压迫，两个军速控五佛寺、一条山、红水一带战略地区，留五军在河两岸监视靖远、一条山之敌及守船任务，四军位现阵地扼阻会、定敌人。”^①朱德、张国焘同意了这一部署。

10 月 26 日 21 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1）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2）目前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主要。（3）三十军占领永登是对的，九军必须占定远营，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一方面军去，不便利不失时机。（4）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敌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5）一方面军集结同心城休息。^②

四方面军渡河部队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执行任务的。敌人为了阻止红军渡河，白天派飞机进行轮番轰炸，封锁河面。部队只能在黄昏后和日出前抢渡。小船在奔腾咆哮的黄河中颠簸飘摇，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指战员们全凭着坚强的意志，战胜了狂涛恶浪。

这时，朱德、张国焘根据中央军委 26 日电报精神，于 27 日指示徐、陈：“四方面军除三十、九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三十、九两军，即由你们中去一个指挥，迅速占领大芦塘、眼井堡、大营盘、三塘驿、五佛寺地区，以一个军向中卫延伸，一个军准备争取战略要地定远营”；“四、三十一两军即以一部逐渐迟滞敌人，准备于郭城驿附近与敌决战，消灭敌之突进部队，面停止其前进”。对于中央军委的指示和朱、张的电报，徐向前、陈昌浩有不同意见，于 27 日致电朱、张、彭、毛、周，陈述对军事行动的看法，其主要内容是：为迅速实现宁夏战役计划及便利迎接一、二方面军渡河起见，提议四方面军全部渡河，以一个军对待兰州之敌，四个军迅出中卫、宁夏，并放船到

^{①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 843、844 页。

大庙及中卫，迎接一、二方面军。如果一、二方面军可单独完成宁夏战役计划，无须我们技术力量上配合时，提议四方面军亦须全部渡河，准备在兰州、平番间与敌部分决战，亦乘机占兰州之线死守均较妥当。四方面军如不全部渡河，各方掩护顾此失彼，不但开路、掩护、决战都难完成，甚至根本影响战役计划，望重决速示，万勿坐失良机。

但徐、陈的意见并未被中央军委接受。直到10月29日12时，中央军委根据朱、张、徐、陈的意见，为迅速夺取宁夏起见，同意三十一军立即渡河，在九军、三十军后跟进。三十一军接到渡河命令后，在军长萧克、政治委员周纯全带领下，迅速向河边急进。但彭德怀建议该军留河东作战，待胜利后直由中卫渡河，中央军委又于30日改变命令，要求已经开到河边的三十一军折向麻城堡前进；九军、三十军即在一条山、五佛寺休息待机。当天，南线之敌关麟征师向靖远突进，负责监视靖远守敌及看守船只的五军，无法向打拉池靠拢，遂奉朱、张命令，全部撤至河西的三角城地区，看守船只，休整待命。至此，黄河两岸的红军被敌割断。河东红军向打拉池、海原地区集中，诱敌深入，待机歼敌。河西红军为三十军、九军、五军及四方面军总部共21800人，北进一条山地带，开始了孤军奋战的艰难历程。

方面军西渡黄河的部队面临的主要敌人是马步青和马步芳部。马步青为骑兵第五师师长，盘踞甘肃中部和西部，师部驻凉州，辖有3个骑兵旅和1个步兵旅，另有手枪、工兵、炮兵各1个团。马步芳为新编第二军军长兼第一百师师长，盘踞青海，军部驻西宁，辖有第二九八、二九九、三〇〇等3个步兵旅和1个骑兵旅及炮兵、手枪、宪兵各1个团，另有青海南部警备司令部所属警备第一、二、三等旅，均为骑兵旅。红军渡河前，蒋介石即令马步青所部开向兰州至靖远间黄河西岸，防止红军渡河西进。红军渡河后，蒋介石又令马步芳率部由青海至甘肃西部地区，并于

11月初任命其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统一指挥新编第二军和骑五师。

四方面军3个军刚渡过河即与当面之敌马步青部遭遇。10月27日，三十军于吴家川、尾泉等地，先后击破敌骑第五师马禄第一旅和祁明山第三旅的阻击。接着在九军协同下，向盘踞景泰、一条山之敌骑第五师韩起禄和退守锁罕堡之马禄旅进击。五军则驻靖远以北之三角城，掩护后方。10月30日，方面军总部进驻赵家水。31日，三十军占领一条山西北一个堡内。11月1日，九军进占一条山南之锁罕堡、打拉牌一线，将马禄旅600余人围困于锁罕堡北土围子内。

河西红军脱离河东红军，孤军作战，宁夏战役计划不能按计划进行，使徐向前、陈昌浩十分焦急。河西部队面临着急待解决的困难：第一，部队渡河时，每人只带了三四天的干粮。此地人户稀少，粮缺水咸，没有补充来源，决非大部队久留之地。第二，地形开阔，堡寨稀疏，不便红军集结隐蔽，却利于敌骑兵的运动和突击。红军三面临敌，背靠黄河，如固守待机，势必处于被动挨打、有耗无补、进退无路的地位。第三，如红军单独北进取定远营，通过腾格里大沙漠至少需4天以上的行程，部队缺粮、缺水、缺骆驼，很难完成任务。而且，苏联的军用物资何时到达那里，还是未知数。红军孤军深入该地，取不到援助物资，就有被二马封锁和消灭的危险。第四，据侦察，河东敌人有向宁夏增援企图。如敌人北控宁夏门口石咀子，南扼永宁、中卫，不仅会使红军眼前的战机丧失，也将使今后河东红军渡河活动，受到严重阻碍^①。因此，徐向前、陈昌浩于11月2日致电中革军委：“行动方针请速示，因一条山、五佛寺在地理、生活、敌情各项估计，都不容许我们争取较久时间。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种关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14~515页。

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目前大靖、土门、古浪、凉州甚空虚易袭，不缺粮，人多，均汉人，若不出动，待敌迫近或布妥，在此方面即陷于极大困难之境况中。”^①

当天，朱德、张国焘在关桥堡会见林育英后，给徐、陈复电，内称：“甲、远方货物已准备好了，我们即电中央，转电去问明远方货物何时到达指定地点。乙、你们出宁夏须有三个条件：（1）你们能单独解决马鸿逵、马步青。（2）海原战役的胜利。（3）从一条山到宁夏露营一般地形、天候、敌情条件。丙、我们估计五、九、三十军3个军必能单独解决二马，海原战役也有把握取得胜利。现在你们应加紧筹粮，制冬衣，问明情况等准备工作，在胜利开展后即迅速准备完成新任务。丁、宁夏地区上砦、水沟多，须在战术方面大大注意。”^②

这时，河西红军与敌人的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之中。11月2日，从青海赶来增援之敌马步芳部骑兵两个旅，为了夺回一条山和解救被围之敌，立即由寺儿滩向一条山地区猛进。三十军英勇抵抗，给敌以重大杀伤，将其击退。3日，敌人又纠集3个骑兵旅和两个步兵旅，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发动进攻。红军奋勇搏击，连续打退敌人6次冲锋，多次与敌人展开巷战、肉搏，再次给敌以沉重打击。

被围于锁罕堡之马禄旅600余人，见情势危殆，惧怕被歼。在红军一再争取下，表示愿意接受“联合抗日”的主张，自动退出一条山，并留给红军许多粮食。徐向前、陈昌浩见向敌军进行统一战线教育初见成效，便命三十军对一条山、景泰、五佛寺各点据守堡子之敌军宣传锁罕堡事件，写信联络，本着以下3个条件与之协商：（1）互不侵犯，互不打枪；（2）互派代表协商与订立

^{①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59、860页。

正式停战抗日条约。协商成功后互撤警戒；(3) 进行友谊帮助，同时应正式向马军各军、师、团、营写信进行各个与部分的协商，作到完全与之合作互惠及进一步成立联合抗日协定。立即释放被俘人马官兵，并以特别优待，等。但红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未再收成效。控制甘肃、青海的马家军，视地盘如生命。尤其是马步芳，号称“野马”，性情暴烈、残忍。他一怕红军西进，扼控河西走廊，进攻青海，端掉他的老巢。二怕蒋介石以“剿共”为名，派嫡系部队进入河西，吞并他的地盘。所以，他这次全权指挥甘、青部队后，先后使用对红军作战的兵力有正规军3万余人、民团约10万人，是决心要把红军消灭在甘肃境内。所以统一战线工作对于这个封建军阀来说，等于对牛弹琴。而马步青由于同马步芳有矛盾，常常受制于马步芳，红军就把他作为主要的争取对象，让出锁罕堡的马禄就是马步青的部下。马禄撤走后，马步青还亲临寺儿滩，想和红军秘密谈判，但因为他派出的代表被马步芳部击毙，未能如愿。

11月4日，敌人集中骑兵一个旅连同特务团、反动民团共5000余人，向打拉牌一带红九军阵地猛扑。经过7小时激战，红二十七师将其全部击溃，毙、伤、俘敌官兵500余人，缴炮3门，机枪数挺，并于5日进占镇虏堡。与此同时，敌人对一条山的多次进攻亦被击退，只有在一条山西北一个堡内固守顽抗的敌韩起禄旅一个团未能解决，形成对峙。

11月4日，徐、陈再次致电朱德、张国焘，陈述一条山地区敌我态势，其中称：“我方情况实不允许久控制现地区等待配合右岸行动”，“韩起功旅全部固守一条山寨子，外交无效。马步芳之一、二旅居寺儿滩及通一条山中间，每天以两团来犯一条山阵地以山炮配合。八十八师限于地形接敌太近不便周转兵力灭敌，拟集二十五、二十七、二十八师先灭寺儿滩敌军。现地区粮难、资材缺，敌据堡塞，须分兵围困，而敌骑四处活动，我又不能分兵

行动。如情况不利时唯有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目前战役计划已决定，务请速战，迟则敌齐头难决战。……使宁夏战役更难速完成。”

朱德、张国焘于5日电示徐、陈：“你们之河西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就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敌人可能隔断你们与河左面主力之联络。你们尽可能派一部带电台保持黄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当由三十一、四军负责来接通你们。”“宁夏战役能否实现，决之于明后日之决战，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

根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的指示精神，徐向前、陈昌浩、李特等人于11月6日制定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并电告中央军委。这一计划的主要目的是：集中河西主力，首先消灭平番、大靖间马步芳野外部队，进取大靖、平番、古浪、凉州一带地区，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配合河东部队渡河行动。具体部署是：以三十军为第一纵队，由一条山出动，经永泰或寺儿滩，攻取大靖；以九军为第二纵队，由镇虏堡出动，经松山、干柴洼、红凉山，攻取古浪；以五军为第三纵队，由三角城出动，经吴家川、赵家水、永泰、红水前进，待三十军进据大靖、九军进据古浪后，再经古浪进取凉州。部队出动时间预定在12、13日。为了加强与统一河左岸四方面军部队党政军的领导及保障党的路线的执行，徐向前等人于7日致电中央及军委，建议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和军委西北分会。

11月7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复电指示徐向前：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为迅速执行为好，兵力集结应稍提前；少打消耗战和少围土寨，首先占领有粮和地形扼要之地区，集结最大精锐，

一举而灭马敌。

11月8日，中共中央鉴于河东红军不能遏止南面敌人北进等情况，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了新的作战计划，主要内容如下：

(1) 三个方面军主力，11月份在关桥堡至金积、灵武之间作战，求得在一、二个战役下消灭敌之一部，争取休息与准备，以示我欲渡河，吸引胡敌北进；并使关师进至石咀子，王以哲进到豫旺。

(2) 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第一步占领镇原、西峰、合水、正宁、宁县地域；第二步占领同官、耀州、淳化、中部、宜君、洛川、富县地域；第三步占领号城、宜川、延长地域。以上三个步骤尽可能延长时间，估计可容许活动3个月左右。其任务是扩大苏区、扩大红军、解决给养。

(3) 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在灵武、盐池地区待机，待绥东抗战起后，开始出动。第一步安边地区，设法夺取安边城；第二步横山、榆进地区，以佯攻姿态吸引二高及二十一师向北增援，以便恢复瓦市、延川一带，并吸引神府残敌向西，与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沿岸。于适当时机开始在两延（延长、延川）、清绥（清涧、绥德）、神府（神木、府谷）分三区造船，准备渡河入晋。

(4) 如此时我们与蒋阎之妥协成功，则依协定行动。如此时妥协不成，则实行东征。入晋后如能依照妥协条件参加抗日，则实行抗日。如不能抗日，则第一步占领同蒲铁路作战、扩大红军；第二步如无妥协希望，东进有甚大困难，则出至冀豫晋之交；并应计第三步，出至直鲁豫之交渡黄河；第四步到皖鲁；第五步到豫皖；第六步到鄂豫陕，尔后再转西北，以一年至两年完成之。第二步到第六步之目的在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争取统一战线在全国胜利，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抗日。

(5) 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

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①。

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战略变动，这一变动不仅放弃了宁夏战役计划，而且改变了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整个方针。对于已经渡河的部队来说，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摆在了面前，即河东部队不再过河，已经过河的部队必须独立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不言而喻，徐向前等人顿觉肩上担子沉重了许多。

11月11日，中央及军委正式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并根据徐、陈的提议，同意组成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统一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另外，由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临时改变西路军总指挥部，其组织照旧不变。新组成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有：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以上5人为常委）、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

西路军的建制和装备情况如下：

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卫生部长：苏井观；总部一局局长：郭天民；二局局长：宋侃夫；四局局长：杜义德；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

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辖十三师（师长李连祥，政治委员谢良）、十四师（师长郭锡山，政治委员朱金畅）。共4个团，3000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5发。

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政治委员杨朝礼），二十七师（师长陈家柱、政治委员易汉文）。共6个团，6500人，枪2500支，每枪平均子弹15发。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74～875页。

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治委员郑维山）、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政治委员张文德）。共6个团，7000人，枪3200支，每枪平均子弹25发。

骑兵师：师长董彦俊，政治委员秦贤道。共200人马，枪200支，平均每枪子弹25发。

妇女独立团：团长王全媛，政治委员吴富莲，政治处主任华全双。

回民支队：司令员马良骏（后叛变）。

全军共21800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约占40%左右^①。

二 转战河西走廊

11月的西北高原天寒地冰，凛冽的寒风昼夜不停地刮着，天空和大地灰蒙蒙一片，万物萧疏显得死气沉沉。风沙弥漫中，已与马家军鏖战10余日的河西部队——西路军，正向西急速进发。指战员们衣衫褴褛，有的还穿着单衣，但在“打通国际路线”、“建立河西根据地”等口号的鼓动下，个个精神饱满，信心百倍地踏上了西去的征途。

红军西进的途中，不仅自然条件恶劣，而且不时受到马家军骑兵旅的骚扰，只能边打边走。为了避开敌人的追堵，红军不得不改为夜间行军。然而，两条腿再快也赛不过敌人的马，运动速度上的悬殊，已经使红军处于被动地位。

这时，中央和军委虽然已交给了西路军打通苏联的任务，但对部队的行动方向仍然犹豫不决。因而，11月11日，毛泽东、周

^① 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19～521页。

恩来致电徐、陈，请他们考虑：“（1）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2）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3）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经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讨论，一致认为西路军有把握完成西进新疆的任务。徐向前在发言中列举了西进新疆的好处：可以解决西路军的战略靠背问题；能拿到苏联援助的武器；回过头来再打马家军，易如反掌；对河东红军和友军能起到有力的鼓舞和策应作用，等等。他的意见被与会同志接受，因为河东已被敌人封锁，所以大家权衡利弊，共同认为西进比东返较为有利。1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认为“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办法”。行动计划是：第一步以主力迅速进到凉州地区，以一部尽量控制土门、古浪迟滞南敌，占领凉州地区后击敌。以一军进占永昌、大靖后，第二步进占甘州、肃州，并准备接通新疆、蒙古和远方。现决在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并向中央提出：“对外与远方请中央即具体迅速布置，一切免失时机，最好第一，请国际与我们发生直接关系，并在新、蒙适当地点建立联络站；第二，要求中央与国际迅速多派干部技术人员来此工作；第三，请在华侨青年与新疆之东北义勇军中进行公开工作。”中央复示：同意向凉州前进，新疆接济正准备中。中央书记处于13日致电共产国际：已令西路军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望国际准确无误地准备接济物品。

11月11日，三十军在击退敌人沿途阻挡后进至大靖附近。在大靖与马步青部第五师祁明山旅交战后，打得该敌退守城内不敢出来。三十军遂绕道西进，包围土门子，迫使守敌马步青部骑五师工兵营350人投降，其中200余人参加了红军，其余均释放。三十军接着乘虚西进，以一部围凉州，进占城西四十里铺，并致书

被困凉州的马步青，告诉他红军只是借道，并无攻取凉州之意，切勿派兵拦堵。马步青于是龟缩凉州，持静观态度。三十军继以主力西进，直指永昌。18日，永昌守敌闻风而逃，永昌城不战而下。21日，三十军一部又克山丹。随后，五军进驻山丹，接替了三十军防务。三十军及总指挥部直属队全部集中于永昌至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一线。

九军于11月10日进至干柴洼地区后，以二十七师扼守干柴洼北山阵地阻击尾追之敌，掩护主力向横梁山转进。11日晨，敌骑兵第五师两个旅、第一百师一个旅在反动民团配合下，分东、西、南三面向干柴洼猛扑。红二十七师在打退敌人连续猛攻乘势反击，将敌击退。下午2时许，敌人又向红军阵地轮番冲锋，并以一个团实施迂回。激战至晚，二十七师终于将敌人击溃，并占领干柴洼东南敌人大鱼口阵地。当夜撤出战斗进至横梁山，与军部及二十五师会合。12日，敌骑兵3个旅又尾追而来，经一昼夜激战，敌死伤严重，其中营以下军官即达30余名。13日，九军一部袭占古浪城，守敌逃窜。15日，全军进抵古浪。

至此，红军西进作战虽有伤亡，但数量不大，整个战斗态势还处于我优敌劣的状况。17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表示“我们决以打通远方与争取在甘、凉、肃地区建立根据地之任务”。但同时也对“打通远方”的任务如何继续执行问讯中央：“是否我们控制肃州、甘州在手，由远方负责与我们打通，还是我们主力进行玉门、安西或到匏撮才有办法。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殊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请速详示。”^①当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说：“直接与远方通电无密本，待将来解决，已电远方派人与你们联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7页。

络。”^① 18日，中央又电告徐、陈：“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部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加深军事训练，恢复体力，检查政治工作，教育每个指战员会做群众工作与人民发生良好关系，严整政治纪律，建立会计给养制度，使尔后和远方同志见面时焕然一新。”“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拒毛炳文部。”“肃州到安西有8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间是1500里沙漠地，绝无人房，货物要用汽车送，正办交涉中。”^②

11月中旬，西路军经过激烈战斗，已全部进入河西走廊。而九军所在的古浪，为河西走廊的要冲，地势险要，南北两面临山，东面只有一条“马不并骑，车不并轨”的狭路可向西通行，西面则是一马平川，直通凉州。古浪城垣由于地震被毁，残破不堪。九军于15日进据古浪后，即以二十五师扼守城西南方向，二十七师扼守城东北方向，并重点布在防于南北两面的山头，控制制高点。16日拂晓，敌人集中3个骑兵旅两个步兵团并4个民团，在飞机和大炮掩护下，从西南和东北向古浪城发起了猛烈反攻。九军急促应战，被优势敌人夺去城外制高点，只得压进城内防守。17日，敌人猛攻城垣，并一度由东西两面突入城内。九军与敌人展开激战巷战，几经肉搏，将敌击退，并乘胜追击。不料遭到敌骑野外逆袭，受到很大损失。18日，敌人倾全力攻城。大约在中午12时左右，敌人用大炮轰开城墙一角，步、骑兵乘机突入城内。敌人骑兵挥舞着大刀，在大街上横冲直闯，红军机关人员猝不及防，许多人惨死在敌马刀之下。尤其是供给部的一些女同志，因为手无寸铁，被凶狠残暴的敌人堵在屋子里，统统用马刀砍死。激烈的巷战在进行着。敌人越来越多，已经快涌到军指挥部了，陈海松

^{①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8、889页。

政委高举驳壳枪，大声喊道：“同志们！我们要和敌人血战到底！坚决杀退敌人！”敌人看见陈海松在高喊口号，断定他不是一般人物，十几个人提着马刀，朝他猛扑过来。这时，交通队一排长乔国军一个箭步窜到陈政委面前，大喝一声：“来来来，看老子给你点名！”随着他手中手提式冲锋枪一阵剧烈摆动，围上来的敌人横七竖八全部倒下了。可是乔国军也被敌人一颗子弹击中，不幸牺牲。陈海松政委悲愤地拣起乔国军的冲锋枪，大喊一声：“同志们，冲啊！”率领交通队和机关的同志们一起向敌人反击。^①战斗坚持到傍晚时分，九军伤亡惨重，决定连夜突围转移，向在永昌的三十军靠拢。在三十军二六八团接应下，打退追击之敌，进至四十里铺。

古浪战斗共毙伤敌2 000余人，但九军损失亦达2 000余人。九军军长孙玉清负伤；参谋长陈伯稚及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治委员易汉文以及不少干部，均壮烈牺牲。部队元气大伤。后来王树声谈到这次战斗时说：“从指挥上讲，这仗欠妥当啊！古浪的城墙残破，地势低洼，确实不利防守；可如果把守好城外制高点，先把敌挡住，再在城内做好二道防线，情况就会好多了。而我们偏偏忽视了这些，被敌人抢占了城外的高地。这就好比高山压顶，毫无办法。这个血的教训，应当牢牢记取……”^②

西路军全部进入河西走廊蜂腰部后，面临着新的困难。这一地区东起凉州、西至高台，长达数百里。北面沿龙首山脉的古长外为荒凉的大沙漠，南面为终年积雪海拔四五千米的祁连山，中间宽不及百里，村庄零落，人烟稀少，其中永昌、山丹两县在百余里的狭长地区上，人口仅有11万。大路两旁，尽是荒凉的戈壁滩，极利于敌人的骑兵运动。当地没有党的工作基础，居民回汉

^① 陈宜贵：《古浪激战》，《艰苦的历程》下，第267～268页。

^② 芦笙：《王树声大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出版，第154页。

杂居，加之敌人的反动宣传，群众对红军很不了解。这一带又是马步育的中心地带，无论从地形、民情、敌情，还是从给养等条件来说，都非红军久留之地。

然而，中革军委却于11月19日电示徐、陈：“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面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向凉州、永昌前进之敌，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具体部署在甘州占领后，可以五军在甘、肃两州安西线活动，九、三十两军可在永昌以南地区活动，大大的扩红筹资准备火敌。”“远方对于经哈密接济你方已原则上同意，物资经济均可接济，正设法解决交通运输，拟技术手续，大约以明年开春后可望大批接济，现正急谋小部接济，大的于我占领安西后即可实现。”^① 20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徐、陈：“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西回旋地区。”^②

中央要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等地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导致了徐向前和陈昌浩之间自共事以来第一次争吵，“吵得很凶”。陈昌浩满有把握，劲头十足，认为形势大好，能在永凉建立根据地。徐向前则说：“现在可得好好估计一下形势哩！九军被搞了这一家伙，马家军整天进攻我们，毛炳文部又要西进，形势和过去大不相同，弄得不好，我们还得吃亏。”陈昌浩说：“现在是形势大好，马家军被我们基本击溃，有什么可顾虑的？！”徐向前一听马上火冒三丈，问他：“什么叫‘基本击溃’？基本击溃敌人有个标志，就是我们转入进攻，敌人转入防御。现在恰恰相反，敌人在进攻，我们在防御；敌人是优势，我们是劣势；敌人有后方，有补给，我们没有。你这个结论，根本站不住脚。”现在“形势困

^{①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92、893页。

难，在这里被动挨打，无法周旋，要吃大亏”。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陈昌浩说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徐向前说：“你说能建立根据地就建立吧，给部队作动员，我可以照你的口径去讲，但保留自己的意见。”陈昌浩认为徐向前是“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事后曾找军政委员会的成员做工作，准备召开会议，向徐向前开展斗争。因曾传六等人反对，只好作罢。^①

经过渡河以来的多次激战，西路军的状况已不如前，实力大为减弱：各军子弹平均只3至4排，五军每人只两排，各军机枪子弹甚少，炸弹消耗甚多，存者无几；伤亡共2800人，掉队约600人，干部伤亡大；棉衣缺少1/4，皮衣收集甚少。扩红不到50人。全部人数18425，战斗员占60%。西路军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极为不利：西路军已处河西走廊的蜂腰部，此间地区房屋为堡寨、土围，不便出击与运动战。大路两翼平行路多，便敌迂回，敌以集团骑兵猛犯，白天只能守围寨，如无火力，可被敌攻破，固守则子弹消耗极大。夜出击敌每散逃，不便消灭，行动必多在夜间，异常疲劳。小部不能远出活动，如稍离寨堡，敌骑即乘机袭击。

但为了完成建立永凉根据地的任务，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于22日发出《告指战员书》，号召全军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坚决战胜敌人，为在甘北创造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而斗争。并将部队部署在东起凉州西北之四十里铺、西至甘州附近约300余里的狭窄地带，使兵力无法集中，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马步芳利用红军兵力分散和处境困难的弱点，立即集中兵力赶向永昌地区寻求红军决战。胡宗南之补充旅亦开抵凉州予以支援。敌人除以主力辗转猛攻红军主要据点外，还以骑兵深入红军控制区中心到处袭扰，切断各点之间的联系，限制红军的行动。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25～526页。

11月22日，敌人集中5个团的兵力向四十里铺三十军阵地猛攻。三十军八十八师及八十九师一个团坚守阵地，奋勇抵抗。敌人先以步兵为主力进攻，遭到红军的正面有力抵抗和两侧迂回包剿，敌人进退无路，官兵死伤惨重。之后，敌人又驱动骑兵进攻，一时间，马家军骑兵如潮水般涌了过来，在红军的阻击下，很快又退了回去，然后又接着进攻，整个战场上烟尘滚滚，杀声震天，血肉横飞，尸陈遍野。红军奋战3日，数度与敌肉搏，杀伤敌2400余人，其中大刀砍死者即在700以上，而红军也付出了伤亡2000人的代价，二六三团一个连，全部牺牲。三十军不得不撤出四十里铺，退到永昌东南的八坝。

三十军撤至八坝后，25日，敌人又集中两个旅向八坝进攻。敌先用山炮、迫击炮将红军阵地的围寨、房舍摧毁，然后以骑兵发起猛烈冲锋。激战两日，三十军阵地被敌杀进两层，弹药消耗殆尽，只能用大刀拼杀，最后利用夜间出击，将敌击溃，敌遗尸800余具。

八坝之战硝烟未落，敌人又于12月初催兵马向水磨关迂回。水磨关位于永昌城东20公里，敌人企图占领水磨关，切断永昌、山丹之间的联系，然后实行分割包围，各个击破。三十军八十八师与敌奋战一昼夜，后在八十九师配合下将敌击退，毙伤敌600余人。

八坝、水磨关战斗之后，敌人又以新二军之警备第一旅、第二旅和骑兵旅、第二九八旅各1个团，骑兵第一师第一、二两旅等共约5个旅的兵力，在7个反动民团配合下，猛攻永昌。这次敌人还以宣传攻势相配合，派4架飞机从永昌上空扔下了成捆的传单，上印《悬赏招抚赤匪办法》，内容是：（1）凡我军民擒获匪首徐向前、陈昌浩二逆者，各赏洋10万元，其匪军官兵自行擒获来献者亦同。（2）凡我军民擒获伪军长程世才、董振堂、孙玉清者亦同。（3）凡我军民擒获匪师长以下政工人员者照章给赏，各

自有差，其匪军官兵自行来献者亦同样办法。(4) 凡匪军官兵自行前来投诚者一律优待，送归原籍或酌予工作，绝不杀害一人。(5) 凡匪军官兵无论团体或个人携械来投者均予奖金，并有军政各机关特别保护优待等因^①。敌机散完传单，又开始轰炸红军工事，然后敌人蜂拥而上。三十军一部及总部直属队据城抗击，多次打退敌人的猛攻，杀伤敌2 000余人，击落敌机1架。12月3日，敌人被迫撤退。

与永昌战斗的同时，敌以步、骑兵各1个旅和反动民团两个团，向山丹进攻。当敌刚刚逼进城郊，五军即乘敌立足未稳之机进行夜袭，给进入南关的马扑旅旅部及所属1个团以严重打击。次日，又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并以主力向东北方向的民团出击，将敌击溃。但因追击过远，途中遭敌骑兵逆袭，苦战一场，损失数百人。此后五军即据城固守，终使敌夺取该城的企图未能得逞。

在此期间，徐向前、陈昌浩于11月21日、23日、24日、25日连电中央和红军总部，说明在现地作战不利，西路军处境困难，部队疲劳，弹药、棉衣缺乏，提出“不得已时转到甘州、肃州间作战。国际接济最好先期或按时到达。如取得接济，可以回击甘、凉之敌，更有力配合红军主力行动”。23日，张闻天、毛泽东电示徐、陈：“远方来电，已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你们作战方法应改变一下，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箝制敌之余部……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如此方能解决问题。”“着重在凉州、永昌之间，各个消灭马部，西面仅以五军占领之。”25日，毛泽东又指示徐、陈：“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远方接济，3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

^① 刘秉荣：《西路军魂》，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

面。”28日，毛泽东又电示：“感觉你们部队仍不集中。我的意见，把全部1.8万人集中于四五十里内，进则集中进，退则集中退，打则集中打，不打则已，打则必包围消灭一部。如此打两三次，问题就解决了，教育训练也方便些。”^①

西路军渡河以后，从11月上旬到12月上旬，奋战月余，毙伤敌6000余人，给了马家军以沉重打击。但敌人依仗源源不断的补充，实力及时得以恢复。全军指战员餐风露宿，顽强地与敌人展开搏斗，但由于得不到补充，已由过河时的2.1万余人减至1.5万余人，战斗力大为减弱，无法改变被动局面。

12月6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分析了目前敌我力量的形势和甘北的条件，“主张主力速来，黄河结冰迅速向甘北占、大、凉、民进。主力西进时，主力于宁、卫方面实行取道凉、靖、五段渡河；或另行先移主力于宁夏中卫地区，争取时间过冬，而后或经定远营到民勤。第二着恐失先机，而受限制，当为第一步为好。”同日，中央军委复电指示：“（甲）远方可于二个半月后，将货物运达安西。（乙）你们第一步相机夺取甘州，第二步夺取肃州，并调查肃州至安西道上各天是否便于行军，计算占领甘、肃两州，包括休息补充时间在内共需多少天，并计划西路军全部包括五军在内，在甘州地区集中训练一、二星期，休息体力，恢复力气。（丙）我主力在保卫苏区消灭胡敌任务下，暂不西进。”^②根据中央指示精神，9日，徐、陈致电中央及军委：“我们拟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争取30到40天休息。”同时报告中央：“为着从组织上加强并保障九军，现调树声为九军之军长，太先为主任，聚奎为参谋长，海松（为）政委。”^③

12月4日，蒋介石在西安召集陈诚、卫立煌、朱绍良等大批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99、902、903页。

^{②③}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06、909页。

国民党将领开会，部署对红军的“围剿”，同时，压迫张学良、杨虎城所部开赴陕北“进剿”红军。张学良、杨虎城为了停止内战，逼蒋抗日，于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命令红军南下关中地区，援助友军抵抗亲日派的进攻，以争取国内和平的早日实现。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西路军后，全军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马家军被西安事变闹得张皇失措，暂时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开会讨论了变化的形势，并向中央提出了8项建议，其中有“先速稳定西北抗日根据地，肃清甘、青、宁后方敌对势力，与新疆、蒙古打通，取得国际的物资援助。争取将马鸿逵、马鸿宾调开，由河东红军以一部主力速占宁夏，与甘北打通，并与新疆取得联络。”

12月15日，军委主席团指示徐、陈：“西路军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18日，军委主席团又来电指示：“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逼远方上面，限明年1月夺取甘、肃二州。”“除开远方，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援助你们。”

根据中央军委主席团的指示精神，西路军开始逐渐西移。计划以九军、三十军一举抢占临泽、高台，进取甘、肃二州；五军跟进，直插安西，争取2月中旬接逼新疆。并于12月22日将部队行动计划电告中央军委。

这时，河东形势已有新的变化。何应钦的“讨伐”军已进抵潼关。张学良、杨虎城决心集中兵力，举行西安会战，粉碎亲日派的进攻，并提议红军给予战略上的配合，以河东红军出击胡宗南，巩固西安侧后方的安全，并望西路军派一部力量东出靖远，牵制马家军及毛炳文部，进行策应。中央于是改变了要西路军西移

的决定，拟令部队东返，于22日来电，征询徐、陈意见。

部队改变行动方向，事关重大，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开会讨论这个问题。会上，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东进和西进比较，前者困难更大些。因为马家军的主力集中在东面，西路军东进，势必与敌决战。从山丹、永昌到兰州，近千公里行程，沿途多堡，缺少补给。西路军彩病号又多，约2000名，不便就地安置，带上则更增大行军、作战的困难。因此，东进取胜的把握不大。徐向前同意这个意见，认为红军乘虚西进，把握大，损失小，比东进有利。陈昌浩却主张应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东进兰州附近，取得物资补充，向河东进击。徐向前见如此，提议如实向军委反映情况和看法，但要做好东进的思想准备，如果军委决定东进，则无条件执行。最好请兰州的于学忠派出一部兵力西进，牵制马敌，接应西路军。^①12月2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中央军委，陈述了东进兰州部队的不利条件，建议西路军仍首先按期执行打通远方的任务。但为了牵制二马，要设法在兰、丹线上活动一时。如果军委要西路军必须东移，则服从之。

12月24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陈，谓：“时局在发展中，有改组南京之政府之可能；抗日联军已经组成。红军为第三集团军。……我主力红军并准备出河南，但胡、毛、曾、关准备向固原、平凉进攻，我们以东北军五个师及红军一部固守与箝制其一个月”。“从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利，只要20天至30天内到达静宁、德隆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8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箝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你们在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决定的命令，明天或后天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35页。

电达。”^① 25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军委主席团：“一、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三、为尽量保持我们有生力量，新的战斗，西路军东进前建议由友军方面派兵运送一批弹药到永昌城，同时由兰州友军至少出二三团兵力配合一部炮、骑向古浪出动，配合我们东进，使我们减员甚少。”

当西路军正在秘密调动兵力，准备东进之时，“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12月25日，蒋介石由西安飞抵洛阳。27日，军委主席团电示徐、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据此，西路军又开始执行西进任务。

隆冬时节，滴水成冰。空旷的戈壁滩上，狂风怒吼，飞沙走石。撤出永昌、山丹地区的西路军指战员们，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冒着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艰难地向西进发。

马家军发现红军西进，遂尾追而来。红军指战员不仅要经受饥寒交迫的袭击，还要不时与尾追之敌周旋，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在1936年即将过去的最后一天里，12月31日，五军进入临泽（原抚彝县）县城。接着，由军长董振堂率三十九团、四十五团及特务团4个连和两个骑兵连共3000多人，星夜挺进，直奔高台。于1937年元旦拂晓一举攻克高台，守敌保安队、民团共1400余人全部投降，其中部分接受红军改编。红军缴枪1000余支，并俘虏了在临泽和高台和从永昌、山丹、临泽逃往高台的县政府反动官员多人。随后，九军一部攻甘州未下，进驻临泽东南的沙和堡。总指挥部及三十军离九军不远。总部直属队和五军一部驻临泽县城。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7页。

这一带粮食较多，部队准备略作补充和休整后，继续西进。

1937年1月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报告：“高台以下人粮极丰，以上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如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灭敌不易，驱敌不易。”因而，建议军委：“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物资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

但这时河东形势又紧张起来，蒋介石扣了张学良，调集重兵逼近西安，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1月2日，军委通令各兵团集结待命，准备配合友军作战。5日，军委电令西路军停止西进，电文是：

（甲）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

（乙）全军集结于二、三点，一天左右行程能集中作战，大力训练补充，伺机消灭敌人。

（丙）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

军委主席团的来电，使西路军领导人大惑不解，因为不了解河东局势紧张的内幕，更不明白中央的意图是想让西路军待机策应河东红军的行动。因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于1月6日致电军委主席团，力陈自己的情况、意见和要求：

（一）西路军实力：五军仍四个团，每团约八百人，骑团约百余，内有新兵约一千，九军只三个团，每团约八百余。骑团百五十余。三十军六个团，每团约六百余。

骑师约三百余骑。弹药缺少，刀枪甚缺，此次由永昌行军共减员八百余。

(二) 此地村落尽是堡垒，分兵即不能灭敌，集结则粮易被敌困，攻则伤亡甚大，所以补充训练上事实不易做到。

(三) 近来各方情况此间甚不明，究竟整个战略企图如何，西路军基本任务怎样，据历次来电变更很大，致西路军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并影响到今后行动。

(四) 来电所谓不依靠任何外力是否包含远方与统一战线，究竟前电所称远方货物到达时间是否属实，抗日联军方面目前对二马有无可能争取。

(五) 西路军以现有力量，可以在此争取必要时间准备以全力接近远方。

(六) 负完成任务，但停此太久消耗实力，与全靠自力不能解决二马奠定抗日后方，必须先机或同时完成奠定抗日的任务时，既不能希望任何外力援助，则建议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如何速示。^①

7日，军委主席团复电：

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让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勿西进，暂在原地休整，这是根据你们四日来电所述的情况而指定的。二马根本反对西安事变，希望同二马建立统一战线是不可靠的。远方物资只送至安西，送肃州是不可能的。四军、三十军已集中长安附近，也不可能策应你们。因此，目前你们只能靠自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2页。

已团结奋斗，不要依赖外力，详容另告。

8日，徐、陈去电仍要求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称“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同日，军委主席团接连发出两电，指示西路军“应从依赖本身力量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因为消灭敌人创造根据地，正是接通远方建立抗日后方的实际行动。”“西路军须全部集结临、高地带，执行上述任务，并求休补，现勿分兵去安西。”“趁此时机已占高台、临泽有粮地区集中全力反攻追敌，消灭其一部，即可创肃、甘、安根据地，远方亦自然打通、寒候亦度过、接济亦必到手”。9日，军委主席团又电示：“四军、三十一军路途三四千里，沿途阻塞，何能来援助你们。请勿作此想。你们集中主力坚决歼敌是出路。”“政治团结一致，自信能解决当前困难，才能完成任务。”^①16日，军委主席团又来电：“目前关键在西安，西安局面如果向有利发展，将使二马难以对付西路军。”“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整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并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②

在此期间，敌马步芳、马步青部5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炮兵团、民团等共两万余人，在其前敌总指挥、海南警备第二旅旅长马元海率领下蜂拥追来。敌以一部兵力钳制倪家营子地区西路军主力，而集中力量向西面突出的高台进攻。

1月12日，敌以4个旅另3个团和民团一部，配以飞机大炮，猛攻五军驻地高台县城。五军仅有电台一部，置于住临泽的该军政委黄超处，因此无法与总指挥部取得联系。五军军长董振堂指挥部队依托城外工事进行抵抗，激战数日后，在敌优势兵力压迫

^{①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7、929页。

下全部退入城内坚守。面对敌人的重围，董军长指挥部队堵死城门，只在北城墙下挖几个洞，准备在紧急情况下突围。他带领干部检查每个防御工事、每一个射孔。鼓舞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誓与敌人血战到底。因为子弹不足，他又组织部队集中砖头、石头、木棒等搬到城墙上作武器，以备急用。

1月20日，敌人倾全力攻城，城墙在敌猛烈炮火轰击下，倒的倒，塌的塌，已残破不堪，部队也遭到严重伤亡。但全体指战员依然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敌人每次冲上城头，都被红军用大刀刺刀砍戮下去，不少伤员扭住敌人跳下城墙，与敌同归于尽。在这艰难的时刻，红军收编的民团又在城内叛变，与敌里应外合，打开城门，使敌突入城内。董振堂立即组织部队与敌逐屋逐街展开争夺，子弹、手榴弹打完，便以刺刀、大刀、石头与敌拼刺。刀刃卷缺，石头打尽，便用拳打、口咬。这样苦战10余小时，终因寡不敌众，被敌消灭^①。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以下3000余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突围出来进入南山的部队，亦被反动民团俘获残害。总部获悉五军危急情况后，曾立即派骑兵师前往接应，但途中与敌遭遇，激战中大部损失，师长董彦俊、政委秦贤道均壮烈牺牲。高台战斗，五军的惨剧及骑兵师的损失，使全军上下无不感到悲痛万分。

高台战斗失利以后，五军尚余在临泽的一部，总部任命孙玉清为军长、黄超为政委、谢良为政治部主任、毕占云为参谋长。

敌人在猛攻高台的同时，以5个团另1个营围攻临泽。其一部兵力围攻城外的五军部队一部，主力则向城垣攻击。城内红军，除1个警卫连外均为机关和后勤人员，守备力量异常薄弱。总指挥部命令城内红军坚决守住临泽城，保卫总部，等待三十军增援。驻守临泽城的总部，是西路军全军的生命线，其中有驮着全军经

^① 赵杰：《董军长教我带兵打仗》，《艰苦的历程》下，第241～242页。

费的辎重部队，有全军唯一能造手榴弹和子弹的一个小小兵工厂，有医院，有供给部门……但总指挥部在倪家营子，亦被敌包围，所以临泽城内除一个警卫连有战斗力外，其他都是缺乏战斗经验的干部及妇女、勤杂人员等。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要守住临泽城是非常之难的。

负责指挥整个总部直属机关的是后勤部郑义斋部长，他一面动员全体人员参战，一面委托富有战斗经验的总部四局科长秦基伟担任守城前线指挥。秦基伟回忆说：“我们被敌人一包围，郑部长便命令我负责指挥城内机关部队坚守城墙。他用坚定的口吻嘱咐我说：‘秦基伟同志，我们当前的处境很困难。但是，我们直属机关是全军的首脑，是全军的生命线，就是战到最后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们也要坚决保卫它。’经过研究，我们把所有的人，不分干部战士，不分男女，统一按战斗的需要编成班、排、连。男同志负责坚守城墙，女同志负责做饭、看护伤兵，捡石头当武器。警卫连两个排分别坚守几个容易被敌人突破的城门楼，一个排由我和警卫连长亲自掌握作为机动部队，哪里需要就投到哪里去。

“夜里，西北风像小刀子一样往人们的骨髓里钻……整个临泽城都在沉默中沸腾着。有的人默默地把木棍、竹竿的头削尖；无数的镐头在坚硬的土地上撞击着，闪动着星星火花；女同志把砖头、石块，凡是能打击敌人的东西，都抬到城墙上；兵工厂的二十几个工人，在用木柴、木炭来熔化打土豪缴来的铜器、铜钱，连夜赶制手榴弹；警卫连的战士和一部分机关干部，一遍又一遍地擦枪。虽然很多人的手在挖工事时磨起了一串串血泡，虎口被震出了血；虽然很多女同志压肿了肩膀；虽然很多人在一面工作，一面打瞌睡，甚至累倒，但是没有一个人叫一声苦，没有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岗位。

“第二天拂晓，敌人的攻击便开始了。他们先用山炮拼命地轰

击城墙。烟雾和尘土笼罩着全城，使人睁不开眼。砖头夹杂着炮弹的碎片，雨一样落下来。炮弹的爆炸声，敌人人马的嘶叫声，震荡着整个临泽城。我们守卫在城墙上的干部和战士们，有的紧握着步枪，有的紧握着手枪，没有枪的便紧握着手榴弹、砖头、石块和自制的长矛，等待着敌人步兵的接近。负伤的同志倒下了，立刻就有人站到他的位置上。愤怒的火焰在每个人心中炽烈地燃烧着。

“几分钟后，敌人把城墙的胸墙轰开了一个口子，接着便抬着梯子，挥舞着马刀，冲呀、杀呀喊叫着，成营成团地向城墙拥来。我们集中起所有的步枪、手枪一齐向敌人射击，手榴弹、石头、砖头也紧跟着压头盖脑地向敌人砸去。前面的敌人被打倒了，后面的敌人又抬起了梯子拥上来；但是立刻又被乱石乱砖砸回去。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乱石、砖头和敌人的尸体已把城外的地皮盖满了。随着时间的延长，我们的伤亡也在逐渐增加，我们的手榴弹、砖头、石块也在减少。但是，前面的同志倒下了，立刻就有人补上来；砖头石块打光了，立刻就有人抬上来。敌人的督战队在城外骑着马，奔跑着，挥舞着马刀，鬼哭狼嚎般地叫骂着；敌人的伤兵，被践踏者，被飞石击打着，惨叫着。战斗继续了几个小时后，住在城外掩护我们的部队，打退了敌人向他们的进攻之后，又向进攻我们的敌人出击了。敌人的督战队，有的被从马上打下来，有的马不听控制四处奔跑着，他们首先惊慌了。紧接着，敌人的攻城部队也慌乱了，他们互相践踏者、拥挤着，溃退了。”^①

就这样，经过3昼夜的苦战，才与城外五军部队一部一起突出重围。不料，冲出重围的人在途中又中了敌人的埋伏，经过十几分钟的混战，最后才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了敌人的包围。经过

^① 秦基伟：《苦战临泽》，《红旗飘飘》选编本第2集，第308～311页。

一天的周旋和战斗，终于与三十军会合了。

三 血战倪家营子

1937年1月21日，西路军决定东返。当日1时电告军委主席团：“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10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机集中。”毛泽东接电后，于同日凌晨2时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脚，西进有18站，二马步骑又向西堵击，20日晨攻破高台，董振堂同志牺牲，五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①

1月23日，西路军指挥部率三十军全部、九军1个团到达西洞堡，王树声率九军则进至龙首堡，准备稍加休整，争取在现地和行进路上乘机歼敌，以利东进。并电告中央军委：“现在全军发扬士气，团结杀敌，克服困难，学习血的教训，虽受部分挫折，但所有指战员均极团结，照军委给予任务斗争到底。”24日，徐、陈电告军委，西路军全部人数1.4万余，内战斗部队不及2/5，提出“我方基本上坚决执行东进计划，但因情况变化，可能折转西进或取民勤抢占定远营，或绕道大通再到西宁或平番”。同日，军委主席团指示徐、陈：“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当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过河。”25日，又指示：“在骑兵追堵下，欲图急行避战达到东进，危险较大，集结全军，切忌分散，用坚决的战斗，来完成东进。”

马步芳、马步青发现红军收缩兵力，企图东进，便火速调兵，

^① 《中国工农红国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30页。

倾巢出犯。1月27日，敌马元海令其第一百师手枪团团长马玉龙督率该团及青海省宪兵团向西洞堡进攻，红三十军当即进行反击，击溃敌手枪团，将敌宪兵团全部歼灭，缴枪1200余支。但因敌集中防堵，不能东进。为了调动和寻机歼灭敌人，西路军于1月28日晚折回临泽东南，进驻倪家营子。

倪家营子是一个人口集中、粮米较丰的大自然村，南北长八九里，东西宽三四里，全营子共有43个屯庄，星罗棋布，坐落在祁连山脚下的戈壁滩上。每个屯庄由一户或几户人家组成，都筑有黄土围墙，高达三四米，相当坚固。大户人家的围墙修得方方正正，并有碉堡和望楼。倪家营子又分上、下营子，地势是南高北低。根据地形条件，西路军一部驻扎在下营子地区20多个屯庄里。以三十军扼守西南方向，九军扼守东北方向，两军前沿阵地相接，纵深梯次配置，构成一个椭圆形的防御圈环，凭垒固守。

红军改东进为西返，进驻倪家营子，使马步芳大惑不解，无法判断红军的企图和前进方向。1月29日，马元海电告马步芳红军在倪家营子驻所以及部队番号等，马步芳肯定红军已由公路线祁连南山地区活动。他认为在肃州沙漠地带围困红军，收效尚难。今既转入山区，红军无处补给，又气候严寒，行动不便，必使红军陷入绝境。于是马步芳公开叫嚣：“红军进入山林，不易久居，我以骑兵分头夹击，最后胜利可期。”即令马元海指挥围攻，将倪家营子东西两面各堡寨40余处占据，以两个民团绕于东；马步銮团、刘呈德团和1个民团绕于南；韩起功旅绕于西北；马彪旅、马朴旅绕于东北，将倪家营子各屯庄内的红军层层包围。1月31日和2月1日，敌人即在炮火掩护下，向西路军阵地连续进攻，当即被西路军击退，毙、伤敌600余人，西路军亦伤亡400人。

2月1日午后，西路军送函给马元海，内容是：“本党已与中国共产党五届三中全会去电谓：西安问题和平解决，全国庆幸，今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

接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挥，爰派代表与贵军商洽一切，先此函闻。”马元海即转电马步芳，马步芳复电称：“红军此时已至山穷水尽，设此诡计，缓我进攻，仍即聚集重兵，勿稍放松，以免失机。”并将来往电文，在《青海日报》公布。

2月1日20时，徐、陈致电军委：“我们决集力击敌，争取时间体整，敌力求与我速战”，“但我人、物补充困难，故感灭敌困难。”

从此，敌我之间在倪家营子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攻防战。敌人每次进攻都先以大炮轰击，而后组织大量步骑兵发起冲锋。许多前沿屯庄的寨墙被轰塌，房屋均被焚毁。但红军战士仍坚持在断垣残壁之间与敌苦战。由于子弹极端缺乏，每次敌人冲到阵地前沿时，部队就突然冲出围子，进行反击，肉搏格斗，杀退敌人后又迅速回防。敌人屡次进攻被打得头破血流后，又采取迂回进攻的战术。敌人以一部从正面进攻，另集中大量兵力猛攻红军侧翼，并曾两度攻入倪家营子村内。第一次三十军的二六五团和二六八团进行反攻，将敌人打出村外，收复了原来的阵地。第二次敌人来势更凶，三十军八十八师一个团和八十九师两个团组成几个梯队，向攻入村内的敌人反击，一寸土一寸土地争夺，将敌人打退。在这些残酷的战斗中，战士们只能用大刀、长矛、木棍进行拼杀。每次战斗，都杀得尸横遍野。每天都要打到天黑，直到红军恢复了阵地，才算告一段落。

入夜，敌人龟缩回去了，红军指战员却要紧张地准备明天的战斗，还要派出小型袭击队，出屯去扰袭敌人。夜袭敌人干得最出色的是有“夜老虎”之称的八十八师二六五团，其中最令人称道的是夜袭雷家屯。

一天夜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二六五团的团部里却在紧张地准备着一次夜袭。二十几个战士穿着软鞋和黑色衣裳，浑身束扎得干净利落。团长邹丰明低声问道：“准备好了吗？”“好了！”

战士们低声说。“跳跳我看看。”邹团长让战士们尽量在地上跑，以便检查是否有没有扎紧的地方。这时黄英祥政委向战士们布置任务：“几方面的情报都证明了这一点：马匪有二十车军火放在雷家屯庄，放了一个排在那里守卫。今天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是：给它连人带军火全部搞掉！同志们都是最有夜袭经验的，但是不能大意，雷家屯庄在敌军后方。完成任务要快，要肃静，不要恋战。炸掉这20车军火，就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削弱马匪的火力，就可以使许许多多的同志和老乡避免伤亡。任务是光荣的。祝同志们胜利！”

战士们手提马枪或花口冲锋枪，悄悄地离开驻地，消失在黑暗中了。他们绕过匪军的警戒线，绕过哨兵，像一把锋利的匕首，无声地直插敌人的心脏。

雷家屯庄是一座地主的宅子，四四方方的围墙有5米多高。战士们摸到大门和圈子形成的拐角处，搭起了人梯，像送罗汉似地一层层垒上去。爬在最上面的人上了围墙后，放下绳索，下面的人便抓着绳索，轻捷地攀登而上。

进入院子之后，战士们分成小组，同时行动。有的到围墙四角的更楼里摸哨，有的去收拾睡在房里的一排敌兵，有的去点火，有的去锯大门，准备撤出战斗。一切都在悄无声息地进行之中。突然，击毙敌人的冲锋枪、手榴弹声和弹药的爆炸声同时响起，睡梦中的敌人还没来得及睁眼就成了死鬼。战士们见任务完成，竹哨一吹，全部从大门撤了出去。

倪家营子仍在敌军的包围之中。气温已降到零下20多摄氏度，天空整天堆积着铅块似的阴云，有时随着呼啸的寒风，飘下几片干燥的雪花。战士们大部分穿的还是单衣，有的弄到一块毡片，便在中问挖个洞，套在脖子上，在腰间用草绳一系，就算是一件御寒的“马甲”。脚上大都没有鞋子，有的裹着破布，有的包

着烂毡，如果在战斗中缴获到一件敌军的衣服，那便是最大的幸运了。三十军驻的屯子里的粮食和弹药一天天在减少，然而最缺的还是水。当地农民是喝夏天在水塘里积蓄下的雨水，但是，突然住下近万的红军，水塘的水不久就喝干了。屯子里有一口几丈深的水井，井底才有盆口大的一汪泥汤，战士们轮流坐着辘辘下到井里，用铁勺往桶里舀，半天上来一桶，还带着半桶泥。最受苦的还是伤员。在敌人的炮火袭击下，房屋不断倒塌，健康的人可以在战壕里、破房桩子里熬过一个个寒冷的夜晚，已经大量失血的重伤员，是难以支持的，即使住进房子里，没有煤，没有柴，房里也是滴水成冰。特别困难的是没有医疗条件，食盐也很少，有时甚至连块裹伤的布条也找不到。因此战士们说：宁愿打死，不愿负伤。^①

敌人有补充，有后备力量，虽然死伤不少，但攻势毫无减弱，而是不断增强。红军是孤军奋战，有耗无补，虽然指战员们攻如猛虎，守如泰山，以一当十，人自为战，但处境越来越艰险。到2月中旬，西路军总计毙、伤敌近万人，但自身伤亡也很大，全部兵力已不足万人。

在此期间，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于2月7日针对西路军的行动方针，曾向军委作出如下分析和建议：“（1）西路军单独在高台、洪水行动一到两个月，争取灭敌一部，但欲迅速与彻底消灭属不易，这不能不使西进困难。（2）东进在目前无敌有利条件下较易做到，如果延搁根本大计，滋长二马之力，尔后击之更加不易。（3）我处倪家营子到洪水约190里，沿途粮房便利。洪水到北大通260里，并须3天露营。北大通粮多河大，正月底开冰，220里到西宁。这一段路不便大队齐进，非万分必要时，不采用。西路

^① 李天焕：《气壮山河——红西路军远征记》，《红旗飘飘》选编本第2集，第323～324页。

军暂时在原地行动，重要是灭敌西进。由抗日方面即兰州于学忠给敌以威胁，以分散敌人兵力，使我军更容易击之。或者在可能条件下，以四军、三十一军西进夹击，加速歼灭该敌，否则不但对西路军，而且对整个抗日局面均有妨碍。”^①13日，又致电军委，认为“四军、三十一军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俟天气稍缓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拼战而不能根本消灭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也。”并表示：“西路军全体指战员苦心孤诣，消灭敌人的决心是没有什么时候动摇的，但战胜敌人仍须决定于敌我之武装力量，主力如不够时，必须另想办法。”^②

倪家营子激烈的战斗在2月13日突然沉寂下来。14日，马元海电告马步芳：“倪家营子红军避不应战，已无西上新疆能力，发现有东返模样。”马步芳以红军行将东下，急电蒋介石请示，蒋于15日复电：“据情报确有此企图，已分令防范。”马步芳当日下令：“四面协力急攻，不得任其东返。”命令马元海、马彪、马朴、韩起功共同行动。

2月15日，敌人又开始全面进攻，战斗更趋激烈，聚集在倪家营子周围的敌军和民团达7.3万余人。红军虽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伤亡也很惨重。

2月17日，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主席团联名电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同意西路军春暖前在临泽一带寻机破敌，争取春暖后向肃州、安西行动。并指出：“依据你们自己与当前敌人力量对比的情况，依据国内与西北的环境，如果蒋介石不能或不愿停止二马向你们进攻，又不愿主力红军派兵向你们增援，则你们唯一的方针，是调动敌人寻求机会逐渐削弱之与各个击破之，以便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中央不同意西路军东出青海大通的意见，并问：“你

^{①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2、943页。

们春暖后向大通行动的提议战略目的何在呢？是把向大通当作调动敌人回守青海，以便自己尔后仍然回到甘州、肃州区域，并向安西呢？还是想占领青海呢？”“你们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上面提出的问题，请你们明确答复我们。”^①

从16日起，敌马元海开始拼凑一切力量，发动总进犯。18日，倪家营子阵地一个屯庄被敌攻破。情况十分危急，指战员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以一当百，凛然不屈，顽强拼搏，手中的武器没有了，就赤手空拳，与敌人扭在一起，咬掉敌人的耳朵，拔掉敌人的胡子，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但终因寡不敌众，红军的阵地在被敌人一点点突破。2月21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突围东返。当日晚，西路军突围出倪家营子，转移到威敌堡一带。不料又遭到敌人的堵截。这时，陈昌浩主张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徐向前听后大吃一惊，说：“昌浩同志，你还有什么力量回去建立根据地嘛！我们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回去不是自寻灭亡吗？”但陈昌浩因为突围东进没有中央的命令，部队又受阻，坚持要返回倪家营子。军政委员会上，陈昌浩说了些“形势大好”、“打回倪家营子”、“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反对右倾逃跑”之类的话，徐向前沉默着一言不发。^②

程世才回忆说：“这次会议原先也让我参加的。我去迟了，一进总部驻的院子，就听见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正在大声地讲话：‘……主力，装备好，战斗力强，被我们敲掉了，这一仗打得好，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目前敌我力量已经起了变化，敌人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5页。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45页。

的锐气被挫伤了。西进对我有利，我们要重回到倪家营子去，占领甘北。我们要……’这些话像一瓢冷水泼到我的身上，禁不住打了一个冷颤。我刚走到会议室门口，军政委员们便纷纷离座往外走了。‘世才同志，你来啦！坐下谈。’陈昌浩主席笑着说，‘你们打得好，消灭了马步青的主力宪兵团。我们要继续向西打……’不用再听，我就知道底下的话是什么。我有心要说几句，又一想，既然军政委员会已经作出决议，我再说还能有什么作用。等他讲完话，我就告辞了。在回来的路上，我骑着马，想起了这几个月发生的一些情况，心里不觉有些激动，脑子乱的像马鬃，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①

同日，中央和军委向西路军发来了一封鼓舞士气的电报：

甲、对于你们艰苦卓绝的奋斗，我们是完全了解的，我们无时无刻不想尽方法援助你们，但当援助还不能立即成为有效的事实时，总是鼓励你们，用自力解决难局。

乙、望告全体指战员，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全党和全体红军誓为你们的后盾。

丙、二马现在若干，二马位置及损失和防线情况，你们位置及行动方向与计划，即告。

就这样，西路军于2月22日拂晓又回到了倪家营子。被马家军残酷地蹂躏过的倪家营子，已人烟灭绝，房倒屋塌，满目凄凉，面目全非。敌人的包围更加紧缩，进攻路数也变化多样，梯队重叠，步步推进。而西路军的境况却更加困难了。22日当天，敌人即从正面攻陷屯庄数处，两侧及后面进犯的部队和民团，也在激

^① 程世才：《血战“河西走廊”》，《星火燎原》选编之三，第427～428页。

战中攻陷数处。23日，西路军西边的一个大屯庄被敌包围，并于当夜发起两次进攻。但西路军顽强地与敌人拼搏着，尽量坚守阵地。24日至25日，双方仍在激战中。徐、陈于24日致电中央军委：“敌骑日夜接近，步、骑、炮集中日夜交战，西路军不战胜此敌，必有极大牺牲。西进不可能时，但东进亦不可能。我们虽拼战到一人一弹为止，但此前途危险极大，恐全军牺牲，不但毫无代价，且壮大敌人马之长久，整个敌重威风，影响中国红军前途，造成将来敌再来，此地困难，究竟战略后方是否此地，究竟战详情前途是否存在，如果甘北必须占领，战争前途不免，即望实现此议，不然我们只有抱全部牺牲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而已。”并请求军委：“欲战胜此敌，只要8个足团，一两千骑兵，带足较强火力及山炮迫击炮一部即可，最好能速抽出这样兵力过河，以归还建制名义向凉州进攻，我们适时夹击，可彻底消灭此敌，夺取甘北，奠定抗日后方，接通远方，实现根本大计，无论对西安之和平或战争计，无论对中国红军及西路军计，此为上策，望军委考虑希予采纳。”^①

倪家营子在危急之中。空前的恶战又展开了。敌集中所有兵力从下营子西面和左右猛攻，将西路军守备部队包围数层，一直冲到纵深处攻击西路军后方部队，切断了与前沿阵地的联系。红军几次反攻，都未将敌人打退。面临着被敌人分割包围的危险。

时任三十军军长的程世才回忆：

下午，上级命令我立即到总指挥部去接受任务。

总指挥部驻在刘家屯庄。在一个低矮的北屋里，并排放着两张桌子。徐向前同志伏在桌子上看地图，因为室内光线不好，他的鼻子几乎挨上了桌面。像往常一样，他安详、镇定地工作着，激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9页。

烈的枪声和不断爆炸的炮弹声对他似乎没有丝毫影响。

徐总指挥慢慢地抬起头来，放下红蓝铅笔，理一理腰间又细又紧的小皮带没有说话，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凝视着我，在这严峻的目光里，含着多少珍贵的语言啊！下级总是熟悉老上级的脾气的。徐总指挥正直、质朴、谦虚，就是和我们作下级的讲话都是用商量的口吻。可是今天，他一度沉默以后，扬起微微下垂的眉毛，用不容置疑的口气，扼要、透彻地说：

“敌人是优势，我是劣势，如果今天不把敌人打退，就有被消灭的危险。世才同志，我派你率领部队立即出击！九军的一个团附属你指挥。”

这是命令，每一个字都像一根针似的钉在我的心里。

……

我抓紧时机组织和命令二六八团和二六五团一部由左侧，八十九师的两个团由正面同时反攻，九军的一个团作为预备队（后来也用上去了）。各团的炊事员、饲养员都充当了战斗兵。我们就是这样一当十、十当百地与敌人战斗。

在下营子的敌人又排山倒海地扑来了，我们用来隐蔽身体的断垣残壁只有二三尺高，敌人的枪弹打得这些矮墙上的土块四处飞溅。战士们谁也不打枪，因为每人手里的子弹顶多也不过三两排了，当敌人“呜呀呀”的喊着冲上来，离我们只有二三十米的时候，手榴弹像冰雹似的一齐扔过去。我身旁有一个机枪手，他看见敌人冲上来，不顾隐蔽，伸出半截身子转动着枪口连放。把敌人打退下去以后，他用袖子抹一下脸上的汗滴，一歪身子就睡着了。连续的恶战，战士们疲劳到了顶点。

冲锋号一响，战士们瞪圆充满血丝的眼睛就往前冲。原野上红旗翻滚。旗手倒下了，后边的人又迅速上前把红旗高高举起来。机关枪开了锅似的嘟嘟叫，手榴弹的硝烟弥漫天空。轻机关枪射手们，把背带挎在脖子上，平端着机关枪，和步枪手们一起冲过

去。谁都争先恐后，谁都想多杀死几个敌人。敌人欺侮我军人少，在督战队的手枪逼使下，举着黄旗和镶边的白旗迎头撞来。两军混战在一起。英勇的红军战士们把刺刀插弯了，用火刀砍，大刀砍缺刃了，用枪托打，用石头砸，用牙咬。拿起什么来就用什么打。夺回一块阵地，敌人反冲过来又失掉，就再次冲上去夺回来。当我军受挫的时候，身负重伤的同志爬在前边掩护，有两个双腿炸断的战士，打完子弹，便把步枪向后一扔交给别人，他们宁死也不愿丢失武器。还有一个伤员拉响了揣在怀里的手榴弹和冲来的敌人同归于尽了。

这时候是人人在指挥，人人在战斗。邹丰明团长提一口大刀，背后跟一群战士左冲右杀，冲到哪里，哪里的敌人就往回逃窜。正杀的痛快时，背后拥来一群敌人，开了枪，邹团长身子一歪倒下了，当敌人赶到他跟前时，他跳起来，抡动大刀又杀起来。许多敌人的脑袋像落了蒂的西瓜从肩头上滚落下去。

一片土地一片血，一个战上一团火。勇士们只有一个念头：前进！前进！夺回阵地！

一天中，同敌人反复争夺肉搏了5次，夺到两杆黄旗，砍死敌人800多名，夺回了主要的阵地。为了保存力量，我军停止反击，又成为短距离的对峙局面了。

二次回到倪家营子来，血战了7个昼夜，几乎到弹尽粮绝的时候了，特别是没有水喝，把米袋里唯一的一点米倒出来，没水煮，只好上锅炒炒吃。我们没有轮换使用兵力，战士们昼夜不眠，有的人打着仗就睡着了。不添油的灯是会灭的，再顽强的生命力，得不到一点养息，也不能永远支持。西路军面临的情况已经严重到了极点，已到非突围不可的时候了。^①

2月26日，军委主席团电西路军：“甲、固守50天。乙，我

^① 程世才：《血战“河西走廊”》，《星火燎原》选编之三，第430～432页。

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① 27日，军委主席团决定由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及其骑一团组成增援军（援西军），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林育英）为政委，左权为参谋长，刘晓为政治部主任，即日开始准备训练。同时电告周恩来并彭德怀、任弼时：“甲、西路军情况万分紧张，他们东进西进都成为不可能，有被消灭危险。乙、对两马不但是10万就是20万和更多些都可以，而且必需。丙、此事需以最快速度为妥，最好在20天内。丁、条件：西路军过黄河右岸来请两马不要阻拦和恶意追击，如果两马同意西路军西进，则西路军可停肃州以西，将来并不东犯。戊、须对两马晓喻和平大义，告以与我们讲和对他们将来有莫大利益。”^②

西路军在倪家营子血战到2月27日晚，已伤敌2500余人，敌骑兵第二路总指挥、旅长马朴，团长马占成、马得胜被击伤，敌循化上四工民团司令韩忠良、团长马亚子被击毙。但西路军伤亡亦很严重，被迫于当晚撤出倪家营子，转移到威城堡以南的三道流沟一带。

四 兵败祁连山

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出来，来到威城堡以南的三道流沟。这是一个东西长、南北短的村子，南面是祁连山，其余三面是沙漠和戈壁。有三道小河从村子里穿过，把村子隔成几节，分别叫东流沟、西流沟和南流沟。

敌人像乌云似地跟在西路军后面。尽管指战员们都已疲劳到了极点，但是谁都不能休息，一到达驻地，水也没来得及喝一口，就忙着挖枪眼、筑工事、砍鹿砦，准备迎击敌人。启明星刚刚消

^{①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50、953页。

失，戈壁滩上的骆驼刺、紫果子刺和芨芨菜还顶着满头白霜，灰蒙蒙的地平线上便忽然扬起了飞尘，便看到马匪骑兵的身影，匪徒们像饿狼似地赶来了。

马匪骑兵接近由三十军防守的南流沟后，便下了马，把沿途抢来的羊和砍来的牛腿集中在一起，然后徒步向前冲锋。机关枪风暴般地从戈壁滩上扫来，敌兵喊着杀声，首先冲击八十八师阵地。

师长熊厚发扎一根宽皮带，上面插一只蓝色的盒子枪，他的警卫员握着一口寒光闪闪的雁翎刀，站在他的背后。他像往常一样，亲临第一线指挥战斗。敌人在机枪火力掩护下越冲越近，当进入红军有效射程以内的时候，熊师长喊声：“打！”红军的机枪、步枪便一齐开火，前面的匪徒纷纷栽倒，后面的转头溃退下去。

但敌军越聚越多，站在高处可以看到，戈壁滩上的敌人稠密得像蚂蚁，无数的黄旗、白旗在烟雾里摇摆。中午，敌人开始了炮轰，炮弹带着啸声不断飞来，落在村子里，炸得烟火弥漫，尘土飞扬。之后，敌人组成密集的队形，举着旗子，喊叫着冲上来。熊厚发师长指挥部队沉着射击，给了敌人以重大的杀伤。但敌人像海潮似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敌人快接近村沿的时候，熊师长命令打手榴弹。一阵手榴弹像雨点似地甩向敌人，硝烟弥漫了战场，敌人的队形也乱作一团。熊师长从警卫员手中接过雁翎刀一举，喊道：“同志们，冲啊！”便第一个跳出堑壕。战士们紧跟着师长，冲进敌人群中，一时刀光闪烁，杀声盈野，战士们以一当十，厮杀了十几分钟，才将敌人杀退。

夜间，敌人在野外沙滩上用箱柜等构筑了层层工事，企图将西路围困在三道流沟，并一举歼灭。

次日，敌人又开始了攻击。西路军中只有三十军尚有战斗力，而八十八师又是三十军的主力，因此，师长熊厚发又是整整一天在前沿指挥战斗。这一天，虽然敌人遭受了大量伤亡，没有攻进

村来，但是围墙已被打得残缺不全，而且已将红军切成了两截。政治委员李先念和军长程世才被分割在两簇围子里，只有一条埋在地下的电话线可以联络，形势对西路军更加不利。

八十八师二六八团守着一条河东岸的两座小围子，这是一个必须固守的要点。傍晚，敌人朝二六八团驻地轰了一阵大炮之后，便以三四个旅的兵力冲过来。这时，二六八团的小围子已倒塌了很长一段，兵力消耗也很大。如果这两座小围子被敌人占领，红军就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在茫茫的暮色中，敌人沿着干涸的河床，借着河床的隐蔽，一步步向前推进。

二六八团的围子外边几十米的地方，有一座独屋，那里驻有红军一个班。敌人攻上来后，全班战士奋勇抵抗，最后全部牺牲。敌人占领了独屋，手榴弹便直接投到了二六八团的驻地。这时二六八团的全体官兵，都紧握着大刀，准备和敌人决一死战。

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熊厚发师长带着几个警卫员来到。

“首长，到后面去吧，这里太危险。”二六八团团长抖掉满身的泥土，恳求首长。

“不危险，我也就不来了。”熊厚发靠在一个围墙缺口上，不动声色地观察敌情。子弹在他的面前打起一排排尘土。他看了一会，坚决地说：“把那个独屋夺回来！”

熊厚发命令二六八团集中了几挺轻机枪，秘密地摆在一个缺口的两旁，又挑选了十几名精壮的战士，配备了较多的子弹，隐蔽在缺口附近。这时，大量的敌人正沿河向独屋运动。熊厚发见战机已到，命令开火。几挺机枪猛烈射击，前进中的敌人被压在河床里。缺口上的战士甩了一排手榴弹，便举着战刀，冲向独屋。屋里的几十个敌人虽然拼命顽抗，但战士们迅速逼近枪眼，塞进了几颗手榴弹，敌人便全部被消灭了。

拿下独屋之后，红军对河床构成交叉火力的封锁，敌人的进攻被迫停止下来，他们便把附近老乡的箱子、柜子里装上沙土，垒

起一座座掩体，与红军互相对峙着。

熊厚发登上围墙，观察敌情。围墙角上有一座残破的更楼，两个枪眼对着敌人。他走过去，抓起一把机枪就向敌人扫射。敌人的机枪也疯狂地向更楼还击。打了一阵，他刚撂下机枪，一个战士便被打倒了。更楼的土坯被打得纷纷脱落。忽然，一颗子弹从枪眼里打进来，熊厚发猛然一侧身子，一股鲜血窜得老远。他的左臂被打折了。

军首长催促他赶快下围子，包扎起来休息。但他一手抓着鲜血淋漓的衣袖，咬牙切齿地瞪着敌人说：“不要紧，手打断了，我还有嘴和腿，一样指挥作战！”经过再三督促，他才下去包扎了伤口，但说什么也不休息。

夜间，战斗仍在继续，四面响着密集的枪声。熊厚发左臂吊在脖子上，右手提着驳壳枪，仍在前沿阵地指挥战斗。他的顽强精神给了战士们很大的鼓舞。许多伤员又拿起武器，爬上了战斗岗位，许多身负重伤的战士，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都没有呻吟一声。^①

3月10日，徐、陈电告中革军委：“现已无粮，仍战中。附近地区均无粮缺水。”西路军坚持到了3月11日夜，不得不向南突围转向祁连山区。

3月12日，西路军来到祁连山边的梨园口，准备向山里转移。梨园口是人山的口子，三面环山，中间有个村子，称梨园堡。总部刚进驻梨园堡，敌人的骑兵即随踪而来。祁连山的山头，一般坡度不大，敌人的战马一个冲锋就能跑上山顶，上山下山，如履平地。

担任西路军后卫的九军，为了掩护三十军和总部，首先抢占

^① 李天焕：《气壮山河——红西路军远征记》，《红旗飘飘》选编本第2集，第335～339页。

了一侧的山头作为依托。待三十军和总部刚到梨园口东侧时，敌人的骑兵就穿插过来，切断了九军的退路，并开始对九军形成包围之势。九军政委陈海松命令陈宜贵带领军部机关向山上转移，自己则亲自带领两个团约千余人的部队，抗击敌人的进攻。三十军一个营和骑兵师全力以赴回援九军，但敌人已经集中10来个旅，把九军占领的山头包围得水泄不通。敌人步、骑并用，轮番进攻。但九军在陈海松指挥下，沉着顽强地抗击着敌人。因为子弹非常缺乏，陈海松嘱咐大家要节省子弹，不要放空枪，要保证每一颗子弹都打中一个敌人。战士们英勇拼杀，视死如归。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捅，刺刀捅弯了就用大刀砍，石头砸……杀得敌人满山遍野都是尸首。直到上午10时左右，陈海松仍和十几名警卫员坚守在制高点上，九军的其他战士和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七十三团、八十一团的团长和政委都已经相继牺牲了。

阵地上只剩下陈海松和十几名警卫员了，敌人又像疯狗一样涌了上来。敌人看见陈海松身边的战士都用快慢盒子枪，断定他不是一般干部，想抓活的，结果只是留下了一具又一具的尸体。敌人见活捉无望，便集中火力一齐向陈海松射击……他身上多处中弹，斜倒在地上，殷红的鲜血染红了沙石。交通队程指导员把陈海松抱在怀里，悲痛地呼唤着：“政委，你醒醒！”陈海松吃力地睁开眼睛，艰难地说：“你们……不要管我了，都……突围……去吧！政委，你……不要说了。”程指导员泪流满面，哽咽着说：“要死……我们和你……死在一起！”……

就这样，九军政委陈海松和九军忠勇的将士们，以气撼山岳的英雄气概，血洒疆场，与阵地共存亡。

九军失利以后，敌人又倾全力压向三十军。这时，三十军每团还有二三百人，守着梨园堡东面的一条干涸的河床，奋勇阻击敌人的骑兵，掩护总部机关和伤病员转移。三十军指战员前仆后

继，顽强与敌搏击，梨园口内，战马嘶鸣，白刃交加，血肉横飞，战况极为惨烈，二六四团全部拼光，二六三团也大部损失。晚上，总部决定继续往深山转移，目的地是40公里以外的康隆寺。

越往南走山越高，天气也越冷，西路军战士忍饥挨饿，沿着陡峭崎岖的山路向深山走去。

3月12日凌晨1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军委：“现全军不足5团，在野外老林中食骡马续死战。”“现百分之七十系彩病员，无日夜不战，弹药几尽，疲乏大过，挖堡寨不易，现全军决心斗待援，希望速配合反攻。”

部队刚进到康隆寺不久，敌人的追兵又至。担任掩护的二六五团和二六七团，与敌人血战一场，又遭重大损失。二六五团政委黄英祥在指挥战斗的时候光荣牺牲。

部队从康隆寺转移的那天晚上，西路军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接到去石窝子开会的通知，他把部里分开保管的黄金、银元收集起来，包成一包，叫妻子杨文局用针线缝牢，准备随身带到总指挥部，给即将返回延安的领导同志们作路费。天亮了，他带了10余名警卫员，带上黄金，顺着山沟向总指挥部所在地出发了。可是，没走多远，就被敌人包围起来。他指挥警卫员沉着应战，边打边往山坡上撤，多次打退了敌人进攻。但是增援的敌人越围越多，包围圈也越来越小。为了不使经费落入敌人手中，郑义斋当机立断，命令战士小张驮上黄金突围，务必送到总指挥部，他自己却留下来指挥掩护。小张冲出去了，经费安全地送到了总部，而郑义斋因身中数弹，同留下的警卫战士一起，全部壮烈牺牲了。

3月13日，徐、陈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军委并告中央：“（一）我们13日晨被敌猛迫进到西洞堡西边90里祁连山腹，全在山上露营，现敌人已赶到，正持战中。（二）西路军现不足3个团，虽精神团结，斗志坚决，但子弹几尽，日夜连续血战，受挫

极大。(三)附近皆高山险路,转移困难,在这紧急情况下,望援西军火速前进,估计援军全部或大部若能于5日内渡过黄河,先头部队渡河后即向凉州进逼,则围可立解。西路军现存的大批干部及知识分子可以保存,并可协同援军解决二马,否则全部危险极大。时迫词切,望即复示,并争取白天与我们通报。”当日24时,军委主席团复电:“你们现在已处在特殊情况之下,已不是一般方法的解决问题,必须立即采取特种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分力量之目的。因此我们向你们提出下列事务和方法,请你们考虑决定一种:率现存之3团人员向外蒙冲去。率现存之3团人员打游击战争。以上方法无论采取哪一种,均需将伤亡兵员安置民间,仍需采取自主自动姿态,均需轻装,均需取变化不测战术。”^①

3月14日,转移到石窝子山上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徐、陈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组成,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政治领导。会议同时决定,把西路军现有部队分为3个支队就地游击:王树声率二十团及骑兵两连,共约700人为一支队;李先念率三十军之基本主力,约5个营共千余人为一支队,工委会随此支队行动;毕占云率十五团及彩号及特务团一部共约千人为一支队。并将决定电告中央及军委。

3月17日,中央及军委回电李先念、李卓然:“(甲)同意你们成立工委会,并分为三路游击。(乙)你们应以主动的游击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及发展,反对过去靠人而不靠己被动而非主动的机会主义路线,过去领导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致陷西路军于今日地位,你们应该坚决反对此种错误路线,而在新的精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66页。

神上执行主动的依靠自己与群众力量的方针。”^①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顶开会时，徐向前正在前沿阵地指挥部队打退敌人的最后一次进攻。当他赶到石窝山顶时，让他离开部队的决定已经作出。他感到很吃惊，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陈昌浩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会后，徐向前仍想动员陈昌浩不要让他回陕北。他拉着陈昌浩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②徐向前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后来回忆说：“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余部组成的3个游击支队，分别消失在祁连山中。海拔5500米的祁连山，仍被一片严寒封锁着，寒风卷着积雪和沙砾漫山飞舞，像利刀似地刮着人们的皮肤。行进在茫茫积雪和悬崖峭壁之间的西路军战士，衣衫单薄，饥肠辘辘。许多人脚上没有鞋子，只包着块破毡片，白天走得出了汗，夜里便结了冰，沾在脚上，两只脚冻得又红又肿，有的人被冻掉了脚指甲。但是为了摆脱敌人，必须咬牙坚持，继续向深山前进。

王树声率领的支队，由石窝向北行动，依托祁连山北麓开展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69页。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50、550~551页。

游击，坚持战斗。敌人集中了大部兵力来追踪他们。3月15日晚8时许，当他们进到康隆寺东西的黄番寺时，敌马彪旅即尾追而至，激战了3小时，红军将敌击退。16日，敌人又发起进攻，红军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打退了敌人十余次冲锋，击毙敌团长谭成祥、马占成等以下官兵百余人。18日，敌集中两个旅的兵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又发动了猛烈攻击。红军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一部向东南方向突围，分散后化装回到陕北。五军军长孙玉清在甘州南山被俘，后慷慨就义于青海西宁。

毕占云率领的支队，在分散游击活动中亦遭受了巨大损失，西路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曾日三、地方工作部部长吴永康及大部分同志均英勇牺牲。

李先念率领的支队于3月14日晚向南行动，深入祁连山区。途中，左臂负伤的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因伤口化脓，胳膊肿得像碗口那么粗。当李先念去看望他时，他告诉李先念，胳膊疼得厉害，血管已经断了，他不能再走了。李先念只好把他坚壁在一个石崖底下，给他留下一部分钱和一包盐洗伤口，并留下一个排的战士，掩护他打游击。快要分手时，李先念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说：“给我留下封介绍信，将来回到延安，我还是个共产党员。”几天以后，马匪便来搜山，掩护他的一排战士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熊厚发被俘。敌人得知他是师长后，用尽酷刑折磨，逼迫他叛变投降，无效；又用高官厚禄、金钱美女收买，这些都遭到他断然拒绝。最后马匪恼羞成怒，把他押解到青海，用大炮将他轰死。在临刑前的最后一刻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

工农红军万岁！”并高唱《国际歌》。熊厚发牺牲时年仅24岁。^①

李先念率领的支队经过了3天的急行军，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尾追。荒凉的祁连山，一眼望去全是冰谷雪岭。部队无粮无盐，衣破鞋缺，不少人被祁连山上的风雪夺去了生命。能够维持生存的唯一手段，就是猎取黄羊、野牛、野骆驼，架火烧熟和着积雪吞食。白天依靠指北针辨别方向，晚上就宿在冰窟山洞之中。但英勇的红军战士依然没有动摇对革命的信念。正是凭着这种信念，这支队伍在李先念、李卓然等领导下，经过47天的行程，终于战胜了雪山、戈壁的极端艰苦的环境，于4月30日抵达星星峡，保存了430人的骨干力量。

5月1日，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等，带着由几十辆汽车载运的物资到星星峡前来迎接和慰问。这支队伍保留下来的人乘车前往迪化（今乌鲁木齐），随后在迪化组成训练队，进行军事政治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分批回到陕甘宁边区。

^① 李天焕：《气壮山河——红西路军远征记》，《红旗飘飘》选编本第二集，第351～352页。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解放军出版社 1993 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上，解放军出版社 1993 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 1993 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卷），解放军出版社 1993 年版。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二、三、四册，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谭克绳、欧阳植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

《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皖西革命回忆录》（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上卷，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 1983 年版。

张廷贵、袁伟：《中国工农红军史略》，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

林超、温贤美：《川陕革命根据地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

林超、温贤美：《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川陕革命根据地论丛》，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下)，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川陕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川陕革命根据地科研组 1978 年印本。

《伟大的长征》，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红军不怕远征难》，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军史》，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版。

《川陕苏区报刊资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

《川陕革命根据地英烈传》(第一卷)，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

《峥嵘岁月》，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星火燎原》(选编之二)，战士出版社 1979 年版。

《星火燎原》(选编之三)，战士出版社 1980 年版。

《红旗飘飘》(选编本第二集)，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9 年版。

《革命回忆录》增刊(一)，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革命回忆录》(九)，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革命回忆录》(12)，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

《革命回忆录》(八)，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

《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

《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博古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年版。

《裴荣臻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 1983 年版。

《陈再道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战士出版社 1983 年版。

王宏坤：《我的红军生涯》，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成仿吾：《长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林伟：《“战略骑兵”的足迹》，战士出版社 1983 年版。

《艰苦的历程》（上、下），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范青：《陈昌浩传》，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年版。

詹杨：《战将的足迹——詹才芳将军的故事》，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年版。

吕黎平：《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版。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1 年版。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中央部分）上，档案出版社 1987 年版。

《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册，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1986 印本。

李理、夏潮：《一世枭雄——蒋介石》，金城出版社 1994 年版。

宋平：《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 = 红军长征全史 第三卷 雄关漫道——红四方面军战史

作者 =

页数 = 456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